

追溯近现代中国起源与历史

——现代化中国的起源与简史，以及东西方世界

【一个基督徒的视角】

【近现代中国历史中的现代化起源、历史、思想、轨迹、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法律、民情等，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西方文明体系和基督教信仰之间的互动、冲击、影响、等复杂关系】

第九章（上）

2020年9月

目录

追溯近现代中国起源与历史

——现代化中国的起源与简史，以及东西方世界

【一个基督徒的视角】

【近现代中国历史中的现代化起源、历史、思想、轨迹、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法律、民情等，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西方文明体系和基督教信仰之间的互动、冲击、影响、等复杂关系】

2020年9月

===

。。。。。。。。。。。。。。。。。。。。。。。。。。。。。。。。

。。。。。。。。。。。。。。。。。。。。。。。。。。。。。。。。

。。。。。。。。。。。。。。。。。。。。。。。。。。。。。。。。

。。。。。。。。。。。。。。。。。。。。。。。。。。。。。。。。

。。。。。。。。。。。。。。。。。。。。。。。。。。。。。。。。

。。。。。。。。。。。。。。。。。。。。。。。。。。。。。。。。

。。。。。。。。。。。。。。。。。。。。。。。。。。。。。。。。

。。。。。。。。。。。。。。。。。。。。。。。。。。。。。。。。

。。。。。。。。。。。。。。。。。。。。。。。。。。。。。。。。

。。。。。。。。。。。。。。。。。。。。。。。。。。。。。。。。

。。。。。。。。。。。。。。。。。。。。。。。。。

==

第九章

1976年-1989年

——

十一届三中全会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5%85%B1%E4%BA%A7%E5%85%9A%E7%AC%AC%E5%8D%81%E4%B8%80%E5%B1%8A%E4%B8%AD%E5%A4%AE%E5%A7%94%E5%91%98%E4%BC%9A%E7%AC%AC%E4%B8%89%E6%AC%A1%E5%85%A8%E4%BD%93%E4%BC%9A%E8%AE%AE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日期　1978年12月18日 — 12月22日

地点　　中国北京市京西宾馆

主持人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

参与者　　　中共中央委员：169人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12人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简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978年12月18日至12月22日在北京举行。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开了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解决了有关问题，此后召开的三中全会只是公布并确认了工作会议的成果。该次会议被视为邓小平时代和改革开放的开端。

背景

1976年10月6日，毛泽东接班人、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及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联同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及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所支持下，在中南海怀仁堂拘捕了四人帮，四人帮被隔离审查，结束十年文化大革命。10月7日，华国锋被推举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并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正式接任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生前的职务。但华国锋为了巩固自己毛泽东接班人的地位及稳定局势，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华国锋并没有因为四人帮被捕而改变自己立场，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意图延续毛泽东时代的方针路线，并欲藉“两个凡是”阻止老一辈政治家复出。由于“两个凡是”延续毛泽东执政时方针决策，华国锋因而作茧自缚，不能改变原有的错误方针，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冤假错案不能得到平反，令人们强烈反对。后期华提出要继续进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及展开批判四人帮运动，但批邓运动不得人心。

1977年，邓小平在“永不翻案”保证下和部分中共元老支持下复出，同年7月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并恢复四五天安门事件后被撤销的一切职务，包括国务院副总理和中

共中央军委副主席。邓小平复出后，对于平反冤假错案有了进一步进展。但由于受到两个凡是限制，大量案件未得到解决，包括批判四人帮运动所揭发的案件，例如震惊中外的四五天安门事件，虽然有大量民众党员要求平反，但受到文化大革命得益的汪东兴、吴德等人反对，有着严重阻力。1978年，局势开始转变，5月，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后期新华社亦转发了这篇文章，《实践》一文在全国各地产生巨大影响，全国展开一系列讨论，令长期受到蒙蔽、愚弄、迷信的人们思想解放，导致“两个凡是”开始被人们怀疑攻击。在此背景下，需要召开一次讨论，谋求解决办法，于是，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准备。

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于1978年11月10日开幕，出席者有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选出的23名政治局委员及3名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常务委员王震、粟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等人。中央工作会议原先主要讨论农业问题、1978年至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议题，但后期突破了原先讨论重点 。11月1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云在会议上发言，指部分批判四人帮揭发出来的问题要由中央作考虑或决定，他先指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牵涉者并非反共，是经中央组织部批准，应予以平反，第二谈到彭德怀冤案，应予以平反。第三是四五天安门事件，指出四五事件并非反革命，中央应平反并肯定。最后是对康生在文化大革命所犯的种种罪行，应予以批评调查。陈云的发言得到很大响应，大量出席者就陈云的意见提出反应，会议展开突破性进展。

11月25日，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在大会上，承认解决问题不彻底，没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11月28日由中共北京市委宣布为革命行动，正式平反）并承认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决定，决定撤销全部中央文件，并为二月逆流、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受害的干部平反昭雪，并给予陶铸、杨尚昆平反，对康生和谢富治的问题，交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审理，并交由三中全会批准审查。

11月25日，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中央政治局委员吴德被批评，吴德在会议上作了检讨。汪东兴在会上被批评盲目支持两个凡是，“鹦鹉学舌”式跟着华国锋讲话。会议上又批评了华国锋的不切实际的经济计划、建设思想。会议主旋律开始转向讨论文化大革命遗留的种种问题。汪东兴亦被批评为兼任太多职务，包括中央办公厅主任、8341部队政委、党委书记、中央警卫局局长，并兼着中央专案组负责人，由于中央专案组是处理、主管文革案件的机构，大量冤案不能平反，是汪东兴不批准，阻碍了冤案平反进度。

当天晚上，党主席华国锋代表了中央政治局决定给予四五天安门事件、彭德怀、陶铸等案平反，并宣布撤销中央专案组、辖下所有办公室，并将所有案件移交中央组织部，今后不再采取成立专案办审查干部，并决定将康生、谢富治的问题进行审查。

12月13日 ，中央工作会议闭幕，邓小平、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分别在会议上作出讲话。

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散会，历时36天的工作会议，基本上解决了文革以来的重大问题，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理论及其追随者在会议上均遭到批判，华的执政理论基础动摇。在其后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其权力更逐渐被邓小平等改革派取代。

三中全会召开

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开幕，共302名十一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出席会议。并有9人被允许列席会议，分别为宋任穷、黄克诚、黄火青、胡乔木、韩光、周惠、王任重、习仲勋。

由于早前已召开为期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三中全会主要继续对以两个凡是问题、平反冤假错案发表意见并落实决定。全会并继续讨论农业及经济问题。会议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高度评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作的作用。并批准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决定，平反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彭德怀冤案。会议召开后，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速度。全会并回顾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教训，提出要按实际情况来发展经济，反对不顾实际情况的经济理论，洋跃进方针被否决，取代之的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全会还讨论了农业问题，认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就整体来说还十分薄弱，只有大力恢复和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才能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全会提出了当前发展农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发到全国各地

试行。另外，从文化大革命时期开始对领袖的个人崇拜问题，在会议上亦受到批评，会上提出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及法制的任务。

三中全会会议上，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理论被抛弃，两个凡是被指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左倾，促使华国锋被迫提早辞职，而其领导地位亦在三中全会起改变，邓小平等改革派占了上风，其实际领导权力已逐渐减少。

12月22日，三中全会进行最重要的人事任命，增补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会议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为中央委员。增补邓颖超、王震、胡耀邦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并决定恢复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陈云为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充分肯定三中全会的作用。

三中全会闭幕后，12月25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进行了人事任免，会议决定任命胡耀邦为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免去其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务，并任命胡乔木为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姚依林出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宋任穷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免去汪东兴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8341部队政委、党委书记，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保留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免去华国锋追随者吴德政治局委员职务。

会议评价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被认为是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和“两个凡是”的束缚，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从此将中共中央的指导思想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从此中国逐渐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走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道路。因此三中全会亦被认为是建国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会议。

https://www.aboluowang.com/2015/1219/662578.html

鲍彤揭三中全会内幕 邓小平从陈云手中夺权

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被定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定性起点。会议知情者、曾任赵紫阳政治秘书的鲍彤认为，这次三中全会的真相一直被掩盖和扭曲。鲍彤披露，邓小平为三中全会的定调政治上极为保守。冲破禁区并引导潮流的是陈云和胡耀邦，邓见风转向夺取了主导权。中共才得以推行批判文革的非毛政策，开启改革开放。本文摘自2008年第3期《开放》，鲍彤口述、姚监复记录，原题为《十一届三中全会谁是

英雄》。

1978年12月，邓小平与陈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改革开放的大会”是一个神话。会议重点并不是讨论改革开放。这实际是一次失控的会议，是出乎华国锋、邓小平意料，要求算老账、向后看的会议。会议进程显示了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和组织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的社会效果与解放思想的威力。邓小平后来是依靠手中的权力成了会议最大的赢家。

全会原定议程是讨论农业、经济与计划，不是平反，更不是改革开放

谁提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是邓小平。他提出的会议议程和讨论的中心议题是什么？他提议讨论三个问题：一、通过农业问题的决定；二、讨论李先念在一九七八年国务院召开的经济务虚会上的讲话；三、讨论计划问题。从邓小平决策的三个议题看，根本不是讨论改革开放。从会议最后通过的农业问题决定仍然坚持“不准包产到户”看，会议不是改革开放的会议。

李先念在国务院经济务虚会议上的讲话稿（不是后来的理论务虚会议），是于光远、邓力群起草的，内容是讲经济的。其中讲了“要经济规律，不要长官意志”，与他以前的讲话比较是好的。邓小平为三中全会选择的议题有

一个目的，就是要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用“四个现代化”这个口号代替“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文革口号。被称为“改革开放的大会”的三中全会，既没有改革开放的议题，又没有讨论改革开放的问题，只有这一个“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是邓小平的发明。

邓小平、华国锋不要回头算文革的帐，陈云、胡耀邦冲破禁区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召开的。为三中全会做前期准备的，更为重要，影响更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是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月十五日召开的。邓小平和华国锋在三中全会前的意见是一致的：向前看，不向后看；不算过去的老帐，不纠缠过去历史遗留问题，也不拟提出文革遗留的毛泽东钦定的大案，包括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因此，华国锋讲话是重点工作要转移到“四个现代化”上来。邓小平于十一月五日至十四日偕夫人访问东南亚新加波、泰国、缅甸。并没有参加会议，会议由华国锋主持。

邓小平没能参加的这五天会议，非同寻常。十日开会当天陈云的发言，十一日谭震林和十三日胡耀邦的发言，冲破了邓小平、华国锋为会议设置的框框，提出了文革中一系列重大遗留问题，使会议原定议程被冲乱，会议就失控了。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胡耀邦为部长的中央组织部为中央工作会议，提供

多种材料和信息：一、关于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材料和中组部的覆查报告；二、彭德怀覆查材料；三、陶铸等人覆查材料；四、关于康生诬陷六百零三人的材料；五、胡耀邦覆查一系列冤假错案中关于历史问题、自首问题的讲话和中组部覆查平反工作中的案例；六、组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带来的群众和高层领导对天安门事件的深刻觉醒的有关信息材料。

陈云十一月十日在东北组发言中说，对华国锋、邓小平提出的工作重点转移的意见：我赞成；历史问题不纠缠是对的。但是，有些问题太大，中央不说话，下面不好解决。陈云发言中参考了胡耀邦提供的材料，根据他本人在中组部和白区地下工作的第一手资料，提出了六个问题：一、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毛主席知道吧？二、关于所谓自首分子问题；三、陶铸、王鹤寿等定为叛徒问题；四、彭德怀同志问题，陈云表面上没有直接讲文革不对，但是翻来覆去提问题。彭德怀同志开除了党籍没有？没有吧？骨灰现在放在哪里？是不是应当放在八宝山？五、关于康生的错误。六、关于天安门事件。群众悼念周总理是反革命还是革命行动？

陈云的发言是迂回战术，没有直接说文革错、毛泽东错，可是敲了边鼓，提出了一些文革中的重大问题。胡耀邦和陈云的发言和材料像大石头扔进平静湖面，引起会议很大震动，突破会议原定的框框，代表们不是集中原定的中心议题：“工作重点转移到四化的问题”，而是集中批判文革，批判凡是派，批判极左思想，要求为毛泽东钦定的冤假错案彻底平反。

陈云只是中央委员，处境、思考问题与邓小平有所不同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没有开大会，分为八个小组开会，地方上按六个大区分组，还有一个中直机关小组，一个军队小组。有几个人做了好事，把陈云的发言编了《简报》，印发各组。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时，还只是一位普通的中央委员，不是政治局委员，因为从“九大”以后，陈云就没有被选进政治局。虽然不是政治局委员，但是陈云曾经长期担任过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长、党中央副主席，余威犹在，陈云点了火、开了炮以后，各个组七嘴八舌都跟上来了，整个中央工作会议就活跃了。在工作重点转移的原定议题之外，会议代表，全党和全国人民更关心的是天安门事件和文革中的一系列重大冤案的平反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还在台下的陈云，同已在台上、恢复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职务的邓小平的处境，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重点有很大不同，因此陈云带头勇敢地冲破了华国锋、邓小平为会议设置的框框，使整个会议失控了。

同会内的热烈讨论文革问题相配合，天安门、西单民主墙的群众的大字报也开锅了，矛头直指向文革、“四人帮”和华国锋、汪东兴等凡是派，甚至指向毛泽东和一党专政。十一月十四日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在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表示：“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胡绩伟、曾涛、杨希光、于光远商量，这是事件发生地最高领导人对事件的正确评价，新华社要当作重大新闻向国内外发布。当晚七时多，新华社的新闻稿发布。

邓小平用于光远代替胡乔木，重新起草讲话稿，从陈云手中夺取主动权

邓小平十一月十四日从东南亚出访归来之后，发现中央工作会议在陈云、胡耀邦发言的带领之下，已经跳出华国锋和他设置的框框，他自己已经没有了会议的主动权。胡乔木为他起草的大会讲话稿也根本不能用了。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一日邓小平对胡耀邦说："乔木的思路不行。你给我找人写。"胡乔木会前为邓小平起草的讲话稿中说：

"实行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还是要处理好阶级斗争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还有阶级斗争，党内还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点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不但王张江姚是走资派，河南省委的王维群、驻马店地委的苏华，也都是不折不扣的走资派，他们的罪恶比三反时候河北省的刘青山、张子善严重得多。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既不应夸大，也不应该缩小，夸大了会把社会主义当作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但是都还有些空子可钻，都还有一些人要钻空子，这就有了产生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可能。在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增加以后，这种可能性一定会增加。我们一定要经常保持清醒头脑，随时采取必要的措施，务必要使阶级敌人的一切活动在开始出现的时候加以消灭，不要等问题成了堆再去处理。"

这个稿子的思想体系仍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以阶级斗争为纲、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你死我活的斗争的视角。准备在三中全会上用的这个发言稿子显然大大落后于中央工作会议的发展形势，比起陈云发言更是落后的太多，了无新意了。因此，邓小平否定了、拒绝了胡乔木起草的这个稿子，他说："看来乔木是不行了。"八十年代清污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重新重用胡乔木，此后胡乔木起草的发言稿中的主要思想并没有根本改变，只是更聪明地用"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化分子"代替"四人帮"的专用词组"走资派"、"新生资产阶级分

子”、“阶级敌人”。这样，具有同样的反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思想基础的邓小平又看上胡乔木了。这是后话。

十二月二日，邓小平邀胡耀邦和国务院研究室的于光远到他家商谈起草讲话稿。按邓小平亲自草拟的三页五百字的讲话提纲，胡耀邦、于光远、林涧青等人五、七、九、十一日接连四天，到邓小平家共同研究讨论，最后定稿，题目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十二月十三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以此文做报告。

是中央工作会议推动了邓小平思想变化与进步，而不是邓小平设计了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实际进程。因此，邓小平既不是什么“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没有把三中全会开成“改革开放的大会”。而是群众、党员、高级干部推动了整个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变，促成了邓小平讲话内容的转变。

陈云与邓小平谁是三中全会的英雄？

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央工作会议、三中全会是陈云和邓小平争英雄的一场暗中较劲的公开比赛。前期陈云高举平反的旗帜、高喊民主的口号，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和会议代表的真诚拥护和欢迎，这是三中全会上陈云由一个普通的中央委员又被选为中央副主席的重要的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邓小平看清了，看懂了形势的紧迫。邓小平看到陈云的讲话预示着东山再起，有些好话谁先说，谁将拔得头筹。同陈云争夺民心、党心也就是争夺最高领导权。甚至是未来的第一把手，名义上的主席和背后的婆婆由谁担

任的问题。

客观地看，邓小平最后的讲话是很好的、很有用的，同时也是不符合邓小平本意的。同邓小平原来交代胡乔木起草的讲话基调是完全不同的。为了比陈云的讲话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邓小平讲了党和国家的制度问题、民主问题、解放思想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可惜的是，邓小平讲出的只是一些很好听但不拟执行的好话。

邓小平最不愿意看到的是会外西单民主墙的议论；他看到了文革遗留的难题，但不愿延伸到反右派斗争的彻底平反问题，因为他自己就是反右派斗争五人小组组长，只愿意为右派份子个人"改正"，而不能为反右派斗争平反，仍旧坚持说："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正确的，只是扩大化了。"没有真正做到也不愿做到胡耀邦坚持的"有错必纠"，"毛主席批的错了，也要平反。"对于民主、自由、人权、三权鼎立，他认为都是西方的资产阶级的东西，都不能用。因此，他赞成抓魏京生，反对西单民主墙，取消"四大"，这些做法正是他让胡乔木起草的讲话的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毛泽东的"六项标准"的延续，邓小平自己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根源。

从会议结果看，陈云是会议当然的英雄，因此摇身一变，由中委成为副主席，洋洋得意；华国锋以主席身份挨批，他为他和邓小平共同为会议定的框框，为"两个凡是"受指责，灰溜溜的；但是同样应当承担会议框框和"两个凡是"责任的邓小平也能摇身一变，把会议成果拿过来，只用一句话："北京市委关于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决定就是中央的决定"，变成他自己的功劳。中央工作会议、三中全会成了邓小平变脸的表演会。

假如认真阅读邓小平的三中全会的讲话，会发现邓小平通篇只讲民主作风，没讲民主制度；着重讲经济发展，没讲政治改革的要害是党的改革、开放党禁、报禁问题；即使讲农业发展，也没讲农村改革，三中全会关于农业的决定强调的是“不准包产到户”，这个文件起草的负责人是纪登奎。至于后来批评华国锋搞“洋”跃进，搞十个大庆的错误，实际上，“十个大庆”是李先念提出来，邓小平支持的，为了大干快上的新跃进，最后把帐算在华国锋的头上。那时翁永曦四个年轻人写封信，主张“轻改革重调整”，陈云评价很高。

总之，三中全会不是改革开放的大会。把这次会议人为地挂上光环说成是“改革开放的大会”，这是编造出来的一个神话。同时，又出来了另一个神话：“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改革不是领导出来的，也不是设计出来的，三中全会之所以成功，是在于它是失控的大会，但是符合人民心愿、符合历史发展客观规律。我在三中全会二十周年时就讲过，三中全会的成功原因，全部在于七嘴八舌，可以各抒己见，讲自己的话。三中全会失控，在于失去领导。既然陈云可以对毛泽东说不；既然陈云、胡耀邦可以对毛泽东批准的几个文革大案说不，那么老百姓也可以对文革说不；也可以对人民公社说不。三中全会上代表们可以七嘴八舌，那么老百姓也可以在政治生活中七嘴八舌，这种自发的对民主的追求，对宪法言论自由权利的捍卫和运用，推动了改革。

至于领导方面的斗争，从领导人排序看，原来是华国锋为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汪东兴、李先念为副主席，从三中全会以后，陈云从中央委员升到副主席，排列第五；而邓小平实际上从第三位变成了握有实权的第一

位。应当说邓、陈得胜，华、汪失败，叶、李保住位置，而最大的赢家是邓小平，贪天功为己功，贪人功为己功，时势造了英雄，又造出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姚监复注：此文由鲍彤口述，姚监复记录、整理。自一九八九年五月鲍彤成为秦城监狱“八九〇一”号囚徒之后，全部笔记本被收走，至今未归还，所谈全凭记忆。姚监复从《胡耀邦思想年谱》等书核对补充。仍有不准确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对《胡耀邦思想年谱》编者致谢。

https://www.rfi.fr/cn/%E4%B8%AD%E5%9B%BD/20181229-%E9%B2%8D%E5%BD%A4%E4%B8%BA%E4%BD%9511%E5%B1%8A3%E4%B8%AD%E5%85%A8%E4%BC%9A%E4%B8%8D%E6%98%AF%E6%94%B9%E9%9D%A9%E5%BC%80%E6%94%BE%E7%9A%84%E8%B5%B7%E7%82%B9

鲍彤：为何11届3中全会不是改革开放的起点

发表时间： 29/12/2018 - 22:30

2018年12月18日中国政府在北京人大会堂举行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大

会。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11届3中全会被普遍看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但曾经担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政治秘书、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等职务的鲍彤先生不赞同这种说法，在他看来，11届3中全会本身并不是一次改革开放的大会，但它掀起了一股怀疑共产党、怀疑毛泽东的高潮，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创造了条件。而改革开放也完全没有顶层设计，其主体更是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而不是党。身在北京的鲍彤先生通过电话向法广阐述了他的观点：

陈云一番讲话改变了11届3中全会的原定基调

法广：中共中央11届3中全会被普遍看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但您不赞同这种说法，几年前您就提出：11届3中全会并不是一次改革开放的大会，请解释一下您的观点？

鲍彤：11届3中全会在1978年（法广注：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召开以前，邓小平和华国锋决定要团结一致向前看，不要向后看。是这样一个组织（基调）。所谓向前看，就是搞建设，也就是四个现代化，这是华国锋同志上台以后提出来的。不要向后看，意思就是不要提文化大革命。这是会议的基调。如何证明这一点呢？我们可以从《陈云文集》里看出来。

陈云当时是一个一般中央委员。在讨论过程中，陈云有一个讲话。他说，

中央决定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这是很正确的。过去的事情宜粗不宜细，我们不要提了，这也是中央的决定。问题在于有些问题太大，到底怎么回事，中央得有个说法。他于是提了，我忘了，大概是6个或是7个问题。比如第一个问题，他是这么说的：彭德怀同志的骨灰到底葬在什么地方，大家知道不知道？东北组的人都说不知道（他是参加东北组的讨论）。他（陈云）说：是啊，彭德怀同志还是共产党员，没听说中央做过开除他出党的决定啊。他还是共产党员，为什么不葬在八宝山呢？大家都说：是啊，为什么不葬在八宝山呢？他还提出一个问题：四-五天安门事件到底是个什么问题啊？他说，四-五天安门事件据说是反革命（事件）。怎么会是反革命呢？当时的理由是他们哀悼周（恩来）总理。哀悼周总理怎么算是反革命呢？后来又说四-五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是因为他们要求邓小平出来（复出主政），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怎么算是反革命呢？这个问题得说清楚啊……他说，像这样的问题太大，中央不表态，我们地区上的工作不好做。恐怕这些问题需要谈谈吧。就这样，他又谈了一些别的事情。比如，（陈云在1938年的时候担任中央组织部的部长），有些人说陶铸同志有什么问题，他（陈云）说，陶铸同志坐牢的历史是清楚的，有什么问题？……

法广：您的意思是说，原来会议的基调是向前看，不向后看，但陈云在讨论中提出，过去的问题不解决也是不行的……

鲍彤：他说，过去的问题不解决，全党的认识不统一，而要解决，必须中央说一句话：中央不说话，叫我们怎么办呢？！他就这样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意思很清楚，就是陈云主张要向后看，要回顾，要把过去的是非说清楚。那么过去的事非要说清楚的是什么问题呢？那就显然牵扯到

文化大革命，而且还牵扯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这些问题都要说说清楚。

他在东北组提出这个问题以后，当时发生一个问题：他在东北组发言，当时大概分成八九十个小组，别的组不知道陈云到底讲了什么。当时的大会秘书长是胡耀邦。胡耀邦主张将大家说的话都印成简报，哪个小组发言，别的小组也可以知道。这样一来，陈云的发言就传到了所有其他小组。这一下子就开了锅了，沸腾了。本来，如果陈云不说这番话，因为邓小平与华国锋已经建议要团结一致向前看，不要向后看，大家都知道这个意思就是不要算老帐。现在陈云一算老账，大家都说，陈云同志可以算老账，我们为什么不能算老账呢？！于是所有的组纷纷响应，都提出了各自关心的问题，这样一来，情况就起了变化。

法广：就是说陈云的讲话改变了11届3中全会原定的日程……

鲍彤：对。整个11届3中全会最后讨论得最热烈的、用的时间最长的，是讨论过去，而不是讨论将来。是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向前看只要一句话：大家团结一致搞建设。这一句话就够了。向后看就产生了无数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中的这个案件对不对，那个案件对不对，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庐山会议对不对，那个问题对不对，文化大革命中审查干部，这个叛徒事件对不对，那个历史问题怎么办……都发生问题了。这一下整个会议就变成向后看的问题了。

会议掀起了怀疑共产党、怀疑毛泽东的高潮

法广：那从这个角度说，是不是11届3中全会其实不是一个启动和制定改革开放路线纲领的会议，它之所以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是一次转折，是因为它决定对过去曾经发生的事情做一个评断？

鲍彤：对。是这样的，按照原来的意图，过去的事情都不要提，现在变成过去的问题要提，而且成为会议的中心题目了，会议的主题就变了。接着马上发生一个问题：华国锋接受了陈云提出的意见，要求北京市委重新考虑四-五事件。北京市委于是做出了一个决定：平反第一次天安门事件！本来毛泽东说第一次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北京市委做出的决定说，第一次天安门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等于平反了四-五事件。

四-五事件一平反，老百姓就知道了。本来（中央）会议上的事情老百姓不知道。当时三中全会还没有开，这些还只是预备会、准备会议，叫中央工作会议，不是三中全会，但是是为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召开以后，会议主题变成了讨论党的历史错误了。其中由于北京市委就北京天安门事件公布了一个决定，就让全国老百姓都知道了中央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做了改变，从反革命事件变成革命事件了。这样，老百姓也就在会外发出响应：这个问题改得好，那么别的问题怎么办？都发生问题了。这样一来，全国政治生活就引起了非常热烈的一个热潮：讨论党的历史错误。讨论党的历史错误最后引起了大家一个共同的要求，要求改掉毛泽东。所以后来的问题就是这样的：中央可以议论党的历史错误，那么地方各级党委有没有可能讨论？也可以讨论啊。党内可以讨论，老百姓可以不

可以讨论？也可以讨论啊。可以讨论政治事件，是不是可以也讨论其它问题呢？比如，可以不可以讨论大跃进？可以不可以讨论人民公社？都可以讨论了！是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中共中央是被动的，邓小平和华国锋是被动的。

我必须补充一句：邓小平当时不在北京，邓小平以为他和华国锋提出了向前看、不要向后看，就大局已定，不会有什么不稳定因素了。他因此出访了，去新加坡，去马来西亚，等等。所以，三中全会之前的准备会议开始的时候，邓小平不在国内。他回来一看，形势已经大变，不知道该怎么收拾。邓小平本来在离开北京的时候，交待胡乔木，告诉他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向前看，不要向后看，因此要讨论怎么大干快上，要求胡乔木为他写一份发言。邓小平一回来，胡乔木就把那篇发言稿送给邓小平。我听说，邓小平看都没有看，就把文章放在一边，说现在这篇不行了，要重新写。就找了胡耀邦，说另外找几个人，重写一篇稿子。后来大概就找了于光远等人。这就是后来我们看到的文章，而不是此前胡乔木起草的稿子，也就是不是邓小平原来意图的内容，基调完全变了，变成了：要发扬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变成：要让大家讲话、让大家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这些名言就是这么出来的。如果邓小平不把主题改了，那么中国的第一号人物就是陈云，而不是邓小平了！

法广：是不是可以说整个11届3中全会的关键节点在于提醒全国上下重新审视历史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放下了一个文革历史问题的一个包袱，才使中国后来可以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

鲍彤：对。但是要说清楚，为什么我认为11届3中全会不能说是一次改革开放的会议？因为，大家可以重新看看11届3中全会的公报，公报里根本没有改革开放这四个字！11届3中全会只是告诉大家：党是有错误的，毛泽东是有错误的，大家是可以讨论的。因为大家可以讨论，因此群众就说，我也可以讨论，我也可以动自己的脑子，我也要改掉毛泽东。这种情况下才出现了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就是要改掉毛泽东。如果没有这一条，根本改不掉毛泽东：凡是毛泽东讲的都是绝对真理、都是宇宙真理，那还有什么改革好说呢？！所以，我直接的证据就是请大家看一看11届3中全会的公报，看看公报里面有没有改革开放这四个字。如果没有这四个字，那就说明11届3中全会不是改革开放的起点，但是它为改革开放创造了条件，就是：毛泽东是有错误的，共产党是有错误的，这些错误是应该改掉的，因此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发表自己的意见，就是不光是共产党的领导是否正确，而是群众所关心的一切问题，大家都可以发表意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11届3中全会可以说是掀起了怀疑共产党、怀疑毛泽东的一个高潮，从这里面才派生出来了改革开放、改掉毛泽东这样一个要求、一个全国性的潮流。

改革的主体不是党，而是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

法广：如果说改革开放当时在11届3中全会上并没有顶层设计，但后来中国40年来改革开放的成绩也是不可否认的，可以不可以说改革开放其实不是一个单一的由上至下过程，而是上下互动的一个结果？

鲍彤：是这样：就改革本身来说，改革的主体，很清楚，是要求摆脱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的制度这样一个潮流，就这股潮流来说，就产生了各方

面的改革，因此改革也好，开放也好，它本身不是顶层设计出来的，恰恰相反，是顶层失去了控制，群众自发地要求改掉毛泽东思想、改掉毛泽东制度，在这里面，农民提出农民的要求，工人提出工人的要求，城市提出城市的要求，农村提出农村的要求，那么私有制就出现了。否则中国根本没有私有制。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刚回到北京的时候，1977年，已经没有一个私有制（单位），连修皮鞋、剃头都是国有的，一个剃头摊子，摆一个脸盆，都挂一面旗子，叫国营理发！后来为什么出现私有、出现个体、民营了呢？这些本身都不是顶层设计出来的，是没有办法的一个办法，是群众已经风起云涌地要活！要找出路。共产党有没有出路给他？共产党不能给他就业，没法让他当干部，没法让他进机关工作，也没法让他到工厂里来，所有工厂都在亏本，工厂不招工。怎么办？自谋生路！这就出现了私有制，如果没有私有制，没有私有经济，后来的改革，一个字都谈不上。所以我说，最重要的问题是，改革的主体是谁？不是党，改革的主体是中国人，是中国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不愿意被一党领导捆住手脚的人。所有的改革意见，都是要改掉毛泽东的要求，而不是要加强毛泽东领导的要求。后来把这些问题说成是：改革开放第一条经验就是加强党的领导，这很滑稽，是完全违反历史真相的。如果当时就有顶层设计，就什么都没了。当时，像农村的包产到户、城市里私有制的出现等都是大逆不道，都是颠覆社会主义、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都是与毛主席唱反调。按照当时的传统，是应该镇压的，而不是支持。但是，因为群众的要求如此强烈，就发生一个问题，党内很多共产党员也跟着群众一起。他们也是人，他们也是中国人，他们也不愿意做奴隶，他们也要提自己的要求，所以这部分共产党员来参加改革开放，与其说是作为党的领导人来领导改革开放，不如说他们是作为人民的一部分提出自己的诉求。

* *

*

小资料（根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资料整理）

1978年11月10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出访新加坡、泰国等地，会议由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主持。

1978年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的分组讨论中发言，提出需要解决一些文革遗留的和历史遗留问题，平反一批重大冤假错案。

11月14日，经中央批准，北京市委宣布对1976年因参加四-五天安门事件而受到迫害者，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反击右倾反案风以及涉及党的领导人的一些已经查明的重大错案平反。

12月13日，邓小平作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篇讲话实际上成为后来召开的11届3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12月18日-22日，中共11届3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为彭德怀、陶铸举行追悼大会，为他们恢复名誉。

伤痕文学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A4%E7%97%95%E6%96%87%E5%AD%A6

伤痕文学

伤痕文学泛指中国大陆于1970年代末期“拨乱反正”时期开始的一种文学创作思想（潮流），是中国大陆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最先出现的一种文学现象，为1980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学思潮的主流。主要是表现文化大革命为

人们带来的精神物质上的巨大伤害以及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反思，是一个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文学现象，在当时中国大陆社会有广泛影响。

开端

伤痕文学开端于1977年11月刘心武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小说《班主任》，其名称来源于复旦大学一年级新生卢新华于1978年8月11日在《文汇报》上发表的小说《伤痕》。当时评论界认为《班主任》主要价值是揭露“文革”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的灵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内伤”，有认为该篇发出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卢新华的小说《伤痕》也在“反映人们思想内伤的严重性”和“呼吁疗治创伤”的意义上，得到当时推动文学新变的人们的首肯。

发展

伤痕文学早期创作以短篇小说为主。一般认为最早问世并产生较大影响的是莫应丰出版于1979年的《将军吟》。周克芹描写农村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古华的《芙蓉镇》也是此类主题的代表作。这些作品许多被改编为电影和电视剧。

代表人物和作品

《班主任》/刘心武

《苦恋》　/白桦

《伤痕》/卢新华

《灵与肉》/张贤亮

《爬满青藤的木屋》/古华

《思念你，桦林！》袭巧明

《飘逝的花头巾》/陈建功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弦

《本次列车终点》/王安忆

《我是谁》/宗璞

《啊!》/冯骥才

《大墙下的红玉兰》从维熙

《将军吟》莫应丰

《芙蓉镇》古华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周克芹

《人啊，人！》戴厚英

《诗人之死》戴厚英

《我们仨》 杨绛

《雪城》 梁晓声

评价

正面评价：伤痕文学使当代文学重新回到“人学”的正常轨道；它摆脱了“假、大、空”，使文学重新回到真实的艺术世界；它一反空洞说教的文艺观而强调了感情在文艺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它用真实感人的艺术人物与“三突出”模式的脸谱化人物作出强烈比照。

负面评价：伤痕文学作品也有明显的不足。当年许多作品有的因情节离奇、有的因片面渲染鲜血淋淋而引起过争议和非议。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car_literature

伤痕文学

伤痕文学是中国文学在20世纪70年代末、毛泽东去世以后不久、拨乱反正期间出现的一种流派。描绘了文革和四人帮统治期间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惨痛经历。

历史背景

在拨乱反正时期，中国社会出现了一段开放阶段。伤痕文学甚至被形容为“第二次百花运动”。虽然伤痕文学侧重于创伤和压迫，并被描述为风格主要是负面的，但爱和信仰仍然是其主要主题；它的作者群体通常不反对共产主义，但相反，他们仍然相信党有能力纠正过去的悲剧，并“将爱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钥匙”。无论如何，尽管他们的作品被誉为标志着传统的复兴艺术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但实际上代表了对这一传统的突破，因为它不再受党的控制，也没有义务为群众政治教育服务。

例子

该类型的第一个范例被普遍认为是卢新华1978年的故事《伤痕》，它抨击了官员的虚伪和腐败。刘心武的1977短故事《班主任》也被描述为伤痕文献的先驱，虽然这种评估是有争议的。

当时的代表性作者大多是三四十岁；他们担任受薪作家和编辑，并在国家资助的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他们在作品中表达的道德愤慨引起了公众的共鸣，从而促进了作品的流行。

并非所有经历过文革的作家的作品都可以归类为伤痕文学。张承志尤其以他对文革经历的理想主义著称；他的作品如《黑骏马》和《北方的河流》被描述为对“伤疤文学的否定主义”。

回应

然而，伤痕文学并没有完全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免费通行证；早在1979年，由于批评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以及对社会问题的曝光，它们就受到保守派的抨击。魏京生受审等事件向作家表明，公开是有限度的。讨论党的过往错误，——在四人帮审判结束后，已经不那么自由；政治气氛明显变冷。最终，作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更广泛运动的一部分，政府开始打击伤痕文学。

邓小平本人为这场"反对自由化"运动提供了主要支持，尽管他在早先的耻辱和在政治上战胜对手华国锋后重返中国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伤痕文学中固有的对毛主义的否定及其对公众舆论的影响。

反对伤痕文学的运动本身很不寻常，与早期的反对自由主义运动不同，官方批评通常仅限于对其内容的攻击，而不是对个人的谴责。

____

胡耀邦与赵紫阳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3%A1%E8%80%80%E9%82%A6

胡耀邦

胡耀邦（1915年11月20日－1989年4月15日），字国光，祖籍江西高安，生于湖南浏阳，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二代主要领导人之一，曾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任红三军团第五师第十三团党总支书记，参加长征。抗日战争期间，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副主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担任晋察冀野战军第四纵队、第三纵队政治委员、华北军区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中国共青团书记、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迫害，此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等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81年6月至1982年9月担任中共中央主席，1982年9月至1987年1月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是拨乱反正时期、改革开放早期平反冤假错案和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具体执行者，1987年被指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被迫辞职。1989年胡耀邦的去世直接引起大量的民众怀念与抗议运动，运动由悼念其的演变和加剧最终导致六四事件。

生平

早年生涯

胡耀邦祖籍江西省高安市华林山镇胡氏古村，1915年11月20日在湖南省浏阳县西岭镇中和乡苍坊村诞生，家中因行九而乳名九伢子。其堂叔父胡祖仪根据《诗经・大雅・文王》篇“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和《易经》“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之句取名为邦，字国光。胡耀邦发育并不算好，幼年吐字困难、有些结巴，但非常聪明且活泼。1920年，他被胡祖伦送至胡氏家族的种桃书屋读书。

1922年，胡祖仪的新式学堂创议获得通过，改为兴文小学，胡耀邦和堂兄胡耀清因此住转入新学。1926年，胡耀邦在读完初小后，到文家市的里仁学堂读高小，学堂校长陈世乔、教师甘思藻、吴千晋等都是共产党员，胡耀邦因此开始吸收共产主义。他每天读书来回需要20公里崎岖山路，这段艰苦历程也使他保持健步疾走的习惯直至晚年。在高小时期，胡耀邦更是连年以第一名成绩升学，并担任学堂的少年先锋队队长兼宣传组长；不久他的表兄杨世俊（杨勇）也转入里仁学堂。

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

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失败，马日事变后，里仁学堂被查封，陈世乔、吴千晋等人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杀害。8月7日，中国共产党因此召集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决定土地革命和武装暴动方针；并派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发动秋收暴动。9月9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决定攻取长沙，但战役的困难使得部队在浏阳文家市集中并召开紧急会议（即文家市决策），并改为主张放弃攻打长沙，改为向农村山区等地方发展，以求保存实力。9月20日，部队在里仁学堂操坪集合，毛泽东对中共革命路线调整进行讲话，年幼的胡耀邦目睹了这一革命性的场景。

1929年，胡耀邦转到浏阳县立初级中学读书，并经本县杨桂英介绍，秘密加入共青团。1930年，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和黄公略的红六军在浏阳、东乡等地国军交战，浏阳中学部分师生转移到长沙妙高峰中学。但不久彭德怀率红三军团进攻长沙，胡耀邦因此不得不中止学业。同年8月6日，红三军团转战浏阳，并和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军团在文家市击溃第四路军第三纵队，并成立红一方面军。胡耀邦回乡后，因为能够读书识字，被推举为乡团支部书记，团结乡村支援红军和苏维埃政权。1930年10月，胡耀邦被调到第十八区区委做宣传。不久，中共湘东特委选中，担任湘东特委儿童局工作。

1931年2月，他改任少共湘东特委技术书记，在任期间的卓有成就的努力，引起冯文彬注意。然而当时由于中共肃反工作的盲目扩大化，1933年中共湘赣省委政治保卫局将年少的胡耀邦和谭启龙列入AB团（反对布尔什维克组织）嫌疑人名单中，冯文彬有心保护两人，于是带他们至中央苏区驻地瑞金。当时共青团苏区中央局书记顾作霖和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长张爱萍经过调查，解除两人审查、并分配工作，胡耀邦因此留在青年部担任干

事。1933年8月，他担任中央苏区反帝拥苏总同盟青年部部长、兼任宣传部部长。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初，担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1934年10月，胡耀邦跟随中央纵队开始长征。1935年，他编入红三军团第五师第十三团党总支书记，在强攻遵义门户的娄山关战役中负伤，弹片击中右臀部，被抬入天主教堂急救，但嵌入体内的碎片始终未有取出。年底，胡耀邦跟随中央红军抵达陕北。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派遣红军东征山西。1936年1月，胡耀邦调到地方工作组，任石楼县工作队队长，向当地宣传红军及中共宗旨，并为东征红军进行补给。然而盘踞山西的阎锡山对此十分恐惧，并请求蒋介石调陈诚、汤恩伯、关麟征的中央军进行阻击。中共中央在红军获取物资后，随即撤回东征部队返回陕北，历时75天的东征结束，胡耀邦也随部队撤回陕西。尽管如此，他负责的石楼县一地，短期就招募新兵一千余人，成绩最为显著。

抗日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3月，胡耀邦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担任第一大队党总支书记，后留下编入高级研究班。同年秋，留任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副主任，主办校刊《思想战线》。1938年24月，抗大举办第四期，胡耀邦兼任第四期一队政委，与队长苏振华搭档。1939年3月，中央调胡耀邦返回延安，担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当时部长方强在华北工作，胡耀邦因此代行部长职位、不久直授，由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和副主任谭政领导，着手负责整个共产党部队领导干部的考察、任免和调动。1940年，胡耀邦兼任军委直属机关政治部主任，并配合柯棣华筹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1941年11月，胡耀邦同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毕业生李昭结婚。李昭出生于湖南宁乡，后随母到安徽宿县定居。抗日战争期间，投身新四军战地服务团、豫东游击队，1939年抵达延安。1942年，他们第一个儿子降生，取名飞飞（胡德平）。1945年，胡耀邦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

晋察冀作战

抗日战争结束后，胡耀邦向毛泽东请求到前方开辟工作，毛泽东同意并委任他作为先遣支队的负责人，提早奔赴东北。而此时胡耀邦和李昭的第二个儿子降生，因考虑奔赴东北长远，只得割舍骨肉，由游击队员刘世昌抚养，合两家之姓氏取名“刘湖”。然而部队在跨入平泉时，国军13军已在美国海军协助下抢占平泉县城[3]:99。1946年，中共中央决定胡耀邦改任冀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与司令员萧克、政委程子华合作。

然而数月的长途奔袭和紧张工作，胡耀邦忽然高烧腹泻，当时叶剑英担任中共代表在北平参加军事调停处执行部工作，遂送胡耀邦在北平协和医院诊治，并判断为阿米巴肝炎。在叶剑英、罗瑞卿的照顾下，他很快康复，之后调往张家口继续治疗，在医师稗田宪太郎的诊断和护理下，他很快得到康复。同年7月，他改任晋察冀野战军第四纵队政委，与司令员陈正湘搭档，这也是胡耀邦首次以指挥员身份率部参加战斗。

当时晋察冀野战军刚结束晋北战役，共军顺利占领山阴、岱岳等地，部队

逐渐围攻大同。但在大同指日可下之时，傅作义派遣三万部队从归绥迁往大同，并由集宁开进大同。由于聂荣臻判断失误，导致傅作义部国军轻易冲开了解放军在卓资山的阻击阵地。尽管胡耀邦、陈正湘率领第四纵队围堵集宁，与傅作义部国军101师发生阵地战，最终不敌放弃集宁；晋察冀部队只能随之撤围大同。随后第四纵队在抵御张家口西线时，再次被善于用兵的傅作义攻破，共军被迫放弃张家口。

在大同集宁战役、张家口战役连续受挫后，1946年10月，晋察冀中央局召开会议，调整部队战斗序列；胡耀邦和陈正湘仍然担任第四纵队政委和司令。1947年，随后晋察冀野战军接连在易涞战役、满城战役、保南战役中接连获胜，四纵趁机占领石家庄外围的栾城县，之后配合二纵、三纵，将山西阳泉以西的国军压缩包围。正太战役成功割断太原与石家庄的国军联系，并促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共军解放军相连。战役结束后，晋察冀部队再次整编，胡耀邦调任第三纵队政委，与司令员郑维山、副司令文年生、政治部主任陆平搭档。

当时晋察冀野战军士气正盛，决定继续利用围城打援战术，意图以运动战方式，消耗北平、太原、石家庄等地的国军防御力量。因此三纵北上发动大清河北战役，而二纵、四纵则等候国军16军、94军西援时伏击。9月2日，胡耀邦、郑维山率部奔袭保定，但国军坚持据守各个阵地，共军损失较多，却始终无法得到预期目的。然而此时形势有变，国军调华北部队前往东北围堵东北野战军，晋察冀军区决定再战保定以北一线，并对徐水发动攻击，国军李文亲自率军救援，双方又形成阵地战，四纵、三纵被迫撤出；当时野战军司令部要求三纵西进再攻涞水县，胡耀邦复电坚持等待时机，并最终得到同意。

战机很快降临。镇守石家庄的国军第3军军长罗历戎率军北上，意图与孙连仲部南北夹击，围困二纵、三纵。通过激烈战役，野战军成功在清风店围困罗历戎部，并最终俘获国军一万一千余人。战役中胡耀邦率领三纵第七旅成功在保定-安顺桥一线上，成功封堵试图南援的孙连仲部。清风店战役后，石家庄已然是一座孤城。10月25日，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亲自抵达安国，指挥石家庄战役。郑维山、胡耀邦率三纵从西南，四纵从东北负责主攻。11月6日，解放军开始进攻石家庄，三纵在8日突破至外市沟，并使用坑道炸药进攻，因战役激烈，胡耀邦曾一度到前线突破口指挥。12日，战役结束，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完全联为一片，并首创解放军攻克大城市模范战例。

石家庄战役后，国共双方的重点再次定位到保定以北，胡、郑两人再次率领三纵于12月奔袭北上，攻打涞水。1948年1月，三纵在攻击涞水县城时，侦查得知国军35军主力驻扎庄疃，随后胡、郑当机立断，调令全纵队改变主攻方向，转为围攻庄疃。其他野战军部队迅速参与围堵，1月13日，国军32师全军覆没、35军军长鲁英麟举枪自尽，涞水战役结束。

太原战役与进军西南

1948年5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抵达河北平山西柏坡。5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组建华北局，原晋察冀军区与晋冀鲁豫军区合并，改为华北军区；中共中央决定将华北军区主力组建三个兵团，直属中央军委。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改为第一兵团（后改十八兵团），由徐向前兼任司令员和政委、周士第任副司令员和副政委，陈漫远任参谋长，调升胡耀邦任第一兵团政治

部主任，下辖八纵、十三纵和十五纵。同年9月，他参加西柏坡会议，随后到太原前线传达精神。

太原战役在结束外围东山争夺战后，中共中央一度考虑暂时围困太原，而运筹平津战役；11月，兵团组成对敌斗争委员会，由王世英、胡耀邦负责，旨在进行政治攻势、瓦解太原守军；胡耀邦制定了一系列政治攻势逐渐酵化、产生效果：他派遣赵承绶、杨诚劝降晋军第八总队司令赵瑞，陆续瓦解晋军一万余人投诚解放军。在策动国军新编30军军长黄樵松的行动中，胡耀邦曾自告奋勇、要求入城协助部队投诚，但被徐向前留住，最终改派黄樵松同乡晋夫迁往。此事却由黄部下戴炳南密报阎锡山，致使行动流产，黄、晋等人被国民政府枪决。事后，徐向前力劝中共中央改为主攻，胡耀邦则将在战前工作，担任太原前线政治部主任，准备进入太原城后的城市政策和部队纪律。1949年4月22日，解放军攻占太原，胡耀邦担任太原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着手治理太原城市治安，迅速组建山西和太原政府机构、恢复学校和工厂等。

同年5月，十八兵团、十九兵团改隶属第一野战军序列，由彭德怀指挥进攻西北。胡耀邦随部西进，并率先同解放军第61军抵达咸阳前线，与马家军马继援部交战并获胜。此后他随部参加扶郿战役、宝鸡战役。西北战事逐渐结束后，十八军团改归贺龙指挥，向西南挺进。当时中共中央决定1949年9月，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7月29日，胡耀邦同贺龙前往北平参加会议，并出席10月1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当时第二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已经通过渡江战役进入华东、华中，并对西

南局势进行大迂回攻势，并顺利结束川黔战役。11月，胡耀邦随第一野战军冲向国军大巴山防线，以破竹之力连续攻城，将胡宗南兵团围困至成都附近。成都战役中，胡耀邦亲自安排国军第七兵团裴昌会投诚。12月，中共中央西南局成立川北工作委员会，由胡耀邦担任书记，至此他多年的戎马生涯也随之结束。

建国初期

主政川北

1949年12月29日，随着三台战役结束，川北地区进入到解放军管辖。然而经过战火沧桑，广大川北地区社会经济近于崩溃，百废待兴。胡耀邦率部进驻南充后，开始着手一系列紧迫问题（即《川北区施政方针》），包括土匪暴乱围攻营山、盐亭、中坝等县城和集镇；伏击抢劫军车、商车等事件。随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1军兼川北军区，同年2月，胡耀邦任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仍兼川北行政公署主任、川北军区政委、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开始治理川北匪情。他采取联系群众、组织农会和自卫队等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行动和指挥，并在同年8月底成功瓦解七万三千余的匪情势力；而随之建立的农会和自卫队则投入垦荒和生产。

在宣传中共政策稳定政局时，胡耀邦并大胆采用党外民主人士，在川北行署29名委员中，民主人士有15名，他还广交工商界人士[5]:92。1950年，川北行政公署职工宿舍大楼遭到纵火破坏，胡耀邦特意在新闻审阅最后加注“领导上思想的麻痹疏忽，也是造成失火事件的原因之一”。胡耀邦的自我批判和坦荡，也得到卢子鹤等民主人士的赞赏；事件也很快通过调查得到解决。此外他还创建、扩建川北大学（即现在四川师范大学）。这些措

施使得川北地区很快恢复社会秩序，胡耀邦也很快受到中共中央的注意。

组建共青团

1952年7月，中共中央组织部调胡耀邦入京，最初小道消息称他担任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建筑工程部部长，然而他在抵京后，安子文则透露他的工作有变，原来毛泽东、刘少奇临时决定（一说邓小平的提议），改任他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在最初收到工作分配时，情绪很低落，自叹已为人父，不甘领导青年工作，心中一度产生抵触情绪。然而他却不知，此后的二十三年（至1975年6月）中，胡耀邦始终一直担任和兼任团中央第一书记，他一生遭遇和影响力，都与共青团息息相关。

当时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仅创建三年，从治理和运行方面，胡耀邦都只能采取探索方式。这也锻炼了他能够很容易与青年、基层干部以及民主人士的沟通与采纳；他的为人和做事果断的风格也得到青年一代的赞赏和推崇。他提出的"宣传教育工作是团的工作的灵魂"一说，至今仍是共青团的工作准则。

在1954年至1956年期间，他组织、支持各种青年突击队参与到生产和垦荒中，其中包括黑龙江北大荒和江西湖畔荒滩。他对江西湖畔荒滩的开垦治理非常关注，并在1984年12月，亲自提名"共青城"，而那也是他最终埋骨之地。而有丰富编辑经验的胡耀邦，创建了《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以提高青年教育和思想。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胡耀邦当选中央委员会委员；1957年，第三届团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易名为共产主义青

年团。时年42岁的胡耀邦当选首任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胡耀邦的性格非常个性化，实事求是，敢讲真话。然而1958年的大跃进导致的恶果，使得共青团工作被严重破坏，他对大跃进政策产生了怀疑和反感。1959年庐山会议上，胡耀邦没有随众批判彭德怀，除了一份简短发言外，始终缄默不语，引起毛泽东的不满。

下放湘潭

1962年，七千人会议后，中共中央倡导调查研究之风，胡耀邦请求下放，并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书记。在上任之前，他还代表中国阿尔巴尼亚友好代表团赴阿访问，10月18日回国。同年11月16日，他抵达湘潭，而原任湘潭地委第一书记的华国锋任第二书记。两人在湘潭相识，并合作共事一年多，彼此互相尊重、互有好感。在上任开始，两人即率领干部考察湘潭各县，鼓舞基层干部并引导发展，并在考察后，确定“鼓足干劲，集中力量，以粮为纲，全面安排。”，着重就各县情况因地适宜，促进生产，达到或接近1957年水平。而当群众提出“单干”（即包产到户）问题时，基层干部感到压力很大，进退失据，胡耀邦则以顾及实际情况，默许包产到户的实施。胡、华两人还推广毛田县的林业改造（即“毛田经验”）、并惩治腐败。

1963年，团中央同胡耀邦联系，决定次年召开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再次调回北京。1964年7月2日，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再次连任团中央第一书记，这也是他主持召开的最后一次团代会。保留团职的情况下，他却接到新的任命，派他去主持陕西省工作。

主政陕西

1964年11月，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并兼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胡耀邦上任后，仍然沿袭此前习惯，与各基层干部沟通并实地调查，他很快发现，因为大跃进等问题，陕西的经济非常落后；1962年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使用，促使渭河下游两岸农田受淹没和浸没，加剧了粮食短缺问题，陕西粮食总产量在1963年居全国各省最低，此外几乎没有工业，文盲率约43%，克山病等地方疾病仍然普遍。而由于刘志丹案等影响，干部群众关系紧张，人人自危。

胡耀邦尽管忧心忡忡，但仍坚持首先将农业生产提升，作为第一要务；此外减少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导致的对基层干部的伤害。1964年底，他出中央工作会议和此后的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并借此机会向周恩来、李先念陈述陕西困难，并争取中央支持：减少陕西征粮量从17亿斤降低为14亿斤、并获得增拨3万吨化肥、筹建陕西化肥厂。身在北京的胡耀邦，此时却目睹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与国家主席刘少奇对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矛盾激化，然而中共中央仍然形成一份《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以指挥各地的政治活动。

胡耀邦在返回陕西后，相对柔性地推广《二十三条》，使得春节时期的陕西民众倍感轻松。春节过后，胡耀邦动身考察陕南安康地区，在发现当地因为斗争处分的极端事件后，他自感《二十三条》应当落实到基层，并提出了解放干部的“四条政策”：

“凡属从社教以来被处分过重的干部，一律实事求是地减轻下来。最好选择几个典型，经过大家讨论，重新作出决定，并在大会上宣布。

凡属停职和撤销工作尚未处理的干部，一律先放到工作岗位上去，待问题完全查清或经过一个时期的考验再作结论。

凡属去年以前犯有某些错误但已经交代过的干部（包括脱产和不脱产的干部），不再在这次会议上“洗手洗澡”。只要做好工作，搞好生产，就一律既往不咎。

凡属这次县的多级干部会议后继续干坏事的，不管职务高低，一律从严处理。”

然而不过三天，2月17日，胡耀邦来到汉中地委，中共中央西北局来电批评胡耀邦此论，并声称可能引起翻案风。尽管基层干部对此表达支持，但中共中央西北局仍然认为此论片面，他被迫做出检讨，并被迫连续多日受着批判。3月17日，极度虚弱的他因病住院，医生检查属于突发大脑蜘蛛网膜炎，住院期间他还是承认了所有批评，当时的陕西改革也陷入困境。叶剑英元帅在得知此事后，偕同张宗逊、张爱萍两位上将一起搭乘军用飞机前来西安，以参加军事会议名义，最终带走胡耀邦返回北京，胡耀邦再次回到中央。

文化大革命时期

1965年6月，返回北京养病的胡耀邦，被邓小平留在北京。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当时北京的大中学生纷纷响应，并开始攻击为首的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市委。毛泽东借此下令推广，并使局面迅速搅动。当时刘少奇、邓

小平认为混乱局面必须制止，并在1966年6月3日，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派驻工作组到北京市各大中学，并由团中央负责北京市中学的工作组，至此团中央也卷入这场斗争中。不久中央文革小组迅速抵触工作组，并成功说服毛泽东撤销工作组。很快，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怂恿下，红卫兵开始踞守并攻击团中央。1966年8月5日，毛泽东严厉批评共青团中央，称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等在团中央工作的“三胡”：“不是糊糊涂涂犯错误，而是明明白白犯错误”。

8月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做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次日，中央文革小组在工人体育场举行万人群众大会，批评团中央：“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违背了毛泽东的指示；没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而是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口头上坚持群众路线，实际上猖狂攻击群众路线；因对挑动学生斗学生，压制学生运动的‘中学工作组’所犯的错误负责。”随后，中共中央改组团中央书记处。

随后，疯狂的红卫兵跑到富强胡同，将胡耀邦、胡克实从家中揪到团中央批斗，从此团中央和直属单位的工作完全瘫痪。之后几乎每天，团中央的干部都被批斗、受刑，尚在病中的胡耀邦只得忍受全身被抽打红肿、鲜血直流的痛苦。很快，运动波及到他的全家，时任北京市纺织局局长的妻子李昭；北京大学学生、长子胡德平被隔离关押，三子胡德华和女儿满妹承担起家里重担。1967年，胡耀邦母亲刘明伦去世，悲痛之中的胡耀邦只能被红卫兵押解下去医院送遗体，而火葬之事只能让刘湖、胡德华两人殡葬。

1968年，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加剧，毛泽东此时不得不派遣军队派驻学校和机关。胡耀邦等干部被关押在团中央南院平房中，由于经常干重活，他患上严重的痤疮。之后他和共青团中央干部被送到河南信阳地区潢川县黄湖农场。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促使毛泽东为二月逆流案平反，并决定由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周恩来趁此将胡耀邦调回北京检查身体养病。

1973年，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并协助病重的周恩来主持国务院。1976年4月，在叶剑英、邓小平的支持下，中共中央决定派胡耀邦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随后他开展一系列活动，将中科院行政业务和党的工作分开，专门建立行政办公会议，分工专人抓业务。然而随着四人帮和邓小平的矛盾日益激化，胡耀邦在中科院的工作日趋复杂，11月，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被迫再次下野，胡耀邦也因此离开中科院，再次过起了家居生活。

1976年10月12日，在怀仁堂事变后的第6天，叶剑英派儿子叶选宁到富强胡同6号胡耀邦的家中看望，并求教此后治国建议。胡耀邦总结：“现在我们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我看有三条：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这三条中兴建议，即后来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和“改革开放”，后人也称赞胡耀邦之言为“隆中三策”。叶剑英听后非常赞赏，深以为是，竭力向华国锋等人推荐胡耀邦出来工作。

拨乱反正

文革结束后，胡耀邦迅速获得重用，于1977年3月，出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

副校长。历经磨难的胡耀邦意识到，如果不为文革中残存的干部解放出来恢复工作，文革后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和政治残局将无法挽救。因此上任后的胡耀邦以中央党校为平台，以1977年10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率先带头为平反干部的冤假错案作了舆论准备。此文与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观点相左，但文章仍然成功发表。不久，12月15日，胡耀邦接替郭玉峰，接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立即开始了全国的平反冤案和干部安置，主持全国的拨乱反正工作。

因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所有重大冤案，均与毛泽东的指示直接相关；胡耀邦坚持的理念，也逐步与当时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产生了正面冲突。1978年，胡耀邦指出，毛主席在晚年也有错误，我们应当纠正我们党和他老人家的错误；这些观点形成了当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刊登了经胡耀邦审定的由南京大学胡福明教授撰写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天，即5月11日，《光明日报》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当天，新华社将这篇文章作为“国内新闻”头条，转发全国。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以及不少省级党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到5月13日，全国多数省级党报都转载了此文。这篇文章阐明，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是检验党的路线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由此引发了一场大讨论；支持实施经济建设的一派最终逐步获胜。

与此同时，尽管阻力重重，但是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工作仍然取得了重大进

展。之后，他指示中组部将调查继续推前，将之前的几起大案、要案平反。随后他继续调查1930年代至1940年代的案件，将当年被定为“托派”和被肃反的蒙冤人们平反，其中包括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李立三和张闻天等。胡耀邦领导的平反冤假错案活动，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年错误的政治运动的重新平反。经过平反活动，他在群众中的威信与日俱增，民间俗语有“受了苦，找中组部；有冤枉，找胡耀邦”。

改革开放时期

党主席和总书记

1977年，是胡耀邦在中国政坛的分水岭，他在仅仅的三年中，即完成了从团中央领导人向党中央领导人的角色转变。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出任恢复组建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同时还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晋身最高领导层。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总书记（设有“党主席”），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之一[26]；1981年6月，接替华国锋出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在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上，做出党章修改，不再设党主席、副主席职务，以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为领导集体的最高负责人。胡耀邦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是党的最高领导职务。

然而胡耀邦对改革过于乐观，并导致一系列与中共其他领导的矛盾。他推动过快的经济改革引发了党内以姚依林为首的保守派反对；而由于他过多干涉国务院工作，就连支持改革一派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也颇为不满。同时，胡耀邦一系列打击太子党腐败活动，引起很多中共元老的厌恶。特别

是保守派陈云指责胡耀邦的率性言行，并未能顾及具体情况。最为重要的是，邓小平认为胡耀邦过于自由的政治态度，超过了邓小平能够接受的极限。1986年10月，胡耀邦仍然着手于推进“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并称将在中共十三大实现。尽管他对自己的去留毫不介意，但另一派却加剧酝酿罢黜的事情，而对此胡耀邦却毫无察觉。同年年底至1987年初，中国各地爆发八六学潮（又称丙寅学运），合肥、武汉、上海、北京、昆明、广州、天津等17个大中城市，爆发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反官倒，反腐败”的口号声，震惊中南海。

失势下台

八六学潮引起了中共元老的震怒，他们将学潮的爆发，归咎自由化知识分子煽动，以及胡耀邦的纵容。而此前1985年5月10日，香港《百姓》杂志的陆铿在中南海访问胡耀邦，将采访内容整理成《胡耀邦访问记》发表在同年6月出版之《百姓》半月刊上，也被中共保守派和既得利益集团视为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证之一。高层认为胡耀邦纵容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要求其辞职；并指胡耀邦应该对1986年学生运动的失控负责。12月30日，胡耀邦打算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中央书记处关于处理学潮的意见。邓小平不同意开会，并要胡耀邦到他指定的地点谈话。邓认为学生运动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并责问胡耀邦“你难道没有责任？”胡耀邦回答说：“我保留我的意见。”邓小平说：“不是保留，而是要你马上站出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

1987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强调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抨击资产阶级自由化，这被认为是为群众做思想准备。当夜，在邓小平家里，陈云、薄一波、彭真、王震、宋任穷等中共元老，商议胡耀邦的去留问题。1月4日，邓小平在家召开会议，参加者有陈云、 万里、杨尚昆、薄一波、王震、彭真、赵紫阳，邓小平在会中出示一封胡耀邦写给邓小平要求辞职的信。到会的人传阅这封信之后，邓说应该同意胡的辞职，当时无人表示不同的意见。1月6日，中共中央发布以邓小平关于处理学生示威指示要点的一号文件。同日，邓小平通知胡耀邦参加"党内生活会"。1月10日-15日，在由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主持，有二三十名高级干部参加的"党内生活会"上，连续几天指责胡耀邦的"问题"。邓小平与陈云因地位太高不宜出面，国家主席李先念因在上海没有参加。

胡耀邦在会上首先作了检讨，承认自己有"错误"，但试图做出一些辩解。之后胡耀邦遭众人轮流批判，其中薄一波认为胡到基层视察的次数太多、地区太广，指责他是在"游山逛景，哗众取宠"；杨尚昆和王震指责他站错路线（即"资产阶级自由化"）；宋任穷则对胡耀邦对邓小平的态度进行批判。此外，邓力群通过五个小时的发言痛斥胡耀邦的作为，称胡耀邦对四项基本原则和反精神污染关注不够、没有做到团结全党、主要使用跟自己观点相同的人、在重要的人事任免上没有遵循老领导的意见等。赵紫阳发言批评胡耀邦"不守纪律"。而被胡耀邦视为朋友的王鹤寿也落井下石将私人讲话公开。在所谓的生活会上，只有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支持胡耀邦，斥责元老们动用文革式手段逼总书记下台是不正常的，是违反党的原则的。习仲勋当时曾指着薄一波怒斥。最终，在连续七天的批斗之下，政治局于1月16日召开扩大会议，以举手通过的方式批准了胡耀邦的请辞，并推选赵紫阳为代理总书记。但胡耀邦保留了政治局常委的名义，只是排名降到最后。1月19日，中共中央三号文件列举了胡耀

邦解除职务的原因："抵制党为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作出的努力，纵容全盘西化的要求；没有充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批'左'不批右；在经济工作中鼓励经济过快增长和消费，造成经济失控；在政治工作中经常违反程序；在外事活动中说了一些不应该说的话；经常不遵守党的决议，未经中央授权就讲话"。

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而当初卖劲倒胡的邓力群和胡乔木，则在十三大选举中因得票最少而落选中央委员。尽管胡耀邦被闲坐，他仍然获得中共党内改革派、知识分子及学生的欢迎。

逝世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因大面积心肌梗塞；于早上7时53分逝世，享年74岁。胡耀邦去世后，大批民众在天安门广场上聚集、悼念，最终演变成六四事件。

纪念活动

六四天安门事件前，官方举行了各种级别的悼念活动，包括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有邓小平参加的高规格追悼会，由于胡耀邦曾经出任党内最高职务，追悼会规格比原曾经担任国家元首的叶剑英逝世时高出半格。六四运动后几年，中国政府逐年降低对胡耀邦的纪念活动的规格，各类纪念胡耀邦的文章也减少。一些海外著作，如杨中美的《胡耀邦——一位激进改革者的传奇生涯》、和气弘《胡耀邦》、柴红霞等人编写的《胡耀邦谋略》、刘新章《胡耀邦》、河北人民出版社的《胡耀邦》、唐朝编《一身

正气两袖清风：胡耀邦逸闻录》、姚铁军编著的《胡耀邦生活纪事》等，从不同侧面对胡耀邦生平做出研究，但个别作品因史料所限，主观臆断多于客观叙述。直到2005年，在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提议下才举行高规格的纪念活动，各类纪念文章及书籍逐渐涌现，其中包括满妹《思念依旧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修订版)》、沈宝祥《胡耀邦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韩洪洪《胡耀邦在历史转折关头(1975—1982)》、张黎群、张定、严如平、唐非、李公天编写《胡耀邦：1915—1989》等作品，在史料与论述上逐渐丰富。然而事关胡耀邦在下野前后的政治事情及生平，因牵扯大量人情世故，仍旧是当今中国大陆的政治忌讳。

对胡耀邦的民间悼念始终至今。1989年4月15日，词作家邹友开在返京列车上听到他死去的讯息，悲怆之下创作诗歌《好大一棵树》，后被谱成歌曲，一时广为流传。

“　头顶一个天，脚踏一方土，风雨中你昂起头，冰雪压不服。好大一棵树，任你狂风呼，绿叶中留下多少故事，有乐也有苦。　”

——邹友开《好大一棵树》

2013年1月6日，浙江省台州市的大陈岛放置了一尊胡耀邦铜像，纪念他在1956年号召和领导的垦荒活动。2013年4月15日胡耀邦忌日，解放日报、人民日报等中国大陆官方媒体刊文悼胡耀邦，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等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上台后首次出现。

2014年4月11日，已经退休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胡耀邦逝世25周年（4月15日）前夕到胡耀邦故居参观，引起海内外关注。

2015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召集“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习近平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出席座谈会。同时，为纪念胡耀邦诞辰100周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胡耀邦文选》。

2018年11月18日，在胡耀邦家乡湖南浏阳一尊雕像落成，台湾中央社报道“仅有胡的儿子胡德平及湖南省委副书记乌兰出席揭幕仪式，并无中央官员出席”。雕像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兴建，前中央美术学院党委书记盛杨设计，以胡耀邦中青年时期的照片为原型。

行动、观点与影响

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冤假错案行动，一开始是在极其困难的局面下展开的。首要的阻力来自于各级的组织部门。因为地方问题迟迟无法解决，各地干部及家属纷纷上访。1978年9月，胡耀邦因此召开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他在会上要求实事求是地落实政策，“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这被称为“砍旗”。他要求对于反右斗争中错划右派和“二十年表现好”的，可以直接恢复党籍，不用“甄别平反”这个名词。

同年9月17日，中共中央颁布《贯彻中央关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以“55号文件”贯彻全国。在胡耀邦等人的努力下，11月他们起草的《关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件的调查报告》报送中央，最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两天公布：曾被毛泽东、四人帮定为“死案”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平反并迅速引起了轰动效应。此后，包括彭德怀反党集团、“反党小说《刘志丹》案”、内人党事件等也被陆续平反。1980年，他领导的中组部随后平反陶铸、陆定一、刘少奇的冤案；同年8月，曾昭伦、费孝通、黄药眠、陶大镛、钱伟长、吴景超六教授案被平反。胡耀邦随后指示中组部将调查继续推前，最终1955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东北叛徒集团案”、“新疆叛徒集团案”乃至三四十年代的数起冤假错案最终均被平反。

胡耀邦平反党内外各类“冤假错案”的历史功绩，在组织上终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并最终为改革开放理论的出现做了思想上的预备工作。

理论联系实际

在学术观点上，胡耀邦主张理论要联系实际，接触世界上的先进的科学技术，认真解决好具体的政治、经济生活上的重大问题。对于研究的问题，“只要没有登报，没有在党校以外随便议论，就不算犯错误。属于研究、探讨嘛。在教研室里，没有定论的东西，谁也没有权力打人家的棍子。”

针对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文章是要在政治上砍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的批判，胡耀邦评价道：“把学术争论一下子上升到政治上，这个风气再不改怎么得了呀！”

落实干部政策

胡耀邦在文化大革命中历经磨难，自感中共中央的干部政策必须得到保护和控制。1977年3月，在出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后，他一边开始准备平反冤假错案，将干部从批斗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准备培养新的年轻干部。对于培养干部的方针，他强调思想上要学习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学习研究毛泽东的思想体系；不能说大话空话、对马列主义的词句各取所需。1980年，中共中央党校举办一年制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大量中层干部逐渐崭露头角，其中包括田纪云、尉健行、胡锦涛、杨晶、沈跃跃、周强、司马义·铁力瓦尔地等。

在1985年后，中共中央逐渐主张“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取而代之则以年龄上限作为确定干部职务任期的标准，从而根本上隔绝毛泽东时期的所造成的政治问题。然而，胡耀邦过于激进的改革和反腐措施，最终使得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权限凌驾于总书记和政治局之上。邓小平时期所造成的“中共八大元老”的老人政治模式，直接影响到胡耀邦、赵紫阳两任总书记的境遇，并持续酿成六四事件。六四事件后，邓小平等元老被迫逐步离开领导职位，胡耀邦确立的“废除干部终身制”最终重启，在江泽民和胡锦涛两任总书记执政时期沿用，但最终在习近平主政后废除。

放宽民族政策

胡耀邦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放宽了民族自治权，大力提拔少数民族

干部，并制定了相当多的法规和条例，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和教育，保护民族自治权和少数民族的特殊利益。胡耀邦制定的一系列优待少数民族政策维护了中国共产党自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开始和少数民族结成的政治统一战线，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1979年3月，胡耀邦允许西藏流亡政府方面派出的代表团前往西藏，1980年3月，胡耀邦召开"西藏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发表"六件大事"：

西藏要有自主权，西藏干部要敢于保护自己民族的利益；

对西藏农牧民实行免税、免征购；

变意识形态化的经济政策为实用主义的经济政策；

大幅度增加北京给西藏的财政拨款；

加强藏文化的地位；

汉人要把西藏的权力让给藏人。

中国独立记者高瑜指出，胡耀邦的报告引起极大的波动，这是解放军入藏29年以来，西藏干部和老百姓没有听到过的声音。他的报告作为中央文件下发，遭到党内左派的强烈批评，认为是民族工作的错误倾向。邓小平决定收回胡耀邦的报告。当时西藏第一批汉族干部撤离已经完成，第二批撤离停止，一切恢复原样。胡耀邦继续坚持民族问题要批左，1980年、1984年他主持两次"西藏工作座谈会"，都是批左[62]。

1980年4月，胡耀邦在西藏进行实地调查，震惊于西藏的贫困，并承认之前的极左路线给藏民带来了许多苦难，这些举动令西藏人民对胡耀邦深切怀念。在1981年7月接见了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期间提出了“关于达赖喇嘛回国的五条方针”。

1980年5月29日胡耀邦和万里在西藏考察时，在西藏自治区干部大会上提出了著名的“西藏六条”，其中一条是要让藏族干部自己管理西藏，藏族干部占到西藏地区干部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汉族干部离开西藏是光荣的。并建议把80%的汉族干部从西藏撤离。这些建议引起新疆和内蒙古自治区的共鸣。同年7月10日至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新疆工作座谈会，胡耀邦提出了新疆六条，提出从新疆调回汉族干部的决定。但最后由于新疆民族主义高涨以及王震的反对，决议没有通过。

1981年，在胡耀邦的民族政策指示下，中国确定了蒙古语标准音，图兰语标准音和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拉丁图兰文及蒙古语音标。中央1984年5号文件关于对少数民族中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捕少杀”（即“两少一宽”）。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通过，正式确立了以少数民族利益为中心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此外，胡耀邦在任期间，还出台了《一九八〇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规定》、《关于对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生产企业给予低息贷款的通知》，每年递增10％民族自治区定额补助的《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管理体制的暂行规定》等对少数民族有利的政策文件。在他的民族政策指导下，全国新增了很多自治县。

计划生育

胡耀邦上台以前，以陈慕华为首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已经于1979年起推行“一胎化”政策。1980年9月25日，以胡耀邦为总书记（华国锋仍为主席）的党中央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指出“国务院已经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有学者认为，这一措辞反映了党中央对一胎政策有所保留。1981年9月，赵紫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农村实行更为宽松的两孩或一孩半政策；国家计生委选择了一孩半政策，但又反对中央将政策写明，导致政策迟迟没有实施。

1982年《全国农村工作会议记要》中胡耀邦强调控制人口。同年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大报告中把计划生育提到了基本国策的高度。

1984年，研究人员马赢通、张晓彤向国务院上报《关于人口控制与人口政策中的若干问题》，建议农村实行两孩政策。胡耀邦批示“这是一份认真动了脑筋、很有见地的报告。”胡耀邦的批示一直没有得到落实，两孩政策在此后30年都没有实现。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u_Yaobang

胡耀邦

胡耀邦（1915年11月20日－1989年4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级官员。从1981年到1987年，他担任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职位，首先在1981年至1982年担任主席，然后从1982年到1987年担任总书记。胡在上世纪30年代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上升邓小平的同僚。文化大革命（1966- 1976年）期间，胡被清洗，后复职，然后又再次被毛泽东清洗。

毛泽东逝世后，邓上台，胡升任一系列高级政治职务，并在“拨乱反正”计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整个 1980 年代，胡在邓的指导下进行了一系列经济和政治改革。胡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使他成为几位强大的党内元老的敌人，他们反对自由市场改革和使中国政府更加透明化的企图。当1987 年中国各地发生广泛的学生抗议活动时，胡的政治反对派成功地将破坏活动归咎于胡，声称胡的“松懈”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要么导致了抗议，要么加剧了抗议”。胡于 1987 年被迫辞去党总书记的职务，但被允许保留政治局的席位。

胡的党总书记职位由赵紫阳接任，他继续了胡的许多经济和政治改革措施。胡于 1989 年去世后的第二天，发生了一场纪念他的小型示威活动，并要求政府重新评估他的遗产。一周后，也就是胡的葬礼前一天，大约 10 万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游行，导致了1989 年的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在 1989 年的抗议活动之后，关于胡的所有信息在中国受到审查，但在 2005 年胡诞辰 90 周年之际中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他的形象并取消了审

查限制。

=====

早年

青年革命者

胡耀邦的祖先是来自江西的客家人。在明朝（1368-1644）期间，他们移居湖南，胡的出生地。胡耀邦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受过很少的正规教育。作为一个孩子，他从未上过学；他自学阅读。胡在十二岁时参加了他的第一次叛乱，十四岁时离开家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 1933 年成为正式党员。1930年代在中共两极分化的派系斗争中，胡支持毛泽东，反对中共“28个布尔什维克”。

胡是长征中最年轻的老将之一。在此前，四次围剿开始前不久，毛下台后，毛的支持者遭到迫害，胡耀邦被判处死刑。就在长征开始前，他和其他人正在被送往斩首的路上。然而，一位名叫谭玉宝的强大地方共产党指挥官在最后一刻出手干预，挽救了胡的生命。由于胡对毛的支持，他被认为不可靠，并被命令参加长征，以便对其进行监视。

胡耀邦在遵义附近的庐山战役中受重伤，靠近毛泽东通过遵义会议重新掌权的地区。胡受伤后，共产主义野战医疗队选择不帮助胡，将他留在战场上，任其死在路边。胡被他的儿时玩伴、中国红军指挥官偶然路过所救。

胡呼唤朋友的外号求救，朋友帮他追上撤退的中国红军主力，救治伤势。

1936年，胡加入张国焘率领的远征军。张的21,800士兵部队强大力量的目标是渡过黄河，扩大陕西以西的共产党基地，并与来自苏联的军队或与共产党的盟友、与苏联密切来往的、新疆军阀盛世才会合。张国焘的军队被当地的国民党军阀马氏集团彻底击败。胡耀邦和秦继伟成为了马帮抓获的数千名战俘中的两个。胡是马步芳仅有的1500名战俘奴隶之一；马决定把这些人用作强迫劳动而不是对之执行处决。

马步芳派出马彪将军率领的几个穆斯林骑兵师与日军作战。然而蒋介石向马步芳施压，要求马步芳增兵抗击日本侵略者，马步芳决定不再动用更多自己的军队，而是将1500名中国红军战俘作为义务兵。由于行军路线要经过陕西共产主义根据地的边界，胡耀邦和秦继伟决定回到共产主义，并秘密组织了一次逃跑。逃跑按计划进行并取得成功：在1500名战俘中，有1300多人成功返回延安。毛亲自欢迎这些归来的共产党员，而胡耀邦则回到了共产主义势力，他将在那里度过余生。

胡到延安后，就读于抗日军校。胡在延安读书期间，结识了同为延安学生的妻子李昭。训练结束后，胡在政治部工作，并被分配到彭德怀的第三方面军工作。

胡在 1930 年代与邓小平结交并密切合作。1940年代，胡在邓小平手下担任第二野战军政委。在中国内战的最后阶段，胡随邓到四川，1949 年共产

党军队成功地从国民党军队手中夺取了该省的控制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政治家

1949年，中国共产党成功击败了中国大陆的国民党势力，共产党人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52年，胡随邓到北京，1952年至1966年任共青团领导。胡在共产党的等级制度中迅速上升，直到1964年毛派胡到陕西担任第一书记，毛说："他需要一些实践训练"。胡被分配到北京以外的地方工作，可能是因为他被认为对毛主义不够热情。与他的许多同事不同，胡在1969 年 4 月召开的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之前一直保持在党中央委员会的地位。

文革期间，胡被清洗两次，并复职两次，这很像是他的政治导师、邓小平的政治生涯。1969年，胡被召回北京受迫害。胡成了"三胡"中的"第一个"，他们的名字被诋毁，脖子上挂着沉重的木牌子在北京游行。另外两个"胡"分别是共青团第二资深成员胡克石（音译）和共青团里排第三的胡启立；他们也是邓小平的亲信。在被公开羞辱后，胡耀邦被送到一个孤立的劳改营，在严密的戒备下参加"劳动改造"。在政治流放期间，胡耀邦被迫手工搬运大石块。

1973-1976年邓被临时召回北京时，胡耀邦也被召回；后来，1976 年邓小平再次被清洗时，胡也被清洗了。在第二次清洗之后，胡耀邦被派去放牛。1977年，毛去世后不久，胡被第二次召回并平反。胡耀邦被复职后，

升任党的组织部部长，后来通过政治局的一个部门指导党的宣传工作。胡是负责重新评估文革期间受迫害者命运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根据中国政府的说法，胡个人有责任为超过 300 万人免罪。胡暗中同情或支持1978年民主墙抗议者，并邀请了两名活动人士到他在北京的家中。胡反对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政策，是邓小平上台的重要支持者。

改革者

公共政策

胡耀邦的崛起是由邓小平策划的，在邓小平取代华国锋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后，胡升至党的最高职位。1980年胡成为党的政治局常委、总书记。1981年，胡就任中共主席，但在 1982 年废除了党主席的职位，作为使中国远离毛主义政治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党主席的大部分职责都转给了胡的总书记一职。邓取代华国锋标志着党的领导层的共识，即中国应该放弃严格的毛主义经济学，转而支持更务实的政策，胡指导了邓的许多改革中国经济的尝试。到1982年，胡是中国第二大有权势的人，仅次于邓。在胡职业生涯的最后十年中，他提倡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基础。

1980年代初期，邓将胡和赵紫阳称为他的“左右手”。胡升任总书记后，推动了多项政治改革，经常与赵合作。胡改革的最终目标有时是模糊的。胡试图改革中国的政治系统，并试图要求政治局委员应当通过选举产生；举行多于一名候选人的选举；提高政府透明度；在确定党的政策之前增加公众咨询；并且，增加政府官员对其错误承担直接责任的程度。

胡在任期间，力图使文革中受迫害的人民平反。许多中国人认为这是他最重要的成就。他在认识到以前政策的错误后，也赞成西藏自治区的务实政策。1980 年 5 月访问西藏自治区后，他下令数千名汉族干部撤离西藏自治区，认为应该赋予藏人和维吾尔人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力。留下的汉人被要求学习藏文和维吾尔文。他提出了六项改善“现有条件”的要求，包括增加对西藏自治区的国家资金，改善教育，以及努力振兴西藏和维吾尔文化。同时，胡表示，“凡不符合西藏本地情况的，一律拒绝或修改”。胡在此行期间就中国对该地区的暴政向藏人明确道歉。他还宣布取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兵团。

胡在任总书记期间周游各地，走访1500个区村，视察地方官员工作，接触群众。1971年六十五岁时，胡重回长征路线，乘机视察西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云南、青海、内蒙古等偏远军事基地。

有争议的政治观点

胡以他的自由主义和坦率表达他的观点而著称，这有时会激怒其他中国高级领导人。1984年去内蒙古旅行时，胡公开建议中国人可以开始西餐（用叉子和刀子，单独盘子），以预防传染病。他是最早放弃穿中式服装而转而使用西式西装的中国官员之一。当被问及毛泽东的哪些理论适合现代中国时，他回答说：“我认为，没有”。

胡并不准备完全放弃马克思主义，而是坦率地表示共产主义不能解决“全人类的问题”。胡鼓励知识分子在媒体上提出有争议的话题，包括民主、人权以及对共产党在中国政府内的影响力进行法律限制的可能性。许多党内长

老从一开始就不信任胡，后来逐渐害怕他的影响。

胡为修复中日关系做出了真诚的努力，但他的努力范围受到了批评。1984年，在北京承认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12周年之际，胡邀请了3000名日本青年来京，安排他们游览上海、杭州、南京、武汉、西安。许多高级官员认为胡的努力是奢侈的，因为日本去年只邀请了 500 名中国青年到日本。党的元老在内部批评胡向来访的日本官员赠送大量礼物，并允许他的女儿私下陪伴日本首相中曾根一行访问北京时的首相儿子。胡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指出中日关系牢固的重要性，他认为日本在二战期间在中国犯下的暴行是军国主义的行为，而不是日本普通公民的行为。

胡连续两年建议削减中国国防预算，疏远了解放军内部的潜在盟友，军方高层开始批评他。军方官员指责胡在1985年从澳大利亚购买军事装备时选择不当。胡访问英国时，军方官员批评他在伊丽莎白二世女王举办的宴会上喝汤太大声。

赵和胡开始了大规模的反腐败计划，并允许对在父母影响下长大的党内高级长老的孩子进行调查。胡对属于这个“太子党”的党内官员的调查使胡在许多党内有权势的官员中不受欢迎。在邓拒绝支持胡的一些改革之后，胡私下批评邓小平的优柔寡断和“老式”思维方式，邓最终意识到了胡的这些观点。

辞职

1986 年 12 月，一群学生在十多个城市组织了公开抗议，以支持政治和经济自由化。抗议活动开始于安徽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他们由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领导；方当时是大学的副校长。方公开谈论引入政治改革，以结束共产党在中国政府内的影响。抗议活动还由另外两名“激进知识分子”王若望和刘宾雁领导。

邓小平不喜欢这三个人，命令胡将他们开除党籍，让他们闭嘴，但胡耀邦拒绝了。1987年1月，经过两周的学生抗议活动、要求获得更大的西式自由，党的一帮长老和高级军官以胡对学生抗议者过于宽容、和胡的过快地转向自由市场式的经济改革为由，迫使他辞职。

胡被迫下台后，邓小平提拔赵紫阳接替胡担任党总书记，使赵有机会接替邓成为“最高领导人”。胡于1月16日正式辞去党总书记职务，但保留了他在政治局常委的席位。当胡“辞职”时，党强迫他发表侮辱性的“自我批评其违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的错误”。此后，胡在中国政治中越来越隐居，不那么活跃，业余时间学习革命历史和练书法，并长时间散步锻炼身体。胡在辞职后普遍被视为没有实权，他被降级为主要是礼仪性的角色。

胡的“下台”损害了中共的公信力，同时也提升了胡的公信力。在中国知识分子中，胡是一个在政治阻力面前拒绝妥协并为此付出代价的人的例子。在胡离开行政级别职位后，保守派李鹏被提升为总理的职位、使政府对改革的热情降低，并打乱了邓小平让任何与胡相似的政治家有序接班的计划。

死亡、抗议和埋葬

死亡和公众反应

1987年10月，胡在第13届党大会保留了在中共中央的会员资格，随后于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成为了新政治局的成员。1989年4月8日，胡在中南海参加政治局会议讨论教育改革时突发心脏病。胡在妻子的陪同下被紧急送往医院。几天后，也就是 4 月 15 日，胡去世了。他享年73岁。胡的遗言是，他应该简单地被埋葬在他的家乡，不要铺张浪费。

在他的官方讣告中，胡被描述为“久经考验的坚定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治家，中国军队杰出的政治领袖”。西方记者观察到，胡的讣告故意“高调”，以转移对党虐待他的怀疑。在追悼会上，胡的遗孀李昭将胡的死归咎于党对他的严厉对待，告诉邓小平“都是你们这些人造成的”。

尽管胡在去世时已成为半退休官员，并因其“错误”而被免去实权职位，但公众压力迫使中国政府为他举行国葬，由党的领导人参加。葬礼上宣读的、纪念胡的悼词，赞扬了他在文革后恢复政治常态和促进经济发展所做的工作。在胡的葬礼上，公众哀悼者排起了 16 公里长的队伍，这一反应让中国领导人感到惊讶。胡的葬礼后不久，北京的学生开始向政府请愿，要求正式推翻导致胡“辞职”的判决，并提供更精心的公共纪念仪式。政府于是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公共纪念仪式活动。

1989年4月22日，50,000名学生游行到天安门参加胡的追悼会，并向李鹏总理提交了请愿信。很多人对党的反应迟缓和丧葬安排相对不满意。北京和其他地方的街头开始公开哀悼。在北京，这些活动集中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哀悼成为公众对政府中的裙带关系、胡的不公平解职和早逝、以及“政治元老”的幕后角色的愤怒的公共抒发渠道。这些“政治元老”是正式退休的领导人，但仍保持准法定权力，包括邓小平。抗议活动最终升级为1989 年的大规模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胡倡导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思想对参加抗议活动的学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墓地

胡的葬礼后，他的遗体被火化，遗体安葬在八宝山。胡的妻子李昭对胡的坟墓位置不满意，成功上访政府，将胡的骨灰移至更合适的地点。最终，胡的骨灰被移到了江西省共青城的一座陵墓，这座城市是胡在 1955 年帮助建立的。胡的陵墓可以说是任何中共高层领导人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陵墓。

李昭从私人和公共来源筹集建造胡墓的资金；在儿子的帮助下，他们在共青城选了一个合适的地点。陵墓呈金字塔形，建在山顶上。1990年12月5日，胡的骨灰由儿子胡德平运往那里。温家宝、江西多位公职人员和2000名共青团员出席了仪式。共青城的工厂和学校当天关闭，允许 7,000 名市民参加仪式。仪式上，李昭致辞，对政府和出席的民众表示感谢。

官方审查

媒体审查

1989 年的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最终以1989 年6 月 4 日对抗议者的暴力镇压告终，成百上千名平民被杀害。由于抗议活动是由胡耀邦之死引发的，政府认定任何有关胡耀邦及其遗产的公开讨论都可能通过重新讨论胡耀邦支持的政治改革来破坏中国的稳定。由于与胡的公众联系和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胡耀邦的名字在大陆成为禁忌，中国政府审查媒体上任何提及他的内容。在政府审查的一个例子中，纪念他 1994 年逝世五周年的印刷媒体被撤销。

胡锦涛于 2005 年 8 月宣布了为胡耀邦平反的计划，并于 11 月 20 日举办了胡耀邦诞辰 90 周年的活动。仪式分别在胡逝世的北京、胡的出生地湖南和安葬胡的江西举行。西方观察人士指出，胡耀邦平反的举动可能是胡锦涛为获得一直尊重胡耀邦的具有改革意识的同事的支持而进行的更广泛政治努力的一部分。

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认为，胡锦涛政府希望与胡耀邦有联系。胡锦涛与胡耀邦都是通过共青团上台的，并被描述为同一个“派系”的一部分。胡耀邦的支持是胡锦涛在 1980 年代迅速晋升的部分原因。

一些观察人士指出，对于胡耀邦的名誉恢复使党更有可能愿意重新评估 1989 年的天安门抗议活动，但其他观察人士表示怀疑。以纪念某人出生或

死亡日期为目的的纪念碑往往是中国国内政治趋势的标志，有些则预示着进一步改革的前景。怀疑论者指出，胡锦涛在宣布胡耀邦的公开纪念活动后不久发表声明称赞古巴和朝鲜政府（尽管它们有经济“缺陷”），暗示该党不太可能追求戏剧性的政治改革计划。

2005年11月18日，中共在人民大会堂庆祝胡耀邦诞辰90周年。温家宝总理、曾庆红副主席等党政干部、社会名流、胡耀邦家属等约350人参加。有传言说胡锦涛想参加，但被仍然不喜欢胡耀邦的其他党内高级成员阻止。温没有说话的机会，曾庆红是最资深的党员。曾在讲话中说，委员们应该学习胡的优点，特别是他的坦率和对中国人民的真挚关怀。曾庆红说，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作出了一生的贡献，树立了不朽的功绩……党和人民将永远铭记他的历史成就和品德。”

2005年后的媒体

官方的三卷本传记和胡的著作集准备在中国发行。该项目最初是由一群胡的前助手发起的，由张礼群（音译）（于 2003 年去世）领导。政府高层得知该项目后，坚持要控制。政府审查人员发现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担心胡与邓小平关系的细节（尤其是胡在 1987 年抵制镇压学生示威者的命令后被免职的细节）对邓小平的遗产有不良影响。胡的传记的作者随后拒绝了政府提出的发布审查版本的提议。胡的前助手撰写的传记只有一卷（涉及文革结束前的事件）最终出版，另外两卷由政府持有，尚未出版。

虽然出版纪念文章的杂志最初被禁止发行，但2005年禁令解除，这些杂志公开发行。改革派杂志《炎黄春秋》获准在2005年发表一系列纪念胡耀邦

诞辰的文章，但政府采取行动限制该杂志的发行。纪念胡的一期卖出了5万册，但剩下的5000册被宣传人员销毁了。这是胡的名字自他死后第一次公开露面。

2010年4月（胡逝世21周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回兴义、忆胡耀邦》的文章，以散文形式呈现，回顾了胡耀邦、温家宝1986年在贵州省兴义县对普通百姓生活的调查。1985年至1987年与胡共事的温家宝称赞胡耀邦“优秀的工作作风”，“完全关心群众的苦难”，以及他的“崇高的道德和[性格]的开放性”。温的文章在中文网站上引起热烈反响，文章发表当天在新浪网就收到了超过20,000条回复。这篇文章被熟悉中国政治制度的观察人士解读为温家宝确认他是胡（而不是赵紫阳）的门徒。

2015年11月20日，胡耀邦诞辰100周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为胡耀邦举行高调纪念仪式。与十年前历届领导人举办的活动不同，100周年纪念活动刻意高调，政治局常委全体成员参加。习近平对胡的成就大加赞赏，并表示胡“一生为党、为人民奉献，一生光辉，奋斗一生……他的贡献将载入史册。”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3%A1%E8%80%80%E9%82%A6%E4%B8%8B%E5%8F%B0

胡耀邦下台

胡耀邦下台，是一件影响中国大陆进程的政治事件。是指1987年1月，掌权的中共元老对时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的一次政治行动，并迫使胡耀邦辞职下野。

由于胡耀邦深入民心的改革作风，以及整个下野程序存在的瑕疵，使得史学界对此颇为争议。而此事也为两年后的后续胡耀邦之死、六四事件埋下伏笔。

背景

1986年5月，作为元老代表的邓小平约胡耀邦到家中谈论中共十三大人事安排。胡耀邦说："我已年过70了，十三大一定要下来。"邓小平说："我、陈云、先念都全下。你要下就半下，不再当总书记，而再当一届军委主席或国家主席，到时候再说。"

1986年8月22日，邓小平过81岁生日，在北戴河设宴，表示在两年后的中共十三大上全退，胡耀邦信以为真。10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公开

表态，说"今天我就十分具体和坦白地讲，我赞成小平同志带头退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带头。只要小平同志退，别的老同志的工作就好做。我的总书记任期满了，也下来，充分给年轻的同志让路。"

胡耀邦的讲话得到了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杨得志、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聂荣臻、倪志福和国家副主席乌兰夫的赞同，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还在会上发表了支持胡耀邦的讲话；却招致王震等人的反对。此后，胡耀邦的权力被削弱。1986年10月，邓小平把人事权交给了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安排由薄一波等7人组成的小组（薄一波、杨尚昆、宋任穷、姚依林、王震、伍修权、高扬）分头征求党内对十三大的人事安排意见。

1986年12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开始的学潮蔓延到北京，中共元老将学潮的爆发归咎自由化知识分子煽动、以及胡耀邦的纵容；而此前1985年5月10日，香港《百姓》杂志的陆铿在中南海访问胡耀邦，将采访内容整理成《胡耀邦访问记》发表在同年6月出版之《百姓》半月刊上，也被中共保守派和既得利益集团视为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证之一。1986年12月30日，胡耀邦打算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中央书记处关于处理学潮的意见；邓小平不同意开会，并要胡耀邦到他指定的地点谈话。邓小平认为学生运动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并责问胡耀邦"你难道没有责任？"胡耀邦回答说："我保留我的意见。"邓小平说："不是保留，而是要你马上站出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

经过

1987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强调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抨击资产阶级自由化，这被认为是为群众做思想准备。当夜，在邓小平家里，陈云、薄一波、彭真、王震、宋任穷等中共元老商议胡耀邦的去留问题。1月6日，中共中央发布以邓小平关于处理学生示威指示要点的一号文件；同日，邓小平通知胡耀邦参加“党内生活会”。1月10日-15日，在由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主持、有二三十名高级干部参加的“党内生活会”上，连续几天指责胡耀邦的“问题”；邓小平与陈云因地位太高不宜出面，国家主席李先念因在上海没有参加。

胡耀邦在生活会上首先作了检讨，承认自己有“错误”，但试图做出一些辩解。之后胡耀邦遭众人轮流批判。薄一波认为胡耀邦到基层视察的次数太多、地区太广，指责他是在“游山逛景，哗众取宠”；杨尚昆和王震指责胡耀邦站错路线（即资产阶级自由化）；宋任穷则批判胡耀邦对邓小平的态度。此外，邓力群通过五个小时的发言痛斥胡耀邦的作为，称胡耀邦对四项基本原则和反精神污染运动关注不够、没有做到团结全党、主要使用跟自己观点相同的人、在重要的人事任免上没有遵循老领导的意见等。赵紫阳发言批评胡耀邦“不守纪律”、“标新立异，搞些噱头”，“大概是想在国内外树立一个开明形象”。而被胡耀邦视为朋友的王鹤寿也落井下石将私人讲话公开。在所谓的生活会上，只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支持胡耀邦，斥责元老们动用文革式手段逼总书记下台是不正常的、是违反党的原则的。习仲勋当时曾指着薄一波怒斥。在1月15日生活会结束前，胡耀邦作了最后的检讨，他表示要为自己的全部错误承担责任。但是他也要求组织继续调查自己是否真有野心，是否搞过派系。生活会结束后，有人看到胡耀邦在会议厅的台阶上黯然落泪。

最终，在连续七天的批斗之下，政治局于1月16日召开扩大会议。陈云在会上说，胡耀邦“没有把工作做好”，“让一百多个部级单位向他提交报告，却不解决要害问题”。“到下面乱跑”，“没有把精力用在他本应深入研究的主要问题上”。“没有定期召开政治局会议和常委会议”。陈云又说，他“批评过胡耀邦以后曾希望胡耀邦能改正错误，可是胡耀邦显然没有完全理解他的意思”。在选拔干部上，胡耀邦“只选自己圈子里的人”。会议以举手通过的方式批准了胡耀邦的请辞，并推选赵紫阳为代理总书记，推选赵紫阳代理总书记的理由是他在地方工作和在国务院负责经济工作期间都有成绩。会议也肯定了胡耀邦工作中的成绩。但胡耀邦保留了政治局常委的名义，只是排名降到最后。1月19日，中共中央三号文件列举了胡耀邦解除职务的原因：“抵制党为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作出的努力，纵容全盘西化的要求；没有充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批左不批右；在经济工作中鼓励经济过快增长和消费，造成经济失控；在政治工作中经常违反程序；在外事活动中说了一些不应该说的话；经常不遵守党的决议，未经中央授权就讲话”。

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胡耀邦仍以接近全票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而当初卖劲倒胡的邓力群和胡乔木，则在选举中因得票最少而落选。尽管胡耀邦被闲坐，他仍然获得中共党内改革派、知识分子及学生的欢迎。1987年12月30日，胡耀邦接受邓小平的邀请去邓家打桥牌，邓问胡对自己的问题是不是想通了，胡没有回答。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3%A1%E8%80%80%E9%82%A6%E4%B9%8B%E6%AD%BB

胡耀邦之死

1989年4月15日，前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北京病逝，享寿74岁，他的死是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导火线。1989年春节，胡耀邦离京去湖南休假，因感冒致使心脏病发作。后经抢救病情稳定，之后转移到广西休息。3月初，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胡耀邦参加全国人大会议返回北京，再次出现在公众场合的胡耀邦明显消瘦。4月8日早上约10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前夕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正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教育问题的决定》的文稿。胡突然心脏病发作，举手请假，赵紫阳让胡耀邦先稳住身体，并立即叫中共中央办公厅马上找医生。当时出席会议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拿出两粒硝酸甘油，但没有采用（一说使用了）。不久，北京医院内科主任钱贻简和王敏清陆续赶到，并判断是心肌梗塞。下午2时，将胡耀邦送至北京医院，情况虽没度过危险期，但一直稳定。4月15日，胡耀邦在如厕时，因用力致使左胸部血管大面积破裂，导致大面积心肌梗塞；于早上7时53分逝世。

胡耀邦去世后，由于他曾经担任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的职务，治丧规格按照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规格进行，实际规格比担任过国家元首的叶剑英还要高。4月22日，胡耀邦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家主席杨尚昆主持追悼会，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致悼词，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界人士、干部群众数千人出席。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的讣告称：

“胡耀邦同志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

在天安门广场至八宝山的道路上，默哀的群众挤满两旁。他的猝逝在学生中形成了强烈的回声，并且成为首都民众聚集的最初动力。各大学校园陆续出现赞扬胡耀邦的海报，并呼吁中共中央重审胡耀邦观点。数日后，这些呼声扩大到新闻自由、民主制度以及官员腐败问题等。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出现小规模的自发性集会，悼念胡耀邦。而在北京主要高校校园内出现形形色色的大字报，借悼念胡批判1987年令胡耀邦下台的“老人政治”。基于对胡耀邦遭遇的同情和其开放清廉形象的尊崇，加上对改革开放以来引发的官倒与贪污情况严重的不满，使当时的青年学生纷纷出来悼念胡耀邦，以至引发后来的学生与民间联合运动，并最终导致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

根据胡耀邦之妻李昭向中共中央提出的要求，1990年12月15日，胡耀邦的骨灰运离北京，归葬于他生前亲手创建的江西共青城。在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陪护下，长子胡德平敬捧父亲的骨灰安葬于富华山陵园。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8D%E5%AF%B9%E8%B5%84%E4%BA%A7%E9%98%B6%E7%BA%A7%E8%87%AA%E7%94%B1%E5%8C%96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政治口号于1980年代初由邓小平等人提出，而作为一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运动最早起始于1986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并于1987年初正式展开。

1986年底，八六学潮的爆发使得改革派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于1987年初被迫辞职，中共左派人士邓力群、胡乔木等人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于1987年初顺势推广、展开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但该运动此后遭到了代理中共中央总书记、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反对，赵紫阳认为左派利用了反自由化运动来反对和否定改革开放，并以此说服了邓小平，该运动随后于1987年中期逐渐结束。反自由化运动被不少人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继文化大革命后的又一场左倾运动。

历史沿革

自由化起源

按照在中国共产党的官方说法，“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概念最早是邓小平提出的：1980年12月25日，他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

中指出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提道“要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

1983年，中国共产党的左派人士发动了“清除精神污染”的政治活动。同年10月，邓小平再次提到，“对于思想理论方面“左”的错误观点，仍然需要继续进行批评和纠正。但是，应当明确指出，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1985年5月20日，邓小平在会见台湾陈鼓应教授时说：“我们大陆坚持社会主义，不走资本主义的邪路。”

八六学潮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持续进行，中国社会出现了官倒、权钱交易、腐败、特权等种种问题，而经济改革也遇到了原有政治体制的阻碍。1986年上半年起，邓小平再次提出“政治改革”并启动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和制定，同年9月“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成立，成员包括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邓小平的政治改革出发点是党政分开、提高行政效率、革除官僚主义弊端、推动经济制度进一步改革等，但不能照抄西方的宪政制度，他强调“要搞一个增强行政效能的体制，讲民主必须要和法制联系起来讲，把法制搞起来，才能有稳定的社会环境。我们的行政机构应该很有效能。 ”

与此同时，1986年9月28日，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邓小平认为：

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实际情况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管什么这里用过、那里用过，无关重要，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在决议中写这个。我主张用。......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

1986年12月，中国大陆各地爆发了八六学潮，对学校管理和有关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等问题提出意见，并高呼“要民主”等一类口号。12月中旬，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学潮情况，提出以疏导为主的方针。12月27日，胡耀邦出席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并讲话，重申以疏导为主的方针，得到中央书记处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大多数人的赞同。1986年12月27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发动者胡乔木、王震、邓力群、薄一波等人到邓小平家反映学潮的严重性，一致认为这是胡耀邦姑息和领导无力的结果，认为胡耀邦应对当前的局势负责。12月30日，邓小平通知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等人到他家谈话，指出：

学生闹事，大事出不了，但从问题的性质来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我们对学生闹事，前一段主要采取疏导的方法，是必要的。疏导，也包括运用法律的手段。如果破坏社会秩序，触犯了刑律，就必须坚决处理。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这也不

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这件事发生了，也是好事，提醒了我们。应该说，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狂得很。...... 上海的群众中传说中央有个保护层，对是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否要反对自由化，也有两种意见。....... 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我经常批评美国当权者，说他们实际上有三个政府。当然，美国资产阶级对外用这一手来对付其他国家，但对内自己也打架，造成了麻烦。这种办法我们不能采用。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于1987年1月被迫辞去总书记的职务，之后又被批评为“资产阶级自由化”。

运动开展

1987年初，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逐渐展开。1987年1月，邓小平认为：“如果说过去我们对‘左’的干扰注意的多，对右的干扰注意不够，那么这次学生闹事提醒了我们，要加强注意右的干扰。”1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指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核心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

在这场运动中，巴金等人受到公开批判，当时资历较浅但作品前卫的剧作家高行健也受到批判。

运动结束

反自由化运动期间，代理中共中央总书记、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主要精力“几乎是用在如何防止这场反自由化的斗争扩大化；控制、限制左的势力借反自由化来反对改革开放”。赵紫阳担心邓力群等人发动的这场运动会冲击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研讨，也会冲击教育、科技、文化、农村等各个领域，故组织力量与邓力群等人进行了博弈和斗争。

1987年4月28日，赵紫阳向邓小平作出汇报，提到有一些人以“左”反对改革开放、借反自由化来否定改革开放的情况。他强调这种气氛与1987年下半年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三大极不协调，必须从现在起着重宣传改革开放这一面，为十三大的召开作好舆论准备，并建议重新发表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8.18讲话”。邓小平赞同赵紫阳的意见，并要求他对这个问题作一次讲话。

1987年5月13日，“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以上系统在京各单位，中央、国家机关部委部以上领导干部共1000多人参加了会议。在此次会议中，赵紫阳作了“5.13讲话”，对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扩大到经济领域的主张进行了严肃的批评；7月1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邓小平的“8.18讲话”。这两个讲话发表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告一段落，改革开放再次成为舆论宣传的主流。

运动后续

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爆发，标志着邓小平、赵紫阳等人在中国大陆推动的后期政治体制改革失败，赵紫阳等中共改革派高层被撤职。1989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诺贝尔奖得主、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时指出：“四个坚持的对立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年来每年我都讲多次，但他们没有执行。”

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导致一系列共产主义政权的倒台，反和平演变取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成为1990年代中国政治生活的中心。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5%B5%E7%B4%AB%E9%98%B3

赵紫阳

赵紫阳（1919年10月17日－2005年1月17日），原名赵修业，男，汉族，河南滑县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家、政论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二代主要领导人之一。1980年代先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共中央总书记等重要领导职务，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了巨大贡献，主持了1980年代后期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平息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左倾运动，极大影响了中国民主运动的进程，被视

为党内改革派主要领袖。“六四事件”后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遭受软禁。

赵紫阳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滑县工委书记、县委书记，中共豫北地委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中共冀鲁豫边区地委书记，冀鲁豫军区第四军分区政治委员。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任桐柏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共南阳地委书记兼南阳军分区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副书记，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第二书记、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时期遭迫害，此后担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19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曾经流传“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的说法。

赵紫阳于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先后担任国务院总理和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在任期间，他参与启动和领导的改革运动为中国大陆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全球性的市场经济奠定了基础。除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外，他还积极提出并设计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推进改革开放的深化，曾一度被认为是邓小平的接班人。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赵紫阳因公开表示同情学生和反对武力镇压，而招致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和李鹏等人的不满，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被免去党内外一切领导职务，仅保留党籍，最终在软禁中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16年，于2005年逝世。并于2019年10月18日下葬。

由于赵紫阳在“六四事件”中的立场与态度，以及他在事后面对党内保守势力声讨时坚持己见为自己辩护，中共官方对其的评价直至其逝世仍然以加诸他身上的“六四错误”为重点。而他在经济改革中敢做敢为的品质、主张建立″现代化政治体制的″观点、响应社会各界民主诉求和反对武力镇压学生的言行以及至死不屈服于外加其罪的品格，获得了中共党内改革派人士（如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前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副委员长田纪云、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李锐等人）和海内外支持普世价值的团体或个人的广泛支持，是现代中国民主运动的标志性人物之一，也是中共历史上少有的特立独行的领袖人物之一。由于赵紫阳在改革开放时期担任总理时的贡献及经济决策，被当时的世人称为“改革开放的总工程师”；亦有人认为他才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而非邓小平。

生平

早年经历

赵紫阳生于河南滑县桑村乡赵庄。父亲赵廷宾，字良乡，又名秋喜，家中殷实，有良田数十亩，是当地有名的地主，但平日乐善好施，得村民爱戴；他与发妻刘氏得一子，取名赵修业。1927年赵进入位于桑村乡的县立第十七小学读书。1932年6月在桑村小学的一间简陋的教室里宣誓加入中国共青团（其介绍人就是校长杨庆然和两位教员胡敬一、聂真三，三人均为中共地下党员）。后由于中共准备的夏季滑县暴动和其他起义遭镇压，地下党组织解散，赵修业与组织失去联系。赵修业在准备这次暴动时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打倒地主分田地；他还对自家的田地和牲畜分发给农民和卖掉，其费用献给党组织，引起父亲赵廷宾的不悦，但是他还是成功说服了他的父亲。

1932年秋天，赵父送赵修业到县立第一小学读书。1933年夏天，赵成功考取开封的省立初级中学（今开封高中），中学时期，他成绩优异，多次获得校方颁发的奖学金。1935年北平的一二九运动爆发，赵修业与同学参加了声援北平学生的活动，当时还是初中生的他参加了开封高中学生发动的卧轨请愿行动，要求政府停止进行内战，出兵抗日。1936年，赵修业考入武昌高级中学。在武汉，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赵紫阳。

革命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状态。时年十八岁，正在武汉读书的赵紫阳因战争辍学，返回家乡组成抗日团体，1938年2月赵紫阳再次与中共组织取得联系，之后被中共派往冀鲁豫省委党校学习。同年5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学成回到滑县，年仅20岁的他被中共委任为滑县工作委员会书记，大量发展党员。1939年春，滑县工委改称县委，赵紫阳改任县委书记，拥有不小的地盘和地方武装。

1939年，在赵紫阳的策动下，他的老同学、原中国国民党籍的滑县县长陈曙辉率军投靠中国共产党，宣布脱离国民党领导，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改编。此一大胆且成功的举动使赵紫阳更受上级重视。同年6月，赵紫阳上调成为中共豫北地委宣传部长，他也因此认识了宣传部的干部梁伯琪，两人之后结为连理。1940年6月，任中共晋豫鲁冀边区第二地委（后改为第六地委）书记，1943年改任中共豫鲁冀边区第四地委宣传部部长，当时日军正展开大规模的扫荡行动，中共的根据地大幅减少，赵紫阳亲率边区第四军分区第二十一团部队开辟新根据地，歼灭日军一个营，同年7月，赵紫阳在

滑县开展雇佃贫农运动和减租减息运动，调动了地主和农民的积极性，其滑县建设的经验受到邓小平等人的赞赏。至抗战胜利时，赵紫阳已经成为中共党内颇具名气的中层领导人。

国共内战时期

1945年8月后，中共中央任命他为地委副书记兼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冀鲁豫军区第四地委书记兼第四军分区政治委员。同年春天，中央局书记邓小平在山东冠县举行的土地改革问题的座谈会上特别肯定赵紫阳在滑县的土改经验，并将赵紫阳的经验推广到中央局的所有辖区，赵紫阳也因此在当时被称为"土地问题专家"。1946年5月，中共中央指示在全国的"解放区"开展大规模土地改革，已经创造出滑县成功的农民运动经验的赵紫阳再次受到重视。邓小平对身边的人说"将来我们解放了，像小赵这样的同志都是党的宝贝。"刘邓大军攻克滑县之后，滑县、卫南成为解放军的重要后方。赵紫阳再一次回到滑县，主持彻底的土改运动，他坚持在土改中支持农民，对地主，根据罪恶的轻重施行文斗、武斗、反省三种形式轻重有别的惩罚。赵紫阳的父亲赵廷宾在这次土改期间，因财产流失导致情绪受刺激，肺心病发作去世。

1947年秋，赵紫阳率地方部队随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纵队南下，中共中央任命他为中共桐柏区党委副书记兼桐柏军分区副政治委员。经过几个月的战斗，中共最终在桐柏山站住脚跟。12月，中共中央中原局批准成立桐柏区党委和桐柏军区，司令员王宏坤，政治委员刘志坚，赵紫阳任军区副政委和兼任桐柏区党委副书记，赵紫阳主要负责土改工作和组织人事工作。

1948年7月他在平氏会议上宣布停止分土地、打土豪、乱没收，有步骤地对已分土地的地区进行复查调查工作。1949年3月，为适应渡江作战，桐柏军区撤销，赵紫阳改任中共南阳地委书记兼南阳军分区政治委员。

广东时期

1949年10月后，赵紫阳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常务委员、秘书长、农村工作部部长、副书记等职。1950年，担任河南省南阳地区地委书记。1951年4月，他辞去南阳地委书记的职务，南调广东，成为“南下干部”的一员，协助陶铸等领导广东的土地改革工作。1965年，赵紫阳任中南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同时增补的中南局书记还有李一清和金明），虽然赵紫阳从未当过中南局第一书记，但1965年46岁的他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1966年接替陶铸为中南局第一书记。

土地改革

1962年，赵紫阳（左二）在广州

当时中共在全国建政后不久，即开展大规模的土改运动。广东当时由叶剑英任省委书记兼人民政府主席，他的两名主要下属古大存和方方主持土改。他们根据广东独特的社会和历史现实，主张“宁慢勿乱”，并颁布了《广东土地改革实施办法》，对广东土改实行较温和的手段路线，给大多数地主家庭以生活出路，不作过分清算。赵紫阳抵达广州之后，很快就被任命为中共华南分局秘书长；1951年5月被增选为中共广东省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为方方。而陶铸任华南分局第四书记。他们上任后，对广

东的“温情主义”式的“和平土改”感到不满，加上当时的地方干部和南下干部的矛盾尖锐，南下干部受到地方干部的排斥，他们打算仿效北方放手进行“疾风暴雨式”土改的意愿也受到阻挠。陶、赵于是向中央写了关于广东土改的报告书，认为于广东土改落后和干部不纯。

1952年，毛泽东向广东发出了“依靠大军，依靠南下干部，由大军和南下干部挂帅”的土改政策。毛泽东的指示使广东的政局形势发生逆转，叶剑英和方方都被批评而作了检查，他们被调离了广东，古大存的职权也被架空。陶铸升任华南分局第二书记，主持全面工作；赵紫阳稍后也升为华南分局副书记，兼分局农村工作部部长，主持土改工作，当时赵紫阳作为陶铸的助手，从严从紧执行土改政策，亲自批核了许多土改的决策。在当时极左的氛围中，根据中央意见，陶铸开展了整顿干部队伍和“反地方主义”的运动，造成一系列冤假错案。

合作化运动

1953年4月叶剑英上调武汉时宣布广东全省的土改工作胜利完成，农村的工作任务进入全力发展生产的阶段。当时的赵紫阳刚刚接管农业事务，他马上发出稳定生产关系，扭转农村混乱的局面，保护私有制的指示，成效比较显著。不过同年11月，毛泽东一声令下，全国随即放弃保护私有的政策，开始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数量指标式的合作化运动使广东各地农村出现了屠宰牲畜、砍伐树木、变卖生产工具等情况，令生产遭到破坏。赵紫阳对此反复强调合作化的过程中要着重于农民的互利、生产的提高，注意循序渐进。但是毛泽东却撰文赞扬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批判右倾保守的路线，提出不少冒进的设想。鉴于毛泽东的权威，合作化运动按照其指示发展，中共中央最终在1956年秋

宣布胜利。在合作化运动期间，赵紫阳的思想即开始发生转变，这种转变是受其上司陶铸的影响而来的；陶铸在那几年的工作中，逐渐认识到原来的极左政策的错误和祸害，向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温和路线靠拢。陶铸的转变促成了赵紫阳的思想转变，陶铸对他的思想影响一直持续到陶铸逝世。

反右运动

1957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掀起反右运动，陶铸因为职责不得不划定一大批知识分子为右派；赵紫阳由于主管农业，可以不参与划右派的工作。不过在这种困难的环境下，陶铸和赵紫阳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暗中保护了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发表文章宣传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结束，政府的重要任务应该是领导经济建设，提高高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等观点。赵紫阳还亲自制定了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特殊生活补助和医疗保健政策。

大跃进时期

从1953年开始，广东省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开展农业增产运动，大力兴修水利，开展农业技术改革，促进粮食增产。1955年秋收，潮安县县委称潮安县成为全国第一个水稻千斤丰产县。在1958年中央粮食征购指标提高的背景下，陶铸坚信当年没有粮食大丰收，怀疑农村干部隐瞒产量，陶铸于1959年1月中旬到东莞调研后得出的结论为，生产大队隐瞒和动用了由公社统一管理的粮食和资金。与此同时，赵紫阳到雷南县考察后认为雷南有瞒产问题，必须开展反瞒产运动。2月，赵上书毛泽东报告“反瞒产私分”的经验，毛当即批示向全国推行，“反瞒产私分”事实上误导了中央。在赵紫阳进一步了解真相后，如实向中央报告，建议政府停止“反瞒产”。但是，“反

瞒产私分”造成的影响已经难以挽回。中央肯定了赵的报告，转发各省，号召全党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赵紫阳开始批判“共产风”、“浮夸风”，提出“按劳取酬”、“爱惜民力”、“不要愚公移山”的要求，强调按照客观的条件和客观的规律办事，珍惜财力，不能单单依靠群众热情进行生产。在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期间，广东在全国范围内算是较沉着稳定、死亡人数较少的省份。

1960年3月，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第三书记的赵紫阳来到南海县一户麦姓农家视察时，看到麦氏两幼童兄弟为了舔一只饭勺里的饭汁而打架，他感触良多。赵紫阳回到省委后，一开口就对陶铸说：“旧社会中，中国国民党把人民逼反，今天，难道共产党也要把人民逼反么？”同年年中，陶铸兼任中南局第一书记，使广东省委大部分工作都由赵紫阳负责，赵紫阳决心开始实施对各方面工作的整顿。为了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赵紫阳经常下基层调研，了解基层情况，他不但与地、县、市的领导座谈，也到公社、大队座谈，听取干部和农民的意见、呼声和要求，帮助解决困难，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听到哪个地方有增产的消息，他必实地察看，以总结经验。由于赵紫阳鼓励干部畅所欲言，当时佛山书记杜瑞芝、专员杨德元、张勋甫，顺德勒流公社黎子流，南海大沥公社陈贤芳，中山县委谢明仁，东莞县委书记林若，汕头书记刘俊杰，惠阳书记原鲁、李富林等等，都乐意与赵紫阳谈心，讲真话。

省委书记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十二条”，称要坚决反对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上级的正式表态使赵紫阳终于可以放手整顿，于是他着力扭转濒于崩溃的广东经济。他表明不准刮“共产风”、搞平均主义，要重新找回共产党

的民主集中制和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两大优良作风。他对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已经产生怀疑，他在农业上大胆推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政策，实行奖罚制度，让农民能够自由生产，提高个体生产积极性。当时他向全省推广清远县农民创造的“联系产量责任制”（与“包产到户”模式大同小异），使广东农村的生产得以恢复，并推行农民可保“自留地”和养小量家禽等“土地政策”，至1963年，广东经济形势基本得到好转。

在对外关系上，他在广东采取较自主的对外政策，与刘邓的“三和一少”相呼应，广东的对外关系得到改善。如在粤港关系上，1961年2月，赵紫阳允许宝安县的水库向香港供水；随后，粤港两地又达成了东深供水工程的协议，解决了香港的淡水供应问题。在1962年，广东民众为了摆脱饥荒而掀起大规模的“逃港潮”，每天都有数千人冲过边防线，中央下令广东要将此事作为第一任务来抓。赵紫阳承受很大的压力，不过他提出的对策则主要强调要“安排好群众的生活，让群众看到前途，跟群众做好思想工作，讲明群众在香港很难立脚，不动武，不进行清算”。赵紫阳富有同情心的做法赢得外界的好评。1965年初，陶铸专任中南局第一书记，不再兼任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职位自然由赵紫阳正式继承，46岁的赵紫阳也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省委书记。上任不久，赵紫阳就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意图改变农村落后的面貌，在农村实现水利化、化学化、电气化、机械化，引进国外先进的农场管理技术，但这些政策被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打乱。

文革时期

文革初期

1966年4月，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前夕，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兼任广州军区政委的陶铸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突然被提升，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排名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武汉军区第一政委，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接替陶铸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兼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并随同陶铸进京。赵紫阳曾劝说过陶铸，说北京局势凶险，这工作不适合他，但是陶铸并未能听从赵的劝告，上京赴任了。陶铸上调中央后，赵紫阳在广东失去了保护他的最大屏障，广州军区司令员、林彪麾下的人马黄永胜不再受到陶铸的制约，迅速发展自己的势力，赵紫阳面临着被打倒的危险。

一开始，广东的红卫兵运动虽然也在外地的影响下和中山大学、华南工学院学生的带领下有所涌动，甚至发出一些质疑赵紫阳和省委的声音，但是由于陶铸晋升最高层，未有人敢公然批判陶铸和赵紫阳的路线，加上陶铸力保在广东前线的赵紫阳，所以赵紫阳尚可以尽力将风起云涌的造反运动置于省委的领导之下。但是，形势很快发生逆转，陶铸在中央的短短半年间，没有执行毛泽东的路线，反而竭力保护刘邓和一大批老干部，使他和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的矛盾激发，毛泽东也决心打倒这个“邓小平的代理”。1967年1月4日，陈伯达率中央文革全体成员接见“红卫兵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正式宣布陶铸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打倒陶铸”。

陶铸迅速被打倒了，之后上海“一月风暴”使造反派的夺权潮向全国蔓延。1967年1月21日，“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省革联）对广东省委进行夺权，赵紫阳等人被扣押到中山大学主楼。不过这次夺权只是象征性的，由于造反派根本没有能力治理广东，所以赵紫阳和他们谈判后协议由省革

联监督省委，省委继续处理日常事务。但是更大的一场风暴很快又来临，省革联和广州军区支持的造反派发生权力斗争乃至武斗，1967年2月28日，广州军区对省革联控制的《广州日报》进行军管，省革联最终垮台。1967年3月15日，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成为全省的最高权力机构，黄永胜为军管会主任。

黄永胜控制整个广东之后，赵紫阳因为是“陶铸在广东的代理人”而成为最重要的攻击目标。他被罗列了“八大罪状”并遭监护审查：

两面三刀，打着红旗反红旗；

配合国内外阶级敌人，猖狂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大刮单干风，破坏人民公社制度；

用评功摆利，代替阶级斗争，疯狂地推行刘少奇的明左实右路线，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打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招牌，推行修正主义路线；

顽固地坚持刘、邓、陶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妄图拒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庇护牛鬼蛇神，陶赵互保，蛇鼠一窝；

大耍象征性夺权的阴谋；

地主阶级本性不变，沉醉于发臭、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1970年6月30日，赵紫阳和夫人梁伯琪以及两个十六七岁的子女被下放到湖南省涟源县湘中机械厂劳动，1971年5月在周恩来的保护下，赵紫阳被分配到内蒙古担任自治区党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革委会副主任。1972年，再度调任广东，被任命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广州军区政委。

主政四川

1975年初，邓小平回家乡四川考察，受文革负面效应影响，当时四川的状况令邓小平心寒，四川人民饱受饥饿之苦，经济上濒于崩溃，为改变四川面貌，邓小平任命赵紫阳主政四川，10月赵紫阳成为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1月由四人帮掀起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开展，到1976年，邓小平被打倒，赵紫阳也因此受到牵连，1976年2月14日，“四人帮”点名批评赵紫阳大搞复辟倒退，10月四人帮垮台，邓小平东山再起，这为赵紫阳在四川顺利开展工作奠定基础。

在四川任职期间，赵紫阳全力投入恢复经济，发展工农业生产。在农业问题上放宽政策，提倡发展多种经营，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休养生息。政策取得显著成果，1977年相较于1976年，四川全省粮食总产量增长10%，1978年下半年，农村政策进一步放宽，将农民的自留地面积扩大至总耕地面积的15%左右，并支持农民包产到户。随着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广，赵紫阳又率先在四川进行了全国最早的人民公社改建乡政府的试点，为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人民公社制度提供了经验，他领导的四川与万里领导的安徽遥相呼应，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并取得很好效果。当时有顺口溜：“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

赵紫阳在四川进行农业改革的同时，也在探索工业改革，他在工业上实施的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方针和相配套的14项政策使试点企业真正成为主体，释放了企业的活力，为促进工业发展，又出台了对新的社队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三年内免征所得税，对政策性亏损的产品实行定额补贴等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积极促进了四川工业生产和商业流通服务的恢复和发展。试点企业的总产值、实现利润、上缴利润增长幅度均有显著提高。

改革开放

邓小平在取代华国锋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之后，将赵紫阳的"四川经验"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的样板，并于1977年，提拔赵紫阳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9年成为正式委员。赵紫阳于1978年2月至1983年6月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七），3月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1980年8月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后，出任国务院总理。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党内排名也从第七上升为第四。胡耀邦下台之后，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于1987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推选为代总书记，同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赵紫阳正式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并任中共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1988年4月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家中央军委副主席。

推进改革

在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军事上掌握大权的邓小平、政治上主导

平反冤案的胡耀邦、经济上推行改革的赵紫阳，这三驾马车顺应历史潮流，使百废待兴的中国总体上出现向好的发展势头。赵紫阳在价值观上早已抛弃苏联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模式，在改革实践中为市场化与私有化奠定基础。在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赵紫阳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促使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大胆引进并推动设立股票市场和期货交易，他还亲自主导加入关贸总协定（即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的总体设计，一步步引领中国从计划经济的困境迈向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坦途。西方观察家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赵紫阳担任国务院总理和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是历史上最为开放的时期，许多对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限制都有所放松，允许知识分子自由表达。当时政治上虽然没有完全实现民主，但在思想文化上充满了民主氛围。

经济方针

赵紫阳在1980年3月17日出任新成立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开始主导中国的经济政策，担任总理后更把自己在四川任职期间的经济政策推向全国。他的经济改革以简政、放权和松绑为主导，在农村下放土地使用权和乡镇企业经营自主权。1980年，赵紫阳对各省施行财政包干制度，使地方财政利益与市场化方向保持一致，从而形成抵制计划经济的力量，使反对市场化改革的政治势力难以逆转中国的经济改革路径。这一改革，多年来一直遭到两股势力的攻击，一是主张恢复计划经济的政治势力，另一股势力是主张集权改革的知识分子。为引进外资、创造出口，他积极支持习仲勋、任仲夷等人在沿海省份建立的经济特区。同时在城市进行企业改革，如1982年减税让利、1984年利改税、1986年企业承包制和1988年股份制试验。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中国的农业和工业生产在1980年代得以快速提升，农业产量、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外贸进出口总额等指数不断增长。

1984年是中国进入全面改革的阶段，从1984年第四季度起中国经济出现过热现象，赵紫阳提出软着陆政策，在他的主持下中国经济既获得降温，又没有出现衰退。1985年初推出的价格双轨制是中国经济向价格市场化过渡的开始，赵紫阳指出价格不在市场中形成的话，企业就不会有竞争力。然而大部分国企还只习惯听从指令，对市场价格反映不灵，所以价格改革采取放调结合，能放的一律放，一时放不了的先调，直至完全放开。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政策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中国政府希望恢复中华民国时期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中的席位，1986年1月10日，赵紫阳向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秘书长阿瑟·邓克尔第一次公开表达了这一意向，赵紫阳说如果中国在关贸总协定的地位得以恢复，中国同关贸总协定成员国间的贸易往来将进一步扩大。1988年9月，在经济学家张五常的安排下，赵紫阳与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北京会面。当年中国经济再度过热，主持经济改革政策的赵紫阳面临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的双重问题。5月经邓小平首肯，赵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的报告，提出用五年时间每年以一定价格上涨指数为代价，实现理顺价格、解决工资不合理的问题，实现价格闯关。自改革以来物价持续上涨的背景下，7月中国物价上涨幅度以19.3%创下新高，8月价格闯关的消息正式发布后，全国出现了大范围抢购并伴随通货膨胀。价格闯关虽然产生了负面效应，但最终实现了市场定价机制，计划经济下呆板划一、缺乏弹性的政府定价机制成为历史。价格闯关的负面效应成为1988年9月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上“保守派势力”攻击赵紫阳领导的“改革派”的主要把柄，改革派因通货膨胀受挫，倡导经济紧缩、治理整顿的保守势力再次崛起，保守派的政策令人民对改革开放的前景充满疑虑。

政治发展

1980年代，尽管赵紫阳被国内的左派视为修正主义者，但他主张政府行政透明化和国家政策的制定要听取民意的方针却受到国民的广泛欢迎。赵紫阳对社会主义的定义跟中共党内保守派有很大不同，赵紫阳认为政治改革是社会主义面临的最大考验。他相信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是密不可分的。进入1980年代后期，赵紫阳和胡耀邦共同推进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政治改革，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选举，政府更加透明化，国家政策制定要更多的磋商，官员对自己的错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等。赵和胡还进行大规模的肃贪行动，允许对中共高干子女，特别是那些在其父母庇荫下发展起来的子女（即太子党）实施调查，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政策也招致中共党内许多掌权人士的不满，1986年发生学潮后，胡耀邦受到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指责，一批党内元老迫使胡耀邦辞职。赵紫阳后来接任胡耀邦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在赵紫阳被任命为总书记前一个月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自己不适合当总书记，更适合管理中国的经济事务。当时中外已经公认赵是邓选定的接班人。基于中国需要进行多样化的经济改革来刺激生产的前提，赵紫阳在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上详细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指出这一阶段要持续上百年。

1986年上半年，邓小平再次提出“政治改革”，并启动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和制定；同年9月“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成立，成员包括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以邓小平提出政治改革的言论为后盾，赵紫阳从目标、模式和进程等方面制定政治改革战略，提出在中国的改革目标中要实现政治体制现代化，政治改革的主题是从革命体制向建设体制转变，使中国的政治运作逐步走上程序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轨道。在邓小平的主导下，赵紫阳设计了一套破除旧体制弊端且可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针对旧体制中权力过分集中、人治色彩浓重、政治运作和信息

不透明的弊端，他提出党政事务应该分开，在此之前这种言论是一种禁忌；其次，进一步下放权力，适于地方政府决策的事情都由地方直接定案；再次，改革官员任用制度以克服人事腐败，为建设高效稳定的公务员队伍提供制度保证；最后，建立社会协商对话机制，提高政府活动的开放度，重大情况知会人民，需经人民讨论，以逐步实现赵所倡导的政治开放。

在为民间创造活动空间上，赵紫阳为知识界与工人做了许多事情。赵紫阳对民主学说持开放姿态、擅于策略性地支持民主自由思想。1983年他与胡耀邦一起成功地抵制了“清除精神污染”，1987年他使“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破坏减低到最小限度。赵紫阳在策略性地尽快结束“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之后，就迅速扩大新闻自由，使中国在经过1980年代三次反自由化运动后，还能出现一段宽松的舆论环境，使得中国的“新启蒙”得以继续。但政治改革的启动并不顺利，至1988年中期几乎陷于停顿状态。1989年突发“六四事件”后，赵紫阳视危机为契机，主张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以便推进政治改革，但学生运动最后武力镇压收场，赵紫阳的政治改革尝试宣告失败，并被后来的上位者束之高阁。

外交政策

1981年10月，赵紫阳在墨西哥坎昆举行的国际首脑会议上阐述了中国关于改革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的立场。赵紫阳提倡开放的外交政策，努力改善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以使其支持中国的经济改革。赵紫阳指出中国不依附于任何超级大国，中国在任何时

候和任何情况下都坚持独立自主，对一切国际问题都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态度和对策。中国判断是非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世界经济繁荣。

1980年代初，中苏开始讨论关系正常化，苏联主动提出举行中苏边界谈判。中国从安全立场出发，要求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停止支持越南以及削减在中国边境驻军。1982年9月27日，赵紫阳表示与苏联建立关系是有困难的，需要时间，苏联必须采取措施停止威胁中国安全，中国并不希望打苏联牌反对美国，打美国牌反对苏联，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1984年末中苏两国关系逐渐改善，12月21日时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伊万·阿尔希波夫与赵紫阳会晤，并签订贸易合作协定。但中苏之间潜在的地缘政治上的敌对和互相猜疑并未消失。

1984年1月，赵紫阳以中国总理身份对美国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期间，美国时任总统里根对赵紫阳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勇于创新的作为表示赞赏，里根表示，赵紫阳所说的"同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各种经济形式和常规决裂"的话是具有远见的，被美国人民理解和赞赏。在赵紫阳到达美国之前，里根于1984年1月9日签署了一份当时被定为机密的文件。文件显示美国有意放开对中国的技术转让，并将中国视为不结盟、但友好的国家。美国鼓励中国继续留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外，鼓励中国放开极权政体，在经济上逐步走向市场机制，继续拓宽中国和主要工业化国家之间的纽带，如果上述两个目标能够实现的话，美国会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对中国宏大的现代化努力予以支持；美国认为一个强大、稳定的中国将逐渐有助于促进亚洲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和平。在军事方面，美国希望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军事合作，共同面对来自苏联的威胁，帮助中国提升军事防御能力，适当程

度上提供民用和军事技术的转让。访问结束后，中国外交部发文指出赵总理对美国的访问在对外政策上进一步显示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形象，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得到国际舆论的广泛报道与好评。通过发表讲话、电视采访、回答问题，向美国人民介绍了中国的内外政策，扩大了影响。另一方面，美国人民对中国还不很了解。赵总理有针对性的讲话和回答问题，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上，中国不再进行意识形态的扩张，对激进政体的支持亦逐渐下降，对外援助总额也不断缩减。与经济发展相比，虽然非洲等地区不再被视为与苏联外交争夺战的地域，但非洲仍然是中国对第三世界开展外交政策的重点地区，在外援总额下降的同时，仍然增加对非洲的援助。1982年底至1983年初，赵紫阳访问非洲，提出中国同非洲国家经济技术合作的四项原则，赵紫阳认为中非经济合作应扩展到双方相互来往，而不是中国单方面援助。1984年6月11日，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恩里科·贝林格去世，正在挪威访问的赵紫阳缩短行程，前往意大利出席其葬礼。多国政要也出席了此次葬礼，其中包括苏联高官戈尔巴乔夫。

党内斗争

在华国锋下台、邓小平重新掌权后，他与陈云、李先念等在权力分配和治国理念上均存在分歧。胡耀邦于1987年1月被迫辞职后，邓小平提议由赵紫阳代理总书记，但是以陈云、李先念等人为首的保守集团中意邓力群，王震四处活动支持邓力群，甚至当面劝赵紫阳不要当总书记。赵紫阳原本没有当总书记的意愿，更加愿意在总理职位上继续经济改革，但是左派的活动引起赵紫阳警觉，若由邓力群接任总书记，反自由化形势会更加严峻。虽然最终邓小平在党内的政治较量中占据上风，赵紫阳成功代理总书记，

但是陈云势力仍有巨大影响力。这批势力因经济改革出现一些问题开始质疑改革开放，认为改革搞糟了，不如重新回到计划经济。

从1987年开始，赵紫阳与中共内部反改革的教条主义者、左倾势力关系紧张，矛盾激化。左派刮起“倒赵风”和“反改革开放风”的同时，关于赵的儿子是官倒的谣传开始集中爆发。对此，赵紫阳主动提出调查自己家属，而李鹏声称他无力阻止其子退出公司。赵下台后，中央对其子女进行调查，但没有查出问题。而李鹏声称尉健行和吕培俭查明赵的长子倒彩电、次子倒汽车牟利数千万元。作家胡平称这是“倒赵派”的诬陷。1990年6月，王任重将调查赵的三十条材料交给赵，材料中没有其子的官倒问题。胡平说若赵的儿子真存在官倒问题，李鹏仅在1989年6月的日记中提一句，之后却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这与李鹏的人品和作风不符。

赵紫阳无法完全认同左派势力的反自由化运动，若反自由化运动持续进行的话，十三大就无法为深化改革开放定调。赵紫阳为此发文对反自由化作出严格规定，划定界限，明确自由化的概念为“反对共产党领导，主张全盘西化的思潮”，这样就不会重复中共过去搞运动式的混乱。在反自由化的氛围中，左派势力企图把反自由化扩大，延伸至经济领域，在左派元老支持、在邓力群的授意下，党校出现反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反对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声音。赵紫阳向邓小平提出自由化干扰是一个时期的，长远看主要是来自左的干扰。邓小平赞同赵紫阳的看法。1987年夏，在得知邓小平同意反左后，中宣部出现抵触情绪，赵紫阳对中宣部部长王忍之和副部长王维澄提出批评，但是赵紫阳深知中宣部的幕后是邓力群等人。早在1987年3月，赵紫阳就曾向邓小平提议让李瑞环到中宣部协助邓力群工作，这样就可以使下面有些意见反映上来，中央的意见也能更好贯彻

下去。邓小平对此同意，但陈云反对。

1987年，随着中共十三大临近，赵紫阳正式向邓小平建议邓力群可以进中央政治局，给他一个发表见解的地方，但是不能进中央书记处，不再负责宣传方面的工作。这事正酝酿时，党内老同志李锐给赵紫阳写信反映邓力群在延安时期生活作风和道德方面的问题，认为邓力群品质不好又保守僵化，不应负责意识形态方面工作。赵紫阳把信转给邓小平，邓小平批示邓力群不再主管思想宣传工作。后来，由胡启立主管意识形态。赵紫阳在十三大上定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个基本点主要是反左。这更加引起左派的不满，李先念在十三大后公开攻击赵紫阳，称赵紫阳学习西方国家的东西太多。

1988年5月13日，赵紫阳向思想理论界的人士指出，反自由化运动开展以来，形势已发生变化，反自由化应该告一段落，之后主要进行日常教育。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是邓力群控制的左倾思想笔杆子大本营，聚集了一大批反对改革开放的写手，早在1985年底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的时候就打算撤销邓力群的书记处研究室主任职务，但是被陈云挡下。胡耀邦没有做成的事情，赵紫阳接着做，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赵紫阳将左派的大本营书记处研究室以及《红旗》杂志撤销。

六四事件

因应对策

1989年4月因胡耀邦逝世引发学潮运动，胡耀邦的追悼会结束之后，赵紫阳对学潮运动提出的对策包括劝导学生复课，对学生要疏导，展开对话，力求缓和矛盾，不可扩大矛盾，避免流血，若有打砸抢等违法行为，要依法处理。邓小平也同意了赵紫阳这一温和的处理对策。但在赵紫阳访问朝鲜期间，国内当局将学潮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刺激学生发动“四二七大游行”。5月3日，赵紫阳在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的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肯定了学生的爱国热情，但更多的篇幅是强调应该保持稳定，这份谈话缓和了学生激动的情绪，有些学校已经复课。5月4日，赵紫阳在会见亚洲银行理事时强调使用民主和法制的手段解决问题，并认为应当通过协商和对话，在理性和秩序的气氛中解决，新华社发表了赵紫阳的讲话。但在各大学党委书记会议上，何东昌等人散布“赵紫阳的讲话与四二六社论精神不一致”，引发学生绝食，绝食的目的是为了改变“四二六社论”的定性。

赵紫阳在天安门广场上的谈话

5月13日，赵紫阳在邓小平家谈到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来访问题，邓小平表示自己与戈尔巴乔夫会晤后，两党的关系就恢复了。赵紫阳非常注意邓小平的这句话。因为这和外交部原来的方案不同。所以在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会晤后，5月16日晚赵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一开始就说戈尔巴乔夫和邓小平的会见，两党的关系就恢复了，戈与邓的会见是戈这次来访的高潮。接着很自然地就讲到邓在党内地位以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赵紫阳的原话为：

“经过中苏双方的共同努力，今天上午实现了你同邓小平同志的高级会晤。从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一直是国内外公认的我们党的领袖。在前年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根据邓小平

同志本人的意愿，他从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常委的岗位上退下来了。但是，全党同志都认为，从党的事业出发，我们党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需要他的智慧和经验，这对我们党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作出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

赵紫阳后来得知邓小平的家人及邓本人对讲话非常恼怒。究竟邓为何认为赵紫阳有意把他抛出来，要推卸责任，是什么人从中挑拨，赵始终不清楚。赵紫阳对讲话使邓产生误解表示遗憾，除了5月13日邓小平对赵紫阳表示自己与戈会晤后，两党的关系就恢复了，赵紫阳才自然而然向戈提到邓在党内的地位外，从中共十三大开始，在会见外宾时，他将邓在党内的决策地位通报给国外领导人特别是兄弟党领导人已经成了惯例，而这种通报完全是为了维护邓的地位。赵紫阳在晚年与姚监复的谈话中再次解释，他的讲话并不是要抛出邓小平，当时说重大问题要请示邓是党中央的决定，意在表明不是邓小平独断或恋权，本想通过公开解释来消解民间对邓小平垂帘听政的误解。赵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的申辩中也说这种决定在组织上是合法的。赵同时强调在此之前，邓是信任他的，4月23日赵紫阳访问朝鲜之前，邓有意将中央军委主席的职位让给他。

赵紫阳还准备开宣传会议以及登报解释邓小平在党内的地位，赵的秘书鲍彤起草的内容已经准备登报，内容主要讲邓在党内的贡献，从而肯定邓的地位，而之前给质疑邓的工人代表解释邓在党内地位问题时，工人代表们表示理解。然而5月17日发生的事情却迫使赵紫阳提出辞职，宣传会议及为邓小平贴金文章的登报计划因此中断。鲍彤指出在4月26日社论发出后，李鹏在各种场合说《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传达的精神是邓小平的精神。李鹏已经把邓小平抛出去了，根本不用赵紫阳把邓小平第二次抛出去，赵

紫阳将邓小平抛出去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失势下台

5月17日，邓小平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时任政治局常委的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和姚依林出席，政治局委员兼国家主席杨尚昆列席，邓的秘书王瑞林担任记录。会上针对学生运动问题李鹏和赵紫阳激烈交锋。姚依林支持李鹏，胡启立支持赵紫阳。邓小平最终表态反对“自由化”，要求党内保持一致。在此次会议上，邓小平还提出宣布“戒严”，打算使用军队镇压学生运动。赵紫阳会后提出辞职。原《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在2005年透露，当时同赵紫阳一样反对武力镇压学生的将军包括张爱萍、萧克、叶飞、李聚奎、杨得志、陈再道和宋时轮，他们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枪口不能对准中国人民。5月18日，赵紫阳、乔石及胡启立到医院探望绝食送院的学生。同日李鹏和学生领袖在人民大会堂进行50分钟的对话。但双方态度强硬，最后不欢而散。国家教育委员会要求全国各地劝阻中小学生上街游行。5月19日，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陪同赵紫阳于凌晨4时50分前往天安门广场对学生发表了谈话：

“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了。不管你们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我这次来不是请你们原谅的。我想说的是，现在同学们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绝食已经到了第七天，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绝食时间长了，对身体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这是有生命危险的。现在最重要的是，希望尽快结束这次绝食。我知道，你们绝食是希望党和政府对你们所提出的问题给以最满意的答复。我觉得，我们的对话渠道是畅通的，有些问题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解决。比如你们提到的性质、责任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终究可以得到解决，终究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你们也应该

知道，情况是很复杂的，需要有一个过程。你们不能在绝食已进入第七天的情况下，还坚持一定要得到满意答复才停止绝食。但是那个时候就晚了！

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国家和你们的父母培养你们上大学不容易呀！现在十几、二十几岁，就这样把生命牺牲掉哇，同学们能不能稍微理智地想一想。现在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你们都知道，党和国家非常着急，整个社会都忧心如焚。另外，北京是首都，各方面情况一天天严重，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同学们都是好意，为了我们国家好，但是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失去控制，会造成各方面的严重影响。

总之，我就是这么一个心意。你们停止绝食，中国政府不会就这样子把对话的门关起来，绝不会！你们说体制有问题，我们可以继续讨论。慢是慢了一些，但一些问题的认识正在逐步接近。我今天主要是看望一下同学们，同时说一说我们的心情，希望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这个问题。这件事情在不理智的情况下，是很难想清楚的。大家都这么一股劲，年轻人么，我们都是从年轻人过来的，我们也游过行，卧过轨，我也知道当时那种情况，没有想后果怎么样。但是事后一想啊，你们要冷静想一想今后的事。有很多事情总是可以解决的。希望你们早些结束绝食，谢谢同学们。”

赵紫阳讲话结束后，广场上的学生纷纷请赵紫阳签字。这是赵紫阳离开政坛前的最后一次向公众亮相。19日晚李鹏宣布了可以实施武力清场的戒严令，而已失去了政治权力的赵紫阳仍在做最后的努力。他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将事件移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解决，为此赵紫阳要求中共中央办公厅立即电传在美国访问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回国；而

温家宝并未执行命令，将电报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否决，从而延缓了万里回国，使这一计划未能实现。

天安门清场以后，由中共元老主导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于1989年6月19日-6月21日召开，会议以批判赵紫阳为主，李鹏在报告中指责赵“分裂党”和“支持动乱”，李先念甚至人身攻击赵。6月23日-6月24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李鹏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因消极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严重忽视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赵紫阳被撤销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等职务，仅保留中国共产党党籍；同年6月30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决定撤销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副主席职务，江泽民成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四中全会最主要的议程是听取审议通过李鹏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针对报告，赵紫阳做出了富有针对性的申辩。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赵紫阳申辩摘要

我仔细回想了自学潮和动乱发生以来这些日子我是怎样做的，哪些地方做得对，哪些地方做得不对或不妥。

一、胡耀邦同志的追悼会举行以前，常委内部没有什么分歧。

二、追悼会结束后，我提出三点意见：一．追悼活动已经结束，社会生活应纳入正常的轨道，对学生游行要坚决劝阻，让他们复课。二．对学生要采取疏导方针，应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和各种形式的对话，互相沟通、增进理解。三．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如果出现打、砸、抢、烧、冲行为要依法惩处。李鹏同志和常委其他同志也都同意。

三、四月一十四日到三十日晨我不在北京，对这一段具体情况不太清楚。

四、我在五月三日北京纪念“五四”大会上的讲话，事前经过了政治局、书记处同志的审核，送审时，不少同志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根据这些一意见，我们对稿子做了多处改动。

我觉得，这次会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必须坚持两手抓，不能忽视政治领域的工作；二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跟上，主要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必须跟上。……我主观上认为，这是真正为党和国家的前途着想。多年来，在经济改革上，我是积极的，大胆的，但在政治改革上，我一向持谨慎态度。我也曾自称是“经济上的改革者，政治上的保守者”；近年来，我的思想上有了变化，感到如不把政治改革摆到重要议事日程上，不仅经济改革中的难题很难解决，社会、政治各种矛盾也会日趋尖锐。我的这种想法，影响着我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观察和处理。我觉得，在今天党的会议上，我应该讲明这些心里话，向同志们交心。很可能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希望同志们批评帮助！

五、我五月四日会见亚洲银行理事年会代表的讲话，本意是想促进学潮的平息，同时也想使外资增强对中国稳定的信心，讲话发表后，开始听到的是一些好的反映。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有什么问题。李鹏同志也对我说，话讲得很好，他在会见亚行年会代表时，也要呼应一下。这次讲话的调子比较温和。我的这次讲话，从当时各方面的反映看，效果还可以。后来同志们批评我的讲话未经常委讨论，这是事实。不过，中央各位领导同志接

待外宾时的谈话（除正式会谈方案外），历来都不提交常委讨论，一般都是根据中央的方针自己去准备。

六、五月八日的常委会和五月十日的政治局会。四月二十七日的大游行后，学生们坚持要我们改变四月二十六日社论的定性。我非常为难。我当时的想法是，先绕过这个问题，在廉政和民主建设方面办几件好事，使群众看到我们正在做出努力，事态也许会逐步平息。……我的基本想法是，把廉政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件大事来抓，把廉政同民主、法制、公开性、透明度、群众监督、群众参与等密切结合起来。五月十三日上午，我和尚昆同志在小平同志处汇报时，向小平同志报告了这些想法，小平同志赞成，说，要抓住这个时机，把腐败问题好好解决一下，要增加透明度。

七、关于我同戈尔巴乔夫谈话的问题。十三大以后，我在接待国外党的主要领导人时，曾多次向他们通报，我党十三届一中全会有个决定，小平同志作为我党主要决策者的地位没有改变。我的目的是让世界上更明确知道小平同志在我们党内的地位不因退出常委而发生变化，在组织上是合法的。这次访朝，我也向金日成主席谈了这个问题。我跟戈讲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惯例了。问题在于这次作了公开报导。……照理说，这些内容的话，是不会给人以一切事情都是邓小平决定的印象的。我实在没有想到，这样做，反而伤害了小平同志，我愿对此承担一切责任。

八、关于五月十六日夜间的常委会。我从朝鲜回来以后，听到各方面对四月二十六日社论的反映很大，已成为影响学生情绪的一个结子。当时我曾考虑，可否以适当的方式，解开这个结子，以缓解学生的情绪。……在五月十六日晚的常委会上我提了一下这件事，这是第一次在正式会议上提出。李鹏同志说，社论中所说的“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是小平同志的原话，不能动。我当时不同意这种说法。

九、五月十七日，在小平同志处召开的常委会上，李鹏、姚依林同志批评我，把学潮升级的责任全部归结到我五月四日在亚银年会上的讲话，其激烈的程度出乎我意料之外。这次常委会再次肯定四月二十六日社论的定性，并做出了调军队进京戒严的决策。我表示有决策比没有决策好，但我非常担心它将带来严重的后果。由我来组织执行这个决策，很难得力。我是在党的会议上坦率地讲出我所担心的。会后，我再三考虑，很害怕因为我的认识水平和思想状况而影响和耽误常委这一决策的坚决贯彻执行。我在情绪比较急躁和冲动的情况下便想提出辞职。尚昆同志知道后，立即劝我说，如我辞职，将在群众中起激化作用，并说常委内部还是能够继续共事的。我无论如何不能做使党为难的事。因此辞职信没有发出。但情况的发展仍使我忧心忡忡。五月十八日，我又给小平同志写信，要求他再次考虑我的意见，并打电话给尚昆同志，请他再向小平同志说一下。我觉得无论如何，在党内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是允许的。身为总书记有不同看法如果不提出，并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现在回想，辞职信虽然没有发出，但当产生这个念头，从全局来看，就是很不妥的。

十、关于五月十九日凌晨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的学生。原来在学生绝食二天后，我就准备去看他们。后来我又几次提出要去，但都因种种原因而未去成。五月十九日学生已绝食进入第七天，有死人的危险，已经到了紧急关头。尽管我当时身体已感不适，但我还是下了决心一定要去。因为学生已绝食七天，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去了以后，除了动之以情，劝说他们停止绝食外，还能说些什么呢。在我们看望之后，当天绝食学生的情绪已有缓和，并于当晚九时，宣布停止绝食。我不能说我的讲话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起码是没有起反作用。

十一，关于我没有出席五月十九日晚召开大会的问题。我要说明，那天我是因为有病向常委请假的。乔石同志在会上也是这样宣布的。我请了三天病假，假满以后我就没有工作可做了，也不再让我参加任何会议。情况我

也就不知道了。

从以上可以看出，我对处理学潮和动乱的问题当时总的想法就是要设法缓和与学生的对立，争取学生中的大多数，使学潮逐步平息下来。我十分担心在同多数人的矛盾尚未缓解的情况下采取强硬手段，特别是动用武力，将很难避免发生冲突和流血事件，那样就会使事态更加扩大，即使把学潮平息下去，将会留下很大的后遗症。最近小平同志发表了非常重要的讲话，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他说，这场风波的到来，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影响的必然结果。还说，现在来比晚来好。如果从这样的高度来观察问题，我的原来的那些想法当然就成为多余的了。我当时确实没有认识到这样的高度和深度，我愿意结合学习小平同志的讲话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

我对李鹏同志的报告中提出的撤销领导职务的建议没有意见，但对我提出的"支持动乱"和"分裂党"这两项指摘我有保留意见。对于如何处理学潮和动乱，我的确根据党章允许的范围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过自己的不同意见。不管这些意见是否可行和有效，但都是关于如何平息动乱的意见。我从来没有提出过支持动乱的意见。再从实际情况来看，学潮和动乱的扩大，也不能说是我支持的。事实上从四月二十三日到月底这一段，学潮和动乱急剧扩大，而这段时间我并不在国内。李鹏同志的报告中，说我在亚行年会的讲话，使动乱升级，事实上在我讲话以后，各大学继续纷纷复课的情况，说明这种批评不符合事实。当时首都各报都有报导。这至少可以说明我那次讲话并没有引起学潮升级。五月十九日实行戒严以后，我就没有工作了，当然也再没有发表任何讲话。此后动乱的升级更没有理由说是我的原因，如果说我请病假没能参加五月十九日的会议，以后事态的发展也主要是由于我的原因引起的，这无论如何解释不通。

关于分裂党的问题。什么才是分裂党的行为？党的历史上是有案例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也有规定。我们党从来没有把在党内

的会议上提出不同意见，甚至表示保留意见就叫做分裂党的。领导人之间的公开讲话中侧重点有时有些不同，口径不那样一致，人们中间有这样那样的议论，这是不断出现过的事，不能因此就叫分裂党。而李鹏同志报告中指摘我在亚行讲话中没有提到四月二十六日社论，又指摘我在已经出现动乱的情况下讲话中却说了"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但是就在第二天，李鹏同志在亚行讲话中也没有提四月二十六日社论，而且说中国要努力"避免动乱"。我认为像这样一些不同场合不同时间出现的讲话侧重点的不同，甚至口径上不太一致，有些是不合适的甚至是错误的，但都不能上纲为"分裂党"，更不能因为我请病假不能出席五月十九日会议算作"分裂党"的行动。 既然党章规定党员有对自己的处理意见进行申辩的权利（党章第一章第四条中规定："在党组织讨论决定对党员的党纪处分或做出鉴定时，本人有权参加和进行申辩……党的任何一级组织直至中央都无权剥夺党员的上述权利"），我今天就着重对这两个指责提出申辩，希望予以考虑。

美国之音引述何清涟的博客文章称，赵紫阳被撤职后，邓小平试图将赵与美国索罗斯基金会挂钩，决定将赵包装成"美国中情局特务"，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时任副主任王任重领导一个专门小组，对赵紫阳及其子女的商业活动进行调查，只因索罗斯从《华盛顿邮报》上得知消息后，给邓写信指出他的基金会的中方负责人是时任中国国家安全部部长凌云。邓意识到，若执意捏造所谓"赵紫阳间谍案"，必然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只好作罢。中共内部对赵的审查，直到1992年中共十三届九中全会才结束。因无法自圆其说，审查结果从未对外公开。

后续影响

2012年6月4日，8.5万人（香港警方公布人数）或18万人（主办单位公布人数）参加第23周年香港维园六四烛光晚会悼念活动

赵紫阳下台后，其大部分亲信或者同情其遭遇的改革派精英以降职、撤职或判刑的方式遭遇清洗，秘书鲍彤被开除党籍，判刑七年；胡启立被免去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严家其、陈一咨遭通缉流亡美国；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陈子明被判刑；胡绩伟、阎明复被撤消一切职务；杜导正被免去新闻出版署署长职务。

中国共产党内的左派保守势力推举的江泽民成功接替赵紫阳，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江泽民在左派势力的支持下，与国务院总理李鹏联合执行“治理整顿”政策，使中国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无奈之下，邓小平于1992年年初南巡，提出“改革开放一百年动摇不得”的口号，江泽民体察上意、心生警觉，立即转变态度、幡然易帜，执行改革开放政策。邓小平在南巡中曾提起赵紫阳主管经济时期的功劳，他要求时任湖北书记关广富记下自己的意见并转告北京当局，他说：“以前的两任总书记抓改革开放还是有功的，1983年到1988年的经济发展很快，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据传，南巡回去后，杨尚昆和万里曾提议让赵紫阳复出，于是邓小平让杨尚昆告诉赵紫阳，要求赵紫阳承认在六四中所犯错误，但赵紫阳拒不认错；1991年，邓小平就曾派人向赵紫阳带话，称赵紫阳复出当总书记都可以考虑，前提是赵紫阳要认错，之后邓小平多次派人与赵紫阳联络，赵紫阳坚持认为自己没错，并要求中央重新评价六四，因此放弃复出。但这些传闻并未见诸赵紫阳本人的回忆录中。

由于赵紫阳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同步进行的主张在其下台后成为泡影，他所担心的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进行的扭曲型的市场经济所容易产生的以权谋私、侵吞国家财产、行贿受贿等腐败问题加重的现象逐步在中国变为现实，还出现种种社会弊端滋生蔓延，社会矛盾加剧，党内外腐败惩而不止的现象。武力镇压学潮给遇害者及其家属带来了难以愈合的伤痛，造成了难以估量的负面效应，除此之外，赵紫阳还担心武力镇压会产生很多后遗症，他的这种担心也成为了现实，香港原本倾向中国共产党的一批政界人士，一部分开始与中国共产党决裂，埋下香港人与中国政府之间的不信任的种子。中国同美国的“蜜月期”结束，曾一度遭受大规模的国际制裁，被西方民主国家孤立，其消极影响直到今天依然在台海关系、香港与内地关系和中国对外关系上存在，欧盟对中国实施的武器禁运政策至今都没有解除。六四事件所造成的伤痛以及海内外每年举行的纪念活动成为中共极力回避但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与赵紫阳当政时期的1980年代的“主义纷呈”相比，赵紫阳下台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变化，致使中国的知识精英阶层开始向现代犬儒主义方向发展，一部分知识分子要么满足于教育产业化带来的实惠埋头创收，要么奋力争夺“公共知识分子”的排名，吸引公众和媒体的眼球。

遭受软禁

被撤职后的赵紫阳一直是中国国内官方报道中忌讳的话题，赵紫阳下台后一直被软禁在其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富强胡同6号的家，他的住宅一直有人俯视在小巷墙上，门前有公安站岗，赵被软禁的四合院所在的富强胡同入口直到赵去世一直有公安的监控摄像头监视赵家门前的举动。中共中央办公厅对赵紫阳的限制有四条：

一、可以在家接待客人，但不接待记者和外国人。

二、外出活动要警卫局派随卫人员，可以到郊区公园散步，如要到繁华人多的地方，警卫人员可劝阻。

三、考虑到北京地区高尔夫球场都是外资或合资经营，打球的都是外国人或港澳人士，建议不要到这些地方去打球。

四、如果要到外地去，可以安排到内地省份，不要到沿海或敏感地区。具体方案报中央批准。

赵紫阳也曾多次写信给江泽民要求解除软禁，但均遭到江泽民的拒绝。1997年，江泽民在访问美国之前，为了给美国有个交代，江泽民要求中南海保健处负责赵紫阳医疗的医生向赵紫阳提议打高尔夫球（在这之前是被禁止的），赵紫阳识破江泽民的用意，于是拒绝。中共十五大前，应“天安门母亲”的请求，赵紫阳于1997年9月12日发出“致十五大主席团并转交全体代表的一封信”，敦促中国共产党重新评价六四，赵紫阳在信中说六四问题迟早要解决，不论拖多久人们都不会淡忘，早解决比晚解决好，主动解决比被动解决好，形势稳定时解决比出现麻烦时解决好。这封信给赵紫阳带来了更严厉的软禁。赵紫阳又于同年10月13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七位常委发出公开信，信中指控对他的软禁是对社会主义法制的粗暴践踏，赵紫阳在信中说：

“……自从信（致十五大主席团并转交全体代表的信）发出之后，我就被禁止会客、外出，完全限制了我的自由，把我从半软禁升级为完全的软禁了。……我作为一个党员，就某一问题向党的代表大会提出建议，是正常行使党员的权利，这是党章明文规定了的。……我不知道我究竟触犯了什

么法律，……这样不明不白的随意就可以对一个人实行软禁，可剥夺一个人的公民权利，难道不是对社会主义法制的粗暴践踏么？……而在我们党早已深刻总结了过去左的沉痛教训以后，十多年来一直强调建立社会主义法制的今天，尤其是在江总书记刚刚在党的十五大向国内外郑重宣布了我党要坚持"依法治国"，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候，在中央身边竟然发生了如此粗暴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事，实在令人难以理解！……自从1989年6月以来，我被非法软禁、半软禁已有八年之久，不知这种被剥夺自由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这对我一个年近八十岁的老人的身心健康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伤害。……我希望能够早日解除对我的软禁，恢复我的人身自由，使我不再在一种孤寂、抑郁的情境中度过余年…… "

这封信没有带来任何回应，完全软禁状态从1997年10月持续到1999年12月，之后又转入半软禁状态。

赵紫阳晚年几乎每年都有媒体传出他去世的消息，2003年4月，日本共同社误传赵紫阳逝世消息，2005年1月6日的病发住院被香港《东方日报》和《太阳报》以大篇幅报道逝世，这些消息都被中国官方否认。

逝世

家人道别与中央慰问

赵紫阳曾被软禁在距离北京王府井大街不远的富强胡同6号达15年之久。此四合院也曾是胡耀邦的寓所。

2005年1月16日，赵紫阳全天昏迷，病情持续恶化，1月17日凌晨4时，肾脏功能和微循环衰竭。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前去看望赵紫阳并表示慰问。赵紫阳的五个子女依次单独走到床前向父亲做最后的倾吐。赵五军说："爸爸，你不仅生下了我们，也教育了我们怎么做人，你放心，我们已经知道什么是善良、正直，我们的所作所为决不会沾污你的名字"，很少在孩子们面前掉泪的赵紫阳眼角处流出了泪花，接着泪水流淌不止。17日早上7时1分，赵紫阳的心脏停止跳动。同日，新华社新闻稿称："赵紫阳同志因长期患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多种疾病，多次住院治疗，近日病情恶化，经抢救无效，于1月1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5岁。"赵紫阳女儿王雁南向驻北京传媒发短讯称：赵紫阳安详离世，当时家人都在身旁，并为他祈祷，又形容其父终获自由。赵逝世后，他的子女与中共中央进行了多天沟通，因意见分歧，其子女于1月25日向中共中央提出四点意见，意见的大概内容为，纠正中国共产党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对赵紫阳所下定的错误结论；要求中共中央对赵紫阳长达16年的软禁给予明确的说法；中共中央在赵紫阳逝世后，不发表赵紫阳的生平简历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这对家属和关心赵紫阳的人是不公正的；基于父亲赵紫阳生前嘱咐希望尽快安息的感情，同意在一个合适的时间办理火化和送别仪式。

赵紫阳儿女们给赵紫阳的挽联是：

"能做你的儿女是我们毕生的荣耀；

支持你的决定是我们不变的选择。

倡民主坚守良知儿女为你骄傲；

今西去终获自由风范永存人间。

”

各方反应

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六四事件”的缘故，赵紫阳去世后其丧葬处理问题受到关注，因为这将直接反映中国政府对赵紫阳的评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将在与家属讨论后安排举行赵紫阳的遗体告别仪式，但是就以已经改革领导人丧葬流程为由表示将不会举行官方正式的追悼会。告别式于2005年1月29日上午9时在八宝山举行，贾庆林、贺国强、王刚、华建敏参加追悼会，在新华社新闻稿中没有说明这些人的职衔，强调是代表中央，从而提高追悼会规格。中共已故政要叶剑英、杨尚昆、陶铸、陈毅、胡耀邦、陆定一和芮杏文等人的后人或家属以及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广州前市长黎子流等人纷纷前往拜祭或致送花圈。另外，习仲勋的遗孀齐心以其个人和“率子女”的名义向赵紫阳送上花篮。赵遗体被中国共产党党旗覆盖。家属表示，赵紫阳的骨灰将置家中，而不会葬在八宝山公墓第一陈列室。同时，中国当局严格控制赵紫阳逝世产生的影响，限制消息的传播与讨论，打压民间的悼念活动。除新华社外没有任何其它的报道，有限的纸媒进行转发，中央电视台在当日对赵的逝世新闻只字未提，只在出殡当日才作了简短的报道。

香港：1月18日上午11时，以南方民主同盟主席龙纬汶为首的100人在中联办门口路祭赵紫阳。下午1时，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近50人亦到达中联办。同日，香港立法会议员梁国雄提议在立法会为赵紫阳默哀，但遭到立场亲北京的主席范徐丽泰否决。民主派议员对范徐丽泰的否决表

示遗憾，当时的民意调查显示有54%的民众支持为赵紫阳默哀。翌日立法会开会时，由香港职工会联盟的李卓人提出“全体议员为赵紫阳先生默哀1分钟”，24名泛民主派议员不理会前日裁决，站立默哀1分钟。范指李行为不检点宣布暂停会议。另一方面，民主建港联盟、自由党、泛联盟和非民主派的独立议员共27名集体杯葛会议，结果立法会首次因有议员集体“蓄意缺席”而“流会”。其后记者会中，自由党的田北俊和民建联的曾钰成皆否认杯葛是政治考虑或与“默哀”有关，而是因为有议员连番违反议事规则及主席裁决，令立法会会议经常中断。民主派则指坚持默哀是“良心呼唤”，并愿为良心和行为负责。1月21日下午，南方民主同盟在尖沙咀码头，邀请市民签署悼念册。同晚，香港支联会举办在中国国土上唯一的一场合法民间追悼会。主办方称有一万五千人参加，而香港警方称有一万人参加，《明报》报道参加者坐满三个维多利亚公园硬地足球场。另外，除了部分立场亲中央当局的媒体外，香港各大报章均在头版大篇幅报道赵紫阳逝世的消息，有十多份报章最少以三大整版报道赵紫阳逝世的消息，并且在社论中悼念赵紫阳，如《苹果日报》称中共欠赵紫阳一个公道，《南华早报》则称赵紫阳是一位具有明显人文色彩的共产党领导人，《明报》呼吁中共当局站在历史的高度，顺应民意，对赵的一生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中华民国：行政院陆委会主委吴钊燮在得知赵紫阳去世的消息后表示，将密切关注中国大陆内部是否会出现动荡，并发布新闻稿称赵紫阳在六四事件中表现出对学生民主行动的宽容与体谅，国际间给予相当肯定。陆委会呼吁胡温政府在推动经济深化改革的同时，应同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符合国际社会对大陆的一致期待。行政院发言人陈其迈呼吁中国政府借此平反历史，诚实面对六四天安门事件。陈其迈还表示，中国经济改革得到国际的肯定，但是民主自由法制方面并没有出现同步进展，因此他呼吁中国政府学习赵紫阳先生的宽容胸襟，同步推动民主和政治改革。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晚报之一《联合晚报》以头条头版报导了赵紫阳的沉浮和天安门事件后被软禁十五年的生活。

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对赵紫阳的离世表示哀悼，他表示中国现行的经济政策几乎都是以赵紫阳的政策为基础的，赵紫阳的荣誉并没有在六四事件中中共元老间政治斗争被迫辞职后变得黯淡，相反，在将来必定会得到恢复。因为参拜靖国神社而令中日关系紧张的日本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得知赵紫阳逝世后，赞扬赵紫阳努力促进中日关系，小泉促请中国政府推动民主改革，同时还保证日本会致力加强中日关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细田博之赞扬赵紫阳为发展日中关系做出贡献，表示日本政府准备向其家人发唁电致哀。包括《朝日新闻》、《读卖新闻》和《每日新闻》等在内的日本各主要媒体也迅速报导了赵紫阳逝世的消息并纷纷发表评论，称赵紫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旗手。还表示中共如果在赵紫阳未竟事业上贴封条，将使中国重蹈六四覆辙。

韩国：韩国媒体播出了有关赵紫阳的一部特辑。韩国的媒体界详细报道了赵紫阳去世的消息，称赵紫阳是“中国民主化身”、“悲剧命运的领导者”。《韩国日报》报道称：“当今的中国社会，因日益严重的腐败和贫富差距，人权保障的声音日益高涨，回避政治改革的行为会越来越变得困难和不现实”。与中国保持密切外交关系的韩国政府没有公开表明哀悼声明。

美国：美国白宫发言人麦克莱伦于1月18日赞扬赵紫阳在困难时期捍卫个人信念，作出牺牲，具道德勇气。麦克莱伦又称赵紫阳是改革开放政策的主要缔造人，协助中国经济转型，并经由贸易及投资，加强中美两国人民的联系。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时任主席亨利·海德特向赵紫阳夫人梁伯琪的致函中说：“虽然赵紫阳先生被软禁了16年，但他对中国政治改革以及重新评价天安门血案立场从来没有动摇。他的理念传遍了世界。赵紫阳先生为中国人民鞠躬尽瘁。人们永远都会记住，他是天安门广场真正的英雄之一。”另外，美国各主要媒体都以头条篇幅报道赵紫阳逝世的消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1970-80年代，赵紫阳为推动中国近代政治和经济改革不遗余力。《基督科学箴言报》针对中国政府掩盖赵紫阳历史的手

法以及在赵逝世后的态度和表现，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剪裁自己的历史”的文章，文章称中国政府在指责日本不能诚实面对二战历史的时候，为何自己却不能正确面对赵紫阳对中国做出的历史贡献。美国《时代周刊》官网报道，赵紫阳曾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最大希望之所在，从而成为最受人民欢迎的领导人，但他不像毛泽东被称为“伟大导师”、邓小平被封为“改革总设计师”，他不是靠这种宣传而变得伟大，他获得的尊敬来自人民。

加拿大：加拿大政府透过外交官皮埃尔·佩蒂格鲁发表声明称：“我代表加拿大人民对赵紫阳逝世表达哀悼，赵紫阳是第一个访问加拿大的中共高级官员，并以改革先锋著称。我们的思想与他的家人在一起。”另外，加拿大国会议员贾森·肯尼访华期间前往赵紫阳家中吊唁，成为赵紫阳被软禁至逝世以来首位被允许到他家拜访的西方政要。

英国：《英国广播公司》称赵紫阳当政时推动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但他在政治改革上的挫败，却更为后世所传颂，他是中国政治改革挫败的象征，亦是领导阶层中反对武力镇压天安门学运的良心。《泰晤士报》在1月18日发表了一篇题为赵紫阳还活在人民的心中的文章，称赵紫阳是一个改革了中国，改变了世界的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几乎没有哪个政治家发挥了比赵紫阳更大的正面作用，文章指出政治家和学者如果想看懂中国崛起的话，他们需要学习赵紫阳思想，并呼吁大家记住赵紫阳。

法国：总部位于巴黎的无国界记者谴责中国当局阻止国外记者采访赵紫阳的葬礼以及封锁有关赵紫阳去世消息的行为，并呼吁“国际社会应向中国交涉，使之结束对报道中国改革之父的新闻检查。”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在一篇题为“赵紫阳在死亡后才获得自由”的评论文章中称赵紫阳的命运和六四事件密切相关，评价赵紫阳的一生功过绕不开六四的话题，赵紫阳曾经的下属温家宝当上总理后也不愿触及六四一事，因为中共惧怕六四的亡魂。《明镜周刊》则称赵紫阳的命运再次证明

中国当权者是如何不遵从自己定下的法律，赵紫阳当年是被非法罢黜了总书记的职务，同样，对赵紫阳实施软禁也是党单方决定，没有任何法官或律师参与其中。

葡萄牙：当时正在澳门访问的葡萄牙总统桑帕约对赵紫阳病逝表示悲痛，并对赵紫阳进行高度评价，他形容赵紫阳是一位非常负责任的中国领袖，并以仁慈、温和以及理性著称，更广为人知是他的人文关怀及人性化表现。他又表示，赵紫阳对中国的现代化贡献非常大。按国际外交惯例，外国政府高官为避免触怒中共高层进而遭到报复，很少会如此高度评价一个被软禁直到逝世的中国领导人。

俄罗斯：苏联前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说在1989年5月访华时，赵紫阳给他留下了最良好的印象。他对赵紫阳的逝世发表声明表示悼念，戈尔巴乔夫在发表的声明中说："我记得我们的会面是在天安门抗议示威的背景下举行的。赵紫阳以非常关注和关切的心情对待这些抗议示威。我认为，在当时的中共领导层中，赵紫阳是最为同情示威者的，也是最为接受民主的。但是与此同时，赵紫阳反复重申，他同邓小平是同盟关系。"同时，俄罗斯的电视媒体以罕见的篇幅报道赵紫阳逝世的消息。

相关人士

胡绩伟对赵紫阳的逝世发表简短意见称其在被软禁长达十六年后含冤逝世，这是举世震惊、全国悲痛、万民哀悼的国殇。胡绩伟要求党中央为赵举行公开追悼大会，并且为他平反昭雪。鲍彤撰文哀悼自己的老上司，文中痛批中共在六四事件后一直软禁赵紫阳，是虚弱和无耻的表现，他指责继任者不但非法软禁赵紫阳，而且试图系统性地抹煞赵紫阳在历史上的功绩，称对他的软禁是对一个曾为中国经济改革破土奠基十多年的国家领导人的迫害。许家屯在美国获悉赵紫阳去世的消息后，伤心痛哭，不能接受访问，惟有亲笔撰写悼词，他在悼词中说：紫阳不幸逝世，哀悼英名！紫

阳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创始者之一，他对中国人民的贡献，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他，历史不会忘记他。陈一咨表示赵紫阳是一个为国为民、难得的开明领袖，就这样离开中华民族，令人难受。还称赵紫阳是自己的长辈和老师，也是一个慈祥长者。

一些六四事件的当事人也都对赵紫阳的去世表示哀悼。六四学生领袖王丹赞扬赵紫阳是一名有良心的共产党员，王丹表示，赵紫阳一生为了他所信仰的共产主义，以及他所效忠的共产党奉献心力，但是最后却被共产党视为囚犯软禁十五年，实在是一出讽刺的历史悲剧。他对赵逝世表示沉痛，并对赵紫阳去世前长达15年遭软禁表示同情，对赵推动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表示肯定，称没有赵紫阳，就没有中国今天的经济成就。而吾尔开希在表示哀悼的同时也指出，虽然六四事件起始之时赵紫阳也是被攻击的目标，但在他出现在广场后就赢得尊重，虽然他并未能为六四事件做任何实质事情，历史该予他以正面评价。吾尔开希并表示赵紫阳是含冤而死的。丁子霖、张先玲等六四难属组成的天安门母亲发表千字悼文，文章称赵紫阳先生是二十世纪的一位伟人，他是怀着对民众的深深眷恋离开这个世界的；他是怀着对未竟事业的无尽遗憾和深深无奈离开了这个世界的；他是带着沉重的精神镣铐离开这个世界的。

中国民间

中国国内的部分民众对赵逝世表示沉痛，要求正面评价赵紫阳并自发进行悼念。在逝世当天网络上曾形成悼念赵的高峰，但高潮被当局成功限制，网络上有关赵紫阳的内容被严格监控，各大网站与论坛过滤删除任何相关消息，新浪网的新闻评论功能当天被取消，人民网强国论坛下午更是首次改为全审核状态，中国著名的搜索引擎百度更是一度屏蔽对关键字赵紫阳

的搜索，不显示任何结果，但是民间仍有不少人自发撰文进行怀念外聚集不少高举赵相片或挽联的悼念人士和上访民众。

赵紫阳逝世周年期间，北京公安开始“如常”监视并拘捕悼念紫阳逝世周年的家庭式活动人士，如胡佳和齐志勇等人。家属表示只在家中举行私人纪念活动，但是“家门永远对公众开放”，将接待前来悼念的人士。2010年4月，北京近百名民众前往赵紫阳家中祭奠。2011年10月17日四川省成都市一批民众，自发在锦江区三圣乡举行纪念赵紫阳的活动。他们人数不多，但是高举的标语上写的是当年赞美赵紫阳担任四川省委书记时关注民生的民谣：“要吃粮，找紫阳”。2012年清明节前后，中国互联网出现大量悼念赵紫阳的网站和网页，甚至出现“赵紫阳网上纪念馆”，而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删除这些网页，而默许了它们的存在。这被认为是中共作出改变的一步。另外，大约有200名访民到赵紫阳家悼念，还有一些人哭祭。

下葬

2019年10月18日，在赵紫阳在逝世14年后，经过赵家后人与当局的不断交涉下，当局获准将赵紫阳的骨灰与其夫人梁伯琪的骨灰合葬于北京昌平区民间公墓天寿园。

影响

党内影响

虽然赵紫阳的支持者在他因“六四事件”被软禁后就不断的推动平反，但是后任者还是成功的将他的名字和材料从大多数公开记录中移除或销毁，中

国官方试图把赵紫阳从公众的记忆中抹除的努力包括从教科书中将他的名字删除，以及禁止媒体以任何方式报道赵紫阳。但近年以来，中国大陆媒体在讲述部分历史事件（如中英谈判）时，会偶尔提及赵紫阳的名字，但也有媒体采用“时任总理”或“时任总书记”来代替，以避免出现其名。

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开前夕，有192人联名致函16大，要求恢复赵紫阳的政治权利并解除对他的软禁，赵常青和欧阳懿等人还因此被逮捕起诉。2005年，包括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乔石，和前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在内的20多位中共中央政治局退休委员，常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高级干部联署去函中共中央，要求为赵紫阳恢复名誉，并对赵紫阳及其对中国作出的重大历史贡献公开缅怀和纪念，还要求中共中央以国家领导人的规格为赵紫阳举行公开而隆重的国葬。中国政府同意举行仪式进行纪念，但规模远远不能满足党内外民众的诉求。在中国大陆，在未经中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只有《炎黄春秋》杂志有时敢于刊登和赵紫阳相关的文章。维基解密爆料称因为《炎黄春秋》发表关于赵紫阳的文章触动了江泽民，江泽民曾施压要求《炎黄春秋》社长杜导正下台，但在胡锦涛的干预下，杜导正没受影响。

思想观点

政治方面，赵紫阳以国情民意和多年的从政经验为基础，主张进行渐进式的改革，从而实现中国的民主化。具体的做法就是在稳定的前提下“先人权后民主”，即先施行“有自由而无民主”的模式，他认为自由比民主更为重要，香港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虽然没有民主，但有自由，任何人可以自由批评港督。同时，司法独立，不受政府控制，并允许结社，这样可以启发民智，提高国民的民主意识。因此，他不赞成一次性的施行多党制和普

选，而主张先做好两项改革：首先开放报禁、实行言论自由；其次，加强法治建设，实现司法独立。同时，执政党党内需要民主化改造和政治决策的公开化，要培养公民的权利意识；

在谈及三年大饥荒和中共责任时，赵紫阳曾说："我们党是从来不认错的，实在说不过去了，就找替罪羊，将错误都推到他们身上，如林彪，四人帮。找不到替罪羊就说是自然灾害，如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纯粹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错误。""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农村饿死几千万人，工人阶级没能给予（农民）有效的救助，自己吃商品粮，有副食供应，有布票，保证了最基本的生活需要。"

国际和两岸关系方面，他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主张融入西方的主流文明，通过思想解放和观念启蒙，消解中国传统的独裁文化，普及自由文化，营造出自由、宽容、多元的社会气氛。主张用和平民主的方式完成两岸统一；经济上主张法治下的市场化、私有化，充分发挥民间的经济创造力，让国企在市场竞争中完成产权改革和优胜劣汰。

评价

官方评价

新华社在2005年1月29日发表关于赵紫阳遗体火化的消息时，评价说："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赵紫阳同志在地方先后担任过中共县委、地委、省委主要领导职务；在改革开放前期，赵紫阳同志先后担任过中央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过有益的贡献。在1989

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赵紫阳同志犯了严重错误。”严重错误是指“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纵容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削弱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

由于赵紫阳提出“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发展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生产力”，艾思奇前秘书党校教授吴秉元指责他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退回到资本主义私有制，并公然反对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对社会上类似的批评，赵紫阳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邓小平说的不合格的社会主义，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就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有人说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有什么？这是规律。”

赵紫阳逝世十周年时，环球时报发表社评，指出中央对他已经做出“在关键时刻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定性评价，同时肯定了他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工作方面做过的“有益工作”，中央的那次报告继续称呼“赵紫阳同志”，这一评价格局大体延续了下来。谈到民间和国外对他的评价时，社评称“不同价值观的人对他的看法是分裂的”“25年前中国社会迈过了那场危机，但中国内外一直都有人希望那样的危机能够重来，并且为此不遗余力地寻找机会做意识形态铺垫。”“ 25年来中国按照赵和他智囊们在重大关头所反对的政治路线和哲学，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最敏感的问题，中国奉行‘不争论’政策，中国把行动和不断取得的成就作为了对那些问题的回答。”该评论还称未来修改这一评价的空间，很可能远远小于因时过境迁事情被淡化、人们更多记住一位老同志曾经所做好事的空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官方网页中的历任总理页面上，唯独缺少赵紫阳

的照片及简历；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官方网页则放出了赵紫阳的肖像及不完整简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

市民展出横幅怀念赵紫阳在农村改革时的贡献

已故的原中顾委主任陈云生前曾评价赵紫阳："一贯追求西方的所谓自由经济，其实根本不懂，为人疏阔，爱听信左右，不够实事求是，关键时刻走到中央的对立面了。"

赵紫阳的秘书鲍彤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表示，赵紫阳的"不镇压"原则，至今仍然有现实意义。鲍彤之子鲍朴说赵紫阳是一位能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解决实际问题的新型政治家，他不回避问题，其中包括民主政治。他说，毛泽东时代大办人民公社，赵紫阳在探索粮食增产；在公有制不能被否定的时侯，赵紫阳在思考商品经济；成为总理后，他告诉大家商品经济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学者严家其和曾担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的陈一咨指出，从1978年开始到198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众多方案主要由赵紫阳等人主导制定，是中国经济改革主要的设计者、推动者和执行者。中共党史研究者高文谦说，赵紫阳在八九民运中坚决不向学生开枪，为了这一决定他付出了16年的代价，一直被软禁到死，他在历史上的定位会很高。前中国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姚监复说赵紫阳真正是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中国那种传统的英雄，在中国这种世俗社会，追求名利权位的情况下，应该学习赵紫阳的道德风格。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称赞赵紫阳没有一丝一毫大官的影子。他到乡镇考察不是做出一幅视察的样子，而是真有问题要研究，真有想法要验证。赵讲问题总是从实际出发，分析中肯，没有“因为权位高，所以我正确”的官腔。最有启发的地方是，赵的经济思维，重点永远是怎样解决关键的实际问题、而不是争论是非曲直。他更像一个走经验科学路线的教授，他心中真正有兴趣的事情不是权位，而是“事实和包含在事实中的逻辑”。赵紫阳平生倾心的事务，恰恰与十几亿中国人探索在新体制下扩大经济自由、提升生活水平、增强国际竞争力这件事密切相关。天安门母亲丁子霖说，赵紫阳、胡耀邦都是中华民族的伟人。如果当年能够让他们放开手，让中国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同步进行的话，中国的今天就不是天怒人怨的情况，社会矛盾也不至于尖锐到如此地步，我们的亲人也不至于惨遭杀害，中国的今天应该是美好的。赵紫阳开创了中共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他不说违心话，就是死都不认错的前总书记。他给中国共产党人，给中国人树立了一个楷模和榜样。中国企业家李国庆说：“我们这一代享受了改革的成果。我尊敬赵紫阳，没有他，我们不会有今天，但我已不再谈政治。”

原新华社副社长李普称赵紫阳很有水准、很务实、很能干，领导和主持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赵紫阳是清醒的改革家。他在中共十二大提出经济改革，他主持起草的报告被邓小平称赞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共十三大他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和理论，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历史过程。这些理论奠定了中国相当长时期内前进的基本框架。李普称赵紫阳要付诸实施的部分设想随着他被非法撤职而停止，甚至已经改革的部分内容也走了回头路。赵紫阳是一个负责任的伟大的政治家，更表现在八九年六四事件上。他坚持在民主法治的轨道上解决

矛盾。他选择宁愿不当总书记，也不赞同武力镇压，他和六四这个冤案，总有一天要平反、要昭雪。

香港著名武侠小说作家金庸为赵紫阳的逝世数度落泪，在谈到对赵紫阳的评价，他说赵紫阳应该功大于过，他的过是可能大都在共产党内部，金庸说作为党外人他本人不了解这个政治斗争，但他觉得赵紫阳对人民、对国家是有贡献的。香港反共作家古德明于其专栏批评赵紫阳的失势乃权力斗争的结局，乃其“投共”的结果。认为其和中共当权者无分别，例如在1984年就曾香港回归反诘香港人惧怕中国共产党的言论，问香港人“你们怕什么？”，反对香港市民及国内人士悼念赵紫阳及为其谱写颂歌。香港民主派元老司徒华说，赵紫阳在六四事件上坚持立场，不屈服，不认错，他表现出强大的道德勇气和以民为本的政治良知，可谓风骨铮铮，亮节昭昭。这是他一生中最悲痛的一页，也是最光辉的一页。

中国异见人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说，在八九运动的大是大非的抉择中，只要赵紫阳放弃道义立场，他就可以保住总书记的高位，但紫阳先生宁愿放弃党魁高位及其巨大的既得利益而坚守为政之德和做人良知。赵紫阳在20世纪80年代对中国改革的巨大贡献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他在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上的道义坚守，也将作为独裁政治中的异数而名垂史册，他留下的政治遗产和人格遗产对一些高官构成了巨大的道义压力，有别于邓小平的赵紫阳模式，也已经标示出中国未来改革的方向。中国近代史学者章立凡说赵紫阳有关中国改革的思想和举措（执政党要在宪法的框架中行使权力）在今天看来仍然意义重大。如果当时沿着十三大的路线继续走下去的话，中国不会出现现在的尖锐社会矛盾和两极分化，而且中国的法治建设和宪政肯定比现在的水平要高。赵紫阳的失势对历史和现实来

讲，都是非常大的遗憾。

有人认为赵紫阳任内推行私有化改革，违背了社会主义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

中华民国前总统陈水扁对赵紫阳在“六四事件”中拒绝武力镇压学生的行为给予肯定，并且批评了邓小平对学生的血腥镇压。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包润石称赵紫阳是一位有远见的领导人，是一位在中国处于变革的时代倡导改革的领导人。人们记得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赵紫阳直接走到群众前，聆听他们的意见，并与他们讨论民众对民主、自由的渴求。赵紫阳对国家的热爱和他独特的领导风格为他赢得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尊敬。赵紫阳是中国80年代经济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的设计师，也是通过贸易和投资把美中两国人民联系到一起的领导人。赵紫阳在担任中共总书记的时候，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人们在中美建设性的关系上，也不应该忘记赵紫阳的功绩。他是一个有道德勇气的人，在苦难时期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而做出了巨大个人牺牲。他是中美关系强大的推动者。

2002年美国《时代周刊》推选赵紫阳为“亚洲英雄”人物。

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称赵紫阳是一位泰然自若、文雅、坚定和重实

效的人。

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说，赵紫阳在六四运动中坚持了人道主义的底线，在人性文明与野蛮的分野上，他站到了人性与文明的一边，并为此失去了自己的最高权位和自由。如果中共把这一点评为是错误而不能改的话，中共是在逆人类基本文明的标准而动。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佛利民1988年受赵紫阳接见，他称赵紫阳是一位思想清晰、论事客观、诚恳可信的国家领导人，是“社会主义国家最好的经济学家”。

已故的哈佛大学教授马若德说赵紫阳是最早策动中国改革开放的领导人之一，但现在的中国是不允许赵紫阳存在的，等到了不再偏执的未来，也许他将进入华夏先烈之列，他们为国效力，功勋卓著，但不见容于最高统治者。当他们腐败的政敌早已灰飞烟灭的时候，他们的英名将久远长存，受人景仰。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研究系主任戴维·兰普顿说，赵紫阳的领导作风十分民主，思想活跃，总是寻找解决问题的不同方式。他是中国第一位新一代领导人，他在和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非常自如和聪慧，而不是教条主义的。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中国研究与亚太关系教授吴国光说，古人云：上者立德，次者立功，再次立言。但赵紫阳三者皆立，1989年以身殉道，是立德；担任总理期间改革计划经济是立功，当然这有未竟之功，即政治改革；他关于政治制度变革的持续思考与论述，对于人们理解中国政治制度及其转型具有深刻的智慧启迪，是立言。

旅居美国的作家和经济学家何清涟撰文称，在历任中共总书记中，赵是一位真正懂经济的领导人，在做封疆大吏时，他就以解决民生、舒解民困见长。赵紫阳1980年代参与的改革是各阶层普遍受益的阶段。赵下台后，继任者把中国带往权贵资本主义道路，使中国成为权贵们肆意掠夺公共财产的天堂，由此引发的严重贫富分化和深度社会矛盾后，中国人才会想起中国在数十年的经济改革中，只有胡耀邦和赵紫阳时期的改革才是追求廉政、均富、和平自由的理想主义改革，也只有那一时期，民众才真有改革的参与感。赵紫阳被迫下台不仅标志着他个人政治生命的终结，还标志着理想主义改革在中国的终结。何清涟表示赵紫阳六四事件中在民主与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之建议所承载的政治智慧与道德勇气历久弥新。回忆起赵紫阳当年的作为，纪念赵的意义远远超出纪念其人物本身。因为在这位老人身上，不仅有他个人的历史沧桑，还体现出中国政治在一个半世纪的现代化道路上所经历的艰难曲折与踣跌起伏。赵紫阳和胡耀邦两人是中共历史上少有的富于人性、拥有健康人格和阳光形象的高层人物。

已故的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在其著作《邓小平时代》中提到，他的批评者认为，他在“六四事件”中面对抗议学生时不够果断，过于关心自己“开明领导人”的形象，从而助推了事件的发生。而在该书附录中，也有关于赵紫阳的人物评述，文中提到赵“对国际经济问题有着出色把握”、“是杰出而又坚

定的改革家”、“是天生的领袖人物”。同时将其与胡耀邦做比较，提到他虽然不像胡一样热情洋溢，但由于不拘一格、平易近人也能受到部下喜爱。文中称，赵不是政坛上的快拳手，但是有报效国家的崇高意识。但文章同时也指，尽管赵紫阳为人和蔼可亲，但是亦有同事认为其不合群，喜欢为自己着想。

回忆录

2009年5月13日，赵紫阳的回忆录英文版“Prisoner of the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 of Premier Zhao Ziyang”（ISBN 978-1-4391-4938-6，字面翻译是“国家的囚犯：赵紫阳总理的秘密日记”）出版。其内容由他在软禁期间，偷偷送出的一系列录音带上的口述内容整理而成。中文版《改革历程》（ISBN 978-988-17202-7-6）于2009年5月29日在香港出版，首版一万四千本上市后随即一扫而空，需加印第二版。台湾版书名为《国家的囚徒：赵紫阳的秘密录音》（ISBN 978-957-13-5052-3）。

家庭成员

妻子梁伯琪（于2013年逝世）

长子赵大军

次子赵二军

女儿王雁南，原名赵亮，任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丈夫王志华。

四子赵四军。妻子任克英，美银美林中国区主席，任仲夷之女。

幼子赵五军

身后影响

民众在富强胡同6号赵紫阳故居悼念赵紫阳逝世十周年

赵紫阳在中国内地属忌讳话题。2012年2月20日，百度百科对“赵紫阳”词条解除屏蔽，词条简述了赵的生平和任职、撤职经过，一日内就有两百多万人次浏览，但该词条在引起网络广泛热议后再次被删除。2013年“六四事件”纪念日前夕，百度百科上重新出现了“赵紫阳”这一词条。

2013年3月，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放的电视剧《赵氏孤儿案》中的部分台词如第38集第4分钟“这19年来，每年的某一个日子，总能见到百姓祭奠赵朔大人，在祭奠那些被大人（是指屠岸贾）下令处死的婴儿，大人（是指屠岸贾），你抓也抓了，杀也杀了，可就是禁绝不了；关于赵氏的传言，在市井中口耳相传，传承不断”，引起一些观众无限联想，他们认为这些台词有借古喻今的意味，暗喻在“六四事件”中被武力杀害的学生和反对武力镇压学生的赵紫阳。

2014年9月9日晚，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播出第39集，在第23分钟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时，剧中出现一个没有标明姓名、职务的人物。但是根据眼镜、面型、发型等特征判断，相信此人正是赵紫阳，赵紫阳的此次“不点名现身”成为内地影视作品首次公开出现赵紫阳的镜头。此后这个人物在第44集和46集还各出现了一次，排名紧跟胡耀邦之后。

2015年1月赵紫阳逝世十周年之际，有来自中国多地的民众自发前往赵紫阳的故居。很多赵紫阳的老部下，老干部等也来参加了纪念活动，包括中国国务院前副总理田纪云。

2015年1月17日，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发表题为《对一些人和事，官方沉默也是态度》的社评，文章开头明确提及赵紫阳逝世十周年的敏感时间背景。并在首段提及赵的秘书鲍彤多年来为其"积极发声"。文章称"不同价值观的人对他（指赵紫阳）的看法是分裂的"。文章也直指中国官方在赵逝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避免谈论赵紫阳，但同时又解释称此种沉默也被认为是"一种态度"。文章亦将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赵作比较，指官方预定在2015年胡诞辰百年之际举行隆重纪念活动，但对赵紫阳逝世10周年却没有发声。文章又转而分析官方冷处理赵紫阳的动因称，其一在于官方对其的评价稳定，没有调整口径的需要。二是官方担忧对赵紫阳的定调发生变化会引发现实的政治波动。文章称，中国按照赵紫阳曾经反对的政治路径取得了重大的建设成就，以"不争论"政策作为对敏感历史议题的回答。文章同时称，中国官方及社会对待六四事件有了更多成熟和理性，中共官方对赵紫阳的定调也逐渐被社会更广泛地接受。此篇评论也是在赵紫阳逝世10周年之际，官方做出的罕见发声。但总体上并未改变对赵紫阳的态度，只是强调社会的看法更为宽容。该文章被部分门户新闻网站转载，且开放网民评论。网民评论以挺赵、赞颂赵的功绩为主，称颂其为"伟人"、"有良心、有风骨、有道义"、"值得尊重"等等。目前该文章页面已被删除，评论区仍可访问，但评论已经被悉数删除。

2015年11月，中国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纪录片《胡耀邦》中，将当年《人民

日报》头版中赵紫阳的头像抹去，替代为赵紫阳的政敌李先念的头像。同时在《胡耀邦》第五集中，涉及赵紫阳的镜头同样被“消失”。德国之声刊文称，篡改过去的一张报纸，从方案提出到精心裁剪、重新制作再到拍摄播放，并非一个人心血来潮的即兴之作，而是一个系统性的造假。在资讯发达的时代，这种造假比过去显得更加天真、愚蠢和虚伪，但它有效地传递了信息，即当局正在对赵紫阳实行“抹除记忆”的刑罚，这种刑罚可以追述到古代埃及和罗马的专制权术。

2019年10月18日，赵紫阳的骨灰被正式安放在北京昌平区民间公墓天寿园，与夫人梁伯琪合葬。据悉，为了顺利合葬，赵紫阳的子女向官方承诺仅安排直系后裔出席，并以家礼形式进行，而多位希望前去参加葬礼的赵紫阳支持者被限制行动，未能成行。

https://en.wikipedia.org/wiki/Zhao_Ziyang

赵紫阳

赵紫阳（1919年10月17日－2005年1月17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PRC）的一位高级政治家。他在1980年至1987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任总理，

1981年至1982年担任中国共产党的副主席，从1987年到1989年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他从1986年开始负责中国的政治改革，但在1989 年由于支持“去威权主义化”的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而失去权力。

作为一名高级政府官员，赵对毛主义政策持批评态度，并在实施自由市场改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是在四川，随后是全国。文革后，由于邓小平的支持，他登上了全国舞台。作为国有企业私有化、党政分离以及全面市场经济改革的倡导者，他寻求精简中国官僚机构和打击腐败的措施；这些问题在 1980 年代挑战了党的合法性。其中许多观点得到了当时的胡耀邦总书记的认同。

赵的经济改革政策，以及他对于1989年游行示威学生的同情，使他与党的领导层的一些成员有分歧，包括中央顾问委员会主席陈云，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和总理李鹏。赵也开始在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面前失宠。六四事件发生后，赵在政治上遭到清洗，并在他的余生中被有效地软禁。

他于 2005 年 1 月在北京因中风去世。由于他在政治上失宠，他没有得到一般给予中国高级官员的葬礼。他的秘密自传于 2009 年被走私并以英文和中文出版，但他的生活细节信息在中国仍然受到审查。

早年生涯

赵的原名是“赵修业”，但在武汉上中学时，他给自己改名为“紫阳”。他的父亲是河南滑县的一个富裕地主；其父后来在40年代初的土地改革运动中被共产党官员杀害。赵于1932年加入共青团，1938年正式入党。

与许多活跃于 1930 年代和 1940 年代、后来成为中国高级领导人的党员不同，赵入党太晚而未能参加1934 年至 1935年的长征。他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服役，参与了抗日战争和随后的内战，但他的职位主要是行政管理职位。赵在1950年代初成为广东的党领导人之前，他的职业生涯并不是特别引人注目。

赵从 1951 年起在广东声名鹊起；他最初追随无情的极左分子陶铸；陶铸以强硬的手段迫使当地农民在“人民公社”中生活和工作而闻名。毛泽东的大跃进（1958-1961）制造了一场人为的饥荒；毛泽东公开将国家的粮食短缺归咎于富农的贪婪；据称他们向政府隐瞒了中国巨大的剩余生产。赵对毛的信仰使他在当地一场旨在折磨农民以发掘他们（共产党想象中的）“所隐藏的”食物供应的运动中发挥领导作用。通过支持大跃进，赵对1958年至1961年间广东因饥饿和营养不良而死亡的数百万人负有部分责任。

赵在大跃进期间的经历使他支持温和的政治和经济政策，包括邓小平和刘少奇主席支持的政策。他领导了重新引入有限数量的私人农业和商业的努力，并解散了人民公社。赵将私人土地归还农民和将生产合同分配给个体

家庭的方法在中国其他地区得到复制，帮助该国的农业部门复苏。在广东取得高级职位后，赵对被指控腐败或与国民党有联系的干部进行了严厉清洗。

到 1965 年，赵虽然不是中共中央委员，但已成为广东省委书记。他第一次出任党委书记时年仅 46 岁，年纪轻轻就可以担任如此显赫的职务。由于其温和的政治倾向，赵在文革期间（1966-1976）遭到红卫兵的袭击。

1967年，他被免去一切官职，此后他戴着一顶纸作的高帽在广州游行并被公开斥责为“地主阶级的恶毒残余”。

重返政府

赵在湖南咸中（音译）机械厂做了四年钳工。他的四个儿子中最小的赵五军（音译）和他一起工作（赵还有一个小女儿）。在政治流放期间，赵的家人住在他工厂附近的一间小公寓里，客厅里有一个小手提箱，用作餐桌。

赵的复职始于1971年4月，当时他和家人半夜被敲门声吵醒。赵所在的工厂党委书记没有多说什么，就只告诉赵，他马上要去省城长沙。工厂唯一的交通工具是一辆三轮摩托车，随时可以载他。

赵被送到长沙机场，那里已经准备好一架飞机带他去北京。赵还不知道发

生了什么，就登上了飞机。他住进了舒适的北京饭店，却睡不着：后来他说，多年生活贫困，床垫太软。

当天上午，赵被带到人民大会堂与周恩来总理会晤。见面后不久，赵就开始了他前一天晚上准备好的话："这些年，我作为劳动者，一直在反省……" 周打断了他，说"你被叫到北京是因为中央决定任命你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从政治流放被召回后，赵试图将自己描绘成一个重生的毛主义者，并公开放弃任何鼓励私营企业或物质激励的兴趣。赵晚年皈依毛主义并没有持续多久，后来他成为毛去世后全面的、亲市场的变革的"主要建筑师"。尽管赵在其职业生涯中在指导中国经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没有接受过正规的经济学培训。

整个1972年周恩来指导赵的政治复职。赵被任命为中央委员，1972年3月担任内蒙古任革命委员会书记、副主席。1973年8月，赵担任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74年4月，回到广东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革命委员会主席。1975年12月任成都军区政委。

赵于 1975 年被任命为四川省委书记，实际上是该省的最高官员。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四川因地方红卫兵的敌对组织之间的激烈战斗而闻名。当时，四川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对它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集体经济政策使该省的农业生产暴跌

至 1930 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但全省人口增长。经济形势如此糟糕，据报道，四川市民为了食物而卖儿女。赵刚上任不久，就推出了一系列成功的市场化改革，三年内工业产值增长81%，农业产值增长25%。赵的改革使他在四川走红，当地有句俗语："要吃粮，找紫阳"。

改革派领袖

政治活动

华国锋作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在1978年被推翻后，邓小平认识到"四川经验"可以作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模型。1977年，邓提拔赵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9年为政治局正式委员。1980年，他加入中国最高执政机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在1980年和1981年赵开始领导财政经济领导小组和担任中国共产党的副主席。

1978年以后，赵的政策在安徽得到复制，也取得了类似的成功。1980年，在担任六个月副总理后（当时华国锋是总理），赵接替华出任国务院总理，负责在全国推行农村改革。1980年至1984年间，中国农业生产增长了50%。

1984 年 1 月 10 日，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在白宫接待了赵，这是改善中国与西方关系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

赵提出了"初级阶段理论"，这是通过逐步经济改革来转变社会主义制度的

模型。作为总理，赵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许多在四川取得成功的政策，越来越分散工农业生产。赵成功寻求在沿海省份建立一系列经济特区，以吸引外资并打造出口枢纽。他还制定了应对全球技术快速变化的政策。赵的改革导致整个 1980 年代农业和轻工业生产的快速增长，但他的经济改革因引发通货膨胀而受到批评。赵提出对外开放政策，改善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以支持中国的经济发展。

赵的主要文化改革之一包括允许乐队Wham! 对中国进行为期 10 天的访问，这是西方流行乐队的第一次访问。Wham! 1985 年的访问，由乐队经理西蒙·纳皮尔-贝尔（Simon Napier-Bell）策划，是一次广为人知的文化交流，被视为增进中西方友好双边关系的重要一步。

在 80 年代，赵被保守派称为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者，但他倡导的政府透明度和让普通公民参与决策过程的全国对话使他受到许多人的欢迎。赵是党的坚定信徒，但他对社会主义的定义与党内保守派截然不同。赵称政治改革是“社会主义面临的最大考验”。他相信经济进步与民主化密不可分。赵是高尔夫球迷，并因在 1980 年代将这项运动重新引入大陆而广受赞誉。

虽然赵在 80 年代初期专注于经济改革，但他的上司胡耀邦推动了一些政治改革。80 年代后期，胡和赵合作推动了一系列目标模糊的大规模政治改革。胡与赵的政治改革包括，政治局成员由选举而产生；多位候选人可以参加竞选；更多的政府透明性；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更多地让公众参与；增加政府官员为自己所犯错误而应当承担的责任。

赵和胡还开始了大规模的反腐败计划，并允许对在父母影响下长大的党内高层长老的孩子进行调查。胡对属于这个“太子党”的党内官员的调查使胡在许多党内有权势的官员中不受欢迎。1987 年 1 月，一帮党的长老以胡对学生抗议者过于宽容为由迫使他辞职。胡被免职后，邓提拔赵接替胡出任中共总书记，使赵接替邓成为“最高领导人”。在赵被任命为总书记的前一个月，赵接受了一位美国记者的采访，他说：“我不适合担任总书记……我更适合负责经济事务。” 赵腾空的总理职位反过来由反对赵的许多经济和政治改革的保守派李鹏填补。

赵在1987年的中共代表大会上宣布，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持续100年。在此前提下，赵认为中国需要进行各种经济改革以刺激生产。赵提出将党和政府的角色分开，这一提议从此成为禁忌。

西方观察家普遍认为，赵担任总书记的那一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开放的一年。许多对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限制放宽，允许知识分子自由表达自己，并为国家提出“改进”建议。赵大胆地引入了中国的股票市场，并大力推动了那里的期货交易。1984年，在赵紫阳的支持下，北京、上海、广州成为股份制试点城市，部分企业只在本公司职工内部发行股票。1985年11月，第一家股份制企业在上海成立，发行10000股50元面值股票公开上市，吸引了众多投资者的兴趣。1986年8月2日，赵紫阳主持召开财务会议，要求次年在全国推行股份制。

赵于 1988 年 5 月提出的加速价格改革的提议引起了民众对通货膨胀猖獗

的普遍抱怨，并为快速改革的反对者提供了反击的机会，他们呼吁加强经济控制的集中化和更严格地禁止西方影响。这引发了一场政治辩论，在 1988 年到 1989 年的冬天变得更加激烈。

与党内长老的关系

由于赵是通过他在外省的工作上台的，他在北京的党的领导层中从未有过密切的联系。由于他在1950年代领导共青团，赵经常依靠其前成员的支持，赵的敌人指责他在中共内部建立"共青团派系"。在北京的党内元老中，陈云和李先念对赵及其政策的批评尤为突出。

尽管批评赵，但陈云是赵最尊敬的党内长老，赵在实施新政策之前会经常尝试与陈协商。李先念因为赵对外国文化的兴趣，以及赵愿意学习在中国以外成功的经济模式的意愿，所以对赵个人感到不满。赵说，李先念"恨我，是因为我在执行邓小平的改革，但他又很难公开反对邓，他就把我当成了反对的对象"。

赵在自传中热情地描写了胡耀邦；他在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上基本赞同胡耀邦的观点。虽然邓小平是党内长老中唯一坚定支持赵的，但邓小平的支持足以保护赵的一生。直到 1989 年 4 月，在赵的职业生涯戏剧性结束前一个月，邓向赵保证，他已获得陈云和李先念的支持，让赵继续担任两届完整的党总书记职务。

1988 年下半年，赵的政治支持日益恶化。赵发现自己与党的长老们进行了

多条战线的争夺战，他们对赵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不干涉的做法越来越不满。以李鹏总理、姚依林副总理为首的政治局保守派，在经济和财政政策制定方面与赵经常发生分歧。赵在打击基层官员及其家人的腐败失控方面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1989年初，赵正面临着越来越艰难的攻坚战，他或许已经看出，他是在为自己的政治生存而战。如果赵不能迅速扭转局面，与党内保守派的摊牌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被誉为改革派领袖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突然去世引发了学生抗议活动，造成了赵被迫与政敌对抗的危机。

天安门广场抗议

在 1989 年 4 月 15 日胡耀邦去世前，赵担任总书记一年多一点；高通胀引起的公愤感日益增强，为 1989 年学生大规模抗议提供了背景；知识分子和城市人口的其他部分都对党心怀不满。天安门抗议活动最初是为胡的自发公开哀悼，但演变为支持政治改革和要求结束党的腐败的全国性抗议活动。

抗议者的不同要求包括更大程度的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媒体自由、言论和结社自由、法治，以及让运动的合法性得到承认。一些抗议领导人反对官员腐败和投机、要求物价稳定、社会保障以及监督改革进程的民主手段。党内强硬派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示威是由于赵的快速改革步伐所致，他们认为这引起了大学生的困惑和沮丧。东欧其他共产主义政府即将崩溃，抗议者可能受到了鼓舞。

赵同情地对待抗议者。抗议活动可能已经平息，但在 4 月 26 日，他不得

不（作为党总书记）前往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在他离开后，国务院总理李鹏举行有邓小平参与的常委会会议，其中李和他的盟友试图让邓相信抗议活动正威胁着党。会后，李让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他把该文章归功于邓），批评抗议活动是“有预谋、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动乱”。在李的文章发表后，抗议活动人数大幅增加，并蔓延到中国各地的城市，尤其是上海和广州。

赵试图通过与学生团体进行对话来安抚抗议者。他试图进行多项政府改革，包括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调查政府腐败；但是，据赵说，该委员会是无效的，因为“李鹏和他的团队中的其他人积极试图阻止、拖延甚至破坏这个过程”。赵试图安排与邓的会面，以说服他撤回李的“4月26日文章”。5 月 17 日，赵获准与邓会晤；但是，他发现不是他所期望的非公开会议，而是整个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都出席了。赵主张修改社论时，国家主席杨尚昆提议根据全国人大委员会的决定宣布戒严。赵拒绝命令军队镇压示威。

邓最终决定宣布戒严。根据天安门文件，常务委员会投票以2比2和1票弃权的形式进行，并召集退休的中共元老决定投票结果。据赵说，没有投票，根据党的规定，宣布戒严的决定是非法的。

“我们已经老了，我们已经无所谓了”

5 月 19 日凌晨 5 点前不久，赵出现在天安门广场，来到抗议人群中。他用扩音器向聚集在广场上的学生发表了现在著名的演讲。它首先通过中央电视台在全国播出。

=====

“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了。不管你们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我这次来不是请你们原谅的。我想说的是，现在同学们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绝食已经到了第七天，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绝食时间长了，对身体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这是有生命危险的。现在最重要的是，希望尽快结束这次绝食。我知道，你们绝食是希望党和政府对你们所提出的问题给以最满意的答复。我觉得，我们的对话渠道是畅通的，有些问题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解决。比如你们提到的性质、责任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终究可以得到解决，终究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你们也应该知道，情况是很复杂的，需要有一个过程。你们不能在绝食已进入第七天的情况下，还坚持一定要得到满意答复才停止绝食。但是那个时候就晚了！

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国家和你们的父母培养你们上大学不容易呀！现在十几、二十几岁，就这样把生命牺牲掉哇，同学们能不能稍微理智地想一想。现在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你们都知道，党和国家非常着急，整个社会都忧心如焚。另外，北京是首都，各方面情况一天天严重，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同学们都是好意，为了我们国家好，但是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失去控制，会造成各方面的严重影响。

总之，我就是这么一个心意。你们停止绝食，中国政府不会就这样子把对话的门关起来，绝不会！你们说体制有问题，我们可以继续讨论。慢是慢了一些，但一些问题的认识正在逐步接近。我今天主要是看望一下同学

们，同时说一说我们的心情，希望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这个问题。这件事情在不理智的情况下，是很难想清楚的。大家都这么一股劲，年轻人么，我们都是从年轻人过来的，我们也游过行，卧过轨，我也知道当时那种情况，没有想后果怎么样。但是事后一想啊，你们要冷静想一想今后的事。有很多事情总是可以解决的。希望你们早些结束绝食，谢谢同学们。”

=====

赵鞠躬后，人们开始鼓掌，一些学生泪流满面。那是赵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因为赵刚到广场就被党内长老赶下台（邓小平下令出兵，赵交了辞呈）。短语“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成为此后的著名语录。

软禁

抗议者没有散去。赵的5月19日前往天安门广场一天之后，国务院总理李鹏公开宣布戒严，导致成百上千名示威者在6月4日死亡。在随后的权力斗争中，赵被剥夺了所有职务并被软禁，但赵并没有被开除党籍，他被允许保留党员身份。赵被免职后，江泽民接替赵出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和邓小平接班人。三十多位高级官员被当作赵的忠诚部下而被清洗；赵在中国媒体上受到广泛批评。最后，媒体禁止提及他的名字；他从教科书上消失了。

即使在今天，赵的动机仍然是许多人争论的话题。有人说，他走进广场是

希望一个和解的姿态能让他在对抗李鹏总理等强硬派时获得筹码。其他人认为他支持抗议者，不想看到军队被召集时受到伤害。事件发生后，赵被无限期软禁。

赵的竞争对手李鹏后来指责赵煽动天安门抗议活动完全是为了政治利益。据李说，"赵在（从平壤）抵达北京后立即与鲍彤联络。鲍召集了其他一些赵的支持者来讨论局势。他们担心赵的政治前途岌岌可危：赵没有成功[管理]经济，政治不光彩，没有自己的权力基础，儿子涉嫌非法经营，很可能成为学生运动的'替罪羊'。顾问建议赵与邓小平保持距离[并]试图赢得人民的心以拯救自己，没有其他选择。" 由于赵从未被正式指控有任何不当行为，无法知道李有什么证据支持他的主张。赵本人将李的说法称为"诽谤"。

赵一直受到严密监督，只有得到党的最高层的许可，才能离开他的院落或接待访客。偶尔有报道说他参加了死去的同志的葬礼，访问了中国其他地方，或者在北京的球场打高尔夫球，但政府相当成功地让他不出现在新闻报道和历史书籍中。在那段时间里，只有几张赵的白发照片泄露给了媒体。赵至少两次写信给中国政府，提出重新评估天安门大屠杀的理由。其中一封信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另一个是在 1998 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期间。两者都没有在中国大陆出版过。

1989 年之后，赵在意识形态上仍然与中国政府疏远。他在那些认为政府下令天安门大屠杀是错误的，以及党应该重新评估其对学生抗议的立场的人中仍然很受欢迎。他继续让中国最高领导层对戒严屠杀负责，并拒绝接受

党的官方立场、即示威活动是“反革命叛乱”的一部分。被捕后，赵最终持有了一些比他在执政期间表达过的任何立场都要激进得多的信念。赵开始相信中国应该实行新闻自由、组织自由、司法独立和多党议会民主。

赵在妻子的陪伴下被软禁了十五年。赵生活的胡同曾经属于清朝慈禧太后的理发师。胡耀邦在1989年去世前也曾住在这所房子里。它由北京市政府提供，位于北京市中心，靠近中南海。尽管赵被软禁，但党从未对他提出正式指控，他也从未被开除党籍。被捕后，邓和他的继任者仍然认为赵和他的部下秘密组织了全国范围的抗议活动，并担心他的死可能会引发类似于胡耀邦去世引发的抗议活动。

死亡和沉默的回应

2004年2月，赵某因肺炎突发肺衰竭，住院三周。2004 年 12 月 5 日，赵因肺炎再次住院。2005 年 1 月上旬，官方否认了他死亡的报道。后来，1 月 15 日，据报道，他因多次中风昏迷。据新华社报道，曾庆红副主席代表党中央领导到医院看望赵。赵于1月17日07时01分在北京一家医院去世，享年85岁。

赵死后，中国领导人担心会发生与胡耀邦死后类似的内乱。为处理赵之死的消息，中国政府成立了“紧急应变领导小组”，宣布“处于极端敏感时期”，并将人民武装警察置于特别警戒状态。为防止首都发生大规模示威，应急小组指示铁道部对前往北京的旅客进行筛查。为了防止对赵的任何公开纪念，中国当局加强了天安门广场和赵家的安全。

新华社成功指示国内电视台和广播电台不播放该消息。获准报道此事的极少数人被告知只称他为“同志”，而没有提及他过去的领导职位。

在“赵紫阳同志逝世”的标题下，赵的讣告说：“赵紫阳同志长期患有多种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疾病，多次住院治疗，最近病情恶化，医治无效，去世。” 在他死后的第二天，所有中文报纸都刊登了完全相同的讣告。在中国互联网论坛，包括强国论坛和新浪网、新华网、人民日报主办的论坛，一位评论者写道，“时间会证明他是正确的”；表达对赵的哀悼的信息充斥着；另一位写道，“我们会永远想念你”。这些消息被版主迅速删除，导致更多用户发表帖子，攻击版主删除帖子。

中国政府成功地将赵的死在中国大陆内保持得相当低调。没有对公众公开的纪念，尽管一些互联网在线评论者表示他们计划购买花圈以悼念赵的死，或者默哀三分钟以纪念赵。

在香港，有 10,000-15,000 人参加了纪念赵的烛光守夜活动。陈若仪（音译）等倾向内地政府人士表示，香港立法会议员参加任何告别仪式都是违法的，并称“……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立法会议员不应该关心中国大陆事务。” 该声明在香港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暴，并在他发表讲话后持续了三天。

香港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盟主席司徒华表示，共产党压制追悼会是不对

的。二十四名泛民议员反对香港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的立场；后者坚持认同应当加强天安门广场和赵家的安全警戒，并支持政府当局试图阻止任何公开表达悲伤的行为。

世界各地也举行了类似的纪念活动，特别是在纽约市和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官员和流亡的政治异议人士都参加了这些纪念活动。在西方，赵被评论为勇敢的改革者和政治烈士。

2005 年 1 月 29 日，政府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他举行了葬礼，那里是为革命英雄和政府高级官员保留的地方，有大约 2000 名哀悼者参加，他们是得到政府预先批准才能参加的。包括赵的秘书鲍彤和天安门母亲领袖丁子林在内的数名异议人士被软禁，因此无法出席。新华社报道，参加葬礼的最高级别官员是党内第四位的贾庆林，其他参加葬礼的官员包括贺国强、王刚和华建敏。送葬者被禁止携带鲜花，也不能在政府发放的鲜花上写上自己的信息。仪式上没有悼词，因为政府和赵家人无法就悼词内容达成一致：政府虽然想说他犯了错误，但他的家人拒绝承认他做错了什么。在他的葬礼当天，国家电视台第一次提到了赵的死讯。新华社发表了一篇关于葬礼安排的短文，承认赵的"对党和人民的贡献"，但说他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中犯了"严重错误"。据杜导正为赵的回忆录中文版撰写的前言，用"严重错误"一词代替先前支持"反革命暴乱"的判决，代表了党的让步。仪式结束后，赵被火化，他的骨灰被家人带到了他在北京的家中，因为政府不允许在八宝山安放他的骨灰。2019年10月，他终于被安葬在北京北部的一个墓地，据报道，他已被宣布为"被抹煞的记忆"。

推动平反

赵死后，国内外多次呼吁中国重新考虑赵在历史上的角色。在中国大陆，这些呼吁主要由赵的前秘书鲍彤领导。在中国大陆之外，赵的去世引起了中华民国和日本政府的呼吁，敦促中华人民共和国向赵所提倡的更大的政治自由迈进。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就赵之死发表的声明中说："我希望他们为民主化做出努力"。中华民国内阁代表陈志迈，表示北京应该"面对天安门广场的真相"并"推动民主改革"。白宫称赞赵，说赵"是有道德勇气的人，他在困难时期坚定地持守了自己的信念，并因而蒙受了巨大的个人牺牲。"

尽管自赵被捕以来，他的一些追随者偶尔试图推动赵的正式平反，但党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将他的名字从中国大多数公开记录中删除了。政府从公众意识中删除赵的记忆的努力包括从中国发布的照片中除去他的影像，从教科书中删除他的名字，以及禁止媒体以任何方式提及他。然而，截至 2019 年 12 月，中国大陆受政府审查的两个主要的民间百科辞典，包括百度百科，都包含有关赵的生平的文章，尽管其中省略了对他被逮捕和随后被软禁的活动的提及。

自 1989 年以来，为数不多的敢于印制非政府批准的、赞颂赵遗产的纪念刊物之一，就是《炎黄春秋》杂志。该杂志于2010年7月发表了亲赵的文章。文章由赵的前助手杨汝岱撰写。

回忆录

2009 年 5 月 14 日，赵紫阳回忆录以英文书名《国家的囚徒：赵紫阳总理的秘密记录》向社会公开。这本 306 页的书是根据赵在软禁期间秘密录制的录音带，历时四年精心写作的。在最后一章中，赵颂赞西方议会民主制度，并说这是中国解决腐败问题和贫富差距扩大问题的唯一途径。

这份出版的自传是根据赵在 1999 年至 2000 年间秘密录制的大约 30 盘盒式磁带写作的。他的传记材料与2001 年出版的、未经授权的中国政府文件集《天安门文件》中的信息基本一致；也与《俘虏对话》的材料一致；后者是赵和他的朋友宗凤鸣之间的谈话记录；该记录仅以中文出版。据赵的朋友和前同事杜导正说，赵是在被朋友说服后才录下这些磁带的。

截至 2009 年，赵的回忆录在香港销售（中英文），但不在中国大陆销售，尽管包含回忆录全部中文文本的Microsoft Word文档在互联网上可以找到，并在中国大陆广泛下载。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48397961

六四周年： 从昔日改革者到今天的政治囚徒 鲍彤称今生“一事无成”

云昇

鲍彤是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最得力的助手，上世纪80年代辅助赵紫阳对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进行顶层设计，提供重要改革路线图，也是因1989年“六四”事件被捕入狱的最高级别中共官员。

六四前夕，因其改革姿态和对天安门抗议学生的温和态度，赵紫阳失去当时中共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信任。 鲍彤也在1989年5月28日失去自由。1992年3月，中共中央宣布撤销其中共中央委员职务，开除党籍。同年7月，鲍彤因泄露国家机密罪及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1996年刑满释放后至今，他居住在北京，住所常年被严密监视，电话被监听，个人活动受到严格限制，形同软禁。但同时，他亦从未放弃对中国政治社会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

“六四”30周年前夕，BBC中文对鲍彤进行电话专访，“六四”前后中国政治格局，邓小平在六四的角色，以及习近平如何处理“六四遗产”等问题展开讨论。30年后，回顾自己曾大力推动的中国改革与前进方向已不复存在，87岁的鲍彤采访中坦承，自己今生“一事无成”。

以下为采访节选。

BBC中文：30年后的今天我们再谈谈论“六四”，意义在哪里？

鲍：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六四”的影响始终存在，并没有过去。很多人

说这是30年前的历史，但实际上这也是现实。30年前出现的大天安门事件现在没有了，但小天安门事件不断，群体的正常诉求受到来自政府、军队、警察的镇压，甚至逮捕、判刑。从维权的公民本人，到报道这些事件的记者，再到帮助这些公民维权打官司的律师，统统都在镇压之列。这些事情性质实际跟天安门一样，应该叫小天安门事件。过去发生在首都，现在发生在全国城乡，还没有结束。

1989年被捕后，鲍彤在监狱中度过七年。1996年被释放后，他仍未重获自由。他在北京的住所常年被严密监视，电话被监听，个人活动受到严格限制。图为2011年鲍彤在家中与赵紫阳图片合影。

第二是领导不准谈。这是历史上明明存在的，现实生活中也存在，但却是个禁区。根据这两个原因，大家便更加怀念，更认为需要多想一想。如果说“六四”已经过去了，那谁还会去想呢？就是因为它的影响现在仍然存在。

BBC中文：对于中国普通人来说，还需要知道“六四”吗？

鲍：知不知道不重要，重要的是应该是以人民为主体，对六四进行反思，大家都来谈真相，大家都来谈教训。不是说哪一个领导做过哪一个决议，这不叫真相，也不叫教训。把这个问题摊开，就什么问题都没了。

到今天为止，大天安门事件在中国发生过一次，没有发生第二次，小天安门事件却不断。不涉及到自己的时候，大家觉得自己很幸运，涉及到自己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不痛苦。现在这个体制就是“六四制度”。“六四制度”就是人人必须服从，谁不服从谁就没有前途，谁服从谁就有可能向上爬。爬到一半如果发现站错了队，那就一个跟头栽下来。没有法治，没有民主，没有选举，人人为了争取自己的前途，必须巴结上面。

现在不仅民不聊生，实际上商也不聊生，官也不聊生。商人今天可以发财，明天就可能破产。官也不聊生。有人说省委书记、县委书记中有5%都是腐败分子，那是因为还有95%没有人去揭发。这不是笑话，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不稳定状态，人心惶惶。这样的情况在《1984》、《动物庄园》里讲故事可以哈哈一笑，但现实生活当中出现，便非常严重了。

我想，如果真的像当初紫阳讲的，我们着眼于社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那么便真要像邓小平讲的那样，“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这句话反过来讲意义更深刻，就是“不让人讲话，天一定塌下来”。但问题是邓小平自己也没这样做。这个东西已经在那里至少七十年、将近一百年，已经根深蒂固，这样一个社会，你觉得是喜剧还是悲剧？

BBC中文：“六四”之后，中国政治改革停滞不前，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报告中体现出的改革设想和蓝图已被全部推翻。 作为十三大文件起草小组组长，您如何看“六四”与中国政治改革的关系？邓小平在其中又起到什么作用？

鲍：六四以前中国有经济改革，也有政治改革，总体设想是中国未来在经济上应该是市场制度，政治上是民主制度。这些已经写进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

89年的事情如果按照十三大方针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通过社会协商解决，就不用动用军队了。如果这个问题成为共识，那我相信不仅是1989年当时学生的诉求能够解决，以后出现的其他的人民诉求，比如征地、盖房子、老兵请愿的问题，都可以按照这样解决。这非常可惜。

1989年，邓小平违反十三大的决定，没有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通过社会协商解决，而是调用几十万军队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跟市民。这样一来就在全国范围内立了一个规矩：遇到社会矛盾通过武力和镇压解决。这由此成为一种制度，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对今后的影响是不得了的。

BBC中文：邓小平自己也表示支持政治改革，"六四"之后还说过十三大报告一个字都不能改。那么在您看来，政治改革还是嘎然而止，为什么呢?

鲍：这个问题可以用邓小平自己的话来回答。邓小平后来接受陈云跟李先念的意见，把江泽民从上海调来当总书记。他见到江泽民之后讲了一句话：过去我们党有个核心，叫毛泽东，毛泽东说了算；毛泽东死了以后，核心是我邓小平，我说了算；我退下来以后，江泽民是核心，你什么时候说话说了算，我也就放心了。这说明，邓小平心目中的体制根本不是十三大决定提到的建立民主政治的起步，而是个人核心体制，是全党服从一个

人的体制。

很多人认为邓小平是改变党的领导人终身制的功臣，但其实邓小平什么时候改变过共产党的终身制？邓小平确实讲过，干部要年轻化，不要终身制，但请问邓小平自己是不是终身制？邓小平自己离开中央政治局常委职位后仍然要求成为党的最高决策者。

政治改革也确实是邓小平提出的。我认为当时邓小平确实想搞改革，他的终极思想是提高效率，后来讲的话也都是提高效率的话。紫阳提出来的是要长治久安，这中间就有一个要用什么模式实现改革的问题。紫阳套用的是邓小平自己在1980年8月讲的“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所以邓没法反对。但在1987年7月31日我们形成第一个基础性的政治改革的稿子后，紫阳告诉我，小平看了我们的稿子，讲了一句话：“我看可以，但是不要搞三权分立，影子也不能有”。听完我就在稿子上加了一句话，“我们绝不照搬三权分立”。小平看到这句话才放心。

但实际上不要三权分立，这话我到现在都不懂。三权怎有不分立的？难道国务院可以搞立法，人大常委可以管司法？这都不通。我理解他的意思是，你讲三权，不要忘了在中国还有一个权比三权更大，叫党权； 只要有了党权，一切问题都解决，不讲党权，三权就会要分立了。

十三大报告里面提到，要改进党的领导。这是紫阳亲自提出来的，党的领导就是政治领导。政治领导就是党在最重大的政治问题上发表自己的观

点，提供给立法机构和全国人民做出选择。中央的领导是政治领导， 最重要的领导人只有四个人：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军委主席。对这四个人的任命要求共产党员全体一致，其他像副总理、部长，统统可以自由选举，共产党员可以赞成，也可以不赞成。

紫阳还跟统战部长阎明复讲过一个问题。他说，我们共产党并不是在干部问题上保持全体一致，如果全体一致根本没有选举的余地。民主党派也可以有自己党组的活动。这话马上就传到小平那里去了，小平立刻派人打电话给紫阳，并说，“这个话说说可以，你真做”？

我想邓小平心里想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党领导一切的体制。他曾多次讲过，三权分立扯皮、效率低，我们的制度办事快、决定快、不扯皮。

BBC中文：您曾经提过“六四”是邓小平“政变”的说法，既然是公认的“最高领导人”，为什么邓小平需要采取“政变”的手段来解决问题？

鲍：这个问题只有邓小平自己有权回答，我只能推测邓小平为什么这样。

这里面有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赵紫阳4月23日下午乘火车访问朝鲜，晚上邓小平就找杨尚昆、李鹏，这个事情《李鹏日记》里面有。李鹏说，“晚上我去杨尚昆那里，尚昆鼓励我去找小平，我要他同去，他同意”。但当天下午他还在贯彻赵紫阳的方针。下午他送赵紫阳上火车的时候问赵紫阳还

有什么要交代的。紫阳说就是他跟常委讨论过的三句话：胡耀邦追悼会已经结束，应该劝学生回到学校学习；对待学生不能动用警察，除非发生打砸抢烧；学生这次提出来的各种诉求，我们通过社会协商对话解决。

李鹏回来以后立即找乔石，两人起草了一份文件，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就是这三条。这三条就是贯彻赵紫阳跟其他四个常委都同意的意见。为什么到晚上他又不同意了？就是因为晚上杨尚昆告诉李鹏，我看你还是去找小平，李鹏要杨尚昆也去，杨尚昆同意了。但到底去了没有，李鹏日记里不再写了，而在傅高义的的《邓小平时代》里面写了，说他们两个去了。本来说是要去，去了说了什么，写下来是很自然的事情，为什么李鹏不写？这里面就很蹊跷了，那就是有不可告人的东西。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他们去了之后邓小平说，学生是动乱。4月22日追悼会结束以后，23号学生已经陆续回去，甚至大部分学生已经回学校了，到26日却还要发表一篇社论，说这是动乱。这就要激怒学生，唯恐天下不乱。

27号我跑到街上看过，那天不只天安门，整个北京大街小巷全是学生。学生队伍打的标语都是针对邓小平的。“反对垂帘听政”，这是针对邓小平的。“小平同志指示说，让大家说话，天不会塌下来”，这是讽刺，因为小平说是动乱。

我这里要纠正我的一个说法。我之前说这是一个政变，后来我想“政变”这

个词虽没什么错，但也不能完全反映这个事情的本质。因为政变在共产党是家常便饭，哪个领导人下去不是通过政变？毛泽东把国家主席刘少奇搞掉也是政变，毛泽东把写在党章里面的林彪搞掉也是政变。邓小平把华国锋、胡耀邦搞掉也是政变。那么邓小平在赵紫阳这个问题上的特点就在于，他屠杀公民，造成惨案，而且是一手策划的。我可以讲，在邓小平在找杨尚昆李鹏谈话以前，杨尚昆、李鹏也不知道，李鹏如果知道，下午他还会写那个文件吗？不会写的。

邓小平跟李鹏、杨尚昆谈话以后，我不讲是不是谁利用谁，他们当然都服从最高领导。十三大的决定提到过，在最重要的问题上还是要请小平拿主意。整个“六四”这么大规模的流血和镇压事件，是邓小平根据自己的需要一手策划的，第二个人都不知道。但是最后他得到基层这个局面，得到了要维护一党专制的人的坚决支持。在这以前，要维护一党专制的那些人也不知道，这一手打下去会不会把党打得稀巴烂，后来没有打成稀巴烂，那就是得逞了。这么重大、骇人听闻的屠杀事件是他为了达到自己目的一手策划的，这个目的一开始是为他自己，但后来歪打正着符合党内自己人的利益，所以得到了支持，得到了拥护，还得到了称赞。

《李鹏日记》里面还有一段话，讲5月21号李鹏给邓小平秘书王瑞林打电话，建议中央赶快开会解决赵紫阳的问题。请问解决赵紫阳什么问题？王瑞林请示邓小平以后解释说，等到部队进城以后，开会才更为稳妥。什么意思？就是说中央全会要在刺刀下面开会，要不然不稳妥。

我还想说明另一个问题，实际上之前中共不是邓小平一个人说话算数的。

在“六四”以后确实是邓小平说了算，标志是陈云的一句话。陈云到中央开会时讲了一句话：我们这个党是以邓小平同志为头子的中国共产党。因为一开枪，共产党在老百姓心目当中是一个什么地位，已经岌岌可危了。这个时候再不承认他是核心，再提邓小平开枪开错了，那这个共产党就瓦解了。为了保全这个党，陈云才委屈求全，承认邓小平这个头子。

BBC中文：邓小平曾经是支持赵紫阳和他所推进的一系列改革的，您认为邓小平对赵紫阳态度变化的关键在哪里？

鲍：根本关键改变在4月19日，《李鹏日记》里面也有反映。耀邦去世的时候李鹏正在日本访问，回来后李鹏问赵紫阳，学生追悼耀邦我们怎么办？我们党要有个态度。当时我也在场。紫阳说，我们的态度很明确，耀邦同志是我们的领导人，耀邦去世我们全党都在追悼，我们没有理由不让学生追悼。我认为这句话触怒了邓小平。邓小平心里非常清楚，是他把耀邦逼下台的。学生也非常清楚，学生要给耀邦讨还一个公道，就是要说邓小平错了。因此李鹏也很清楚，否则李鹏为什么还要提出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当时治丧小组的胡启立和乔石提出，是否允许学生在追悼会上跟胡耀邦遗体告别。他们两个人的意见是允许，紫阳同意这个意见。因此当时《人民日报》、《新华社》开记者吹风会的时候，乔石主持，胡启立宣布，说遗体告别时可以让学生参加。当天上午讲了这个问题，到晚上却突然取消了。请问谁能取消这个决定？三个常委作出的决定，我想中国只有一个人有权取消。这个事情不是我说的，是《人民日报》副总编陆超祺和《新华社》国内部主任张万舒在回忆录里写的。

BBC中文：您认为，邓小平要赵紫阳下台，是基于个人考虑，还是站在保党的角度考虑？

鲍：我也提出过这个问题。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一个人决定的？还是毛泽东跟刘少奇商量后决定的？还是毛泽东跟林彪商量后决定的？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怕党内出赫鲁晓夫，出赫鲁晓夫就是说党内将来有秘密报告。赵紫阳多次跟我们讲，没有小平同志支持改革寸步难行，赵紫阳心里也是这样想的。小平也确实支持赵紫阳。但如果小平发现，赵紫阳在胡耀邦这个问题上对他有保留，那就是说未来的赫鲁晓夫就是赵紫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跟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是一样的，不能说错一句话，说错一句话就是路线错误。邓小平如果在耀邦这个问题上说错一句话，那他千秋功业就没了。

邓小平为什么要换赵紫阳？那无非就是怕在耀邦这个问题上，即使他活着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怕他死后有人要做秘密报告，说他在耀邦的问题上犯了错误，这是他不能忍受的。邓小平什么时候承认过错误？反右派他是“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在“反右”中被打倒的，99.99%都已经平反了，他还在说右派是要反的。

BBC中文：您自己有没有反思当年政治体制改革是否可以做得更好，或者当年是否有办法避免“六四”的发生?

鲍：我这一辈子可以用四个字概括，一事无成。我要做的事情，没有一件事件做成功的。毛泽东时代是这样，邓小平时代也是如此，现在当然也没什么事情，一事无成。

你认为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毛泽东不怕党内出赫鲁晓夫，不搞文化大革命吗？道理是一样的。如果没有办法叫毛泽东不怕出赫鲁晓夫，那也没有办法叫邓小平不怕出赫鲁晓夫。毛泽东就是怕刘少奇做秘密报告所以才发动文化大革命，所以同样，邓小平也是怕赵紫阳做秘密报告，因此从顶层设计了一个"六四"事件。唯恐天下不乱的不是学生，是邓小平。他要乱，才能至少在他在世时根除党内出赫鲁晓夫的可能性。

BBC中文：30年来"六四"在中国一直是禁忌。您认为是时候公开讨论"六四"了吗？

我曾在"六四"10周年时写过，邓小平留给后继者最大的历史遗产就是"六四"。谁只要平反了"六四"，谁就得到民心，谁就超过了邓小平，也超过了毛泽东，就可以得到人民的信任。所以这是最大的历史遗产。这件事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一做就成功。

现在的领导人要心平气和看这个问题，不要把自己跟邓小平捆在一起，应该把自己跟邓小平切割开来。特别是当国家遇到困难，需要团结、凝结人心的时候，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值得郑重再三考虑的问题。他要真想摆脱现在的各种矛盾和困境，真想得到选民的信任，就应该考虑这个问

题。

这种矛盾作为一个公民个人很难感受到，但作为领导人如果连这个感觉都没有，那是不可思议的。我很希望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人民为主体”解决，我很欣赏习总书记讲的以人为主体的说法。

BBC中文：您觉得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是真正在实践“以人民为主体”吗？

鲍：如果他不相信以人民为主体，那还讲以人民为主体干什么？至少说明他还没有忘掉“以人民为主体”这几个字。

习总书记“以人民为主体”的说法好像是最近几年谈的。不过我想他现在做的还不够，我希望他能够充分展现自己的抱负。当然现实的情况我完全不知道，这只是我个人没有根据的信口开河。我只能把当时了解的事情作为根据，不可能把现在的事情作为根据。

但其实我对任何人都寄予希望，对任何人都没有成见。任何人要做一件好事，我都支持，绝不拆他们的台。

我有幸曾与习主席的父亲习仲勋老先生交谈过几次，很赞成习仲勋老先生

“要保护不同意见”的主张。其实保护不同意见这个事情只是在中国的特殊情况下才会提出。不同意见本身当然会存在，就是有不同意见才开会，才征求意见。再比如说，为什么要有舆论，就是要有批评与反批评，没有不同意见还要批评与反批评干什么？所以没有不同意见等于说没有脑袋，就是不准人们有脑袋，大家服从就得了。这是不行的。共产党现在好像有多少条纪律，不准这个不准那个。我想习仲勋老先生如果活到现在，他大概不会赞成“看齐”这种东西。

———

邓小平、二野与越战

http://hx.cnd.org/2007/02/20/%E6%96%B9%E8%A7%89%EF%BC%9A%E9%82%93%E5%B0%8F%E5%B9%B3%E7%9A%84%E5%8E%86%E5%8F%B2%E6%80%A7%E9%94%99%E8%AF%AF/

方觉：邓小平的历史性错误

发表于 2007 年 02 月 20 日 由 CND《华夏文摘》编辑

方觉

十年前的今天，邓小平去世了。

中国不必继续吹嘘邓小平的“丰功伟绩”。中国需要清理邓小平的历史性错误。

他的第一个历史性错误，是极大地延缓了中国领导层的年轻化进程。

当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第一代主要领导人完全退下历史舞台后，这个没有多少文化（只受过不完整的中等教育）、也没有多大才能的老式共产党人，终于等到了攫取中国最高权力的机会。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使这个74岁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成为了中共的实际最高领导人。这就开创了名义上不是最高领导人、实际上却是最高领导人的恶劣政治先例。为了巩固自己的破坏领导制度、违反政治规则的最高地位，邓小平起用了一批支持自己的超过70岁的老迈共产党人。这份名单是冗长的：陈云从73岁起“监督”经济工作，并担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彭真从77岁起主管“法制建设”，并在81岁时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杨尚昆从74岁起主持中共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并在81岁时担任国家主席；王震则在79岁时成为国家副主席；薄一波从74岁起主

持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等等，等等。这些七十岁、八十岁乃至九十岁的政治老人实际上组成了一个中国的"摄政团"，邓小平则是"摄政王"。从1978年底邓小平掌权到1997年2月邓小平去世的将近二十年间，中国政治一直处于"摄政"的阴影之下。这种"摄政现象"在当代世界是绝无仅有的。即使在其它共产党国家，也从来没有产生过"摄政现象"。邓小平创立的"有中国特色的摄政"，导致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不能突破传统共产党人的思维局限和政治局限。中国的改革开放被限定为"发展生产力"，"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引进外国的资金和技术"。而改革开放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他的第二个历史性错误，是"以军制党" 、"以军制政"。

邓小平历来反对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然而他开发出另一种权力制衡：用军队制衡党、制衡政府。从1980年底起，邓小平担任中央军委主席。这又开创了一个恶劣的政治先例：中央军委主席既不是党的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又不是国家的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这就使中央军委成为事实上的独立王国，使中央军委主席实际上可以依据个人利益干预政治、甚至自行调用军队。胡耀邦在1981年6月至1987年1月担任中共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期间，邓小平一直把胡耀邦排斥在军队事务之外。1988年中国的最高领导层是这样一个荒唐的结构：邓小平是中央军委主席；党的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赵紫阳（总书记）是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但是不参与中央军委领导工作；国家的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国家主席）杨尚昆是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人们有理由怀疑：这个荒唐的结构到底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到底是国家领导军队还是军队

领导国家？？到这个时候，邓小平彻底实现了“以军制党”、“以军制政”。这种“军队制衡”反映出一个迷恋最高权力的84岁的共产党人为了保持自己的最高权力不择手段。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中国的抗议浪潮中，邓小平的政治威信降到最低点，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要求或希望他退休的呼声占了上风。为了继续自己的“摄政王”地位，他以中央军委主席的独立权力，自行动用军队镇压和平的抗议者，酿成“64”血案。他事后冠冕堂皇地解释：军事镇压是为了防止中国的共产主义制度改变颜色。事实上，不但1989年春夏之交在中国没有形成改变共产主义制度的态势，那时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在苏联的改革也没有发展到改变共产主义制度的阶段，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雪崩还未开始。邓小平的军事镇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自己能够继续享有最高权力。

他的第三个历史性错误，是顽固阻挠中国的民主改革。

到1991年底，东欧各国和苏联陆续进行了历史转型式的民主改革。邓小平始终坚定地批评苏联东欧的民主改革，而且竭力阻止中国发生类似的巨变。苏联的国旗从克里姆林宫的屋顶黯然落下后不到一个月，88岁的邓小平就开始了“南方视察”。“南方视察”丝毫不提中国有必要启动拖延已久的民主进程，而是强调必须防止中国出现民主变革。邓小平总结的最重要的防止民主的经验即“发展是硬道理”。1992年初的“南方视察”把这样一种错误方向凝固化：以发展经济取代民主化，以少数富人发财的自由取代大多数人民的政治自由，以共产党不受制约的全面腐败取代多党竞争，以向西方让出一部分国内市场取代加入自由世界。如果说五十一年前毛泽东反对苏联东欧最初的改革，导致中国在政治上停滞了二十二年，那么邓小平十八年前反对东欧苏联的民主转型，有可能导致中国在政治上停滞更长的时

间。

作为邓小平的继承者，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上一个领导层，把邓小平“南方视察”的错误方向发展到极端的边沿。

因此，中国进一步的改革需要突破邓小平的历史性错误。这一突破的中心是启动民主进程。只有在民主进程中，才可能杜绝政治老人“摄政”，才可能终止上一代领导人指定下一代领导人；只有在民主进程中，军队才可能忠于宪法和国家而不是忠于个人，军队才可能中立化而不是政治化；只有在民主进程中，人民才可能通过普选决定政府领导人并促使政府为大众谋福利，其它政党才可能合法有效地监督执政党。

现在中国的领导层并不想突破邓小平的历史性错误，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错误的受益者。

突破邓小平的历史性错误，要靠新一代的民主力量。

新世纪

日期: 07-02-20 06:58

专题: 华夏快递

原来由 thchen 发布在URL: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16144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46512070

改革开放40年：邓小平究竟给今日中国留下什么

山海

BBC中文记者

2018年12月18日

历史对邓小平的评价，从不缺少争议。他一手缔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也造成政治改革的停滞。回溯改革开放40年，这个庞大国家的成与败，似乎都与邓小平密不可分。

1979年1月，邓小平的车队行驶在华盛顿街道上。两边人群产生奇妙分野——一边抗议者挥舞着台湾"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另一边抗议者则是狂热的美国左派，他们认为邓背叛了毛泽东的革命。甚至在白宫草坪的欢迎仪式上，有两人因高喊"毛主席万岁"，而被强行带离。

势成水火的两股势力都在反对邓小平，反对的理由却又显得十分充足——邓访美一个月前，台北熟睡中的蒋经国，被大洋彼岸电话吵醒，得知美台断交；此前不久的北京，邓掀起关于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被毛泽东的支持者斥责在“砍旗”、“违反中央精神和反对毛泽东思想”。

此后18年，更多矛盾在邓小平身上持续呈现。他反对“两个凡是”，努力使文革后的中国走出毛泽东的阴影；但却又极力避免成为“第二个赫鲁晓夫”，力排众议在官方文件中给予毛泽东积极的历史评价。邓小平是政治斗争中改革派最有利的支持者，甚至是培育者；但面对诉求民主的学生，他却下命令“采取一切手段”恢复秩序。邓小平主张“摸着石头过河”，务实推进经济改革，塑造此后几十年的改革方法论；但他也曾强行推“物价闯关”，导致全民抢购潮，诱发通货膨胀。

改革之路，矛盾丛生，也让各方对邓的评价不尽相同。中国官方语境将他形容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手缔造今日经济奇迹；哈佛大学教授、《邓小平时代》作者傅高义认为，改革开放并没有清晰、完整、现成的设计图纸，不如说，邓小平全面领导转型过程的总经理；哈佛大学教授麦克法夸尔则认为，“总设计师”应该是赵紫阳，邓更像是改革的“教父”，他临阵督战，抵挡四面八方的反对者；曾出版赵紫阳回忆录的鲍朴更认同台湾学者钟延麟的观点，认为邓小平实则是毛泽东的“副帅”，并得出“主事在毛，成事在邓”的结论。

哪个历史评价更公允，需要时间的持续检验。但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

际，我们能做的是重新观察他在关键时刻的决策细节；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在另一个政治强人习近平主政的当下中国，邓小平的改革遗产是如何被扬弃的。

“西单民主墙”与六四事件——自由的尺度

1978年，入冬后，中国北方万物冰冻，而思想的解冻却在江湖和庙堂两个层面，同时发生。

庙堂之上，11月召开中央工作会，原本议题是农业及之后两年国家发展计划。会议刚开两天，政治气氛迅速改变。与会的210名高层干部，纷纷发言对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和对“四五”事件定性表达不满。舆论汹涌，以至于叶剑英劝华国锋顺势改变。

这次气氛的转折，为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执掌政权提供条件。傅高义引述党内老领导评价，“就像遵义会议是毛泽东成为党主席的转折点一样，这次工作会议是邓小平崛起的一次决定性事件。”

江湖之中，也发生着微妙而剧烈的变化。工作会开始后出版的《中国青年》杂志，登载“四五”运动中天安门诗抄，还批评对毛泽东的迷信为“现代迷信”。时任副主席汪东兴气急败坏地叫停发行，却被人一页一页地贴上天安门西边几百米的灰砖墙上。由此一发不可收拾，诉求民主、批评毛泽东和文革的大字报，雨后春笋般出现在“西单墙”上。

“西单墙”恰为我们提供一个对于邓小平心中自由尺度的绝佳观察点。

政治气氛转向，民间与高层相呼应，一度为邓小平所乐见。11月28日，邓在回见日本民社党党魁佐佐木良作时称，“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没有权利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他还进一步反问，“允许群众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有什么错？”

一个月后，大字报的形式已无法满足民众的表达欲。时任新华社记者杨继绳记述，12月28日，有人在西单墙演讲，认为光争取民主、自由还不够，最根本是要改变国家的政治制度，数千听众堵塞交通，人群遂向天安门转移，边走边高喊“要民主，不要专制”“让思想冲破牢笼子”的口号。3月25日，北京动物园职工魏京生贴出《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一文，直接点明邓小平“走的是独裁路线”。三天后，北京市政府发布禁令，第四天即逮捕魏京生。

傅高义猜测，“西单墙”曾为邓的政治理想提供燃料，因而被他容纳，甚至鼓励。随着言论触及中共领导的根本制度，他断然压制。一位前省委书记评价，邓小平对民主的看法就像“叶公好龙”一样，如果龙真的出现，他就害怕了。

1989年6月2日的天安门广场，远处为中央美院学生四天赶制的民主女神像，5月30日被正式立于天安门广场。

档案：邓小平曾说20万人死可换20年稳定

在改革开放的第一时间，民间思想的一次喷发就这样骤然遇冷。邓小平意识到政治言论需要红线。魏京生被捕后一天，邓小平发表讲话，确立四项基本原则，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以及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四项基本原则为之后四十年的言论管制划定“红线”，乃至今时今日，还在影响中国。

毛泽东去世后第一次来自民间的思想解放与反思，激烈喷薄，却心有余悸地快速收缩。这一蛰伏就是十年，再次爆发已是1989年的春天——彼时，数以万计的学生带着更强烈的民主诉求，再一次触及四项基本原则，邓决定用武力一劳永逸地结束运动，维护政府权威。他的女儿邓林曾说，不管邓小平受到多少批评，他从未怀疑过自己作出的决定是正确的。

鲍朴向BBC中文表示，由此可知邓小平在政治上延用毛泽东的制度和思想方法，他在1989年对待学运的态度，与1956年波匈事件时中国态度相同，当时苏共还未考虑派兵镇压时，中共已经建议派兵。所以说邓与毛在政治上是一贯的，即用无产阶级专政，用权力达成社会共识，把异议消灭掉，这个没有变化。

或许比外界更能一窥邓小平内心的，是他早年的一份课堂作业。1926年8月12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邓小平只有21岁，他在作业中写道，“集中的权利要自上而下地行使。服从上级命令是绝对必要的。允许多少民主，要视周围的情况而定。”

1990年，邓小平力促上海开发浦东新区，时任上海市长朱镕基之后任副总理和总理。当时，“八十年代看深圳，九十年代看浦东”成为流行语。

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理念的博弈

无论在官方语境，还是舆论印象中，邓小平与中国的经济成就紧紧绑在一起。

改革开放初，中国就展现出不俗的经济潜力。1982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1%，1983年达10.9%。因此到访中国的外宾，常对邓发展经济的能力表达赞叹。而曾任邓小平翻译的张维为在其视频节目中引述，邓在听到这样的夸奖时，往往会说，“在经济问题上，其实我是个外行，即使我讲一些话，也是从政治的角度讲的。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是我提出的，但如何搞改革开放，一些细节，一些需要考虑的具体问题，我懂得并不很多，我总是从政治角度谈经济的。”

鲍朴向BBC中文解释，邓小平和习近平执政的环境很不同，没有人可与习在政治上匹敌，但邓当政时一直被陈云等老干部制衡着，做事情必须和“老人”们商量。邓的功绩是改掉毛时代的经济政策，不过具体他也不知道怎么

改，因此哈佛大学教授麦克法夸尔看完赵紫阳的回忆录后作序表示，赵紫阳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设计师，邓小平则是“教父”，就是在争论不休时拍板之人，从这个角度，他对中国的影响当然很大。

“改革教父”的称谓确实有迹可循，邓小平早期提出的发展目标以及“物价闯关”等决策并不符合经济规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从政治角度谈经济”的邓小平没有功劳。恰恰相反，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阻碍，才是彼时中国经济改革最大的桎梏。

邓被认为是改革“教父”，而赵紫阳（右）为改革主将，但他因在“六四”中同情学生，反对武力镇压而被迫下台。

改革开放之初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评价毛泽东。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邓小平、陈云等老干部群起而攻之，这种主张被快速否定和边缘化。

这一仗后，胜利者们形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共识，但如何建设经济，又将彼时中国政坛一分为二——一边是以邓小平为首，主张市场经济的“改革派”；另一边是以陈云为首，主张计划经济的“保守派”。傅高义将其称之为“一山二虎”；杨继绳则称其为“双峰政治”；赵紫阳在《改革历程》中也确认，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方面，邓小平和陈云自始至终持两种不同的主张。

整个80年代，不同经济主张的互相博弈，频密展开——首先是经济增长目标的分歧，改革派认为目标要高一些，以实现2000年翻两番，保守派认为目标过高，会导致混乱，分歧之大，以至于1981年全国人大既没有通过年度预算，也没有明确“六五”计划的增长目标；1983年，保守派公开批评“指导性计划”，捍卫“指令性计划”；1984年，邓小平视察并肯定深圳的建设，并将开放扩大到14个城市；1985年，陈云则利用数据上的财政赤字和通胀，把快步前进的改革派拉了回来，并提出“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1987年，邓小平直接否定陈云的主张，在讲话中称“（过去）讲以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1988年，邓决定取消大量价格管制，然而他错误估计形势，致使物价过快上涨，引发恐慌性抢购，政策被快速叫停，经济决策权也从改革派的赵紫阳手上，交到支持陈云紧缩政策的李鹏手上。

1992年邓小平南巡，通过一系列讲话和表态，迫使江泽民公开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

经济路线的博弈一直持续到邓小平政治生涯的最终章。1992年，邓小平南巡中一边参观一边表态，走到珠海召开了一个由两位军委副主席参加的军事会议，会议上，邓却没谈军事，强调“谁不改革，谁就下台”。傅高义在其著作中称，“出席会议的军队领导人的强大阵容表明，如有必要，军队高层愿意拥护一个新的领导人”。江泽民感受到这股压力，五天后，他给邓小平打电话拜年，并在其后成为坚定的改革派。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在舆论中也得到普遍拥护，直至随后的中共十四大，才正式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改革派与保守派的经济路线之争才落下帷幕，此时距改革开放开始已经过去14年。

杨继绳形容，此后，一方面大力推进市场经济，一方面强化中共领导，由邓小平奠定的“威权政治加市场经济”的模式，贯穿整个江泽民和胡锦涛执政时期。这也成为邓小平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最显的影响。

两次政改与遗产的扬弃——失败的尝试

或许很多人并不知晓，改革开放之初，对中共统治状况最严厉的批评之一来自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指出党内存在政治弊端，比如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思想僵化、墨守成规、不负责任、压制民主、贪赃枉法。讲话内容虽未到改变中共执政地位的地步，但对民主表达积极评价。

正是这篇措辞严厉的讲话把政治改革的想法带入中国政坛。不过，邓讲话的同时发生波兰团结工会事件，其他党内高层由于担心像波兰一样失控，10月中宣部就指示不要再讨论邓的上述讲话。12月，邓小平自己也回调口径，称政治改革要慎重。

高调的讲话就此沉寂。改革开放伊始发端的政治改革意识，刚露出苗头，就被迅速掐灭。

2018年3月11日中国人大以2958票赞成、 2 票反对、 3 票弃权、 1 张无效票，通过修宪草案，删除国家正副主席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

然而这并非邓小平时代唯一一次政治改革尝试。1986年，由于经济改革推动，政治改革再次被提上日程，邓小平称，“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

3个月后，赵紫阳根据邓的指示，成立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教授吴国光，彼时为《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被选入该小组。在吴国光关于中国政治改革的论文中，他指出邓小平与赵紫阳对政治改革的根本不同——前者希望通过高度积极的人员提高管理效率，后者则想更大范围地减少党在经济和社会单位中的作用。政治改革再次被提及时，意涵已经不再相同，更像是一场行政改革。

即便如此，这次政改还在讨论阶段，就先后遭遇“物价闯关”和“六四”，因而中断。

邓小平时代的政治改革并非全无建树。首先是设置任期制，在1980年8月的讲话后不久，他向意大利记者法拉奇表示，过去实际上存在领导职务终身制，制度缺陷在60年代还看不出来，“那是我们还年轻”。以此为铺垫，1982年，172名“老干部”卸任，保留级别和待遇加入由邓当主任的中顾委，

邓还宣布，中顾委只会存在十到十五年，通过这种方式集中卸掉老干部的权力。也是这一年，新修订的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和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邓掌权期间还多次强调和推动“党政分开”。在接受BBC中文采访时，吴国光回忆，当时邓小平的思路是党委书记就是甩手掌柜，就像是一个现代公司，党委书记是董事长，政府是CEO，最后的决定权是在党手里，但日常事务由政府去管。

不难观察到，在习近平第二个任期开始，邓的政治改革遗产接连面临挑战。一方面，通过修宪，消除国家主席任期。另一方面，“党政一体化”的改革意图在中共十九大上浮现。

这些变化使中国自由派人士失望，进而产生了习近平不再延续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而是向毛泽东更加靠拢的想法。

傅高义向BBC中文表示，“他（习近平）基本上延续了邓的政策。因为他在上台后立即去深圳访问了邓的雕塑，还依然延续了邓当年的对于外部世界的开放，他依然允许私营企业的存在，依然与外部世界保持着广泛的联系，而且也参与国际事务中。他还基本在政治制度的框架内运作。虽然他还在使用年轻时在文革中学到的毛泽东式语言，但或许是想留住那些偏爱毛泽东的人的支持。不过，他的政策与邓小平在1978年推行的一系列发展政策的主线保持一致。”

吴国光则认为，如果说中国共产党是一家股份公司，那么毛泽东通过中共七大巩固了权力、控股了，到了发动文革，毛要把中国共产党变成“毛记公司”。他判断，习近平也要走这条路。

鲍朴表示，邓小平错过了一个绝佳的政治改革契机，在毛死之后的十年，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和发展，中国人重新相信这个党至少是向好的方向发展，未来会给中国人更多的自由，但是“六四”结束了这个梦想，现在的希望越来越小，这种僵局是邓小平造成的。而想要通过市场经济发展缓和，是不可能的。

值得一提的是，习近平执政后，毛泽东生前秘书李锐在《炎黄春秋》上发表《我为何提议重发邓小平“8·18 讲话”》一文，再次提到1980年邓小平那篇措辞激烈的讲话——比如权力过分集中，“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家长制作风，“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李锐称讲话内容依然有现实意义，并表示肃清封建专制主义最有效的手段，是政治民主。

李锐试图通过邓小平的政治改革遗产发出声音，然而并未像邓小平时代一样，掀起更多、范围更大的讨论。相反，《炎黄春秋》在此后一年迎来当局力度空前的打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4%BA%BA%E6%B0%91%E8%A7%A3%E6%94%BE%E5%86%9B%E7%AC%AC%E4%BA%8C%E9%87%8E%E6%88%98%E5%86%9B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

（中原野战军）

存在时期　　1931年至1950年

种类　陆军轻步兵

功能　由鄂豫皖苏区红军第四方面军逐步改编扩建

规模　28万余人

直属　中共中央军委

装备　中正式步枪

汉阳八八式步枪

三八式步枪

四一式山炮

土制手榴弹

毛瑟C96手枪

冠名自　　　晋冀鲁豫边区

专用颜色　　灰色制服

进行曲　　　八路军进行曲

参与战役　　中国抗日战争

国共内战

象征性指挥官　　　中央军委主席

臂章　解放军军徽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是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五大主力部队之一。是由晋冀鲁豫边区的八路军和地方武装组建和发展起来，最初名为中原野战军。总兵力达28万余人。因为该部队为刘伯承和邓小平领导，也称为“刘邓大军”。

历史和发展

1945年8月20日，撤销北方局，改为晋冀鲁豫中央局；八路军一二九师改为晋冀鲁豫军区。1946年7月14日成立晋冀鲁豫野战军指挥部，由军区领导指挥。1947年5月改组成立新的中原局，邓小平任书记（兼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1947年6月，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已发展到42万人，其中野战军5个纵队，炮兵和工兵的建设有进一步发展，各二级军区所辖独立旅已达10个。1947年6月10日，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纵队12万余人组成晋冀鲁豫南征野战军，执行挺进中原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战略任务。6月23日，野战军指挥部率南征大军由安阳地区向楼阳寿张地区出动。6月30日晚，野战军四个纵队在冀鲁豫军区部队的配合下，发起鲁西南战役，歼敌四个师部、九个

半旅六万余人，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1947年7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称“南征野战军”，实力为4个纵队、13个旅、39个步兵团、1个骑兵团，团有迫炮连，旅有炮兵连，纵队有炮兵营，各纵都有教导团，共计11万余人。1947年7月27日，以第四纵队与第九纵队及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共10个旅8万人组成陈谢集团，挺进豫西创建鄂豫陕根据地，协助陕甘宁击破胡宗南的进攻，并配合刘邓“大举出击,经略中原”。1947年9月22日中央军委令“陈粟西兵团改为晋冀鲁豫野战军”但实际未实施。1948年5月9日根据中央电示，在宝丰县改组中原局的领导，南征野战军与陈谢兵团正式改称中原野战军（辖第1、2、3、4、6、9、11纵队，约15万人），同时成立中原军区（辖鄂豫、桐柏、江汉、豫西、陕南、豫皖苏军区），“军区、野战军不分设”（1948年6月22日中原局致中央电）。1948年6月4日，邓刘致电军委，报告四月份中原野战军兵力统计：一、三、六纵队及野直共六万二千一百零八人，地方武装桐柏、鄂豫、皖西、江汉、豫皖苏五个军区共十三万五千七百四十五人，总计十九万七千八百五十三人（不含陈谢集团第四、九纵队与豫西、陕南军区）。1948年8约，中原野战军第一纵队3个旅，第二纵队2个旅，第三纵队3个旅，第四纵队4个旅，第六纵队3个旅，第九纵队2个旅，第十一纵队3个旅，共20个旅、约15万人。1948年9月间，中原军区部队发展到21万人，组成了7个军区、8个独立旅(师)、32个军分区。其中，豫西军区6个军分区，4.8万人；豫皖苏军区1个独立旅、8个军分区，4.9万人；陕南军区1个师、1个独立旅、两个军分区，2.4万人；桐柏军区1个独立旅、4个军分区，2.2万人；江汉军区1个独立旅、4个军分区，2.7万人；皖西军区1个独立旅、3个军分区（另有第四军分区）；鄂豫军区2个教导旅、5个军分区；军分区和县均建立基干团，区建立了区干队，并健全了制度。

1949年2月，中原野战军改为第二野战军。经过整编，二野的总兵力达28万

余人，其中在石家庄接收华北新兵16000人，东北补训师一万人，天津2万俘虏、北平2万俘虏。1949年2月21日，第二野战军与中原军区正式分开，刘伯承、邓小平、邓子恢、张际春、李达、李先念致电二野各兵团、各军、各（二级）军区首长并报军委，通报中原负责人分工和电台联络的有关规定：以刘、邓、张、李专理野战军工作；邓子恢、李先念专理中原军区工作。电台联络规定：各军区行政、作战诸事宜直报军区，非有特殊情形，不与野战军司令部联络；各兵团及各军行政、作战事宜都直向野战军司令部报告，没有特殊情况，不与军区联络；野战军和各军区之间有必要通报，由野战军司令部商同中原军区临时联络。

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均参加了淮海战役，此役中共投入66万官兵加40万地方武装。并在之后共同发起渡江战役，并参加了接管南京、南昌等城市的工作。1949年11月，第二野战军主力在第一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各一部的协同下，向川黔进军，举行了成都战役。1949年9、10月间，进军西南的部队；二野直属部队82331人，第3兵团119364人，第4兵团12万人，第5兵团102357人，西北军区直属部队31577人，第18兵团96368人，共计551997人。

改编

1950年2月22日，西南军区成立，贺龙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下辖西康、川西、川北、川东、川南、云南、贵州、西藏8个军区。同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并入西南军区，撤消兵团和野战军机构。

第二野战军编制

野战军总部

司令员　　　政治委员　　副政治委员　政治部主任　参谋长　　　副参谋长

政委邓小平与总司令刘伯承元帅　宋任穷、张际春　　张际春（兼）　　　李达上将　　曾希圣

中共第二野战军前委委员：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陈赓、李达；书记：邓小平

司令部

作战处处长：姚继明

军政处处长：余非

情报处处长：柴军武

新闻处处长：李永悌

通信处处长：张有年

机要处处长：林桂森

军械处处长：黄以仁

政治部

组织部部长：陈鹤桥

宣传部 部长陈斐琴 副部长王敏昭

新华社二野总分社 社长陈斐琴兼 第一副社长王敏昭兼 第二副社长缪海棱

保卫部部长：卜盛光

民运部部长：李庭桂

联络部部长：杨松青

俘管处处长：袁血卒

编辑出版处处长：胡痴

直属政治处主任：唐济盘

后勤司令部（1949年2月成立） 司令员兼政委：段君毅 副司令员：刘岱峰、姚继鸣兼参谋长 副政治委员：穰明德 政治部主任：邓存伦/卢南樵

供给部部长：刘岱峰兼/李泛山 政委谭映月

卫生部部长：齐仲桓/钱信忠 政治委员：马琮璜

兵站部部长：李静宜 政治委员：萧鹏

运输部部长：何郝炬 政治委员：杨杰

后方总留守处主任：卜盛光

下属部队

兵团/直属　兵团司令　兵团政委　兵团其他领导　下属军
　军长　军政委　军其他领导　下属师

第3兵团　陈锡联上将　谢富治上将　副司令员王近山中将

副司令员杜义德中将

政治部主任阎红彦上将

副参谋长王蕴瑞少将

政治部副主任钟汉华中将

后勤部部长刘清/胥光义

杜义德中将　王维纲　　　副军长范朝利中将

参谋长高厚良少将

政治部主任许梦侠

供给部部长陈三纪

卫生部部长孙毅华　第28师师长陈中民/张奇 政委姚克佑

第29师师长周发田 政委于笑虹

第30师师长马忠全 政委鲁大东

曾绍山中将

鲍先志中将　副军长郑国仲少将

参谋长杨国宇少将

政治部主任刘华清少将、上将/胥治中后勤部部长王子清　　第31师师长赵兰田 政委周维

第32师师长何正文 政委卢南樵

第33师师长童国贵 政委高治国

王近山中将　副军长萧永银少将

副政治委员李震少将

政治部主任李开湘少将后勤部部长王耀显　　　第34师师长尤太忠 政委邵子言/唐平铸

第35师师长李德生 政委李如海

第36师师长邢荣杰 政委刘昌

陈赓大将　　副司令员郭天民上将

副政治委员刘志坚中将

参谋长郭天民兼

政治部主任刘志坚兼

政治部副主任胡荣贵少将

后勤部部长赵炳润

后勤部政治委员杨世荣

周希汉中将　刘有光少将　副军长陈康中将

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廖冠贤少将

后勤部部长任学恭　第37师师长周学义政委雷起云

第38师师长徐其孝政委南静之/张丕绪

第39师师长黎锡福政委侯德才

李成芳中将　雷荣天　　　副军长兼参谋长王启明少将政治部主任朱佩瑄

供给部部长党元成

卫生部部长刘辉儒　第40师师长刘丰政委侯良辅

第41师师长查玉升政委丁荣昌/陈明（后）

第42师师长廖运周政委张子明

秦基伟中将、上将

谷景生少将　副军长刘昌毅中将

参谋长张蕴钰少将

政治部主任余洪远少将

后勤部剖长 胡孝武 第43师师长张显扬政委薛涛

第44师师长兼政委向守志

第45师师长崔建功

第5兵团

杨勇上将

苏振华上将　副政治委员张霖之

政治部主任甘渭汉中将

副参谋长潘焱少将

政治部副主任石新安少将

后勤部部长吴机章　第16军　　　尹先炳

王辉球中将　副政治委员戴润生少将

参谋长杨俊生少将

政治部主任吴实

后勤部部长尹痴生　第46师师长齐丁根政委范阳春

第47师师长李觉/郑统一政委郭强

第48师师长郑统一/王晓（代理）政委李一非/姜思毅

第17军

王秉璋中将　赵健民　　　副政治委员肖元礼少将

参谋长刘星

政治部主任裴志耕少将后勤部部长王耀华　　　第49师师长汪家道政委况玉纯

第50师师长胡华居政委卿正兴

第51师师长闵学胜政委崔子明

第18军

张国华中将

谭冠三中将　副军长昌炳桂

副政治委员王幼平

副政治委员王其梅少将

参谋长陈明义少将

政治部主任郭影秋

后勤部部长夏仲远　第52师师长吴忠政委刘振国

第53师师长金绍山政委王其梅

第54师师长魏洪亮政委罗野岗

直属部队　　第19军

刘金轩中将　张邦英

第二政治委员汪锋　副军长陈先瑞中将

副政治委员李耀中将

参谋长薛克忠少将　第55师

第56师

第58军　　　高树勋/孔庆德中将 方正平中将　副军长杨秀昆

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张力之

参谋长张西三少将　第172师师长杨树根 政委李福尧

第173师师长李定灼政委吴罡

第174师师长何济林

特种兵纵队　李达（兼）　李达（兼）　副司令员孔从洲中将

副政治委员谭善和少将

参谋长赵章成少将/巫金峰

政治部主任张力雄少将　　榴弹炮团

战车队

工兵团

后勤司令部　段君毅　　　段君毅（兼）　　　副司令员 刘岱峰、姚继鸣

副政治委员 穰明德 政治部主任 邓存伦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B6%8A%E6%88%98%E4%BA%8

9

中越战争

1979年中越战争

中越战争（越南称“反中国扩张主义战争”；中国大陆则称“对越自卫反击战”），指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期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之间的战争。起因为中苏交恶、中越两国的领土争议、中国声称越南对中国边境的袭扰，以及越南入侵柬埔寨、推翻了亲华的红色高棉政权。

中越战争期间中方攻入越南北部领土进行反击，声称取得了胜利并迅速撤军为终。开战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短时间内攻下了越南北部20余个重要城市和县镇，一个月之内便声称取得胜利。随后解放军开始对越南北部的基础设施进行系统毁灭后撤出越南。越南人民军在中方撤出之后也宣布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称这场战争为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或对越自卫还击

保卫边疆作战（广义上是指1979年到1989年近十年间的中越边境冲突），中国大陆民间多称这场战争为对越自卫反击战、自卫反击战，部分资料称南疆战争、南疆保卫战或惩越战争。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称这场战争为反中国扩张主义战争、1979年北部边界战争或越中边界战争。

国际上则称这场战争为1979年中越战争。

背景

战前中越关系

法越战争（1945年—1954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有着近似于同盟的关系，双方都反对当时统治越南的法国政权。 在越战（1959年—1975年）期间，中国大陆和苏联都向北越提供了援助，共同对抗美国。

1969年3月中苏爆发珍宝岛冲突，可能引发大规模战争。此后，中国大陆与苏联持续处于敌对状态，而中美关系则开始正常化。1978年6月29日，越南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经济互助委员会。出于牵制中国大陆的目的，1978年11月3日，苏联与越南签订了带有军事援助性质的《苏越友好合作条约》，支持越南在中南半岛的扩张。

1975年越南统一后，越南决定与苏联发展更为亲密的外交关系，从而开始与中国大陆疏远。高层方面，越共中央亲华派如长征、武元甲逐渐不再被重用，以越共中央总书记黎笋为首的亲苏派掌权，而早在1960年越南劳动党三大时党章中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也被删去。

为了制止越南侵略柬埔寨，由华国锋担任主席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于1978年12月7日召开会议通过当时在任的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邓小平建议，并于8日下达了对越作战的决定和命令，命令以昆明军区和广州军区部队以及各大军区抽调部队组成云南边防部队和广西边防部队，攻击大量越南北部城镇，消灭越军在北方的有生力量并以减轻赤柬承受越军入侵的攻击压力。

越南华侨

1975年越南取得越南战争最终胜利统一越南之后，将南方的私人企业收归国有，致使不少华侨华裔财产被没收，并受到残酷的政治压迫，许多平民遭到秘密逮捕和肆意杀害，迫使许多人抛弃财产甚至携家人逃亡。在一些“战略要地”，华人要接受无穷无尽的“忠诚测试”，甚至被驱逐离开越南。越南国内的排华事件频频发生，华侨的正常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直接导致大量越南华裔返回中国。由于无法容忍越南当时这种反华行为，中国一方面对于越南发出谴责，另一方面接收了大量沦为难民的越南华裔。中国以需要安置难民为理由之一减少对越援助，此举亦增加了越方的不满。

联合国难民署估计，1970-1990年代间，逃出越南的船民介于100万至200万之间，其中约20万至40万船民被海盗杀害或者葬身怒海。1975年至2005年，香港共接收了23万多名越南难民和船民，其中14多万名越南难民移居海外，遣返6.7万多名越南船民并永久安置了近1.6万名越南难民。1978年到达香港的难民中大约有六到七成是越南华人。1979年，华人难民的比例已接近80％。

南海诸岛领土纠纷

现中越双方的陆地疆界长达1300公里。1885年前，中越属于宗藩关系，并未划定准确的陆地边境线，仅以地理习惯划分管辖区域。但中法战争后中国将越南的宗主权转于法国，这使中越陆地边境线必须明确化。在随后中法陆地划界中部分战前属于越南管辖的区域被归入中国，这成为中越两国陆地领土纠纷的源头。至于南海诸岛，当时中法均认为不属于越南（法方认为是无主岛屿），两国划界时未涉及。中国虽然宣称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但此后长期并无完全实际控制。

1940年，日本帝国乘二战欧洲战场法国被纳粹德国击败之机会将法国驱逐，将南海诸岛归入日属台湾管辖。二战结束后，中国于1946年收复南海诸岛。1954年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之后，越南分裂。当时南方西贡政府声称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并派兵占领西沙、南沙部分岛屿。

1974年西沙海战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西沙群岛控制权。1975年，越南统一，河内政府接收原西贡政府控制下的南海岛屿，其对南海诸岛的归属权的官方立场亦开始改变。1978年9月起，中越双方开始相互指责对方军队

越界。

越南入侵柬埔寨

虽然越南和红色高棉曾经有过合作，但是当柬埔寨共产党总书记波尔布特建立民主柬埔寨政权后，自称信仰毛泽东思想，开始实施整肃与屠杀，其执政期间，红色高棉试图逐步将柬埔寨改造为不分任何阶级的社会，将所有城市居民强行驱赶至农村，实行恐怖统治和全国大清洗，屠杀平民两百万人。红色高棉的这些作为，遭到世界各国谴责，越南则指责红色高棉政权屠杀居柬的越南人，且入侵越南领土，故两国关系开始恶化。

1978年5月，在巴祝大屠杀发生后，大清洗激发了反波尔布特的起义，被镇压后，流亡者在越南成立了“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领导者是红色高棉曾任师长、省委书记的高层领导人韩桑林。1978年，苏联和越南签订友好同盟条约；同年12月25日，10万经历越战洗礼的越南“志愿军”发动势如破竹的进攻。1978年12月，越军进攻柬埔寨，并于1979年1月7日攻占首都金边，推翻了民主柬埔寨，成立了“柬埔寨人民共和国”。

战争准备

解放军初期攻势

在1978年12月7日，由华国锋担任主席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扩大会议，中国决定对越南诉诸战争。12月8日，中央军事委员会下达战略展开命令，“为了支援柬埔寨人民反对越南侵略扩张的正义斗争，打击越南的反动气焰，牵制越南侵略行动，争取我国边境的和平稳定”，命令广州军区、昆明军区的参战部队及配属部队，从秘密机动转为公开集结，迅速将乙种部队补充人员、装备扩编为战时甲种部队，尔后向指定地点开进集结，至1979年1月10日前完成一切战斗准备工作，等待中央军委的命令执行对越机动作战任务。预计在东西两线集结6个野战军，以越北边境浅近纵深的县级城镇为目标，“用3-5天时间歼灭越军1-2个师，速战速决，震慑越南的气焰”。同时，为防止苏联在北方可能采取的武力援越行动，与苏联、蒙古接壤的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兰州军区及新疆军区均进入临战状态，这四大军区的乙种步兵师补充人员装备扩编为战时甲种师，各野战军离开营区进入野战地域。

越南在1978年12月25日发动大规模侵柬战争后，中共中央军委于12月31日再次召开作战会议，决定扩大对越作战规模，全线增加3个野战军投入作战，将进攻目标由边境县级城镇升级到省会城市，时间延长到15-20天，歼灭越军3-5个师，加大对越南的有限惩罚力度。广州军区和昆明军区奉命重新制订作战计划，调整兵力火力部署，所属参战部队于1979年2月15日前完成了一切作战准备工作。东西两线的7个野战军另2个军区独立师、2个地面炮兵师、3个高射炮兵师、2个铁道兵师、2个通信团、2个防化团、空军航空兵13个师加3个独立团另10个大队全部进入待命地点（开战后又相继加入2个野战军的7个步兵师）。（另空军航空兵奉命出动各种飞机700余架，在中越边境地区加强巡逻警戒，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一般情况下不进入越南境内作战，同时积极做好支援地面部队作战的准备；空军高炮和地空导弹部队也同时完成战术部署，担负中国境内的机场对空保卫任务；海军

南海舰队组建了一支代号为217的合成舰艇编队，在川岛以西各港口集结各型舰艇120余艘和海军航空兵作战飞机170余架待命，随时准备打击苏越入侵西沙群岛，以及破坏中国海上钻井平台，空袭中国沿海港口和重要设施的行动。）

昆明军区临阵易帅，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与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对调职务。1979年1月7日中午，杨得志飞抵昆明上任，与王必成进行了工作交接。当天下午，杨得志就飞去了设在开远的昆明军区前进指挥部视察，听取了前指领导关于作战准备情况的汇报。在昆明军区的40多天里，他做了大量的战役准备工作，开战后又在开远前指日夜关注战局，运筹兵力调配，实施各种指挥。2月25日夜，杨得志突发急病，26日即被专机秘密接回北京治疗。昆明军区副司令张铚秀被任命为代理司令员，与军区第一政委刘志坚、副司令员查玉升等人继续指挥西线的对越作战。

1979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军委下达《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命令》，决定于2月17日拂晓，从广西、云南方向同时发起对越自卫还击作战。1979年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访问记《是可忍，孰不可忍——来自中越边境的报告》，实际上是对全世界宣布了中国的最后抉择。

对于本次战争的起因，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表示：

“越南政权三番四次挑起边界事端，严重地骚扰了中国边民的日常生活和生

产活动，中国一再发出警告，越方却置若罔闻，一意孤行，中国政府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发动边界自卫反击战，对越南实行惩罚。”

而越南的河内之声广播电台，则指责“北京扩张主义集团”，称：

“北寇（指位于越南北方的中国）妄图侵占邻邦的领土，以遂其称霸亚洲的狂妄野心，（越南共产党）党中央和政府号召全体军民再次奋起反抗外族侵略。”

中方作战计划

战争分别由中国的西线云南省和东线广西壮族自治区两个作战方向，分为三个阶段进行。云南方向作战先期由杨得志，后期由张铚秀指挥；广西方向作战由当时的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指挥。总共动用了9个军29个步兵师（分别为：陆军第11军、第13军、第14军、第41军、第42军、第43军、第50军、第54军、第55军及第20军第58师、广西军区独立师、云南省军区独立师、广西军区2个边防团另1个边防营、云南省军区4个边防团另3个边防营）、2个炮兵师（炮1师、炮4师）、3个高炮师（高炮65师、高炮70师、高炮72师），以及铁道兵、工程兵、通信兵等兵种部队，约22万人，在约500公里的战线上对越南发动了突袭。

越军以一线的6个步兵师（第3、345、346、316A、338、325B师）、10余个地方团、20余个独立营及4个炮兵团应战，后期又陆续加入步兵327、337师和若干独立团、独立营、特工营、炮兵、工兵、通信等单位，参战正规军在10万人左右，此外还有数量庞大的武装民兵配合作战。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部署：以第41军、第42军、第43军、第54军、第55军和第50军（欠第149师）为东线兵团，由许世友指挥，从广西方向出击；以第11军、第13军、14军和第50军第149师为西线兵团，由杨得志、张铚秀指挥，从云南方向出击。

过程

第一阶段：1979年2月17日－1979年2月26日

1979年2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线4个军及大量配属保障部队近12万人在许世友指挥下分14路进入越南境内。3小时后，北集团突破莫隆，歼敌独立营，向通农县前进。41军122师从广西平孟方向攻击朔江，41军123师368团从靖西方向进攻茶岭，42军125师从广西水口关方向进攻复和。同日，西线3个军及配属保障部队10余万人在杨得志指挥下，从云南边境的三个方向攻入越南。战争正式爆发。当日，东线41军从那坡、靖西出击。121师向班庄、123师主力向扣屯方向实施长途穿插作战，123师368团向茶灵方向实施牵制性攻击。122师从平孟、孟麻出击，包围朔江地区的越军。42军从龙州出击。126师配属43军坦克团从布局关出击，大出越军意料，迅速占领东溪，打开了突破口。124师随其后进入战斗，沿4号公路直插高平，125师进攻复和。129师当日攻占班腮和靠矛山地区。55军向同登、坂然进攻。43军主力从爱店出击，进攻禄平。广西军区独立师攻占越南广宁省保肯、比劳地区。同日凌晨，西线第11军从云南金平县出击，攻占越军第一线据点西罗楼、巴楠棍、布多等地。13军偷渡红河后出动炮兵群炮击谷柳外围诸点，突破越军第一线防御。14军向老街、班菲、拔坡、班老、孟康、发隆同时发起攻击。

2月18日，东线41军121师继续向班庄穿插，122师与朔江越军激战，123师主力继续向扣屯穿插，123师368团攻占了八达岭和八姑岭。42军124师夺取了弄梅隧道。55军164师攻占坂然，163、165师继续围攻同登越军。越军向探垄发动了团级规模反击，被163师488团击退。127师攻占支马、龙头地区，128师攻占长条山。西线13军37师攻占谷柳后山以北地区，38师歼灭坝洒地区越军，39师进攻岳山和谷珊西山的越军。14军进攻红河东岸的越军，40师主力攻占老街周围各个要点，41师攻占猛康、发隆外围阵地，42师歼灭了拔坡、班老地区的越军。军攻歼了封土当面巴南棍、老虎充、麻栗坡一线阵地的越军。

2月19日，东线41军121师插到班庄，122师部队突袭并占领了河广县长白山。42军穿插高平，124师攻占博山，125师攻占复和。54军162师从水口出境作战，接替125师继续进攻复和。43军转入巩固已占领地区。西线13军37师发动夜袭攻克谷柳、保胜，39师攻占了岳山防线。14军40师攻占越南黄连山省省会老街市，41师攻占孟康。同日55军163师开始攻击同登地区的鬼屯炮台、339高地和探某地区，同时展开对占领地区残余越军的清剿。

2月20日，东线41军123师1个营插到扣屯，122师继续向朔江突击，42军124师推进到高平外围，54军162师在平江上架桥成功。55军继续围攻防守鬼屯炮台、339高地和探某的越军。西线13军进抵北瓜姚、登朱、登尚一线，14军全歼发隆地区之越军。

2月21日，东线42军扫清了高平外围的主要据点，55军攻占了鬼屯炮台。2

月22日，东线41军122师占领高平省河广县县城朔江，123师攻占了河安。西线13军39师一部抢占代乃，切断了10号公路。11军31师一部插到巴沙山口侧后，切成了攻击山口的有利态势。

2月23日，东线55军攻歼了探某、339高地的越军，全部攻占了同登，全歼越军第3师12团主力。西线11军攻占巴沙山口，13军37师、38师分两路对甘棠构成钳形攻势，39师坚守代乃阻击越军增援甘棠，越军316A师发动多次猛烈进攻，无法突破解放军防线。14军40师主力进攻龙徽、朗忠等地，41军向郭参穿插，42师攻占班甘以东地区。

2月24日，东线42军占领越南高平省省会高平市。西线14军40师抢占朗洋，攻克班罗，41师进至东家。

2月25日，东线41军、42军开始对高平地区残敌进行清剿。西线13军攻占黄连山省重镇甘棠。

第二阶段：1979年2月27日－1979年3月5日

2月27日，东线55军从多个方向猛攻谅山市，经过2天战斗基本扫除了外围的防守越军，直逼谅山市区。西线50军149师也分多路向沙巴越军发起穿插进攻，双方沿10号公路南北地区持续激战。

3月1日9时30分，东线55军集中了19个炮兵营的306门火炮，对谅山市内33

个重要目标进行了猛烈的火力急袭。30分钟内发射炮弹9900多发，谅山市区的军营、火车站、汽车站、发电厂、邮电大楼、省府大楼、市府大楼、公安厅、国际旅行社等主要建筑物、军政设施被打得千疮百孔，谅山对外的通信中断、交通中断、供电中断，整个城市陷于瘫痪。越军一不明单位用无线电明话向河内总参报告说："敌人从上午8时30分（河内时间比北京时间晚1个小时）开始炮击，火力非常厉害，简直不可想象，炮声隆隆，从未见过这样猛烈的炮火，炮弹一直不停地轰，数不清有多少发，所有的道路都被他们封锁了，我们简直无法抵挡，要撤退只有爬山。"炮击停止后，中国军队向谅山市区发起猛攻，战至3月2日中午12时，全部攻占了谅山北市区。3月2日，54军162师攻占越南高平省广渊。

3月3日，东线广西军区独立师攻歼了广宁省横模地区越军。西线11军31师攻占封土，50军149师占领越南黄连山省重要避暑胜地沙坝，14军攻占铺楼、郭参。东线，42军124师攻占茶岭，54军161师攻占脱朗。

3月4日，东线55军打过淇穷江，当天攻占谅山南市区，最远向淇穷江以南推进了5公里，与攻占迷迈山的43军127师共同形成了威逼河内的态势。

3月5日，东线42军126师攻占下琅，广西军区独立师攻占广宁省高巴岭。当日晚，中国宣布已达到惩罚作战目的，开始从越南撤军。晚几个小时后，越南宣布全国总动员令，表示要抵抗到底。

第三阶段：1979年3月6日－1979年3月16日

从3月6日起，中国军队以交替掩护，边清剿边撤退的方式，开始撤退。此期间中国军队将大量民生工矿物资运回国（其中包括大量中国无偿支援越南的物资）。

在撤军过程中，中国军队有计划地摧毁了越北地区的大量越南军政设施，以破坏其战争潜力。3月12日，东线谅山方向中国军队率先完成撤军。3月13日，西线云南方向的中国军队全部撤回了国境线以内。东线高平方向的中国军队继续回撤，并在撤退路线上铺设地雷，以远程炮火掩护撤军，导致越军无法发动大规模追击行动。3月16日22时20分，最后一辆军车回到中国领土，东线中国军队完成撤军。同日，中国宣布完成撤军行动，战争结束。5月30日，东线以许世友为总指挥的广州军区前进指挥部从南宁班师回到广州。

中国官方未发表伤亡人数。越南官方亦未正式发表伤亡人数，仅于官方《人民报》上罗列了中国军队在撤退时对攻占过的城镇做出大规模破坏的项目，包括基础设施和矿厂等。

广西方向参战部队序列

广州军区前指

独立坦克团 工兵第13团 舟桥第84团 防化第22团 通信团

陆军第41军

结果与影响

双方伤亡

根据后来昆明军区后勤部编写的《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工作总结》，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广西、云南参战的解放军、支前民兵共6,954人牺牲，14,800多人受伤；2月17日至2月27日越军约15,000人死亡，2月28日至3月16日越军约37,000人死亡，预计越方总死亡人数共超过80,000人。

遣返战俘

为推动中越政府副外长级谈判，1979年5月21日中国政府委托中国红十字会在友谊关至同登公路零公里处单方面释放首批越南被俘伤病员120人，将《交接越方被俘武装人员名册》一份和《俘虏残废证明书》四十一份交给越南红十字会代表团。越南红十字会代表团将定于今天释放的四十三名《被俘的中国士兵和伤病员名单》（越文）一份，交给我方红十字会代表团。释放时，中方用十多辆救护车和客车把这批越方被俘武装人员伤病员从开到凭祥市隘口车站的柳州铁路局铁路卫生专列上接运到友谊关口，遣返的越方被俘武装人员下车后，十二时四十分步行或用担架抬至零公里处，由越南红十字会代表团接收。越方红十字会代表在交接书上签了名。应中国红十字会的邀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多米尼克·保海尔今天到零公里处现场，观看了交接过程。释放越方被俘武装人员后，中方红十字会代表接收了越方释放的被俘中国伤病人员四十三名。中方驻友谊关边防部队在零公里我方一侧公路地段，进行了排雷和撤除障碍物，保证双方遣俘时，获释的被俘人员和红十字会代表在我方一侧的安全。5月22日中越双方红十会代表团在友谊关举行第一次会谈，就释放第二批战俘、举行第二轮会谈的时间、内容达成协议。5月26日双方红十字会举行第二轮会谈。

对中国大陆的影响

短短一个月的战争，中方伤亡人数达到2-3万人，并直接造成经济损失约35亿人民币，导致当年（1979年）经济计划未能按时完成。但是透过中越战争，中国大陆达到了预期的惩罚性作战目的，摧毁了越南北部的工矿业。打乱了苏联-越南的战略部署。透过十年边境轮战（两山战役），解放军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指挥人才，锻炼了部队的作战能力。同时，这场战争中国军队也吸取了诸多教训：因为长期没有战斗，解放军部分军官军事技能不强，在作战时指挥不力；59、62式坦克在战斗中被击中损失数量极多，56式半自动步枪在丛林战和近战中火力不如越军装备强大；没有军衔制导致部队打散临时拼建时不能迅速确定指挥关系；缺少输送步兵的装甲运兵车，使得步兵不得不搭载坦克行进，易受攻击等问题都在战争中暴露出来，为解放军现代化建设探明了道路。

对越南的影响

对越南方面来说战争的伤害是持久的。中国军队在撤退回中国的过程中运走了大量越南公私部门物资，包括大批此前援助越南的物资，并对越南的村庄、公路、铁路施行完整且有系统的破坏，迫使越南保持相当大规模的陆军（共120万），对越南国内经济造成了拖累。越南记录的损失包括了428家医院、735所学校、8万顷农田被毁和40万头牛被抢走或杀掉。[30]据《对越战争亲历记》中的夸张描述“连越南的牛见了163师的官兵都跑得远远的。”有数千平民遇害 。伤亡严重的原因，据当年老兵记载：中国军队撤退时，无数越南男女军人，伪装成无武装的越南百姓，对解放军进行不

间断的偷袭，导致中国军队分辨不出是普通百姓还是反击越军，造成大量误伤，这反而造成了越南百姓更加仇恨华人。这场战争加剧了越南对在越华裔的歧视，许多人被迫移民。他们之中很多人被迫成为难民逃难，部分逃难到香港，而最终移居到澳洲、欧洲或北美的其他华裔社区，其余大部分华裔回到中国大陆境内定居。大约八万汉族以及苗族被从越南北部强制驱离到越南南部。

战后因受战争影响，加之黄文欢出走北京，越南共产党开始了对党内亲华派的清洗，估计共有20468名越共党员受牵连而被开除党籍。

世界各国态度

1979年2月22日，新华社汇总了各国对中越战争的态度：

世界各国的态度

态度	国家
谴责中国，支持越南，并要中国撤军及停火	苏联、 古巴、 波兰、 东德、 捷克斯洛伐克、 匈牙利、 保加利亚、 阿尔巴尼亚、 蒙古人民共和国、 阿富汗、 南也门、 埃塞俄比亚、 安哥拉、 莫桑比克、 贝宁、 刚果人民共和国和 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包括了苏联及其大部分卫星国。
对中国表示遗憾，要中国撤军	老挝、 印度
反对中国及越南的军事行动	瑞典、 加拿大、 新西兰

要求中国从越南撤军、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日本、 泰国、 马来西亚、 新加坡、 印尼、 菲律宾、 伊拉克、 北也门、 芬兰、 挪威、 英国、 荷兰、 意大利、 南斯拉夫、 罗马尼亚、 美国、 澳大利亚

对中国和越南都表示遗憾、希望越南和柬埔寨都能支配自己命运　　西德、 奥地利、 瑞士、 比利时、 卢森堡、 法国、 爱尔兰、 西班牙、 希腊

呼吁谈判解决问题　孟加拉国、 塞浦路斯、 丹麦、 冰岛、 埃及、 利比亚、 马里、 马达加斯加

公开声明不表态　　葡萄牙

仅谴责越南　朝鲜

支持中国，谴责越南　　民主柬埔寨

后续

中越十年边境冲突

中国军队撤军后，越南军队又相继占领了中越边境许多骑线点，并占领了老山、者阴山等地区，在中国边境频繁活动。1979年中越战争结束后，越南和中国又在中越边境发生了数千次的冲突，均以中国军队获胜为结，越军伤亡1800余人。1980年10月至1981年5月，昆明军区司令员张铚秀奉命率领昆明军区军队对占领云南省罗家坪大山和扣林山的越军进行攻击，中国军队占领罗家坪大山和扣林山，越军200余名士兵死亡。此后，中国方面又经过精心的准备，于1984年4月发动了争夺老山和者阴山的两山战役，经过三年的反复战斗，中国军队获得战争胜利，并最终收复这两个地区，包括一些山峰。

中越关系正常化

1986年，越共中央总书记黎笋去世，长征接任总书记重新掌权，面对战略失误导致的严峻社会经济危机和孤立的国际环境，越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新的发展路线和战略方向。1989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中越边境的战事终于逐渐结束。1990年北京亚运会召开，越南部长会议副主席武元甲大将作为越南政府代表出席亚运会。1991年苏联解体，越南失去支持，并被国际孤立；中国大陆在1989年六四事件后被国际制裁，与美国关系降至冰点。1990年9月，越共中央总书记阮文灵和部长会议主席杜梅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成都，与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国务院总理李鹏就中越关系和柬埔寨问题进行会谈。1991年11月，越共中央总书记杜梅和越南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正式访中，会见了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国务院总理李鹏。两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中越关系实现正常化，结束了长达13年之久的两国关系对立状态。两国政府很少提及当年的军事冲突。今天越南仍然维持着庞大的陆军。

在经过多年谈判之后，中国和越南先后签署了陆地边界条约以及北部湾海上边界协定，勘定了两国的陆地和部分海上边界。但两国在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海上边界争议仍然没有解决。直到现在，越南和中国仍然持续在其占领的南海岛礁上填海造地，并时常发生海上争端。

英国BBC根据史料推算，中国军队伤亡大约27000人，越军伤亡大约80000人。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ino-Vietnamese_War

（选摘）

中越战争

1978年，越南入侵柬埔寨，推翻了人类历史上最残暴的政权之一、红色高棉政府。1979年初，支持红色高棉的中国政府对越南发动了进攻，爆发了中越战争。在印度支那战争的最后这一场战争中，中国和越南都声称取得了胜利。

中国军队进入越南北部并占领了边境附近的几个城市。1979 年 3 月 6 日，中国宣布打开河内的大门，他们的惩罚任务已经完成。中国军队随后撤出越南。由于越南军队一直留在柬埔寨直到 1989 年，中国试图阻止越南干预柬埔寨的目标没有成功。继苏联1991年解体，中越边境安定下来。尽管无法阻止越南将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赶出柬埔寨，但中国证明了其冷战时代的共产主义对手苏联，无法保护其越南盟友。

名称

中越战争也称为第三次印度支那战争，以区别于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和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在越南，这场冲突被称为反对中国扩张主义的战争。在中国，这场战争被称为对越自卫反击战。

=====

1945 年 9 月 14 日，中国国民党军队进入该国，在北纬16 度线以北解除日本军队的武装。这条线将印度支那划分为中国和英国的控制区。由于没有足够的英国军队立即可用，英国人在南部登陆，重新武装了一小部分被拘留的法国军队以及部分投降的日本军队，以帮助收复越南南部。

在苏联的敦促下，胡志明最初试图与法国人谈判；法国人正在慢慢重新建立对该地区的控制，尽管在敌对行动停止之前仍处于英国控制之下。一旦敌对行动结束，英国将领土移交给法国。1946年3月6日，中国国民党政府签署了一项协议，允许法国军队取代国民党中国军队，以换取法国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为法国联盟内的"自由"共和国，具体内容包括由未来协商确定。英国军队于 1946 年 3 月 26 日撤离，越南由法国控制。法国人于 1946 年 3 月登陆河内，并于同年 11 月将胡志明的越盟赶出该市。此后不久，越盟开始了对法国联盟军队的游击战，开始了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

1858 年，越南首先成为法国的殖民地。到 1880 年代，法国将其在东南亚的势力范围扩大到包括整个越南，到 1893 年老挝和柬埔寨也成为法国的

殖民地。反抗法国殖民势力的叛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很常见。欧洲战争激起了东南亚的革命情绪，具有独立思想的民众聚集在胡志明等革命者的身边，其中包括保皇党。

在袭击珍珠港之前，日本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但将民政事务交给了维希法国政府。1945年3月9日，日本担心维希法国人即将转向支持盟国，推翻了维希政府和控制印度支那的军队，并建立了自己的傀儡政府——越南帝国。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在印度支那造成了权力真空，因为各个政治派别争先恐后地争夺控制权。

导致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的事件存在历史争议。当越盟仓促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时，法国人默许了，等待法国军队返回该地区。中国国民党支持法国恢复治理，但胡志明越盟走向独立的努力受到苏联的支持力量下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苏联起初间接支持越南共产党，但后来直接支持胡志明。尽管如此，在中苏分裂之前，苏联人的支持度仍然不如中国，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成为共产主义越南的主要盟友。

1950-1960年代越南战争本身涉及许多对整个印度支那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举行了两次主要会议以达成一项决议。最后，在 1954 年 7 月 20 日，日内瓦会议达成了一项在中国、俄罗斯和西欧国家的支持下签署的统一国家的政治解决方案。虽然苏联在协议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但它的参与程度又不如中国。美国没有签署该协议并迅速采取行动支持南越（越南共和国）。

中苏分裂

中国共产党和越盟有很长的历史。在与法国的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的初始阶段，新近成立的共产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履行俄罗斯扩大共产主义的使命。因此，他们帮助了越盟，成为了连接苏维埃和越盟的纽带。1950年初，越盟脱离中国军事顾问团独立作战。这也是中国削减对越盟军备支持的原因之一。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苏中关系开始恶化。毛泽东认为，1956年2月，苏联新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在谴责斯大林的秘密讲话中犯了严重错误，批评了苏联对马列主义的解释，特别是赫鲁晓夫对关于苏联与西方和平共处的支持及其解释。这导致了日益敌对的关系，最终导致中苏分裂。从这里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在帮助他们的前盟友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因为越盟不支持中国对抗苏联。

随着1956 年至 1966 年中苏分裂导致苏中关系恶化，多达 150 万中国军队驻扎在中苏边境，准备对苏联进行全面战争。

继毛泽东于1976年9月去世，四人帮被推翻和邓小平上台，中国领导层将改变自己的立场，进行市场经济改革，声讨文革，并与美国合作、共同针对苏联。

越南战争

随着法国于 1954 年底从暂时分裂的越南撤出，由于多米诺骨牌理论，美国越来越多地介入支持南越领导人，该理论认为，如果一个国家转向共产主义，周边国家很可能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并成为共产主义者。苏联和北越成为重要的盟友，因为如果南越成功地被北越接管，那么远东的共产主义就会巩固其战略地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眼中，苏越关系的发展令人不安；他们害怕遭到不太友好的苏联势力范围的包围。

美国和苏联未能就 1956 年旨在统一分裂的越南的拟议选举计划达成一致。相反，南方举行了一场被广泛认为是欺诈的单独选举，导致与越共领导的共产主义派系的持续内部冲突在 1950 年代后期加剧。在苏联的补给和支持下，北越军队于1959 年直接参与了正在进行的游击战争，并于 1964 年公开入侵南方。

在此期间，美国在支持南越方面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美国在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中支持法国军队，在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初期向南越派遣补给和军事顾问，并最终在 1960 年代中期接管了与北越和越共的大部分战斗。到 1968 年，超过 500,000 名美国军队参与了越南战争。由于缺乏明显的军事成功以及美国对战争的日益强烈反对，美国军队于 1969 年开始缓慢撤离，同时试图加强南越军队，以便他们能够接管战斗。根据巴黎和平协定，到 1973 年 3 月 29 日，所有美国作战部队都已离开南越，但允许北越作战部队留在原地。北越在1975年初袭击南越；南越在1975年4月30被征服。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 1970 年代初期开始与美国进行会谈，最终与亨利·基

辛格和后来的理查德·尼克松进行了高层会谈。这些会议有助于中国重新调整对美外交政策。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支持柬埔寨的红色高棉。

柬埔寨

虽然越南共产党和红色高棉以前有合作的关系，但是，当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掌权以后，越南与柬埔寨的关系恶化。波尔布特于1975年4月17日建立民主柬埔寨政府。

自从毛主义的波尔布特在与柬埔寨的朗诺政权进行内战的时期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支持毛主义的红色高棉；红色高棉1975年成功推翻了朗诺政权。中国在红色高棉统治期间为红色高棉提供了广泛的政治、后勤和军事支持。

在越南柬埔寨边界发生多次冲突之后 1978 年 12 月 25 日，在越南和柬埔寨之间的冲突中，在逃离东区清洗的红色高棉叛逃者的鼓励下，越南入侵柬埔寨。到 1979 年 1 月 7 日，越南军队进入金边，红色高棉领导人逃往柬埔寨西部。

少数民族

在越南境内的FULRO叛乱期间，中国支持越南国内的、主要由越南国内少数民族组成的“被压迫民族统一战线”反对越南的政府。

越南人处决了为中国人工作的合作者，不分种族。

中国攻击越南

现在，在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正在开始经济改革和开放与西方的贸易，反过来，对苏联越来越挑衅。1978年11月3日，苏联和越南签署了为期25年的共同防御条约，使越南成为苏联“遏制中国”的“关键”。然而，不久之后，苏联就从公开的针对中国的敌意转向了与中国的关系更加正常化。

1979年1月1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第一次访问美国，对美国总统吉米卡特说：“小朋友不听话，该打打屁股了。” 2月15日，邓小平宣布中国计划对越南进行有限的进攻。

中国列举了攻击的原因，是为了支持中国的盟友、柬埔寨红色高棉，以及越南虐待中国的少数民族，和越南占领南沙群岛（中国称那里是属于中国的土地）。为了防止苏联为越南进行干预，邓第二天警告莫斯科，中国准备对苏联进行全面战争。为准备这场冲突，中国将中苏边境沿线的所有军队置于紧急战争戒备状态，在新疆设立了新的军事指挥部，甚至从中苏边境撤离了约30万平民。此外，中国的大部分现役部队（多达 150 万军队）都驻扎在中国与苏联的边界沿线。

战斗顺序

中国军队

尽管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人数远远超过越南军队，但苏越联盟迫使中国将大部分军队部署在中国与苏联接壤的北部边境（以及在较小程度上与苏联结盟的蒙古），以进行对苏联干预的威慑。

与越南交战的中国军队由昆明军区、成都军区、武汉军区和广州军区的部队组成，但由西部战线的昆明军区和东部战线的广州军区指挥部指挥。

战争准备

据越南称，自 1979 年 1 月以来，中国军队进行了多次越境侦察活动，并在越南土地上进行了 230 次侵犯。为应对中国可能的入侵，越南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所有武装部队处于待命状态。

中国开战

1979年2月17日，中国20万军队进入越南北部，这是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以来的人民解放军第一次重大作战行动。

解放军入侵是在两个方向进行的：西部和东部

西向，由许世友指挥，旨在进攻高平、谅山和广宁

东向，由杨得志指挥，攻打河屯、黄连山、荔洲省

越南人的反击

越南迅速将其在柬埔寨、越南南部和越南中部的所有主力部队调动到北部边境。2月18日至25日，第3军区第327步兵师和第4军区第337步兵师出动，加入第1军区，保卫西北地区。3月6日至11日，驻扎在柬埔寨的第二军被部署回河内。

越南中部的第 372 航空师以及越南南部的第 917、935 和 937 航空团迅速部署到北部。

苏联对越南的支持

苏联虽然没有直接采取军事行动，但为越南提供了情报和装备支持。苏联进行了一个大型空运行动，将越南军队从柬埔寨运送到越南北部。莫斯科还总共提供了400辆坦克和装甲运兵车（APC）、500门迫击炮和防空大炮、50架BM-21火箭发射器、400枚便携式地对空导弹、800枚反坦克导弹和20架喷气式战斗机。1979 年约有 5,000 至 8,000 名苏联军事顾问在越南训练越南士兵。

中越战争期间，苏联在中苏边境和蒙中边境部署军队，作为对越南的支持和束缚中国军队的行为。然而，苏联拒绝采取任何直接行动来保卫他们的盟友。

苏联的太平洋舰队还部署了15艘军舰在越南海岸，把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的通信内容传送给越南军队指挥部。

苏联的不作为

苏联在向越南部署军舰、提供物资的同时，他们觉得根本没有办法直接支持越南对抗中国；距离太远，无法成为有效的盟友，任何形式的增援都必须穿越中国或美国盟友控制的领土。唯一现实的选择是重启与中国未解决的边界冲突。越南对苏联政策很重要，但还不足以让苏联人为之开战。在莫斯科没有干预的情况下，北京公开宣称苏联违背了援助越南的无数承诺。

莫斯科不干预的另一个原因是北京向莫斯科和华盛顿承诺，入侵只是一场有限的战争，中国军队将在短暂入侵后撤退。在美国缓和之后，莫斯科决定采取"观望"的方式，看看北京是否真的会限制他们的进攻。邓小平，因为越南的防空能力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为了让莫斯科放心，它正在进行一场有限的战争，下令中国海军和空军不参加战争；空军只提供了有限的支持。当北京信守诺言时，莫斯科没有进行报复。

战斗

中国坦克在曹邦被毁

解放军迅速推进约 15 至 20 公里进入越南，战斗主要发生在高平省、老街省和谅山省。越南人避免动员他们的正规师，并组织了大约 300,000 名士兵来保卫河内。越南人民军（VPA）试图避免直接打击，并经常使用游击战术。

解放军最初的进攻很快就失去了动力；新的进攻浪潮来自刚加入战斗的八个解放军师。在占领了谅山上方的北部高地后，解放军包围并停在城市前，以引诱越南人民军用来自柬埔寨的部队加强它。这是中国战争计划中的主要战略策略，因为邓不想冒险与苏联的紧张局势升级。经过三天的挨家挨户的血腥战斗，谅山于 3 月 6 日沦陷。解放军随后占领了谅山上方的南部高地并占领了萨霸。中国声称已经粉碎了几个 VPA 正规部队。

中国撤军

3月6日，中国宣布通往河内的大门已打开，他们的惩罚任务已经完成。在返回中国边境的途中，解放军摧毁了当地所有基础设施和住房，掠夺了所有有用的设备和资源（包括牲畜），严重削弱了越南最北部省份的经济。解放军于3月16日越境返回中国。双方宣布胜利，中国声称击溃了越南的抵抗，而越南则声称主要使用边境民兵击退了入侵。美国海军分析中心的研究科学家亨利·J·肯尼指出，大多数西方观察家都认为越南在战场上的表现优于中国解放军。

后果

中国和越南各自损失了数千名士兵，中国损失了 34.5 亿元的管理费用，延迟了他们 1979-80 年经济计划的完成。

战后，越南领导人采取了各种镇压措施来解决实际或潜在的“亲华分子”的问题。1979 年春，当局将约 8,000 名华族人从河内驱逐到南部“新经济区”，并部分安置了来自最北部省份的苗族部落和其他少数民族。为回应黄文焕的叛逃，越南共产党发动了一场清洗运动；亲华分子和在战争期间向前进的中国军队投降的人，都受到残酷清洗。1979年，共有20468名党员被开除越南共产党党籍。

尽管越南继续占领柬埔寨，但中国通过承诺保护泰国和新加坡、反对“越南侵略”，而改善了与东盟的关系。相比之下，越南在该地区的威望下降，导致它更加依赖苏联；苏联在金兰湾租用了一个海军基地。

2005年3月1日，霍华德·W·弗兰奇在《纽约时报》上写道： 一些历史学家称“战争是由邓小平先生（中国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发动的，目的是在巩固权力的同时保持军队的注意力。 ..”

中国伤亡

战争期间的伤亡人数是有争议的。越南消息人士称，解放军共伤亡 62,500 人，其中包括 550 辆军车和 115 门大炮；而中国民主活动家魏京生在1980年告诉西方媒体，中国军队在战争中死亡9000人，受伤约10000人。中国军方泄密的消息表明，中国有 6,954 人死亡。

越南人伤亡

与中国同行一样，越南政府从未正式公布任何有关其实际军事伤亡的信息。中国估计越南在战争期间损失了 57,000 名士兵和 70,000 名民兵。官方《人民报》声称，越南在中国入侵期间超过 100,000 名平民死亡；并报告了工业和农业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统计数据。

囚犯

中国关押了1636名越南战俘，越南关押了238名中国战俘；他们于 1979 年 5 月至 6 月进行了交换。

238名中国士兵在撤出越南期间与主力部队分离并被越南人包围后投降。投降后，他们被越南士兵转移到监狱。中国囚犯报告说，他们遭受了酷刑和不人道的待遇，例如被蒙上眼睛，身体被金属丝捆绑和束缚。

战后中越关系

边界小冲突在 1980 年代一直持续，包括 1984 年 4 月的一次重大冲突和 1988 年在南沙群岛上空的海战，称为约翰逊南礁小冲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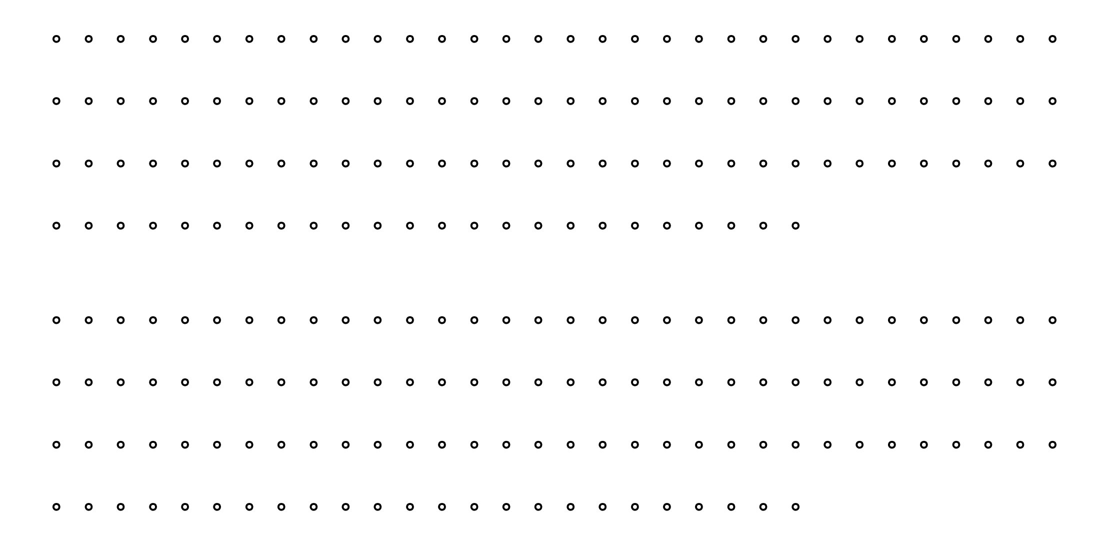
1989 年越南同意完全撤出柬埔寨后，武装冲突才结束。两国于 1990 年 9

月在成都秘密会晤，计划实现关系正常化，并于 1991 年 11 月正式实现关系正常化。

1999年，经过多年谈判，中越两国签署了边界协定。陆地边界发生调整，导致越南将在战斗中失去的部分土地归给中国，包括作为越南与中国传统边界标志和入境点的爱南泉门。这在越南社会引起广泛的不满。越南官方新闻社报道了2001年8月左右新边界的实施。2009年1月，越方副外长武勇和中国副外长武大伟签署了陆地边界最终划定工作。西沙群岛（越南称为“黄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越南称为“张庭选萨群岛”）的岛屿仍是争议的焦点。

2007 年 12 月宣布的河内-昆明高速公路建设计划是中越关系的一个里程碑。这条路将穿越曾经作为战场的边界。预计它将有助于边境地区的非军事化，并促进国家之间的贸易和工业合作。

关于民主与开放



中国共产党的行动与动机

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中国共产党所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最大的动机是，为了扭转经济面临即将崩溃、国家人民处于极度贫困的局面。

当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打倒的时候，当整个中国在文革中已经变得混乱虚弱不堪的时候，环顾世界，中国已经处于人均收入水平在全世界都属于最贫穷的水平线上。相比于周边的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地，中国大陆的经济水平已经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正是在这样的景况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急切地想要进行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从而努力把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上去。

邓小平的贡献是，他正确地带领全党，从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局面转向建设经济的轨道上来。在具体的经济决策上，主要是来自于赵紫阳等一大批经济干部的工作和贡献；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精神，为他们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

然而，邓小平与赵紫阳、胡耀邦等一大批在文革结束以后、1980年代初期崛起的中国共产党改革派干部们深刻不同的是，邓小平从来都仅仅是想要进行经济改革，但却绝不想进行任何政治民主的改革。

邓小平虽然是1980年代以后启动了中国改革开放道路的领军人物，但是，他却与那些聚集在他的麾下的无数改革派政治人士们迥然不同。以胡耀邦、赵紫阳、和他们所代表的一大批现代化改革开放的中国共产党人们，有着一个正常的思维，即，中国的出路，不仅在于经济制度的改革开放，更在于政治制度的改革开放，在于现代民主主义制度的建立、发展和成

熟，在于与世界先进文明体系的接轨与融合。

然而，在邓小平的心中，却根本不是如此。邓小平想要的，仅仅是从实用主义、功利主义角度出发，大力地借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体系，把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迅速地提高上去。可是，邓小平既不真正地明白，西方先进文明的真正力量究竟在于何处；也根本不想要在文明体制层面，谦卑地向西方学习。

从本质上说，邓小平的心中，不仅是诡诈的，而且是自傲、自义的。他以愚妄、蔑视、欺谎的心，来看待世界，看待文明，看待社会、国家、人民、发展等等最深层次的问题。

邓小平的思想，与一百多年前晚清时期的洋务运动是基本上一致的，即，仅仅是在现实面前、用功利主义的心态、同意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但是，却根本不愿意谦卑地、真挚地、认真地、诚实地思考世界、面对文明。

在政治制度层面而言，邓小平从未曾经想过要进行政治民主化的改革。而是，他一直是专制威权主义的热衷拥护者【不论文革前、还是文革以后，都是如此】，他自己更愿意通过推行专制威权主义，而在其中享受权力与私利所带来的各种衍生利益；——尽管，我们也应当公道地说，邓小平在经济改革道路上的贡献是巨大的，并导致了中国在过去四十年以来的经济腾飞。他对于亿万中国人物质生活的改善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不可抹煞的贡献。

而且，我们更应当进一步公道地说，邓小平对于民主政治的反对和排斥，并非是没有道理的。事实上，正是由于清朝灭亡以后，在整个二十世纪上半叶期间的中国混乱动荡、军阀混战、一盘散沙，——才使得中国共产党浑水摸鱼、搅动内战、夺取政权，而且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在整整几代人中，都一直反对、讨厌、排斥民主政治、尤其是以三权分立为特征的议会民主政治。

这里，我们暂且不深谈民主制度本身的要素、条件、前提、环境、挑战、等等（详情请见本书作者所著《论民主》），而仅仅是简单地指出，——虽然，邓小平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民主的反对态度，固然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他们对于民主的一味排斥、拒绝、讨厌的态度，却是谬误的，甚至是愚妄的、罪恶的。

固然，民主绝非是一件一蹴而就、一夜之间就可以实现的事情，但是，拒绝民主、镇压人民、实行专制暴政，却更将要把国家带入更加灾难深重、甚至生灵涂炭的境地。自从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改革开放道路，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在政治体制层面，在政治文明领域，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却不但没有丝毫进步、不但一直在原地踏步、不但专制主义文化甚至愈演愈烈，——而且，对于世界和平与文明发展，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甚至，也将要把中国人民置于被危害之境地，使中国人民在信息闭塞、民族主义、狂妄自傲的道路上狂奔；如果这样发展下去，那么，中国必将重蹈义和团暴乱、慈禧与万国宣战、围攻东交民巷以及一切外国驻华使团、八国联军入华的覆辙。

===

遗憾的是，邓小平在文革以后的崛起，从某种角度而言，其实也是政治权术大师、毛泽东在生前所安排的某种结果【其中的一个关键事件是，毛泽东在1975年批准，邓小平取代了毛泽东的政治奴婢、周恩来而成为了中国治国理政（尤其是在国民经济综合治理方面）的实际第一号人物】。

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长征时期就与毛泽东在政治思想上高度一致。他们二者都认为，不应当盲目学习西方、外国人的教条主义，而是要从实际情况出发、从功利主义角度、采取措施和制定方针政策。但是，邓小平等务实派与毛泽东本人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是彻底的务实主义者、功利主义者、实用主义者，而毛泽东则具有某种程度的理想主义色彩、或空想主义特征。

中共建政以后，文革前，邓小平与刘少奇等人（例如彭真、陶铸、等等）一样，一方面，在名义上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把毛泽东高高地捧上神坛；另一方面，由于毛泽东在大跃进中所犯的愚蠢错误，因此，刘邓等人在实际政治层面夺得了毛泽东的治国理政的实际权力，使毛泽东被架空，其名位变成一种虚名化。

在具体政治道路层面，刘少奇和邓小平其实都类似于百年前清末时代的洋务运动中的实用主义者、功利主义者；他们长于解决治国理政中的各种各样的具体问题，但是，往往没有高屋建瓴、或是哲学思考一般的深邃思想能力；他们在政治体系道路方面，从中国具体国情和民情出发，都在某种程度上倾向于不完全信任人民，倾向于偏爱专制主义、威权主义的政治道路和政治体系。

毛泽东在1949年以后的治国、弄权、御人之术之中，一个最主要的手段就是，在属下之中扶植左右两派，使之互相争夺、争风吃醋，从而自己作为领袖得到稳固的权利地位。毛泽东在大跃进中被冲昏了头脑，犯下了极其愚蠢罪恶的错误，导致了数千万人死亡。此后，虽然毛泽东成功地在庐山会议上清洗了彭德怀、并抬出了另一个愚妄、邪恶、吹嘘、心怀鬼胎的稀有鬼才林彪统治军队，但是，毕竟，大跃进的错误与罪恶实在太大，因而，即使权力如日中天的毛泽东也不得不暂且隐退、让权与刘少奇，并韬光养晦、蓄势待发、准备东山再起。

大约五年之后，1966年的毛泽东，利用刘邓的专制威权主义的政治特征和弱点，通过红卫兵、造反派等大规模群众运动，在林彪军队保驾护航之下，打倒了刘邓，害死了刘少奇，然而却保留了邓小平的性命，为其日后的复出留下了伏笔。

文革末期，由于林彪叛逃、毛泽东在党内的实际威信骤降、文革导致经济面临崩溃局面，因此，在毛泽东面前的、一生的政治奴婢、政治权谋大师、周恩来的举荐下，——毛泽东批准了邓小平的复出。邓小平在短时间内，通过对国民经济的治理整顿，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些都为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上台全面掌权、并把中国带入全面经济改革开放埋下了伏笔。

纵观邓小平一生中的政治起伏，恰恰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邓小平与毛泽东之间，在政治思想上的异同、重合之处、以及分歧之处。

在邓小平与毛泽东之间，他们两者都笃信，所谓中国革命，应当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而不应当盲目地学习西方；应当强调集体主义、威权主义、专制主义、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等等；应当压制、镇压、排斥"议会民主制度"；并且，他们都对于所谓的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抱着极其反对的态度。在政治道路、手段、政策方面，他们都是强烈的务实主义者、实用主义者、功利主义者、唯物主义者。在政治手段上，他们都无所不用其极，奉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但是，在邓小平与毛泽东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不同和分歧。邓小平是一个实干家，对于高屋建瓴的政治理论和抽象概念，并不感兴趣、也不想深究。毛泽东则是一个狂想家、浪漫家、具有着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和空想主义特征，喜欢讨论和辩论那些高屋建瓴的政治理论和抽象概念。

正是由于邓小平与毛泽东之间的深刻相同点，所以，在中共建政以后的七十多年中，虽然可以简单地分为前三十年（闭关锁国）与后四十年（改革开放）的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但是，其专制主义道路、威权主义、极权主义政治治理模式是完全一致的；而在经济体系道路上，前三十年与

后四十年，则存在着天壤之别。

这正是为什么，邓小平能够在文革之后上台、全面执政【毛泽东在逝世前的时候，设立华国锋为接班人，这明显是一种过渡阶段，因为，——华国锋本人并没有任何坚实的政治班底和权力基础，也没有高超的御人之术、权力斗争手段；江青、张春桥等人，虽然在思想舆论领域耕耘多年、并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全国中央委员范围内、享有着很高的威望与声誉，但是，在关键的军队领域，无论是当时的叶剑英、还是陈锡联等实权人物（这也都是出于毛泽东的政治平衡之术、御人之术的高超政治权谋安排的结果），都与邓小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毛泽东生前所留下的政治局面（尽管此时邓小平已经由于1976年四五运动而在其政治生涯中第三次被打倒），使得邓小平能够在1978年完全上台。然而同时，毛泽东所留下的政治局面，又使得邓小平无法彻底推翻毛泽东（不论是由于邓小平自身的威权主义政治思想特征的“内因”，还是由于当时全中国范围内毛主义的余威的“外因”），而只能进行挂羊头卖狗肉的经济体制改革；————这正是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的由来和政治背景】。

====

另外，邓小平在文革以后之所以能够上台，显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表面

原因，即，四人帮的“出人意料”的倒台。在四人帮倒台事件的关键因素中，一个是华国锋本人（作为一个政治老实人）的心狠手辣、坚决果断，更重要的是，汪东兴的“出人意料”的反叛。

从政治思想道路而言，毛泽东更偏爱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洪文等所代表的空想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原教旨主义、阶级斗争理念【顺便说一句，这也正是林彪之所以倒台的一个很重要的导火索因素；——林彪反对张春桥的阶级斗争原教旨主义，因为林彪本人的革命战争的经历，使得林本人明白，文革的混乱斗争是在害国家、而不是有益于国家。——由于林彪试图打击张春桥，从而与毛泽东产生政治分歧和嫌隙】。

而汪东兴的一生则只是一介武夫，并不明白政治、也对政治理念不感兴趣，而仅仅是对于毛泽东一生忠心耿耿、勤勉地做好各种保卫工作。与其说汪东兴是一个政治人物、或政治家，不如说他是一个精明而忠心的管家。按理，凭着汪东兴一生中对于毛泽东的忠诚，在毛泽东逝世以后，汪东兴应当也忠诚于毛泽东生前的政治理念、路线、道路，并支持毛泽东在生前所偏爱的人，即江青、张春桥、等人。

但是，文革的错误实在太过明显，以至于汪东兴内心其实也并非不明白；更重要的是，汪东兴之所以要背叛和打倒四人帮，还有另一个更为迫切的

原因。这个原因就是，毛泽东一生荒淫无度，因此与江青之间的婚姻，仅仅是一种政治理念的相合，但却不是身体上的忠诚（毛泽东本人根本视婚姻为无物）与相合。

关于毛泽东的荒淫无耻，汪东兴不但心知肚明，而且还要作为贴身总管，负责促成这些荒淫之事。毛泽东在世时，江青无可奈何；但她在心中最仇恨的、或最迁怒于的对象，大概非毛泽东的大内总管、汪东兴莫属。毛泽东去世以后，一旦江青在政治斗争中稳定下来【她此时一直处于政治斗争的上风，已经基本上掌握了全国范围内高层的多数派的人事力量；此时，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王震等人，不过是软弱的少数派】，那么，接下来被清洗的，一定是非汪东兴莫属。

因此，毛泽东逝世仅仅一个月以后，汪东兴的背叛，既是意料之外【对于那些忠于伟大领袖毛泽东光辉思想的中国高层政治人物而言】，但也其实是意料之中【掌握大内总管权力的汪东兴，用“先下手为强”的优势，在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人的怂恿鼓动下，在毛泽东尸骨未寒的时候，就一举解决了江青等人】。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虽然长于理论的辩论、擅长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等等名词概念的堆砌，但是，他们的政治权谋之术、行动力、果断

程度，却远远地逊于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等老革命的阴险诡诈之手段。——因为，后者都是经历了1949年以前残酷的、腥风血雨的所谓“革命战争”、是“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的人”。

====

就这样，自从晚清洋务运动以后，中国在近现代史上经过了大约一百年的动荡与轮回之后，在1980年代，又开始了一次新的时代背景下的“洋务运动”。与上一次洋务运动同样的是，在这一次经济改革开放中，仍然奉行残酷愚昧的、不公不义的、专制主义、极权主义、威权主义，仍然在骨子里面与西方世界为敌，仍然在经济取得腾飞一般的发展以后，国家与政府的心态开始再次变得逐渐地狂妄自大起来。

那么，为什么，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中国总是倾向于与西方彼此为仇，而不能像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那样，在保持自己文化与尊严的同时，与西方世界和平友好相处呢？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固然，我们应当深刻地省思和追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许许多多事情的是非曲折、来龙去脉【这也正是本书想要努力的方向】，然而，更加重要的是，我们应当深刻地省思“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样的思维方式中，存在着什么样的盲点和缺陷。

在这里，我们再次引述《现代科学的起源与意义》一书中的相关文字。【洋务运动中所学习的对象，是科技文明，而不是政治文明；但是，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技文明？科学、政治、信仰、等等这些不同的概念、领域之间，有着什么样的深刻关系？更重要的是，何谓“西方文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引述 现代科学的起源与意义】

=================================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另一方面，大批的、主流的中国知识分子们，虽然折服于以严复为代表的、大批中国留学生们【这些中国留洋学生，以及受到他们影响的、新学教育所培养出来的、大中城市里院校的毕业生们，包括了周恩来、邓小平、陈毅、毛泽东、江泽民、胡锦涛、等等无数从事政治、干革命、深深改变了中国近现代代史的政治家们、军事家们】从西方所引进介绍的斗争哲学、进化论思想、等等"现代人类科学文明与先进思想"；——但是，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他们却从未放弃过一个重要的原则，那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这八个字出自晚清洋务运动时期。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内容：—— 张之洞在《劝学篇·设学》中提出，"中学为体"，是强调以中国的纲常名教作为决定国家社会命运的根本；"西学为用"，是主张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科学技术，效仿西方国家在教育、赋税 、武备 、律例等方面的一些具体措施，举办洋务新政，以挽回清王朝江河日下的颓势。（百度百科）

在过去的一百八十多年中，在大批的、主流的中国知识分子们的家国梦想中，其实在道德意义上，他们从未真正重视、了解和尊敬过西方文明。

之所以如此，有许多众所周知的、但却非常复杂的深刻原因。在这些原因中，往往好坏参杂；有的是有一定道理的，值得肯定；有的则有深刻的错误，需要清楚地指出。

======================

中国自身文化的生命力

第一，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有深刻思想传承的、以儒释道为主体的、复杂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信仰观的思想文明体系。

中国的历史与欧洲的历史非常不同。中国是一个有着强烈中央集权色彩的国家，是一个坚定而稳固的思想文明政治体系。欧洲则是一个不断分分合合、吵吵闹闹的众多小国所组成的大家庭。中国历史上称外国人为“夷人”，正如古罗马帝国称北方民族为“蛮族”一样。在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后，直到近现代以前，其实就没有真正的、平等的外交政治，因为中国的那些邻国、外国，在政治经济影响上，在人民文明与富裕程度上，都是中国人眼中所谓的蕞尔小国。自古以来，华夏汉族自视为中央帝国，而外族都是前来朝拜、万国来朝的、偏远地区的、尚未完全开化的百姓而已。

中国有着光辉的思想文字历史，有着像《论语》《老子》《周易》《诗经》那样古老的、深邃的、明哲的人生哲学思考与历史文化传承。这些古代文字所代表的深刻思想，所表达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谦让、孝敬、忠诚、诚实、顺服、忍耐、坚韧等等精神，对于社会、家国、人间道德社会的纲常秩序等等，有着极其重要的、显然的、无可置疑的重大意义。这些古代文字对于整个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对于人生思考的重要助益，在人类历史上，绝不亚于古希腊罗马的亚里斯多德、苏格拉底、柏拉图、西塞罗、托勒密等哲学家的思想，甚至只有过之而无不及。或许，它们的重要意义、深远价值、重大教益，就人类整体历史而言，仅仅次于圣经本身。

中文是一种表意文字，而不是像西方文字那样是字母拼写文字。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境内，虽然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绵延辗转数千里，虽然有许许多

多的方言，甚至每一个省份、每一个县市、隔着大山的不同村落，都有自己的口音方言，但是，却“书同文、车同轨”。相比之下，西方的德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等，由于都是以字母拼写为形式，因此逐渐地，各自发展成为独立、平等的语言、邦国、文化体系。

中文的表意文字，相比于西方的拼写文字，虽然对于孩童来说更加艰深难学，虽然在历史上曾经导致高文盲率，虽然在历史上曾经导致文字出版和印刷自动化更加困难复杂，但是，却是一个重要的、意义重大的文化和政治纽带。这个纽带使得整个大中华主义成为一种不可分割的、不可断开的思想文化整体，成为一个有机的、生命力极强的文化传承体系。

=======================

力量与真理

第二，虽然，在过去一百八十多年中，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曾经有过大量的碰撞、摩擦、互动过程，以至于今天的中国早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革命与变化；但是，其实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从未进行过真理层面的、坦诚的、直接的冲突与对话。

虽然，中国在近现代史中，曾经多次是西方军事的手下败将，甚至曾经是西方文明的“学生”、日本的手下败将，但是，恰恰因此，那些复杂的中国近现代政治军事历史，没有导致中国人在道德意义上尊敬、重视西方文明，反而是，更加极大程度地增强了中国知识分子们、乃至于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忧国忧民、同仇敌忾的心志。

历史上的鸦片战争、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中日之战、以及一系列的被迫开放国门的条约，甚至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中国的八年抗日战争，等等复杂的近现代历史，让每一个中国人都内心伤痛、满怀屈辱。

这些复杂的、许多因素缠绕其中的、饱受屈辱的近现代中国历史，一方面让中国人对于当年的清朝政府、民国政府、腐败官员、糊涂政治决策等等痛恨得咬牙切齿，另一方面更让中国人对于西方文明，以及深受西方文明影响、明治维新之后“以西方为师”的日本，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态。

今天，在普通中国人心中，尤其是在那些见识过外面世界、内心诚实而开放的普通中国人心中，人们对于西方文明的复杂心态，包含着互相矛盾

的、很难调和的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人们认识到，西方文明思想体系是璀璨的、是博大精深的，是对全人类有重大贡献与巨大影响的，是文明的。看起来，西方文明中包含着很多好的“哲学”，很多好的思想、内容、政治体制、民主自由、人权、平等、科学、等等。因此，许多功成名就的家庭都梦想着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常青藤大学去留学、接受深造，等等。

第二个方面是，人们不可能忘记那些屈辱的近代历史，不可能忘记那些窝囊的战役、羞辱的条款，更不可能忘记，中国的大门正是被洋人的枪炮所打开的。换言之，在许多中国人心中，从道德意义层面而言，中国文明从未曾真正地被西方文明打败过。那曾经打败中国的，仅仅是枪炮与科技而已。这正如，在五胡乱华的时代，或是华夏文明败于蒙古成吉思汗、忽必烈，以及败于满清八旗军队的时代，那些历史事件的发生，并非是因为蛮夷人有更高的文明、有更温良恭谦让的仁爱，而恰恰是因为他们更加野蛮而已。

虽然，在现代中国人的文化氛围里，人们常常在表面上推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样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但是，每一个中国人在良心深处中都知道，其实，强权、力量、武力，绝不简简单单地等于真理。在绝大

多数中国人的心里，都认为，中国文明在近现代历史中从未曾被真理打败过，而仅仅是被强权、力量、武力打败过。这样的历史，既绝不能够说明中国文明不好，也绝不能够说明西方文明好。恰恰相反，对于许多重视民族主义、有强烈家国梦想的中国人来说，这样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正说明了中国文明好，西方文明不好。

在这里，我们不必去分析所谓鸦片战争的复杂来龙去脉，也不必去探讨八国联军侵华的起源，而仅仅是在今天大多数中国人所认可的历史文化层面上，探索为什么中国人至今对西方怀有敌意或蔑视，以及，这样的心态正确在何处，错误在何处。让我们接下来继续分析。

=======================

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泊”

第三，当面对西方文明的时候，当思考如何吸收西方先进科技与文明体制的时候，中国人常常说的一句话是：“取其精华、去其糟泊”。但是，普通

中国人、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思想家们，却从未曾认真地想到过、反思过、辩论过，在西方思想文明体系中，究竟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泊、以及为什么。更进一步说，甚至，中国人很少去认真思想，所谓西方思想文明体系，到底是什么。

中国人常常大而化之地以为，所谓西方文明的精华，就是那些器物层面的，科学技术发明等等。一些内心开放的中国人，还会把民主自由、宪政、法律、经济等等方面的内容，也看作是西方文明的精华。但一般而言，这就仅此而已了。

而关于西方文明的糟泊，中国人则常常误以为是，自由散漫、贪生怕死、贪图享受、个人主义、无组织无纪律、不能吃苦，或者从更深层意义说，也包括西方历史上曾经有的宗教专制、封建愚昧等等。在这方面，很多现代中国年轻人追随、仰慕西方的人文主义、文艺复兴、个人解放，甚至性解放、性自由等等。

简言之，中国人很少去深刻地、公道地、客观地研究，西方文明究竟是什么，其中的内在机理是什么，主要构成要素是什么，等等。甚至，中国人大多数虽然都听说过、知道，基督教信仰对于西方文明的核心意义，但是，却对基督教信仰的内容了解极少、乃至不知所云。

这固然是由于，西方文明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不断变化的动态有机体，而绝非是一个单纯的、静态的、内容一致的铁板一块；但也是因为，在过去一百多年中，历史的局限、现实政治环境、思想环境的局限性等等原因，从而导致了，那种对于西方文明的全面认知，还没有、或很少在中国出现。这样的隔阂状态，不仅是在中国大陆如此，即使在资讯自由流通的香港和台湾，也往往是如此。例如，我们从现代著名文化人南怀瑾的著作中，就能够看出，中国许多知识分子、文化人对于西方的了解和认知，仍然有着很多主观臆断；这些主观臆想，与实际的西方现状、文明状况等等，有着很大差异。

========================

中国古代文明看起来并没有什么错

第四，在过去一百八十年中，在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互动、来往等等过程中，中国人其实并不真的觉得，中国古代文明有什么错。

当清朝灭亡以后，很快就爆发了五四文化运动。五四文化运动直接催生了现代中国白话文书面语言的正式诞生与系统性普及。五四运动期间，一个重要的主旨就是，要砸烂孔家店，反对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精髓，反对以孔子论语为核心代表的儒家思想。清末民初，之所以会有这样一种强烈的反孔的情绪，是因为人们实在痛恨和反感清朝末年的官吏腐败、政治专制、政策愚蠢的局面。人们常常把这些专制弊端归因于孔子的儒家思想。

但是，这种反孔子、反传统的情绪是肤浅的、也是短暂的；很快，到了1920年代以后，社会上就重新兴起了对于曾国藩等传统儒士著作以及整个儒释道中华思想传统的重视。从根本上说，很多中国人并不觉得，在近现代史上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冲突，是由于中国古代文明传统的系统性的错误。——在很大程度上，事实也的确如此。

人们在切身生活感受上，仍然感受到传统价值观的重要性。即使是那些把儿女送到海外留学的父母们，也不希望儿女因抛弃了传统价值，而失去了顺服、听话、孝敬、尊老爱幼等等品德。

人们在国家凝聚力上，仍然深刻地、警惕地认识到，传统文化价值体系、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等等的重要性。

在近现代历史上，中国文化相对于西方文明而言一直处于弱势地位。这也让中国知识分子们更加迫切地感到应当加强和强调传统价值思想体系的重要性。因此，他们不愿意在西方文明面前，抱以重视和尊敬的态度；反而是，有意无意地贬低西方文明的重要地位，而特别地强调中国传统文明价值的伟大意义。

======================

凭什么因为需要尊敬别人的技术、需要学习那些技术，所以就要尊敬和学习别人的思想体系呢？

第五，在过去一百八十多年中，一个显然的事实是，中国需要认真、勤奋、扎实、痛下决心地尊敬和学习别人的科学技术。这一点，很少有中国人会怀疑。但是，很不显然的却是，凭什么因为要尊敬别人的技术，所以就也要尊敬别人的思想体系呢？

这正如，汉人在历史上曾经要学习胡人的骑马射箭技术，但是，汉人却从来没有必要学习胡人的什么思想体系。事实上，华夏民族的思想体系，论语的仁义礼智信，道德经的深邃，要远远地胜过胡人的思想文化传统。

换言之，至少从表面上看起来，技术与思想体系之间，并不一定有什么必然联系。学习和效法先进的技术，绝不等于要学习和效法别人的思想体系。这对于大多数人的生活常识来说，都显然是正确的思路。正因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提法很深刻，至今在中国人心中仍然刻下深深的烙印；——尽管，我们今天或许很少直接用这八个字来表达我们对待西方时的想法与政策方针。

对于一个普通正常人的思维方式来说，显然，技术与科学是一回事，文化哲学思想体系则是另外一回事。在这两件事之间并不一定非得有必然的联系不可。不但如此，事实上，在人类的历史上，常常是那些不文明、野蛮的民族和国家，才往往长于技术，尤其是那些杀人放火的军事技术；而那些文明程度更高的民族和国家，则看起来，往往是和平的、是与世无争的；——至少，在传统文化思想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们的眼中，就常常是这样认为的。

所以，虽然，在过去一百八十多年中，中国知识分子们看到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因此都认识到、都同意，需要认真而勤奋地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但是，这绝不等于说，主流中国知识分子们就因此而重视和尊敬西方文明，——尤其是关乎道德意义上的文明而言。

======================

凭什么一定要服气

第六，在过去一百八十多年的近现代中国历史上，中国虽然经历了许多失败、羞辱、挫折、失落，但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来说，我们凭什么就要因此而在心灵里投降、就要因此而在西方文明面前俯身膜拜、就要因此而服气呢？

难道，中国人的心灵与精神中，没有坚强的脊梁吗？我们岂能有奶就是娘呢？我们固然可以接受和学习别人先进的技术、科学、甚至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管理经验等等，但是，难道我们接受西方，就等于要

摒弃文明老祖宗的光辉而璀璨的文明礼制、思想传统吗？

如果说，当面对西方的时候，我们不但不应当摒弃我们自己的文明思想体系传统，反而应当更加坚持和发扬那些古老的文明与悠久的思想、品德、信仰；——那么，这难道不就正意味着：——我们不应当在西方文明面前卑躬屈膝，也不需要在道德意义上重视他们、尊敬他们。

=======================

技术体系与思想体系的根源关系

第七，在过去一百八十多年的近现代中国历史中，虽然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们都认识到科学技术的深远而伟大的意义，但是，却很少有人认识到、也很少有人同意、甚至很少有人会想到有这种可能性，即：——那些科学技术与西方思想体系本身之间有着什么深刻的根源性关系。

人们常常说的一句话是："科学是没有国界的。" 因此，若有人说，在科学与西方文明思想体系之间，甚至在科学与基督教信仰之间，存在着一种本质性的、根源性的关系，那么，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匪夷所思、令人难以同意的说法。

所以，当人们说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类的、对待西方文明体系所应当采取的策略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们往往会点头称是。但是，当听说"现代科学的开启与爆炸性发展，与西方思想文明体系，尤其是与基督教信仰之间，有着深刻的本源性关系"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们往往会立刻声色俱厉地反驳说道：——中国古代也曾经有非常璀璨的科学技术历史，并且，在西方历史上，宗教信仰正是压制科学技术诞生的重大阻碍因素。

=====================

不卑不亢，亦或是应当俯视还是仰视？

第八，在过去一百八十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中，中国知识分子们在对待西方文明的态度上，常常是有两种极端态度，而很少有中肯的、平衡的、不卑不亢、实事求是的、公道公平的态度。这两种极端态度分别是，主流

的、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往往对西方文明抱着俯视的态度；而少部分中国人则抱着崇洋媚外、甚至试图要全盘西化的态度。

一般而言，那些越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思想体系熟悉并深感骄傲的人们，就越会以鄙视的态度、俯视的心态，去面对西方文明，甚至根本不愿意静下心来去了解一下，所谓西方文明，到底是什么。

反之，那些越是想要崇拜武力、喜欢时髦、看重力量、喜好外在物质的人们，则就越会以仰视的心态，去看待西方文明，而把自己的中华文化看得一无是处。

上述两种立场，其实都不是抱着实事求是的、明哲的心态。他们两者，也其实并不真的懂得，所谓西方文明，到底是在说什么。

直至今日，许多中国人都肤浅地把所谓西方文明看作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骑士精神、资本主义、个体主义、民主政治、多元文化、百花齐放、自由烂漫等等的代名词。很多人喜欢西方的那些故作高深的哲学，还有的

人喜欢西方的竞争与创新，更多的人则仅仅是把西方看作是物质经济发展比较发达的地区而已。

至于圣经、基督教信仰，很多中国人或是对此完全无视、忽视，或是一头雾水、不知所云；既没有兴趣、也没有信息资源去了解，基督教信仰的内涵、外延、历史，与欧洲国家历史的演化有着什么深刻而内在的关系。还有的人，则简单地把基督教信仰与西方文明划上等号，大而化之地把西方文明体系看为是铁板一块，大而化之地用中国人在传统文化体系中所熟悉的那种念经敲木鱼的宗教观念，去看待和揣摩基督教信仰，甚至鄙夷地把基督教信仰看作仅仅是洋教而已，等等。

==================

涉及到现实民主政治与权力斗争

第九，在过去大约一百八十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中，中国知识分子们不重视、不尊重、不了解西方文明体系内涵的另一个非常重要而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在漫长的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在经历着自古以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变局。动荡的政治现实与权力斗争，阻碍了知识分子们深刻思考历史、反思文明的客观环境条件。

过去的一百八十年的中国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即满清政府、民国政府、以及中共政府。在专制政权的环境下，政治宣传的目的往往是为了维护本政权的生存与稳定性，为此，许多政治宣传内容就是有意识地进行反西方的信息灌输。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政治宣传对人思想的毒害影响至深，使人无法认识到历史、事实与世界的真相。

========================

麦子与稗子

第十，在西方世界内部，存在着复杂的、好坏参杂的情况。

马太福音

13:24 耶 稣 又 设 个 比 喻 对 他 们 说 ， 天 国 好 像 人 撒 好 种 在 田 里 。

13:25 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

13:26 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

13:27 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阿，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子呢？

13:28 主人说，这是仇敌作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

13:29 主人说，不必，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

13:30 容这两样一齐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惟有麦子，要收在仓里。

13:36 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进前来说，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

13:37 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

13:38 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

13:39 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

13:40 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

13:41 人 子 要 差 遣 使 者 ， 把 一 切 叫 人 跌 倒 的 ， 和 作 恶 的 ， 从 他 国 里 挑 出 来 ，

13:42 丢 在 火 炉 里 。 在 那 里 必 要 哀 哭 切 齿 了 。

13:43 那 时 义 人 在 他 们 父 的 国 里 ， 要 发 出 光 来 ， 像 太 阳 一 样 。 有 耳 可 听 的 ， 就 应 当 听 。

+++

+++

+++

+++

+++++++++++++++

【【【引述 《从金刚经说起》中的内容 西方文明与基督教信仰之间不能划等号】】】

虽然基督教信仰的文化思想与文明体系影响如此广泛，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文化思想与文明体系简单地当成了基督教信仰本身，或者，如果我们简单地仅仅把西方文明与基督教信仰之间划等号，那么，我们就犯下了严重的、望文生义、不认真负责、偏离事实的错误。

事实上，我们只要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近三百年来，虽然有很多好的事情，比如现代科技革命的开启，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及民主自由制度、法治、自由经济、平等贸易、社会大分工协作、医疗、教育等等，还有无数的、具体的科学技术发明，都是来自西方；但是，也有很多坏的事情，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无神论主义、进化论哲学、性解放、放荡主义、离婚泛滥、家庭破碎、甚至同性恋等等，也都是来自西方。

显然，如果我们刨根问底、认真查考、追本溯源，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明白，西方世界绝不是铁板一块，西方人也绝非全都是纯洁无辜的、敬虔谦卑的圣徒。

任何思考东方、西方文明体系比较的人，如果，——看不到西方文化的优异成分；看不到西方文明给人类所作出的、无与伦比的巨大贡献；看不到现代人要在何等广泛而深刻的程度上，感谢——培根、波义耳、牛顿、等等无数科学家、哲学家，以及源自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现代医院体系、现代教育体系、现代经济法律制度等等；看不到在西方的无数的、大批的、前赴后继的、仁人志士们，在科学、文化、政治、法律、医疗、教育、服务、信仰领域，为社会、为人类所作出的可歌可泣的杰出贡献；看不到在西方各国有那么多、数量巨大的信仰敬虔、谦卑诚实、热忱真挚、敬老爱幼、爱人如己、勤奋工作、热心服务于大众和全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真诚基督徒们；——那么，这样的人就一定是没有良知、没有诚实态度的人。

另一方面，任何思考东方、西方文明体系比较的人，如果，看不到——西方文明中的错误、缺憾、谬误成分，比如，在诸如法国为首的、遍及西方各国的、打着人文主义旗号、放荡不羁的淫乱主义、性解放主义；在诸如德国为首的、遍及许多国家的民族自大主义、好战主义；在诸如俄国为典型代表的信仰虚伪主义、专制主义、民族主义；以及，起源于英国等国学术领域的达尔文进化主义，和盛行于德国的唯物主义、泛神主义、自然神主义、法西斯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那么，这样的人就一定不是仔细思考与观察、真诚寻求真理的人，而仅仅是盲目崇拜西方的武力与物质繁荣，而在心中没有正义、没有饥渴慕义之心的人。

事实上，即使我们撇开这些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历史、哲学史等历史领域的角度不谈，单单从宗教信仰、基督教教会的历史与现状来看，西方文明体系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存在着极其复杂的、甚至分裂的、内部景况；——这也从侧面再次证明了，西方文明体系绝非简单地、直接地等于基督教信仰本身。

基督教会的简史

在基督教信仰的传播与教会历史中，在大约公元15世纪以前，基督教会一直分为东西两大部分。

天主教与东正教的由来

东方教会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是从大约公元四世纪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归依基督教信仰以后，把罗马帝国从罗马迁都至当时的拜占庭市开始的。拜占庭市位于欧洲与亚洲陆路交通的重要枢纽节点。它后来被改名为君士坦丁堡。这个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以基督教信仰为国教的帝国，被后世的历史学家称为拜占庭帝国；她从公元四世纪一直延续到公元十五世纪，存在了将近一千年的时间，是人类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没有改朝换代的重要国度之一。公元八世纪左右，这个以希腊语为主要官方语言的基督教国家，开始不断地把信仰传播到后来称为俄罗斯等、以斯拉夫民族为主体的各个国家。俄罗斯这些国家曾经在很长时期一直处于农奴制度状态（俄罗斯的农奴制度一直到后来十七世纪彼得大帝改革、效法西方工业革命等等的时候，才开始被完全消除）；然而从公元八世纪开始，基督教信仰已经逐渐把社会文明和人道关怀制度带给俄罗斯等的广袤土地。

西方教会以罗马为中心，在君士坦丁大帝迁都君士坦丁堡以后，延续和保持了从公元一世纪下半叶（注：耶稣基督于大约公元元年左右降生，于公元三十三年左右被钉十字架）、使徒彼得时代以后建立的教宗制度。在从公元四世纪到公元十五世纪的上千年历史中，以罗马教宗制度为核心、以拉丁语为主要官方语言的西方众教会，与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以拜占庭帝王为政权中心、以希腊语为主要官方语言的东方众教会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

在公元一千年以前，东西方教会基本上是兄弟般的关系。他们——都以圣经新旧约全书为共同的信仰根基与中心教义的基础；都相信和承认，圣经、也只有圣经，是上帝的全备话语、是上帝亲自的、超自然的启示与默

示；都相信和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都信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恩典。

但是，在公元一千年之前，在东西方教会之间，也一直存在着既合作、又有纷争的状态。两者在各自教会权威、教义细节等等方面都有很多争议、互相对对方不服气。这种状态持续到公元一千年，终于矛盾完全爆发，互相之间彻底决裂，互相否认对方的信仰合法性。

中世纪

公元十五世纪，君士坦丁堡被后来称为土耳其人的突厥民族攻陷。君士坦丁堡为改名为伊斯坦布尔；这个名字是源于突厥人的伊斯兰信仰。从此，拜占庭帝国正式覆灭。然而，东方教会，此时已经自称为东正教，逐渐开始向莫斯科方向迁移、直至后来以莫斯科为其中心，继续与以罗马为中心的西方天主教会体系分庭抗礼。大约在同时，以罗马为中心的西方教会体系（自称为天主教系统），于公元十五世纪开始了被后世称为文艺复兴的一种近现代文化革命运动。

值得指出的是，从大约公元四、五世纪至十五、十六世纪的一千年，被后世称为的所谓“中世纪”，其实并非人们所常常误以为的、专制主义压迫的黑暗时代。事实上，任何诚实的历史学家都会承认，尽管在这期间发生了几次针对中东的十字军东征、回击伊斯兰的进攻和劫掠，但是，总体而言，在这大约一千年的漫长历史年代中，整个欧洲，包括西方教会影响下

的西欧，和东方教会影响下的东欧，在政治与军事上，基本上是处于和平时期，几乎很少有国家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很少有兵荒马乱、生灵涂炭、改朝换代的时期。在许多乡间、市镇、经贸中心，人民安居乐业，许多地方治安良好、常常夜不闭户。

在中世纪的长达一千年中，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方教会与罗马为中心的西方教会，各有特色、短长、优缺点。

东方教会所处的拜占庭帝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帝王及其家族笃信基督教信仰。东方教会分成各个教区，众教区的各级牧者、长老等等围绕着拜占庭帝王，彼此和谐，处于互相和平、长达几乎一千年的安稳状态中。事实上，拜占庭帝国这个名称，是后世的历史学家给起的；当时的人们从未曾这样称呼。他们这个国家，一直自称为"基督之国"、或"东罗马帝国"。

而在西方教会，随着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时代在公元四世纪、公元五世纪的解体与破败，罗马教宗体系饱经风霜、生死存亡、无数的患难、危机。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人、一本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就是著名的基督教圣徒、奥古斯丁，以及他的《上帝之城》。这本书讲述了，根据圣经、耶稣基督的教导，所谓上帝的国度、上帝之城，究竟是什么意思。在长达上千年的中世纪历史中，西欧从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政权，但是，却有一个统一的教会体系，就是以罗马教宗为首的天主教教会体系。

我们会在其他文字中，继续深入讨论东方教会与西方教会历史之间的比

较，以及他们两者之间的短长、利弊、得失；并从中反思，基督教信仰的教义，以及，基督教信仰与世上国度、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文明体系之间的深刻关系，应当是怎样的。

中世纪与近现代之间的分水岭

公元十五世纪是西方历史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正式标志着中世纪的结束，近现代历史的开始。此时，一方面，君士坦丁堡被伊斯兰的突厥人攻陷，因而，整个欧洲大陆与东方地区之间的贸易枢纽、中枢节点被强行隔断。从此，西欧各国开始大兴海上贸易，从而使得曾经位于西欧文明边缘地带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成为海上强国，纷纷在经济政治上依次崛起。

另一方面，从公元十五世纪，以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城邦为中心，因着一个开始于美第奇家族的长达约两百年左右的统治，开始了——被后世称为文艺复兴的艺术文化运动，以及，与此同时的、罗马天主教体系所受到的巨大冲击和影响。美第奇家族供养了许多后来极为著名的艺术家，包括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等人。这些艺术家回归基督教信仰临到欧洲之前的时期的希腊艺术风格，以绘画和雕塑人体为美、为荣。美第奇家族积极地涉足政治与宗教领域，甚至有的家族成员自己成为了罗马天主教会的教皇。美第奇家族的奢靡与腐败之风，加重了罗马天主教本来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的弊病。

天主教与东正教的谬误

自从公元四世纪开始，当圣经新旧约全书被从原文（旧约是希伯来文，新约是希腊文）翻译成罗马的官方语言、拉丁语以后，罗马教宗系统就开始逐渐把圣经束之高阁，使普通人无法轻易接触到、阅读到圣经。在公元十六世纪以前的长达一千年中，西欧各国绝大多数人民，都只能从教会的神职人员那里聆听基督教信仰的教义，而没有机会自己去阅读圣经、上帝的话语。

在教义方面，天主教系统添加了许多圣经本身没有、甚至是圣经明文反对的内容，例如，不恰当地高举耶稣母亲、玛利亚的地位，甚至称之为圣母、上帝之母，以及，把历世历代的许多基督教使徒们、圣徒们当作偶像崇拜、向他们顶礼膜拜、祈祷、祈求庇佑（在这些方面，东正教与天主教存在着同样的谬误，即，都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圣经本身的教义和教导，而在后世添加了一些违背、偏离圣经内容的教导、信条）。而且，天主教还在后世自行添加了一些伪经、次经，以及向圣母玛利亚祈祷、敬拜的玫瑰经，等等。

好在，天主教与东正教之间的纷争与分裂状态，虽然是一件很不好、极其令人伤心的事情，但是，这种状态却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力地、可信地保证了，圣经新旧约全书本身，一直被精心地、忠实地保存着，直至后世，因为天主教与东正教双方之间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互相监督、有力督责的效果。

并且，尽管天主教与东正教中存在许多谬误和偏差，但是，我们仍然要说，他们的主流信仰、主干教义、主要信条，例如“使徒信经”等对于基督教信仰教义的总结，是正确的。所以，在天主教与东正教里面的信众，如果真心地、真诚地、热忱地寻求和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真的以耶稣基督为自己生命的救主，那么，我们仍然可以说，他们是良善的、真诚的基督徒——尽管，我们应当诚实指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完美的。

圣经的广泛翻译传播，以及近现代时代的开始

公元十五、十六世纪，随着君士坦丁堡被突厥人攻占、拜占庭帝国灭亡，东方教会保存的希腊文的圣经原典以及许多其他希腊文写成的著名基督教历史文献和著作，被教会人士抢救、传播到西方教会体系。这些希腊文的文献以及圣经原典，开始让西欧的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罗马教会的圣经拉丁语译本，在一些重要教义方面的词汇概念上，存在着一些翻译上的失误或偏差。

几乎与此同时，欧洲发生了许多历史意义影响深远的事情。我们仅举以下三件极其重要而著名的事情为例。

第一件事情是，金属印刷术的发明，使得大规模、迅速地、廉价地印刷、传播纸质书籍在技术上成为可能。

第二件事情是，罗马教宗的教义上的谬误，以及财物方面的奢侈腐败作风，终于激起了教会各级神职人员以及普通基督徒们的反抗。以德国的马丁路德为代表，一大批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反抗教廷、传播圣经、传播真正纯正的福音与基督教信仰教义。马丁路德把圣经翻译为德语，极大地推动了圣经在社会中的普及化、广泛传播。

第三件事情是，英国的丁道尔开始把圣经翻译成英语。这些圣经翻译运动本身，直接导致了现代德语书面语、现代英语书面语等等的诞生，因为在那之前，西欧的书面语言只有一种，就是拉丁语。

圣经的广泛传播，使得欧洲的无数普通人开始真正地、详尽地明白基督教信仰的真正主旨、原则、精髓；这些基督教宗教改革运动，深刻地革新、更正了欧洲各国人民在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信仰观方面的许多认识与观念。这样的革新与更正，直接地推动了——现代科学的开启；以及，现代民主自由政治运动、法律、经济等等许多方面的变革，如火如荼地在各地展开。

这些事情，推动了、构成了过去五百年来的欧洲近现代史，并进而，对于全世界的文明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天翻地覆的影响作用。今天，每一个出门坐火车汽车飞机、早上吃牛奶面包、上班穿西服革履、住在高楼大厦或四季温暖如春之庭院别墅里的人，都要感谢培根、牛顿、波义耳等现代科学的开启者们，更要感谢那些舍生忘死地传播圣经、传播基督福音的敬虔基督徒们。

基督教会简史的总结与反思

从上面的简史中我们可以看见，在耶稣基督降生以来两千年的历史中，每当人们贴近圣经、寻求圣经、明白圣经话语的时候，他们就展现出热忱、敬虔、谦卑、真挚、积极的信仰，他们的生命就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社会与国家就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整个社会的道德风貌也发生极其巨大的改变；上帝的祝福就极大地、温暖地、令人震撼地临到他们。

反之，当人们沉浸在自己的罪性与私欲中，沉浸在彼此的纷争中，当人们没有真诚地、认真地、热忱地寻求上帝的话语、信仰的真理的时候，那么，他们的生命就显出冷漠、消极、惰怠的样式，他们的道德就不断滑坡，他们整个社会与国家就充满了许多动荡、败坏之事。

从基督教会历史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反思。

一，上帝的国度，虽然表现在地上的教会中，但是，从终极的意义与层面而言，基督的国度不属于这地上的任何地方，而是属灵的、属乎天上、那永远的国度与家乡。

二，然而，这并不是说，基督教信仰在这个地上就没有：——确定的、明晰的、任何人都无可否认的见证。事实上，现代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人道主义、人的生命与自由被极其重视，到艺术文化、经济与科学

的大发展等等，——在无数的层面上，现代人类文明都被深深地刻下了基督教信仰的烙印。（读者可以阅读《基督教的果实》《基督教信仰之大众证据》《基督教信仰之证据的反思》等系列书籍，进一步查考这些方面的事实与信息。）

三，但是，在基督教信仰与西方文明之间，是无法划等号的。前者固然在极大程度上深刻影响了后者，但是，后者中包含着许多其他方面的成分与因素，甚至包含了无数的糟泊、不义、败坏、奢侈、贪婪、淫乱，等等。

那些感叹"为什么基督教信仰没有全部改变欧洲人、使全体西方人都成为基督教圣徒，或是为什么没有彻底消灭那些罪恶的恶人"的人们，并不明白：——上帝是公义、圣洁、慈爱与恩典的，他的终极道德审判必将来到，他的终极惩罚是永远的；然而，他以恩典与慈爱，给世人悔改己罪的时间与机会，使他们真心地、真诚地、而不是被强迫地，相信和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恩典。上帝的无限公义与权柄，到那终极的审判日，必将昭然地显明在一切世人的眼前。

四，那么，为什么有很多人，尤其是那些对于基督教信仰和西方文明不太了解、不求甚解的人，常常把这两者看为同等呢？

这一方面是由于，许多世人并不了解基督教信仰的真正主旨、福音的真正涵义：——"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却不属于这个世界；人在世上应当勤勉而敬虔地生活、工作，但是却不应当把心系于这个世界，以这个世

界、或其中任何被造之物为心灵的归依”；尤其是不了解基督教信仰、与世上之国关系的教义：——“基督的国度属乎天上，而不属乎地上；真诚、谦卑的基督徒应当在这个世上作盐、作光，把基督的爱带给世人，见证福音的真实，见证耶稣基督伟大、圣洁的爱；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温柔的福音，是圣洁的福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烛火他不吹灭。”

另一方面是由于，世人因着自己生命中的罪性，因着自己的心系于这世上的国度与荣华，所以，常常误以为，神的作为和果效，是要终极地显示在这个地上的世界中。他们把世上的荣华璀璨、建筑物的宏伟绚丽、人群的华盖云集，错误地当成了天国里的永远荣耀。他们总是以为，非得要通过外在的、表面光鲜的“荣光”，来看待那些属灵的、属天的、属乎道德的事情。

五，基督教信仰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影响最大，特点也最独特的宗教信仰。它虽然指出，我们不应当以这个被造的世界或是其中任何被造之物、被造之人为我们心灵的依归，而是要单单地敬拜那位创造宇宙天地、创造我们生命的主；但是，它不是像佛教那样抱着虚无、万事皆空、不垢不净、不生不灭、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诸相皆虚妄的态度，以否定主义的态度，来看待一切世事。它告诉我们，应当积极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以谦卑、温柔、真诚、和平的心，以勤勉、专诚的工作，去面对一切事情、一切世人。

它虽然指出，只有上帝才是我们的造物主、生命之主、永生之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上帝是我们道德律法的颁布者、是圣洁公义而全能的终极

道德审判官；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道成肉身，耶稣基督谦卑地降身为人，生在马槽里，生在律法下，取了奴仆的样式，甚至谦卑顺服、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永远的救恩，使一切相信他、接受他救恩的人，得到永生，得以进入那永远的天国、得享那永远的幸福与美好。

它不是像伊斯兰教那样用火与剑传教、荼毒、劫掠，而是用谦卑、慈爱、怜恤与和平的方式，把福音向世界分享。它不是像伊斯兰教那样推行、奉行政教合一的教义与制度，更不是要在地上建立起什么伟大的、属世的国家；它不是要以严刑峻法来统治臣民，更不是要让整个社会万马齐喑、丧失活力与创造力。在圣经福音书中，耶稣基督清楚地说道：“我的国属乎天上，而不是属乎地上”。

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基督教信仰给这个世界所带来的良善影响是最大的，也是有目共睹的。

+++

+++

+++

+++

+++++++++++++++

=========================

人的罪

第十一，毋庸置疑的是，在每一个世人的生命本质之中、在心灵深处，都充满了骄傲自义、自私自利等等各样的罪性与罪行。因此，当人所属的原有思想观念体系受到冲击的时候，他们就会倾向于，本能性地抗拒、排斥、反抗。

在人的心中，一个最大的特点往往就是自以为义；即，人总倾向于认为自己所处的境况、所属的团队是好的、正义的，包括自己的家庭、社群、祖国、思想传统等等。当人遭遇失败、挫折、落于下风的时候，往往会怨天尤人，而很少会反思自己；甚至，人常常会迁怒于外界各样的因素；以仇恨、苦毒、猥琐、自私、自义、心骄气傲的心理去看待世界。很少有人愿意接受挫折和失败。很少有人愿意面对痛苦的反思与深省。

======================

地上的国与神的国

第十二，当人的心背离上天、上帝、那宇宙天地造物之主的时候，就会把自己的心灵与灵魂系于这个世界，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以及今生的骄傲。并且，世人常常会有一种深刻的误解，就是认为，上帝的圣洁国度和地上的国一样，充满外在的虚浮样式。

因此，这就往往是为什么，很多中国人常常会把基督教信仰与西方政治混为一谈；而且，会把西方政治中的某些缺陷、不完美、不好的地方当作借口，对基督教信仰嗤之以鼻；并且，不但如此，反过来也对西方文明抱着蔑视的态度。

==
==
==
==
==
==
==
==
==============================

师夷长技以制夷

在过去一百八十年中，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师夷长技以制夷”一直是被很多中国人所认同的、与西方人打交道的原则和战略战术。直至今天在许多中国人心中也是如此。

遗憾的是，直到今天，在很多中国人的心中，仍然没有去认真、谦卑、诚实地去思想，西方人的长技究竟在于什么，其背后的原因、起源在于什么。

不但如此，直至今天，在很多中国人的心中，仍然莫须有地、不实事求是地、不认真考察地、主观臆想地认为，在西方世界，存在着一股反对中国人的强大势力。【值得指出的是，在许多情况下，在西方人反对中国人的历史中，固然有许多错误和弊端，但是，西方人往往并非是——因为对方是中国人而反对中国人，而是因为针对对方各样的错误言行而反对。】

因而，一百八十年以来，虽然屡败屡战，但是，中国人的战略出发点、战略原则、战略目标，从骨子里就一直是想要怎样制夷，——怎样打败、制服、压过那些西方来的“野蛮人”。

如果，中国人不深刻地、不真诚而诚实地面对客观事实（尽管客观事实或许非常复杂），那么，即使《大学》中所说的心诚、格物、致知，也必将令中国人羞愧。

===============================

改革开放，学习西方的先进管理经验与科学技术：——结果是什么

从1980年代以来，中国又一次进入了类似于晚清洋务运动时期的改革开放运动。其中的主旨，仍然是类似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只不过这一次在很多名义上都换了称呼，号称学习西方的先进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然而，在骨子里面，中国仍然是抱着对于西方所谓亡我之心不死的、莫须有的敌意（这在很大程度上，固然是出于当政者的政治私利而导致的政治性宣传和欺骗，也实际上与普罗大众的骄傲和排外情绪深有关系），在国内进行信息资讯的封锁与政治宣传，使中国人在内心思想上，对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敌意越来越深。这样的罔顾事实、缺乏公正

与公道的集体心态，必将把中国政治又一次带入崩溃与混乱之中，重蹈百年前的秩序崩塌的覆辙。

================================

================

一战与二战的背景和起因；英国与德国之间的争竞；（后起与先发之间的争竞；英美之间的和平争竞；英德之间的武力争竞）；法兰西共和国的动荡历史；等等

我们并不是说，西方文明在整体上就是无可指责、没有瑕疵的。事实上，西方的科学技术与政治文明固然在过去几百年中给整个人类带来了巨大的贡献，从根本上消除了很多地区与人民的饥饿、贫穷以及许许多多的疾病，给全世界许多国家带来了民主和自由的清明政治；但是，在西方各个国家内部，以及各个国家之间，都存在着许多麦子与稗子的人和事。

从十七世纪开始的现代科学与技术革命，到十九世纪末已经发展到了如火

如荼的程度。然而同时，很多西方人在这样的科技革命运动中，开始变得不那么谦卑，而是变得盲目乐观、自信、自傲、自义。在十九世纪末，西方各国都开始隐隐然处于一种非常骄傲自豪的情绪之中。首届世界博览会在维多利亚女王丈夫的推动下，在伦敦开幕。此时的英国，处于日不落帝国的巅峰时期。而欧洲的德国，则处于急起直追的状态。欧洲各国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人民自豪感情绪高涨。法国的人文主义哲学、甚至享乐主义，达到了一个新高峰。德国与俄国之间的张力，崩得越来越紧，谁也不服谁。

这样的状态与冲突，终于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的结果是，导致了西方原有的秩序世界被很大程度地改变。战败的德国人在心理上，与西欧各国的裂痕越来越深；这种局面终于在几十年后促成了希特勒这样人物的上台，并导致了规模更大、毁灭性更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战的另一个重要结果是，使得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俄罗斯浑水摸鱼、乱中取胜，并使得后来长达几乎一个世纪的时间内，马克思主义深深影响了东亚、南美等地区的国家和人民，以及西方国家的许多左翼知识分子。（关于西方国家左翼知识分子的发展、影响与现状，我们将会在本书后文中继续介绍和讨论）。

一战与二战的历史，让我们清晰地看到，西方国家既非铁板一块，也非纯洁无瑕；而是，在西方世界中存在着复杂的元素、张力以及善与恶的成分。固然，我们必须要清晰地看到，在西方国家政治体制与人民文化中，

有着大量的、美好的、良善的成分，并且这些因素给全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祝福【这些因素，在几乎所有方面，都是来自于基督教信仰的果实，都与基督教信仰有着直接的、间接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西方国家政治与人民文化中的缺点、缺陷、罪恶的成分【关于这些缺点、缺陷、罪恶成分的复杂起因、机理，我们不应当主观臆断、望文生义、人云亦云，而是要仔细分析、谨慎鉴察、认真剖析】。

限于本书的篇幅与题材范畴，我们不在这里对那些各个方面的成分与元素一一进行展开阐述。

===============================

公义，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就道德意义而言，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哲学的最大盲点就是，它几乎彻底地无视、忽视、甚至否定了公义。在这样的观念体系下，真理变成了强权的丫鬟，道德变成了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附属品；真理、公义、道德失去了绝对的、超越生死的价值和意义。这样的思想观念，对于人类社会以及政治面貌的发展是危害巨大的。这样的观念，不仅

对于西方政治与西方人文思想的影响意义深远、危害巨大，而且，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危害和影响也都非常巨大。这样的思想观念，多年以前就深刻影响了中国人民，并产生出了像“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口号；直到今天，这样的思想仍然在中国人的头脑和心灵中，深深地毒害着我们的灵魂。

================================

正义、力量、输赢、争竞、道德、与信仰

若我们仔细地观察与分析西方历史和现状，就会看见，在欧洲各国中同时包含着许多善恶、好坏、麦子稗子参杂的情况。那些善、好、“麦子”的方面，正是由于基督教信仰的影响；这些有益的、良善的影响，遍及世界，尤其是在过去四百年来给整个人类都带来了极大的益处。这些益处如此深远，以至于今天全世界的几乎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得益于这些良善的影响，尤其是表现在科学与民主所带来的生活、教育、工程、交通、职业、平等、人权等等方面的改善。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也存在着许多恶、坏、“稗子”、杂草的方面。这些方面正是由于那普遍地存在于世人心中、也包括存在于欧洲人心中的罪。

我们在欧洲的近现代历史中，能够清楚地看见，在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之中，在英国的人文学术界中，常常会出现那种偏重于力量、输赢、争竞、好勇斗狠的文化。在欧洲内部，这种文化构成一种明显的张力，与正义、道德、信仰的力量，彼此进行拉锯战。正是由于这种坏的方面，导致了西方的人文主义中的达尔文进化哲学，导致了法国的存在主义哲学、放荡奢侈的文化，导致了德国的纳粹主义的土壤，导致了今天弥漫在欧洲的无神主义文化，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

遗憾的是，直至今天，很多中国人在面对西方文明影响的时候，仍然把那些好的方面与坏的方面混为一谈；或者是，把洗澡水和孩子一同倒掉、因噎废食；或者是，想要崇洋媚外、全盘西化；甚至，以坏为好，以好为坏，以善为恶，以恶为善；——效法西方文明中的糟泊，丢弃西方文明中的精华。这就常常是过去一百八十年中，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互动的历史。这是多么令人遗憾、令人可叹。

当我们在口中喊着"取其精华、去其糟泊"的时候，最好要俯身、谦卑、低肩负重、认认真真地好好研究、深刻思索，真正地明白西方文明的历史、脉络、本质、与详尽而公正的全面信息。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泊，而不要望文生义、想当然、人云亦云，否则，结果就一定会南辕北辙，变成了"取其糟泊、去其精华"。

西方文明中的精华，固然在于科学、技术、先进的生产管理经验等等，在于民主自由平等的政治体制等等，但是，这些都是表面现象，背后的本质更在于公义、正义、道德、基督教信仰。（西方的基督教会本身，尤其是天主教、东正教内部，也存在着许多关于“麦子”与“稗子”的人和事）。

而西方文明中的糟洕，则在于无神论思想和文化，在于人文主义中的进化哲学、达尔文哲学、存在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否认个人的自由、尊严、以及个体生命本质中的高贵意义，否认人的心灵、灵魂、精神、超自然信仰的重大意义，否认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并应当真诚地寻求、敬拜、归向上帝】等等，在于好勇斗狠的争竞，在于功利主义、成败论英雄、自私自利主义，等等。

=============

我们应当怎样认识西方，以及西方的文明体系？我们既要谦卑而认真仔细、一丝不苟地从大局、全局、主流、以及其中的机理、机制、体系去看，同时也要儆醒、谨慎、小心地从支流、细枝末节、各个方面、各个侧面、好坏兼有地去看。这样，我们才能够接近事实的真相，才能够公道中肯，才能够真正从中得益。

如果把西方文明看作是一个巨大的麦田，那么，其中既有麦子，也有稗子。而我们应当怎样呢？是把麦子当作稗子吗？还是把稗子当作麦子呢？我们应当怎样认情本质、分辨主流与支流，分辨良善与罪恶呢？我们应当怎样面对西方社会文明体系整体呢？

================

我们所应当寻求、信靠、倚靠的对象，应当单单地是那创造宇宙天地与世人生命的造物之主，应当是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赐我们永生的、三位一体的上帝。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我们不应当以这世上任何被造之物、受造之人为我们的偶像、为我们所敬拜、寻求、倚靠的对象，而应当单单敬拜事奉我们的主。我们应当尽心、

尽力、尽意、尽性地爱主我们的上帝，并应当爱人如己。

==

信仰的见证，麦子与稗子，买椟与还珠

“买椟还珠”的故事是说，一个人去买珠宝，但是在珠宝商那里看见，那个包装珠宝的盒子看似很精美，但珠宝本身却看似朴实无华，于是，他把珠宝盒子留下，把珠宝还给了珠宝商。

这个故事说明了，在这世上，有很多人并不认真地、深刻地、谦卑真诚地思考，而仅仅是看重事物的表面现象，仅仅是注重外在的华丽与虚浮，从而常常犯下非常荒谬的错误，以次为好，以好为次，有眼不识那重价的珍宝。

难道，在过去一百八十年的历史中，在我们面对西方文明时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等等的固有思维模式中，我们所犯的，不正是这样的“买椟还珠”的错误吗？我们许多人仅仅是看见了那些船坚炮利的

虚浮表面现象，就心生羡慕；我们看见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物质文化，就急起直追；并且，在小有成就以后，就往往容易沾沾自喜、俾倪天下。——但是，我们不过就像是那个买椟还珠的人，以为自己已经买到了天下最华丽珍贵的东西，甚至骄傲自满、内心自高、自义；——然而，我们所作的，仅仅是愚蠢地把盒子当成了珠宝，却把珠宝弃之如蔽履。

============

固然，基督徒们的信仰见证是重要的，但是，我们绝不应当把基督徒们的信仰见证，尤其是那种好坏参杂的、并不百分之百纯洁的见证，误认为是基督教信仰本身。我们应当仔细地分辨麦子与稗子，仔细地看清主流与支流，看清楚全局、大局、本质，也应当看清噪音、杂音、杂草。我们应当内心谦卑、诚实、求索，这样，我们才会有公道而公正的心；否则，我们的眼睛就会欺骗我们自己，我们的心灵就会被自己的诡诈、欺谎、私利、偏邪所绊倒。敬畏上帝，是人智慧的开端。

====================================

什么是我们应当想要的麦子，什么是我们不应当想要的稗子

麦子，就是那些关乎敬虔、真诚、恩慈、仁爱、喜乐、和平、圣洁、忍耐、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的事情。这些事情，只有是来自于那真正的、真挚的、真理的信仰。这样的信仰，只有是来自于那创造宇宙天地之主、上帝自己的启示。

稗子，就是那些关乎亵渎、亵玩、私利、暴戾、凶恶、残忍、不公不义、欺压、强迫、强权即真理、贪婪、好勇斗狠、为私利而争竞、等等的事情。这些事情，正是出于人生命与心灵中的罪性与罪行。这些事情，给这个世界所带来的，不是祝福，而是毁坏；不是良善与幸福，而是死亡与战争。

==================================

信仰与功利主义

真正的信仰，不是心系于这个被造世界中的属世之利，不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与今生的骄傲；真正的信仰，不是人在心中自以为义，不是功德主义、不是因行为称义，而是单单地因信称义；因为，人只有靠着上帝的白白恩典、救赎，才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

那些以功利主义看待世事的人，一定会沉沦在自私自利的世界观体系中。真正的成功与幸福，一定是与圣洁紧密相连的。但是，人如果以为，看一件事情是否是正确，取决于这件事情在短暂的此世之中的成败输赢，那么，这样的人生观就大错特错了。在这样的人生观中，人看不见道德的隽永价值和真正意义，看不见上帝的大能与公义圣洁；这样的人，必将在这个世界中沉浸在罪恶深渊里，必将会在罪恶与暴戾中碰得头破血流。

======================================

想要得到什么，却失去了它

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又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人在这个世界上，想要追逐成功与幸福，但是，他们所作的努力的结果，却常常是失去了成功与幸福。他们急功近利、功利主义、以成败论英雄、以力量论输赢、以力量论真理、以力量为价值判断的基准和出发点。然

而，他们所得到的结果，却是与真理渐行渐远，与成功与幸福渐行渐远。这是因为，他们看不到那根本、本质的事情，看不到道德的隽永价值，看不到信仰的珍贵意义。

==

目标与手段之间，可以割裂吗（从“师夷长技以制夷”说开去）

在这个世界上，在人生之中，在许多事情上，尤其是在关乎真理的思想体系上，目标与手段是不可割裂的。否则，人们就会常常欲速不达，甚至南辕北辙。

“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样的思维方式，虽然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我们如果是内心诚实、谨慎、谦卑的，如果愿意对这个问题仔细地深思咀嚼，那么，就会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在于，我们想要得到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想要采取的手段是什么；——我们的目标是正确的吗？我们的手段是正当、有效、正确的吗？如果不是，那么，我们就会舍本逐末、缘木求

鱼、买椟还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为什么要反对民主

自从1949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七十多年中，现代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尤其是以三权分立为特征的宪政、议会民主制度，一直受到中国共产党的严厉镇压和压制。

中国共产党对于现代民主主义制度的反对和压制，固然是由于，——马克

思列宁主义理论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反民主、推崇专制主义极权制度的根本原因；也更是由于，——无数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短见、愚昧、自私、自利、专权、腐败、贪婪、罪恶的结果。

然而，我们也应当公道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其中的保守主义者、马克思列宁主义原教旨主义者）对于民主的反对，并非是全然没有正确道理的。只有当我们深刻地明白了民主制度的机理、机制、必需条件等等以后，只有当我们真正地、客观地明白，那些反对民主制度的人们的理由和原因是什么，——我们才能够真正地懂得，应当怎样去追求民主、建设民主。

关于这方面的深刻思索与讨论，已经超出了本书、本章的范畴，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论民主》一书，了解更进一步的详细情况。

我们在这里，仅仅引述《论民主》一书中的开篇的话语。

++

++
++
+++++++++++++++++++++++++++++++++++++++

【引述 论民主】

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

民主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国家与人民的幸福吗？那么，什么才是国家与人民的幸福呢？

是安居乐业吗？如果仅仅从安居乐业的角度而言，那么，专制国家、君主制度国家、等等，也都有可能会在一定的时期内、一定的条件下，使国家与人民处于安居乐业的状态中。

是长治久安吗？如果仅仅是从政权稳定性的角度来考虑，那么，虽然一般人都会认为，民主制度会更稳定、更长久，而专制制度会更动荡（因为民主制度的权力更替似乎有着更稳定的机制）；但是，事实上，若我们仔细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就会很快发现，这一论点，虽然看似符合很多国家政治中的实际情况，但却也并不尽然、并不一定能够完全站住脚。例如，在有的威权政体、或君主政体内，政治治理架构也可能会在很长时期内很稳定。而反之，在很多民主政体内，政治治理却也可能会在很多时期中很动荡、不稳定、乌烟瘴气，充满了暗杀、贿选、纷争、龌龊、扯皮、吵闹、撕打、不义、等等之事。

我们如果严肃认真地深入思考这些问题，就会发现其中存在着很深刻的机理、与本质性思考题目。

那些认为民主制度会导致国家长治久安的人们，有没有深思过：——为什么，民主制度会导致国家政治的长治久安呢？难道，在许多选举政治中，不会有你争我夺、好勇斗狠、甚至许多暴戾、谩骂、污蔑、不公不义之事吗？

人们常常说，民主制度下，政权更迭会比较和平；而在专制政体内，政权的更替则常常会伴随着血雨腥风、权利倾轧、权力斗争等等。不错。如果我们放眼今天世界上的各国的政治现实，似乎的确如此。那些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大多数往往是和平的、先进的、发达的、稳定的；而那些实行专制政治的国家，大多数则往往是动荡的、落后的、贫穷的、充满了政治动乱。

但是，在民主与稳定之间，究竟哪一个是因、哪一个是果呢？是因为民主导致了稳定，还是因为稳定导致了民主？亦或是，在民主与稳定的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与机理？

另外，坦率地说，为什么——在今天世界上那些主要的、发达的民主国家政体内部，往往是与基督教信仰与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呢？

公道地讲，我们并非是说，那些以基督教信仰为主的国家，一定就是实行民主；或者，那些实行民主的国家，一定就是以基督教信仰为主。但是，如果我们看主流，看起源，看大趋势，就会发现，民主制度诞生于基督教信仰的欧洲，这似乎并非仅仅是一个巧合。而且，像日本、台湾、韩国、等等一大批国家，她们的民主制度，是在西方的支持与保护下才得以建立的；甚至像日本这样的国家，是在西方军事力量的胁迫下，才得以建立民

主。

关于上述这些问题的深入思索，我们都将会在本书后面的章节文字中进行。

============

当我们想要思考一件深刻而重要的题目的时候，常常应当从三个方面来入手：即，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

那么，什么是民主？为什么要进行民主、实现民主？怎样才能实现民主、进行民主？

——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正是我们在本书中所想要深入思考的事情。

在本章这里，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我们先仅仅一般性地、简单性地作出一些抛砖引玉性质的陈述，并在本书后面章节中，尝试进行更加深刻的探索与反思。

============================

什么是民主

什么是民主？从根本层面而言，我们的回答是，所谓民主应当是指，自由、圣洁之民所进行的自我管理的政治组织形式。

从抽象的概念而言，民主并不能适用于任何百姓中间。这是因为，显然，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人人都是暴民、好勇斗狠之辈、自私自利之徒，如果人人都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厚黑学"等等为人生的根本法则，甚至公然地杀人放火、荒淫靡乱、坑蒙拐骗、以罪恶为荣、毫无底线，那么，这样的人民所组成的所谓"民主"社会，就会像圣经创世纪中所记述的所多玛、俄摩拉等古城一样，其中充满了荒淫、暴力、欺压等等喧嚣混乱罪恶之事，并最终必将灭亡，面临那无限圣洁公义之上帝的终极审判与刑罚。

。。。。

不过好在，今天的现实世界中，毕竟，世上的各国各民族大概还没有糟糕到像所多玛、俄摩拉一样败坏的那种程度。

然而，我们必须反复强调的一个重点是，民主本身，并非是绝对的、终极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更不是解决人类社会与政治经济中任何问题的万灵药。

在这一点上，一百多年前当满清灭亡、民国政府成立的时候，当后来的五四运动很快爆发的时期，甚至直到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或许都对于民主的价值和意义有着深深的误解。

一百多年前，中国的许多开明知识分子、许多拥抱西方文明的人士们，以极其渴慕的心态，期望把德先生（即民主）与赛先生（即科学）引进到中国来，希望——使近代史上多灾多难的中国得到拯救，使许多贫穷落后、

精神愚昧的中国亿万百姓能够得到救助、更新，使中华民族能够真正走上民主富强自由之路。但是，过去一百年的中国近当代史显明了，当年那些知识分子们的梦想，今天并没有完全实现。固然，今天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而言，科学教育的普及早已经深入人心，但是，人们的心灵与信仰却仿佛仍然是空的。今天的中国人，似乎离民主、自由、和平仍然很远。即使有一天，假如在中国大陆实现了民主制度，可是，人们是否会在民主体制下和平相处、互相尊重，而不是互相争斗、剑拔弩张、苦毒暴戾——这却仍然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

____

因此，我们在谈论民主之目的、途径、方式、等等之前，首先应当谨慎、认真、深入地思考，究竟什么是民主，民主意味着什么。既然我们已经着急了一百年了，那么，就让我们再多有一些耐心，来冷静、客观、深入地思考一下：我们所追求的、梦想的目标，所谓民主，究竟是什么。

民主的一个核心精髓，也是一个核心难度性的挑战在于，人们怎样能够和平而智慧地处理彼此之间的不同意见。

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社会很快就会跌入吵吵闹闹、混乱不堪、甚至失序的无政府状态。事实上，在社会政治中，民主所面临的两大敌人，正是这两个极端败坏的社会政治形式：专横暴力的专制主义，与混乱无序的无政府主义。

社会是由人群组成的。人是这个宇宙自然世界中最为复杂、微妙、珍贵的存在体。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也是这个世界上最为复杂的事情之一。在人与人之间，有一件似乎存在着内在本质性矛盾的事情，就是，我们既应当坚持正义，又应当宽容待人、并愿意常常妥协。换言之，我们既要有公义，又应当有恩典。在某些事情上，我们应当坚持己见；而在另外一些事情上，我们则要愿意常常妥协、后退。常常地，在坚持与妥协之间，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态度，不仅取决于我们所面对之事情的性质本身，也取决于社会中其他相关人士们对于此事的意见。在许多事情上，我们既要学会坚持原则、据理力争，又要不失灵活性，时刻准备放手、时刻准备妥协、让步。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统一的、一成不变的公式，来决定什么情况下应当坚持，什么情况下应当妥协；因为世上的万事之中，都存在着长期、短期、全局、局部、主流、支流、大环境、小气候、大目标、小阻碍等等数不胜数的变量与因素，决定了我们应当如何对待每一件具体的世事。

====================

民主的关键，绝不仅仅是什么简单的所谓“人民当家作主”；而是，民主的关键在于，在一个庞大的、由许许多多个体之人所组成的复杂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究竟怎样能够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在各样的事情上最大程度地达成一致意见。换言之，民主的核心涵义是在于，由数量巨大的个体之人所组成的人民，究竟怎样才能够自己治理好自己。

在一个国家、社会中，在人民自我治理的这种过程中，若想要达成顺利的民主进程与民主制度，人民至少需要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在大多数人民中间，人们应当认识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异同，并且愿意重视公共利益的重要性。

第二，在大多数人民中间，应当有起码的是非、公义、平等、诚实、和平、仁爱、等基本的道德法则与道德品质。

第三，在大多数人民中间，人们应当愿意以诚实谦卑、实事求是的心，寻求事实真相，寻求真理。

第四，在大多数人民中间，人们的生活、生命、心灵应当是基本上自由的，而不是如同奴隶一般，眼睛被蒙蔽，耳朵被堵上，嘴巴被捂住，既无法知道世事真相，也无法发声。

____

我们如果深思以上条件，就会认识到，上面的四个条件虽然看似简单、基本，但却实际上非常复杂、深邃，而且很难量化、测量、验证、校准。

不过，至少，正如上面所引述的所多玛、俄摩拉那样的情况所显明的，我们无可置疑地知道，民主本身，并非是没有前提条件的。

因此，我们在这里强调指出：所谓民主应当是，自由、圣洁之民所进行的自我管理的政治组织形式。

这并不是说，民主社会中的人民，就非得要完美、毫无瑕疵不可。事实上也绝非如此。在这个地上世界中，在人间社会中，不可能有完美的国度，也不可能有完美的、毫无任何缺点的百姓。从本质上说，只有上帝的国度才是那完美的、能够持续到永远的国度；上帝之国是属乎天上、而不是属乎地上的。上帝的国度要在那属他的百姓中间建立起来；上帝的百姓要有着成圣的生命；上帝的国度是指向永恒、永生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地上之国与上帝之国之间，就根本没有任何关系。无论是世上的法律，还是世人的心灵；无论是情感、理性、灵魂，还是关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信仰观之中的真理；在地上之国与上帝之国之间，都存在着深刻的、绝不可忽视的关系。敬畏上天，是人智慧的开端。圣经中告诉我们说：——你们应当尽心、尽力、尽意、尽性地爱主你的上帝，并要爱人如己。

我们若要深刻而全面完整地回答“民主是什么”这个问题，那么，就必须要深刻而全面完整地明白，地上之国与上帝之国之间的关系。

另外，关于上面所列出的、民主社会中人民所应当具有的“四个条件”，我们怎么能够判断，在一个国家或社会中，是否有这样的条件和特点呢？我们又能够做什么事情，来加强或改善那些特点呢？难道，是通过行政命令和威逼等手段吗？那不岂是又成了专制主义政府了吗？那么，是非、对错、好坏、善恶、等等，到底又是由谁来决定呢？我们又怎样避免所谓“多数暴政”的暴民主义政治呢？

我们若要对民主有深刻的理解，就必须要从反面来思想这个问题，即，民主的障碍、敌人、反对力量，在于什么？是什么样的因素，会导致民主的失败？这些障碍、阻拦、因素背后的机理，又在于什么？民主与人性、民情、社情、国情，与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世界观、信仰观、等等之间，有着什么样的深刻而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将会深入地思考上面的这些问题。

==

为什么要进行民主

民主的目的，绝非仅仅是为了人们在物质经济文化生活等等事务上的安宁昌盛，或仅仅是为了社会政治与权力更替的稳定等等，而是，为了正义、公义、平等、自由等等道德与心灵领域的重要原因。圣经告诉我们：应当“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

从本质层面上说，所谓民主政治制度，必须与道德价值深深相联。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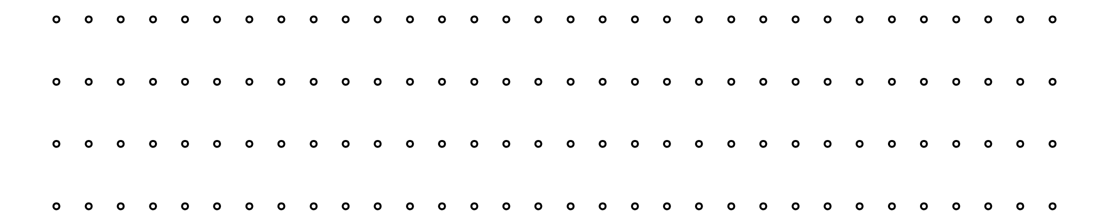
。。。。。。。。。。。。。。。。。。。。。。。。。。。。。。。。
。。。。。。。。。。。。。。。。。。。。。。。。。。。。。。。。
。。。。。。。。。。。。。。。。。。。。。。。。。。。。。。。。

为什么要开放

如果我们追溯180年来至今的近现代中国史，并且深思其中的纷繁、混乱、动荡、事件中的共同点，那么，我们就会看见一个共同的、鲜明的共性，那就是，无论是在慈禧时代，还是北洋军阀时代，抑或是蒋介石时代、毛泽东时代、还是邓小平时代，直至今天，——它们都面对一个同样的挑战性问题，即，应当如何面对西方世界、以及现代科技文明、政治文明、等等。在它们中间，大多数答案都是在于，——仅仅是采取有限的开放政策；即，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它们看重科技进步、经济开放，但是，它们都试图避免政治民主的文明。

它们的经济开放，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实用主义的、功利主义的开放；在它们心中所迷恋的，仍然是从前那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专制主义世界。它们没有一个真诚地、热忱地寻求真理、寻求公义的态度和立场。

过去180年的中国近现代历史告诉我们，上述立场是错误的、并将总是会面临困境。中国执政者迷恋专制主义政权，然而，他们最终在专制主义所导致的不公不义、愚昧顽梗、好勇斗狠、民族自大主义、动荡政局中，摔得头破血流，并给国家与人民带来巨大灾害。



____

言论自由以及反腐败

自从1980年以来至今的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虽然在经济体制上，人民生活有了相当大程度的松绑，但是，在言论自由、思想、信仰和精神领域，直至今天，亿万中国人民仍然生活在奴役、捆绑、蒙蔽视听、堵嘴的专制极权统治之下。在1980年代末、六四事件以前，在胡耀邦、赵紫阳主政的时代，曾经有过短暂的言论松绑，然而，自从8964民主运动被辗压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思想精神领域彻底失去言论自由、而同时另一方面举国上下进入了娱乐至死、犬儒主义、精致利己主义、甚至在一些人群中荒淫糜烂的状态。

四十多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厚颜无耻地进行所谓反腐败运动，但整个官场、乃至整个社会却进入越来越腐败、骄奢淫逸、荒淫堕落的局面。到今天，中国虽然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在中国社会上下，却充满了仇恨、暴戾、苦毒、伤痛、信仰缺失、礼崩乐坏。中国的官场官员们、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高层家族们，早已经腐败透顶、甚至富可敌国。

与台湾、香港、澳门、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地相比，中国大陆腐败横行的一个最主要原因之一，正是由于缺少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媒体监督、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等重要的现代政治体制因素。这样的腐败政治局面，必然导致愈来愈不公不义的政治体系制度，并必将给国家与人民带来苦难深重的灾祸。

———

人民的希望

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时候，由于打倒四人帮、结束文革、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建设四个现代化等等，中国人民曾经对于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对于中国共产党重新充满了信任和希望。一些思想开放的人甚至以为，这一次，中国会向民主自由的政治道路打开门，中国人将要真的走向幸福康庄大路。

但是，邓小平心中所想的，与中国人民心中所盼望的，并不一致。这一点，到1989年六月四日的时候，无情地显现了出来。邓小平所要达到的目标，是经济发展、政治专制极权。从那以后，整整三十多年时间过去了。邓小平当年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整个国家也在更广泛地程度上，几乎变成了一个像纳粹德国一样的国家。朝野上下，对于西方世界、西方文明充满了憎恶、仇恨，对于中国文明自身，充满了狂妄、愚妄、自大、自傲。

今天，当我们眺望未来的时候，让我们思考，那中国人民的、曾经的关于民主自由、走向现代政治文明的希望，什么时候能够真正地开始实现呢？

____

年轻的一代

1980年代期间的中国年轻人是幸运的，因为他们在那短暂的十年窗口期，享受到中国共产党执政七十年中的短暂的开放言论、新闻、媒体的时代。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尤其是那些年轻的大学生们，曾经极其憧憬和向往着西方的那些美好的民主自由制度。十年文革的枷锁，让年轻的一代感受到自由空气的甜蜜和宝贵。

但是，遗憾的是，这一切都在1989年64以后嘎然而止了。中国共产党的铁拳统治，又重新开始；钳制言论、思想、精神的铁幕，又重新关闭，直到今日，已经持续了三十多年。在铁幕统治下，亿万中国人民一面在努力地发展经济，一面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宣传、谎言、欺骗、洗脑、信息扭曲

之下，变得愈发憎恨西方国家；自大、自傲的民族主义，充斥着、毒害着无数人的心灵。

———

四个现代化的梦想与政治改革

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口号，是周恩来在去世前不久的全国人大会议上首次提出来的。随后，这成为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在中国的一个最重要的政治口号。这四个现代化，其实都是像洋务运动一样，集中于科技、军事、器物，但却无视政治改革、民主自由制度的极端重要性。

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的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证明了（也将要继续证明），故意无视政治改革、无视民主自由制度的现代经济改革，虽然使得国家经济状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却将要如同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纳粹德国政权一样，给世界以及本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伤害、不公不义、甚至灾难。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个政治口号，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中国曾经非常流行，甚至直到今天，很多中国人还对此笃信不疑。

一方面，这个政治主题有效地、有力地帮助邓小平等经济改革派实现了权力更替，取代了华国锋的过渡政权，正式地结束了文革中的荒谬思想错误，结束了文革的残酷思想桎梏与阶级斗争。因此，这个政治主题虽然不是完美的，但是，显然它要比荒谬罪恶的毛泽东阶级斗争思想、文革动乱、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等等好得多。

但是，另一方面，这个政治理念与人生信条，使得整个中国社会在接下来

的四十年中进入了信仰崩塌、礼崩乐坏、唯利是图、甚至“笑贫不笑娼”的精神和心灵的局面。这是因为，在这个政治主题的内涵中，包含着深刻的“强权即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有奶便是娘”、实证主义、唯物主义、等等谬误极深的思想内容。这样的思想内容，——忽视、无视、甚至蔑视——道德的内在隽永价值、信仰的内在隽永价值；——把人带入罪恶悖逆的深渊；在这样的思想体系下，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人至贱则无敌”、“厚黑学”、“一切靠实力说话”、“物质主义”、“攀比与炫耀”等等——都成为“显学”，成为人们堂而皇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人生信条与人际关系法则。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C%9F%E7%90%86%E6%A0%87%E5%87%86%E5%A4%A7%E8%AE%A8%E8%AE%BA

真理标准大讨论

真理标准大讨论或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是1978年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两个凡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两种执政指导思想的讨论，实质上是文化大革命路线和实施经济建设的改革开放路线的较量，也是中国共产党党内以邓小平为领导的务实派和以华国锋为领导的派别之间的辩论，是邓小平主导的“拨乱反正”的重要部分。

经过

真理标准大讨论由一篇文章的发表而引发，这场大讨论前后历时三年多。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刊登了经胡耀邦审定的由南京大学教授胡福明撰写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天，即5月11日，《光明日报》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署名是“本报特约评论员”；当天，新华社将这篇文章作为“国内新闻”头条，转发全国。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以及不少省级党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到5月13日，全国多数省级党报都转载了此文。这篇文章阐明，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是检验党的路线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由此引发了一场大讨论。

四人帮倒台后，许多人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华国锋提出了“两个凡是”。

邓小平复出后，提出要完整准确地对待毛泽东思想，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否定了“两个凡是”的观点。这次讨论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教条主义的情形，形成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

从1979年5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在广大基层，进行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任务的基本完成，也标志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结束。

===
===
===

+++
+++
+++
+++
+++
+++

+++
+++
+++
+++
+++
+++
+++
+++
+++
+++
+++
++

【引述 《见证基督》】

物质主义的不足

培根曾经说道："我宁可相信世上所有的童话，也不会相信这个世界没有一

位智慧的设计者”。这个说法，代表了许多人心里的共识。培根还说道："无神论主义对于无神论者来说，往往只是他们在口头上所说的事，却不是他们心里面真正的想法；就好象，他们自己心里也不确定，并反复要在嘴上说出来、以求得别人的支持”。CICERO曾经在著作里面问道："一个民族，或是一个社会，如果在文化传统中没有对于神的敬畏，那会是多么糟糕的光景呢？” 关于神的概念，在人的心里是无法去除、无法消灭的。当处于危难时刻、生死攸的关的时候，即使那些心里面没有信仰的人，也会呼求上帝的帮助。

无疑，本章所讨论的中心话题，物质主义，与另一个看似不明显的题目是息息相关的，就是无神论主义。如果除了物质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存在，那就没有上帝。如果我们的意识所能认识的对象，除了物质以外别无所有，那么我们就不可能认识上帝。在本书第三章，我们已经指出，无神论主义与物质主义一样，对于人灵魂的教导和生命而言，都是远远不足、有重大缺陷的。在本章，我们还要进一步指出，它们关于宇宙的描述也是远远不足、有重大缺陷的。我们无论从理论意义还是实际意义来看这个问题，都会发现，人类在终极层面上不能以物质主义为依归。

用简单的几句话来描述物质主义观念到底是什么，其实并不容易。因为，这个问题在不同人的眼中往往重点不同，内容也不尽相同。有的人认为，物质现象足以用来描述生命的一切现象。还有一些人则认为，在物质之外，还要考虑“力”，或能量。不过，就一般性而言，我们可以把物质主义

观念定义为：否认意识能够独立存在于物质。物质主义者声称，思想仅仅是物质高度组织化的产物。物质主义者否认物质及其组织形式是思想与意识所创造的产物，即，这个世界没有一位智慧的设计者。物质主义者还认为，人的认知与意识，并不具有独立于物质的存在性。人的意识与思想是物质原子的组合与互动而导致的结果。

在物质主义框架内，关于物质的基本形式或起源形式，有一些不同的理论。有的人主张原子理论。还有的人认为，物质的基本组成是来自于遍满空间里的某种液体物质形式。这些理论都仅仅是一些假设而已，因此在我们本章的讨论中可以忽略其中的一些细节。一个重要的话题是，物质与物体的组织形式是怎样形成的。一些人认为，物质本来都是无机的，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物质组织形式发生了变化，从而生命开始出现了。

就这个意义而言，所有的物质主义观念系统都不可避免地包含了某种自发衍生与自然进化的理论，尽管，那些理论本身之间并不必然有什么固有联系。比如，STRAUSS博士认为，在过去的某个时间点，细胞自发形成了，从而无机物变成了有机物，并且，随着时间的进展，生命开始进化出来。显然，这里我们面对的是生物进化论。对此我们有必要简单说几句。即使推崇进化论的赫胥黎博士也不得不承认："没有任何直接而可信的证据，能够表明，生命可以从无生命的物质进化而来"。让我们来仔细看一看物质主义者怎样试图解释生命的存在性。然后，且不说这样的解释能否满足心灵与良知的要求，就仅仅看一看，这些解释是否经得起我们理性的推敲。

在物质主义者眼中，这个世界并没有一位智慧的设计者，也没有一位有位格的上帝来掌管，更不是由那位全能无限的上帝所创造。不论物质主义者所持的具体理论是什么，他们都一致地拒绝承认在这个世界存在着超越物质的宇宙的定律和事实，否认在自然现象的背后有一位无限智慧的造物主，那位能听能看有思想意志的上帝。

让我们思考，那些实证主义者与怀疑论者的主张究竟是什么。显然，他们认为，人类能够认识物质，但不能认识超越物质之外的东西。意识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物质的衍生品、附属物。物质是第一性的，而意识是第二性的。物质是客观存在的，可以被我们所知道。但意识不是客观性的，因而，若离开对物质本身的认识，我们不能对于意识有任何认知。意识只不过是物质特殊组织形式的产物，比如，是电子运动的产物，是物质粒子互相运动的结果，仅此而已。

我们且不说上述解释能否满足我们的良知，信仰，以及对于永生的渴望；在此，我们仅仅考虑，这样的解释是否能够满足我们理性的思考与推敲。根据我们对自己本身的认知，我们能够相信上面的解释吗？LOTZE先生说道："在人类思想的所有谬误中，在我看来最奇怪的一点就是，人的意识怀疑自己的存在性。人的直接经验首先是自我认知，然后才是间接地认知外

部物质世界。然而，人的意识却通过其自身形成的知识，进而否认自己的本质存在性”。

如果我们仔细省思上面这句话，就会立刻明白其真实性。我们其实并不真地直接知道外部的物质世界。我们的第一手知识和经验，其实是我们自己的意识状态本身。LOTZE先生继续说道：“我们对于我们所生活的自然界如此熟悉，以至于其中有任何违反那些我们所熟知规律的现象的时候，我们就能立刻感觉到。久而久之，我们对自己的意识本身熟视无睹，下意识地把外部物质世界当成了我们的直接经验，并看见其中充满了各种复杂的规律。最后，我们以为，我们自身意识的内部，也是由这些外部物质事件组成的，就像外部物质世界中的那些粒子交互运动一样。我们看见外部世界中的粒子彼此碰撞，因而也认为我们内部的自我认知、情感、盼望，等等，也是如此。我们认为我们的意识，只是对外部世界的反映。我们一切的思想，情感，决心，内心的渴望与呼求，都是这些物理粒子运动的结果。只要我们认可这种关于意识的论断，那么，物质主义者就可以在象牙塔的学院里面大行其道。在今天的大学里面，充满了各种类似的理论和说法。然而，那些物质主义者仅仅能在学校的教室里宣扬他们的这些谎言而已。因为，只要他们离开了讲授唯物主义的课堂，回到现实生活中，就会暴露出他们的真实思想状态和光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仍然会和世上任何一个人一样，会继续去爱和恨，继续去盼望与畏惧，继续去梦想和钻研或钻营。他们对我们的劝说将是徒劳的，因为他们把人的意识仅仅是当作神经能量的运行，身体的物理组织而已。他们声称，人心中对真理的热爱，仅仅是脑干神经纤维的某种运动而已。”

我们的意识与自我认知本身，并不是我们不可认识的，也不是我们必须通过物质为媒介才能够知道。恰恰相反，我们首先直接地认识到我们自己的意识，然后才通过我们的意识而认识到物质世界。这引致我们要问的下一个问题是，我们对于外部物质世界的知识的本质是什么？人类知识的根基在于什么呢？是否，在经过对外部世界的仔细观察与研究之后，我们应当得出结论说，在自然界中，除了对于物质以及物质之间的作用力的知识以外，我们别无所知，不能认识任何其他事情呢？亦或是，我们是否，不仅能够认识到自然界的现象，更能够认识到自然界现象背后存在着一位智慧的设计者、一位能听能看有思想意志的上帝？尽管上帝本身是无限而绝对的，但他可以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并把他的启示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

在上述两种选项之间，看起来，后者有充足的依据。

哲学家康德的一个主要论述，就是指出，在人的思想意识中必须要有一个先验的认知，否则，人的任何经验都是不可能的。康德从未否认，我们的知识来自于经验，来自于感官的体验。但是，他指出，在我们的感官体验能够变成意识内的经验之前，必须要预先有一个内在的、独立于外部世界的、先验的认知，事先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在康德看来，这就是人的思想、认识、经验、知识形成的过程。我们可以简单地打个比方，以说明我们本章的论述目的。

当我们的眼睛看见外部世界的各个对象的时候，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它们的某种相似处或不同点。进而，我们对这些对象、物体、东西进行分类和泛化，举一反三。并且，我们关注它们之间的彼此联系，以及它们与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有我们对它们的认识之间的关系。对此，我们形成了关于它们的知识。我们称之为规律。这样，逐渐地，我们就认识到自然界中的一般规律，比如万有引力定律，热胀冷缩定律，等。我们是什么时候得到关于它们的知识的呢？不是在我们仅仅用感官看见它们、体验它们的时候。仅仅凭着感官的体验，并不能使我们得到思想与知识。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就是我们的意识本身。正是我们里面的意识，以及自我认知，才使我们人类与自然界中的任何其它物种都不同。（有人在这里又会朝向另外一个方向说，那么，自然界的定律就是人创造的。这种理论，是从一个错误的极端，即唯物主义，跑到另一个错误的极端，即，唯心主义。在这里，我们暂且停在这里，不把辩论进行下去）。

当我们谈到人们所认识的自然界规律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那些规律是我们所发明或创造出来的。的确，那些规律并不存在于我们的感官体验本身中。它们也不是可见地存在于我们对具体客观物质对象的认识中。我们无法给那些规律画一个具体的长相。它们是我们的意识对于自然界现象的总结归纳而推演出来的结果。然而，它们虽然是我们意识推演的结果，但却不是我们意识所创造发明出来的结果。它们本身有着客观存在性，因为它们确实是实实在在地运行着。那么，它们是在哪里存在着的呢？对于这

个问题，只可能有一个回答。那就是，它们存在于一个与我们的意识相似的一个伟大意识中。的确，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才可以认识它们。人的意识，在自然界中所看见的，是那与人自身意识相似的伟大造物主的意识的运行。

这个辩论非常简洁明确。在基督教护教学中，这被称为“目的论”的辩论。换句话说，这是关于“这个世界是出于伟大智慧设计者之设计”的辩论。首先，我们认识到，在自然界中，有关于一位伟大造物主的永能与神性的启示。进一步说，自然界本身，并不能完全启示出那位伟大无限的上帝。这位无限、绝对、全能的造物主，是一切存在的起源、根基、和支撑者。并且，这位伟大无限的上帝，是有无限智慧的，有着思想、意志、意识、灵。不但如此，这位上帝是有位格的，能听、能看、有自由意志。最后一点是，我们对于这样一位伟大上帝的信仰，并不包含任何矛盾。

前文已经论述了，在自然界现象与规律的背后，有一个与我们自身意识相似的、伟大的意识。正是因此，世界才能被我们所认识。我们也承认，自然界现象与规律本身，并不能显明上帝的无限性。然而，我们清楚的是，那导致现实世界之存在的第一因，即造物主本身，一定是无限的。否则，如果造物主是有限的，那么，我们一定还会设想出，造物主本身的界限，或那个“第一因”的局限。这样，就一定会有别的什么东西导致了那第一因。或者换句话说，一定有别的什么东西，创造了那造物主自己。若上帝本身是无限的，那么，他就是“自有永有者”。那个导致世界存在的“第一

因”，是无限的，因而没有任何别的什么因素，导致他的存在。上帝是自有永有的，因而，他不需要别的什么东西，来把他创造出来。所以，上帝不可能不是无限的。同样，那导致世界存在的“第一因”（即造物主自己）不可能不是无限的。他从无创造出万有。万有都是出于他、本乎他。我们的生命、动作、气息、存留，都是在乎他。

“第一因”也必然是独立的。如果他不是独立的，而是依附于什么别的事物，那他就不可能是第一因。任何别的事物，都必须依附于这个第一因。所以，从任何意义说，这个第一因都必然是完美的、完全的、整全的、全能的、绝对的。

当我们仔细观察我们周围的宇宙、自然界环境的时候，当我们认真思想它的本质的时候，我们就会不可避免地得出一个结论。那些围绕着我们的客观对象、事物、事件、运行、规律，投射在我们的意识、认知、知识中，使我们不得不寻问，导致它们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在我们求问的过程中，我们不会停息，直到我们看见了那终极的第一因为止。并且，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那第一因必然是无限、终极而绝对的。那第一因必然是至善、至美、全能的。

不但如此，我们还会不可避免地得出结论说，那个“第一因”一定是有思想

意志的。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在自然现象中，我们本身意识的存在性，也无法解释我们自身意识的来源。换句话说，那“第一因”不仅是宇宙万物的造物主，而且也是我们生命的造物主。是他赐予了我们生命，并赐给了我们思想与意识的能力。

泛神主义者通常会认为，这个宇宙的造物主或第一因，是无意识的，是没有位格的，是无自我认知的。他们认为，虽然“泛神”遍及世界所有，无处不在，但是，那个“泛神”自身并没有意识和意志，而更像是一种神秘的能力，或是运行着的能量，仅此而已。LOTZE先生对此很好地辩驳说：“这样的概念是无法接受的。我们自己通过意识和理性认识了这个世界，却想要自欺欺人地认为，那位导致世界存在的‘第一因’本身没有意识。只有目光短浅的人才会认为，那个‘第一因’是无理性、无意识地运行的。换句话说，持这样思想的人，从终极而言，实际上是认为世界中的事物、事件、力量都是在盲目运行的，其中没有任何具有真正终极性意义的理性、意识、计划、盼望可言。”

另一方面，当现代物质主义者们宣称“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其中的物质及其规律以外，我们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毁掉了知识的根基与确定性。他们认为意识是依附于物质的，但是，我们正是通过意识才能够认识到物质。假如这个世界上有任何“知识”的话，那么，这知识首先是属于意识的知识。只有当我们有了意识，才能够通过意识而认识到自然界现象中的知识以及其中的规律。即，在我们认识自然世界的过程中，

在我们里面必然先要有意识和先验性的理性。（否则，我们就无法对自然现象进行归纳、总结、分类、联想与推演。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就只能停留在感官的体验，而不能形成知识）。并且，我们能够从自然界的规律中看见，一定有神的永能和神性，因为，那能够被我们意识所认知的自然界以及其中的规律，一定是出于那与我们意识相似的伟大"意志"。

我们进一步说，在人的心中，总是会有敬拜、倚靠的对象。每一个人活着，总是有他活着的目的，想要达到的目标。人的生命，总是在寻找目的和意义。人的生命中，总是会有精神支柱。这精神支柱，就是他终极的心灵归依，是他的眼目的焦点，是他在生命中所最看重的。当人找不到上帝、不信上帝、背离上帝的时候，他就会为自己造出各种有形无形的偶像，并在这自己双手所造的偶像面前，对它跪拜。那么，物质主义者给人的心灵提供的是什么样的"偶像"呢？这就是，自然界物质及其规律运行的那一股绝对的、不知道、不可知的"力"。人们的心灵会在这样的"力"面前下拜。人们的生命与信仰，变成了功利主义，崇尚强力，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强权即真理。在物质主义的理念系统中，从本质上说，道德观念，从基督教信仰中那来自于神的绝对观念，变成了唯物主义中、意识从属于物质的次要观念。

而且，不但如此，物质主义的观念系统，还会带来更加黑暗、更加致命的后果。生命会成为死亡。永生的门被关上。人们盼望的眼睛，将要充满绝望。物质主义不仅使人丧失了在道德方面努力的伟大动机，并且，深刻改

变了人的生命与工作的本质性质。更加糟糕的是，它去除了人生命中真正喜乐的源泉，拔出了人生命中真正平安的根基。它的后果，必然是没有永远盼望的生命，是彻底的悲观主义。物质主义所带给人的，是人类有史以来的最令人悲哀和绝望的信仰体系。

上帝、上天，是人生命、思想、行动中的必需倚靠。一切世人的观念中，都普遍性地存在着关于神的概念。上帝是我们知识的来源和根基。如果没有上帝，那么，一切思想都会成为混沌。如果人的思想当中忽视或摒弃了上帝的概念，那么，思想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水之泉。上帝是我们道德本质的根基，是我们良知的源泉，是我们意志的基础。如果没有上帝，那么，"对与错"就没有真正的意义。如果没有上帝、没有那位终极道德权威者的声音，那么，我们的良知也会进入不停挣扎、纠结不止的可悲境地之中。如果没有上帝作我们所倚靠的对象，那么，我们的良知就不能告诉我们，律法与正义的真正标准是什么。

我们并不是在这里宣称，只要我们思想中确立了"关于上帝的观念"以及"对于上帝的信仰"，那么，我们就能够解释世界上和人类历史上的所有秘密、所有困难。我们也并不是说，只要有了对于上帝的信仰，我们就能够立刻消除此生此世中的所有困难与挑战。甚至，当我们有了对于上帝的信仰以后，思想中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前所未有的难题。

是的，我们要承认，当我们认识到这样一位无限大能的、能听、能看、有思想自由意志的、有位格的全能上帝的时候，在我们的思想观念中，会产生一些关于世界、关于人生的，看似难以解决的难题。然而，即使是在这里，我们仍然能够看见希望的门。如果我们仅仅是从自然与历史之中的启示看见神，那么，我们的心里或许就会充满困惑犹疑。我们会对自己的命运深感焦虑，也会对他人的境遇和未来感到气馁。然而，正是因为我们认识到，那掌管自然、赐予生命的上帝，是有位格的，即，他是能听、能看、有思想意志的，所以，我们知道，他必会把他自己的心思意念启示给我们。他的这种特殊启示，必然超越他在自然秩序中所给我们的一般性启示。

一个人若相信上帝是有位格的，也会相信上帝必然愿意把自己启示给他的所造之物，相信上帝愿意把他自己的心意、计划、旨意启示给他所创造的世人。如果没有上帝，那神迹也就不可能。若我们接受泛神主义，或者说，本质上的物质主义和无神论主义，那么，我们也就不必考虑什么神迹了。但若世界是由这样一位智慧的、有意志的、自有永有的上帝所掌管，那么，他就能够并且愿意与他所创造的世人沟通，因为他认识他们，了解他们。若世界是由这样一位大能而圣洁的上帝掌管，那么，神迹就不是不可能的，而是完全可能的。神迹的目的，就是要见证上帝的启示，见证上帝的同在、意念、作为、以及他与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们相信，神已经把这样的启示给了我们。神以超自然的方式向我们启示了他自己。他所赐给我们的关于他心思意念的知识，是至高的，纯全的，完整的，是人类任何其他知识所无与伦比的。耶稣基督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认识父；父借着子把他完全显现出来”。我们的眼睛有福了，因为它们看见了那至高荣耀之神的显现。我们的耳朵有福了，因为它们听见了那爱与恩慈的信息。这恩典的福音，正是来自那为我们罪而被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从死里复活，荣耀彰显。愿我的心打开，接受他的恩典！愿我们永远不要背耳不听他的话语！“主啊，我们还去寻找谁呢？你有永生之道。”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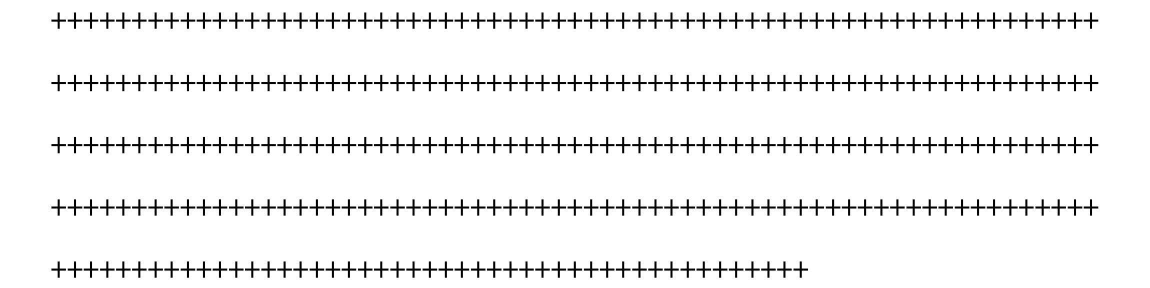
+++

+++

+++

+++

+++



【引述 《见证基督》原著 WILLIAM CLARK 1887年】

第三章

关于个人的文化教育与信仰

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思考人的本质。我们可以把人作为一个个体，当作研究全人类的一个样本，来考查他在能力、权柄、喜好等等方面的表现，并由此推而广之，得出关于人类本质的一些思考。或者，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思考。我们可以把人类当作一个整体，研究人的社会、国家、以及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并从中得出一些结论，也能够从中看出人心里面的光景，及其在社会整体上的投射。

这两种角度都有一定的功用。但无论是哪一种角度本身，都不能给我们关于人性的全部知识。个人主义的角度，会忽视人在群体中的品格特征。纯粹的个人主义，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不仅无法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也不能理解在个人心中的思想与生命的焦点。另一方面，纯粹的集体主义则会忽视人的个体，把人当作是一个整体中没有个性的零件，并且，根本看不见在人心灵与生命中一些最重要的、基本的品格特征。

在前一章，我们已经简单地思考了历史与文明的发展轨迹。我们想要指出，在文明制度中的最重要、最高贵的部分，正是直接来源于耶稣基督福音的影响。如果我们的结论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不仅能够看见基督教信仰对整个人类社会的重大原则的影响与塑造，而且，也能够看见，耶稣基督福音对个体生命的穿透性影响力与塑造。如果，我们没有一个一个良好的、愿意寻求真理、愿意归向神之公义与良善的个体，那么，我们也就不会有一个伟大而高贵的文明。反之，如果个体没有生活在这样一个愿意寻求真理、愿意归向神之公义与良善的社会之中，那么，社会之中每一位个体的发展也不会得到有效的进行。

我们现在从前章中对于文明的讨论，进入本章里面：对于个体文化与生命的讨论。当前，有许多思想家、学者、教师，以及各个学派、流派、团

体，也都愿意讨论这这个问题。可以说，在今天的社会当中，没有什么话题，比这个关于“个体主义”的话题更加引起人们的兴趣——无论是教会还是世俗的团体，无论是研究科学的还是研究文学的人们，无论是关心教育的还是关心政府的人们，都对这个问题深感兴趣。

人是一个活物。就像一切有生命的，人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体，具有复杂的性质。在世上一切受造之物中，人是最高贵的，也是最复杂微妙的。人需要爱护，也需要发展，并有职分进入良善之中。正如一个植物，一束鲜花，一株大树，一只小鸟，一个动物，都有其本身的特质，并需要滋养，需要成长，同样，人作为万物中的冠冕，更是如此。人可以被塑造、被教育，并能够节制自己。若人自暴自弃，或是任凭灵魂昏睡不醒，那么，他就会进入沉沦与败坏之中。

如今，以上这些认知与原则被人们广泛接受、同意，我们不需要对其中的细节赘言。这些共同的认知影响如此广泛，以至于，无论是什么学派或是思想体系，不论是物质主义的还是属灵主义的，无论是无神论者还是有神论者，不论是基督徒还是不信主的，都深深觉得，人们应当接受良好的教育，人类的能力应当得到良好的发展。各种不同的思想之间，虽然有着许多不同的、关于文化的认识，但是他们彼此之间对于人类文化的果效和依据，其实观点并非是像看起来那么相距遥远。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些理论和观点都有哪些内容。第一种常见的、针对个人与文化的观点是，不排斥宗教信仰，但也不支持宗教信仰，而只是把宗教信仰看作是一种普通的社会文化现象。第二种是科学主义的观念。第三种是文学、艺术主义的观念。在他们的观点之间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在这些之上，则有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理论。除此之外，与上述体系不同的，则是基督教信仰的观点理论与方法。

我们深信，当我们越深刻全面地分析上述各个思想体系的时候，就会越清晰地看见他们分属两个阵营。一个阵营是基于宗教信仰的文化观念。另一阵营则是基于无宗教信仰的文化观念。而最终，从基于宗教信仰的文化理念，我们能够看见基于神的启示、基于耶稣基督救恩的基督教信仰文化观点理论与方法。的确，有不少思想体系想要在上述两个阵营之间寻找妥协之处，寻找所谓的第三条道路，想要吸取两者的"优点"，避开两者的"缺点"。但是，这样的妥协道路并不具有长久性和有效性。历史的实践证明，凡是在基督教信仰体系中进行删删减减的人，最后都会滑向理性主义、"不信"主义、自然神论主义，并最终达到泛神论主义和无神论主义。

首先让我们先看一下那些文化思想理论者们自己所宣称的内容。让我们考查一下，他们对于人性本质的认识是什么，以及他们认为应当用什么方法来使人的品质得到发展。或许，令我们震惊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们会看见，在他们的教导与基督福音和教会的教导之间，在很多地方有共同之

处。为此，我们其实真的很应该向神感恩，因为我们竟然能够在那些与我们意见不同的人们身上，居然看见与我们观点的很多相同或是相似之处。当然，在认识到许多共同点的同时，我们也应当儆醒，不应当在那神所启示我们的福音真理上有丝毫妥协或是删减。

我们先来看一下，关于文化教育的不同观点。

先看一下，世俗主义、或社会角度的文化观点是什么。一般而言，大家所说的“良好教养”“良好教育”是什么意思呢？世人都同意，一个人良好的教养，意味着精良、安稳、节制、温柔、友好、尊重等等品格。尽管，或许世俗文化不那么看重寻求真理、崇高的职责感、自我牺牲精神，但是，那些关于人良好教养的品格的观念，也的确值得我们称赞了，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这些品格与很多其他方面的人生重要品格一样，都是不可或缺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那些所谓科学主义者的观念。这里我引用赫胥黎教授的一些话。他说：“我认为，人应当接受文化的教育，因为人应当有知识和智慧，人的身体应当为其精神服务，人应当有秩序的工作，人的头脑应当明白关于自然界的基本真理与知识。......人满有生命与热忱，但人的热忱激情应当由其意志来驾驭、节制、使用，应当作其温柔良心的仆从。人应当学习和热爱美好之事，热爱自然、艺术，憎恶罪恶，并尊重他人，正如

自己愿意受到别人的尊重一样”。这就是一个科学主义者的文化观念。

文学主义者的观念是什么呢？在这个问题上，或许没有什么人比MATTHEW ARNOLD先生更有发言权，因为他就是这样一位著名的文学主义者。这位著名的作家写道：“文化是一种内在的、心灵的活动。文化使人有更多的甜蜜感，看见更多的光明，看见更美好的生命，具有更多的同情之心”。ARNOLD先生并不排斥宗教信仰对与文化的影响。按照他的观点，宗教仅仅是情感加上道德。对于这个观点，我们会在下文评述。

我们再来看一下物质主义、实证主义、无神论者们的观点是什么。当然，有的实证主义者或不可知主义者并不见得完全等同于无神论者。甚至，那些人中有的人心里是有一点点相信有神的。但实际上，不管如何，这些怀疑论者并不想与宗教和信仰发生什么太多的关系。这些物质主义者们对于文化的观点，其实与上述的科学主义者、文学主义者们的观点并无不同。这里，我可以引述著名的LUDWIG BUCHNER博士的论述。他说：“文化应当使人更深刻地看见人的社会生活与民事生活的目的与意义。文化应当使人对于他人的权利有更多的尊重，对于自身的职责有更多的认知”。BUCHNER博士还谈到，文化应当使人有更多的同情心。

最后，基督教信仰理念对于文化的观点是什么呢？在圣经里面的很多地

方，我们都能够看见相应的文字。比如，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提到的、著名的八个祝福，其中所谈到的八种人，包括怜恤人、饥渴慕义、温柔谦卑、清心、使人和睦，等等，都清楚指出了基督教信仰理念所应包含的文化观念。那些观念的内容，是无法被世俗主义的道德标准所超越的。保罗在圣经加拉太书列出了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以及主的旨意和命令。还有彼得也在圣经彼得后书1章5-7节说到："你们要分外地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有了虔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

在上述所有的、不同的思想观念之间，我们会看到其中包含着一些惊人一致的内容。我们并不是要试图停在这里，说，那些共同点都是由于受到了福音的影响。迄此为止，我们仅仅是把今天社会中一些流行的观念思想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总结归纳，把其中的核心要点罗列出来。让我们仔细来思考这些不同思想观念之中的共同点究竟是什么。所有人都同意，若要在人的文化里面有真诚和自由，那么，人就必须要有知识和素养，要有节制，心灵要纯洁，要有同情怜悯的心，思想意志要坚强、要仁爱，要有自制力，同时，人的各方面能力和品质要平衡，这样才会有力但不暴力，温柔但不软弱。关于人所应当具有的这些品格，所有人、所有学派、所有思想者都是同意的。然而，我们面临的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人怎样才能够具有那些良好品格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简直可以说是五花八门，难以详尽地罗列出来。但根据我们在上文的论述，所有的答案，在本质上都可以归结为两个阵营。这就是，基于宗教信仰的阵营，以及，基于没有宗教信仰的（或称为，世俗主义的）阵营。世俗主义者（或，那些不愿意基于宗教信仰的人）认为，人的文化教育，应当仅仅是按照自然的法则，按着人自身的身体和头脑的规律，以及人所处的境况，来进行教育和发展。而基于基督教信仰理念的人们则认为，我们应当按照神的启示、圣经，依靠耶稣基督的救恩，应当按着神的恩典与救赎，来使人认识到恩典与正直，得到恩典、正直的品格。

当然，一位坚信基督福音、教导基督福音的人，可以轻易地指出，世俗主义的文化是不全备的，并不能使人得到完全的、和谐的品格。只有当基督真理在人的心灵里面运行，当人的心思意念从罪中悔改、并归向神的时候，人才能够得到那些恩典与正直的品性。

不过，我们要在这里指出，当我们秉持基督教信仰理念的时候，并不是说，要排斥那些关于人的身体与头脑方面的锻炼、研究、学习等等的重要性。那些事情，不仅是属于科学范畴的工作，也可以是属神的工作。因此，我们应当一丝不苟地仔细研究关于身心健康、医学、教育学等等学科的知识，而不可对它们忽视。

但我们在研究和重视以上各学科的同时，必须要指出，它们绝不可能代替宗教信仰对人心灵与生命的影响力。为此，我们要在下文提出足够的理由和证据。

在此，我们首先必须要认识到，前文所述的、所有人都同意的一个基本原则。若要有真实而完全的文化，就必须要有整全的考虑，必须要包含所有的元素，而不可残缺不全、缺斤少两。这正如一株大树，或是田地里面的植物，需要适宜的土壤、适宜的气候、等等必备的条件都满足，才能够茁壮成长。人的文化教育也是如此。如果我们忽视了其中一些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结果就是不完全的，是反常的，或是充满偏见的。

我们这里进一步坚定地指出，对于一个世俗主义的文化、一个不认识神的文化而言，其中缺少了人性本身一些最重要的、必需的养分。事实上，无神主义的文化，绝不可能像基督教信仰体系的文化那样，能够孕育出丰富、美好、和谐的结果。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无神主义忽视了在人里面的一些不可分割的、或是不可除掉的性质。

比如，在人的心里都存在着，对于上帝的渴望，对于永生、完美、正义、道德之终极标准的盼望，以及对于罪的认知与本质性的憎恶。如果说，这些人性里面不可分割、不可除掉的性质，已经充分地表现在人类历史当中，表现在人的品格当中，那么，一个观念理论体系，若忽视这些至关重要的内容，又岂能给人的文化教育带来什么正面积极的、完整有效的影响呢？在这方面，残缺不全、缺斤少两的思想体系，充其量是一种因无知而导致的幻觉与幻想。

例如，在人心里都有关于永生、永恒的概念。我们举这个例子，是因为这个观念是最接近人性、也是所有人都无法否认的。只谈这个概念本身，并不需要言及道德的责任与诫命，不需要阐述人对上帝的倚靠、对上帝的渴望、对上帝能力的渴盼，等等。无疑，对于人的文化教育体系而言，这个概念很难被忽视，也不应当被忽视。

可是，对此，科学是怎么告诉我们的呢？科学说，它对这个概念完全一无所知。在科学的眼中，生命的意义已经超出了它力所能及的计算公式与科学定律。科学既不知道永恒、永生的涵义，也不想同其发生任何瓜葛。科学研究的对象，只是一些具体可以测量的、人们无法证伪的现象与规律。然而，我们对于科学主义立场的回答是：如果人真的有一颗不死的灵魂，那又会怎样呢？如果人真的在死后，真的会仍然存在着，那又怎样呢？难道你就要把这些观念从文化教育体系里面统统抹掉吗？

我们可以不难预测无神主义（世俗主义）教育者的回答。他们会回答说：“如果，我们正确地理解人所当有的品性，并按着这些品格标准，从各人自然的性格规律出发，去管理和教育每一个人，那么，在我们的文化教育体系里，是否需要提及死后的生命，其实就无关紧要。只要人能够达到真诚的、训练良好的、有节制的、和谐平衡发展的状态，那么，我们就不必在意，究竟用什么样的路径，来完成那样的文化教育目标”。

无疑，上面的这个回答，很有道理，也包含了很大程度上的事实。但我们不想就简单地停在这里，而是要继续进一步深入思考。我们在这里只需要问一个更深的问题。假如我们认为，人的存在只是到他在地上的死亡为止；又或者，假如我们认为，人在死后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生命；那么，是否，不论我们怎么想，我们在这世上对人的文化教育体系都是同样内容呢？让我们把这个问题问得更加清楚一些。假设，有两家人分别在教育自己的孩子。其中一家父母认为，人在地上的死亡，就是他的存在性的终点。而另一家父母认为，一个人在地上的死亡，仅仅是他的另一个更加荣耀的、永远的生命的开始。那么，这两家父母在对自己孩子进行文化教育的方式上，是否会完全一样呢？毋庸置疑，他们两家的文化教育方式肯定不一样。一个相信永生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所关心的问题，与一个不相信死后生命的无神主义者在此生所关心的问题，非常不同。关于死后生命的信仰，会深刻地影响一个人在此生的行为模式与人生观念。因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一个只关注此生的、忽视人心中固有的关于永生与永恒之概念的文化教育体系，注定是不完全的，存在着极大的缺陷。

我们还有很多更加严重、意义更加重大的问题。在我们思考人性以及文化教育的真正本质之前，我们首先要问，人心中关于对与错的道德标准是哪里来的？人的职责是什么？人与上帝、造物主的关系应当是怎样的？当我们开始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那些世俗主义的、物质主义的、泛神主义的、或无宗教信仰的文化教育观念与思想理论体系，一下子就显出它们更多、更严重的缺陷。换句话说，除非那些思想理论体系、文化教育者们顽梗地固执己见，自欺欺人，否则，他们会看见，在这世上没有任何文化体系，能够像基督教信仰理念体系那样，完整地回答这些人生问题，完全地满足人内在灵魂的饥渴。

关于终极道德标准、人的职责、人与上帝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和概念，普遍地存在于人的心里。从前，曾经有人对此反对说，那些观念，都是神职人员们为了达到用宗教信仰欺骗人民的目的，而编造出来的迷信。不过，这在今天的社会早已经没人说这种荒谬的反对之言了。至少，在今天的社会，不会有人堂而皇之地否定那些概念。也不会有人敢于公然对那些关于道德、职责、上帝的观念嗤之以鼻，或将之斥为愚昧落后的无知观念。然而，对于那些刻意想要忽视宗教信仰的世俗主义者们来说，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拼命说服世人：——“在文化教育体系中，关于道德标准等等的那些话题，并没有与宗教信仰的必然关系”。比如，德国BUCHNER学派的人们声称，道德等等问题，其实只是感官所经历的经验，而并不必然与超越性、终极伦理性、形而上学性、等等信仰层面的观念发生一定联系。他们说，并没有绝对的罪。所谓“罪一定会带来罪责、一定会带来惩罚”等等说法，仅仅是人的一种幻觉而已。罪仅仅是由于无知而导致的。无知是人

的一切谬误之源。罪是一种疾病、谬误、绝望感。所谓良知，不过是来自于幼儿园的道德课。对于上帝的观念也是如此。不少无神论者们都愿意秉持上述BUCHNER学派的立场。比如，ATKINSTON先生和MARTINEAU小姐在他们的著作中声称，他们不承认绝对道德标准的存在性。MARTINEAU小姐讲道："我总算摆脱了那位超级主宰者的掌控了。我也不用再担心罪责感所带来的困扰。因为并不存在罪这个东西"。ATKINSTON说道："罪只不过是一根棍子在水中的折射投影，或是一个偏见者眼中的幻象"。

我们愿意接受这样的说法吗？且不说我们自己的信仰（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有丰富的证据显明了福音是真实的），即使从人文主义、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说，所有人也都知道，人对终极道德、职责、上帝的渴望，是普遍性的概念。这些概念，不是只来自于这里、或是那里的一些局部地区的人，而是来自于全世界各地的一切人类。如果说，这些概念，不但没有一个稳固的根基，甚至更糟，完全是一些幻觉和幻象，并阻碍了真正自由的人文文化的进展，那么，我们愿意接受这样的说法吗？当然不会。那些概念，如此真实，甚至就像是我们眼前亲眼所能够看见的那些实实在在的物体一样。我们对终极道德、职责、上帝的渴望，就像是我们对食物的渴望一样真实，就像是我们在疲乏无力时得到滋养、精神焕发、心灵喜悦一样真实。这种生命的特质与经历，在千百万人身上都曾经清清楚楚地显明。

比如，以我们的良知为例。在人类的心中，普遍地存在着"对与错"的概念。在有的人心里，或是在有些地区的人们心里，这些概念或许薄弱一

些。在很少的一些人心里，甚至这种概念完全丧失。但这些个例并不能证明良知不存在，正如一些个别的疯子的存在，不能否定人类心中所普遍存在的先天理性一样。而那些否认"终极道德标准"概念的人，是如何解释人类心中的良知呢？他们说，人们心中的道德观念，是后天教育的结果。所谓的道德概念，不过是人类漫长历史演化的产物。在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激烈斗争中，人们为了自我保护，就必须要惩罚那些伤害他人的人。为了这种自我保护的目的，人们建立起政府，并惩罚那些不服从管理的人。这样，人们就进而建立起"罪"的概念。凡是伤害他人的事，就被看为是错误的，并要受到惩戒。于是，"罪责"、"无辜"等等这些概念就形成了。

关于上述这种陈述，公道地说，我们需要承认其中所包含的一定程度上的客观事实。如果没有后天的道德方面的教育，我们所有人的道德面貌肯定会极其糟糕。但是，这就像是我们的理性方面的教育一样。假如一个婴孩在一生下来以后就被带走，放到牲畜群里长大，得不到任何人类的教育，那么，那个孩子长大以后或许就与牲畜无异。如果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就会因此说，人类不是理性的生物吗？我们就会把那个牲畜群里长大的人看为与牲畜、野兽同类吗？当然不会。我们要知道，在人的本性里面，其先天的理性与道德性质就在那里，尽管或许还没有被开发、发展出来；——当得到适当的教育以后，那些理性与道德方面的先天性质就会成为人实际的品格，在人实际的行动上体现出来。这正如青少年在得到营养与锻炼的情况下，身体上的成长一样。我们也要知道，不论一个野兽、牲畜受到多少外在的训练或是教育，都不会发展出人所具有的那样理性与智慧来。在人与牲畜之间，存在着一种本质上的差别。一个人可能会由于缺乏教育和培养而得不到理性上的发展，但一只牲畜绝不会由于得到教育和培养而得到理性。

在道德方面也是如此。除非有教育的对象，即，一个真实的人在那里，否则，教育就无法进行。你不能教育一个牲畜或是野兽，使之具有“对与错”的绝对道德观念。一方面，我们应当承认，正如一个人在理性方面的发展一样，对于一个人道德品格的形成而言，教育是重要的。而另一方面，我们更应当认识到，人类的道德观念，是来自于先天性的性质。在人的心里，先天性地存在着一种终极道德标准的概念。在成长过程中，我们可以相信所受到的关于“对与错”的道德观念教育。但是，我们在内心深处，不是毫无置疑、不加思索地就盲目接受别人给我们的那些关于“对与错”的观念教育。而是，我们把别人的道德教导，放在我们心里面咀嚼消化，与我们内心的判断和先天性的良知相比较，并以此测试，别人所告诉我们的那些道德观念，是否符合我们良知里面的理性与是非。而当我们形成了那些部分程度上是来自于教育、部分程度上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咀嚼消化吸收的道德观念系统以后，那些道德观念系统，就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很难分割出去的一个组成部分。除非我们再在什么特殊经历的事情上受到了重创，否则，我们的道德品质就很难再改变。这正如我们的理性思考系统一旦形成，思维素质就很难再改变一样。

人并不是一生下来就知道逻辑三段论的定义【译者注：三段论是包括大前提、小前提、结论的三段逻辑推理。比如：一下雨就会路湿。今天下雨了。所以，今天的路湿了】。事实上，许多人都不自觉地在思维过程中违反逻辑三段论。人们应当受到理性教育，清楚地明白逻辑三段论的意思，这样，就会在思维过程中大有益处。在道德方面的教育也是如此。人们应

当清楚地明白道德观念，并晓得自己的职责。一方面，这些道德、理性的观念，是来自于人先天性的性质、理性、良知。另一方面，人们亟需在这些方面受到教育。道德观念，既是直觉性的，是人们先天性的良知，是人们内心自我省思的结果，也需要启发和教育，因为在很多地方，有很多人在道德方面的观念很薄弱。但是，人的良知一旦被激发起来，就能够清楚地辨别什么是良善的，什么是罪恶的，并能够保持道德观念的清楚性和一致性，而且不会轻易改变。因为这些关于"对与错"的观念，本是建基于人们心中先天性的"知道"、先天性的"良知"之上。

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以下问题。人的良知，作为人先天性的性质，仅仅是人类的演化历史中的偶然随机产物吗？人的道德、是非、对错的观念系统，仅仅是人的这种"良知"与后天的教育、经历、境遇相结合的结果吗？这种良知，是人的本质中的必然组成部分吗？关于上述问题的答案，我们不应当有任何犹疑。我们内在的理性和良知，互相结合，告诉我们自己，人是道德的生物。人的心中，有着公义与职责感。这内在的公义与道德的律法，照亮了我们的生命，并指向了一个更高远的世界。

就终极的层面而言，在人心中的关于道德的良知，与在人心中的关于上帝的观念，是紧紧地相联的。在一个人的心里面，以及在一个由许多人群所组成的社会中、国家里，这两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果，在这个宇宙中，除了物质以外，别无所有；如果，人的思想仅仅是关于物质的性质及其组成形式；那么，关于上帝的观念，就会被从人的思想领域消除掉，并

且，关于道德的良知，也就仅仅成为了一个相对的概念而不是绝对的标准，仅仅成为了人们某种特定文化里的临时性组成部分。

关于这个话题的进一步讨论，我们会在本书后面关于物质主义的一章里专门展开。在这里，我们仅仅提出一个很实际的要点。在人类心中，普遍性地存在着关于上帝、上天的观念，——不论种族，不论地域，不论时代。这一点没人能够否认。而且，人心中关于上帝的观念，与人心中关于道德的良知，也是紧紧相联、很难分割。这一点人们也很难否认。的确，德国哲学家康德甚至把人内心中存在的"道德感"当作是上帝存在性的最主要证据。人良心里面的这种"道德迫切感"，无可置疑地显明了人本质中的某种真实性，并由此而证明了那位终极的"律法给予者"、"终极审判者"的存在性。毋庸置疑，正是这种人内心的关于真理与良善的先天性道德观念、终极性道德标准，使人拒绝凡事都是去为了功利、计算、得失而做；使人做事的时候，不是只看损益、成败、利润；使人去做"对"的事情，不做"错"的事情；使人不敢断然宣称说：没有上天、没有终极的审判惩罚。

不过，在德国的BUCHNER博士眼中看来，人心中关于上帝的观念，就和人心中关于罪的观念一样，只不过是如同小孩子在玩过家家游戏时的无知、幼稚的幻觉一样。这些观念，都不过是蒙昧、无知与胆怯的产物。PETRONIUS也提出，人心中的胆怯与畏惧，使人心里产生了关于上帝的观念。MILL先生对此反驳道："我认为，PETRONIUS所说的'畏惧使人想到神'，不完全对。至少，其中所包含的真理成分很少。我想，至少在最基本的层面上，人心

中关于神的观念，有更加可贵的起源”。

如果我们考虑到，在文明国家中，人心中关于上帝的观念与道德良知的紧密相联性，要远比在野蛮部落中更加清晰、更加强烈、更加坚固，那么，BUCHNER博士的理论就会显得很奇怪。人心中关于上帝的观念，以及关于道德的职责感与绝对标准，并不随着人的知识与文明的进步而消退。相反，那些观念以及关于绝对道德标准的良知，在人心里更加扎根、强壮、稳固。不论一个人受到多少教育，学习到多少文化知识，这些知识与文化都不能去除他心中的一个观念和事实：他的生命需要上帝。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的人文启蒙主义时代，著名的世俗主义哲学家VOLTAIRE虽然反对基督教信仰，但他也曾经说道：“即使上帝真的不存在的话，我们也需要把他发明出来”。VOLTAIRE没想到，他的这句话，很快就被他自己国家的历史给佐证了。后来，法国人民在大革命期间，很多人想要把他们的宗教信仰与他们的国家政府历史一起抛弃掉。但是，他们很快发现，抛弃一个政府、一种政治组织形式容易，然而，若抛弃他们对上帝的信仰，那么，他们法国人很快就会陷入自相残杀的混乱与灭亡之中。把法国人民从大革命的混乱状态带回到社会秩序之中的，首先是他们信仰制度的重建，然后才是他们的政府系统的重建。ROBESPIERRE曾经派遣那些参加法国大革命的无神论主义者们去GUILLOTINE参加那里的敬拜上帝的信仰活动。他们回来以后声称，人类需要假设有上帝，正如人类需要有物理科学。这样的说法，居然来自于那些无神论主义者的口中，这真地很令人震惊。

我们在上文谈及，那种把人心中的上天观念与道德绝对标准观念看成是由于人心中的无知、胆怯、畏惧而导致产生的理论。我们已经在上文指出，那种理论或说法是完全错误的。然而，我们在此还应当指出，与那种错误理论或错误说法相对应的，其实有一个重要的真理论断。人在心中、在上帝面前的畏惧和胆怯，其实，会使人去质疑上帝的存在性。只不过，人心中的良知、“道德迫切感”太过强烈，以至于常常胜过人心里面的狡猾与诡诈。但就一般性而言，正是由于人对神的畏惧感（以及人在神面前的自责感），使人不愿意去思考神的启示，不愿意去省思神对人生命的心意和旨意，也不愿意去亲近神、寻求神，更不愿意去思考，有什么办法可以使那在神面前犯罪的人能够与神和好、被牵引、回到神的面前。

因为，在人的良心里面充满了负罪的愧疚。一个在内心中彻底诚实地面对自己的人，一定会为自己的罪责而深感不安。他知道自己从前所犯的错已经发生，无法抹去。他知道自己在当前的境况中软弱无力，虽然晓得“对与错”，虽然想要行善，但却无力去行。对于未来将会发生什么，他更一无所知，惴惴不安。让我们仔细思考人良心的处境，仔细思想人生命的真实状态。在这充满杂草和荆棘的心灵土壤上，怎能培育出良好的文化与文明呢？人心中的这种阴暗，恰恰阻挡了人去认识上帝、寻求上帝，也使人灵魂之中的潜能不能完全发展出来。在这种阴暗的境地中，人的心灵没有真正的自由，因此也不能有和谐的发展和扩张。只有当人的灵魂真正认识神、认识天父，晓得上帝的饶恕与救赎，明白神的真理、恩典与帮助的时候，人的心灵才会有真正的自由、平安与安宁。

所以，我们相信，在物质主义与基督福音之间，没有妥协的余地。在没有上帝的物质主义理念系统与教导我们怎样能够与上帝和好的基督教信仰之间，没有真正的重合之处。很多人想要推崇自然神论主义【译者注：即，相信上帝仅仅是一位造物主而已；他在创造了宇宙自然界以后，就不再进行主动干预，而是撒手不管，仅仅通过自然定律来管理世界】，然而这已经被试过很多次了，并且被一遍一遍地显出该信仰中的重大缺陷。基督教信仰所启示给我们的，是神完整的公义、恩典、救恩，针对的是人的罪、道德、死亡、生命。这些都是自然神论所不能回答的。MILL先生在著作中指出，BUTLER主教针对自然神论的辩驳是无可阻挡、无可置疑的。若至善至美的上帝、造物主真的存在，那么，考虑到我们所处之世界的光景，基督教信仰能够回答关于罪、关于死亡、关于救赎、关于恩典、关于公义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然而，那种认为上帝仅仅是通过自然界、历史、人类良知而启示自己的自然神论主义者却无法回答那些人生信仰中的系列重大问题。

虽然，我们在思考自然神论主义的理论本身中得不到什么收获，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思辨、辩驳自然神论主义，得到许多启发。在这种启发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更深地明白，基督福音是多么有力地把上帝的恩典与能力向人显明。比如，让我们假设，在对人的文化教育过程中，我们从对以下问题的提问和思考开始。人怎样能够在这个纷乱、满有患难与罪恶的世界中，寻找到清晰的亮光，找到那能够引领人的光明，带领我们穿越迷雾？人怎样能够脱离内心的罪恶感与负罪感的捆绑，而得到真正的自由，不再作“罪”的奴仆？人怎样能够得到真正的力量和能力，赢得生命里的争战？简单地说，人怎样能够不再被罪恶、软弱、罪性所羁绊？怎样能够进入完美、和谐、安宁，并且同时，有极大的工作热情被激发出来？

在这世界上，有什么样的信仰系统、理念系统，能够回答这些问题？使人达到这样的状态？我们聆听那些实证主义者的教导，听他们说“世界仅仅是由物质组成的，除了物质以及物质的性质以外，这个世界别无所有”，这样会有任何帮助吗？或者，我们聆听那些自然神论主义者们的教导，听他们说“上帝仅仅是通过自然定律来管理世界的，除此以外别无他法”，或说“一切事物之上都有一股神秘力量在掌管，仅此而已”，这会带给我们什么有益的教诲与确定的知识吗？会使我们灵魂挣脱罪的枷锁，得到真正的健康与自由吗？

那些现代的自然神论主义者与泛神论主义者们宣称，上帝仅仅是一股神秘的能力，是一种能量的流动，或是某种趋势。我们良心里对于公义的感知，以及道德的标准，仅仅是来自于这样的能力、能量或是趋势。我们的宗教信仰，仅仅是道德感与情绪加上情感的混合体。

假如，在圣经里保罗书信中对基督徒这样讲道：“你们要信靠那个带给你们公义的神秘能力，要紧紧倚靠它衍生给你们的道德，谨守它演化给你们的定律”——那将会是何等荒谬！不，上帝是有位格的，即，他能听、能看、有思想和自由意志、有圣洁道德、有话语启示。他是生命的源头，是道德与良善的终极标准。他鉴察人的内心，审判人的罪恶。他是那位全能的律法给予者，是终极的审判者。他创造了我们，赐给我们口、眼睛、耳朵、思想、道德、自由、生命。这正因为，正如上帝在圣经中所启示的，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而被创造的。虽然，人因罪而亏缺了神的荣耀，然

而，若人作为被造之物能够听、能看、有思想和自由意志的话，上帝岂不能听、不能看、没有思想自由意志、没有圣洁道德与话语启示呢？在自然神论主义和泛神论主义信仰系统中，神是没有位格的。在那些信仰里面，人得到自由与喜乐的方式，是奇怪的、神秘的、不确知的。在基于一个没有位格的造物主、神的信仰中，何谈神的启示呢？又何谈关于神、关于人的生命与自由的确定知识呢？

我们知道，基督福音的启示是什么，也知道福音在人生命里面有何等伟大的作为。我们知道，在近两千年以前，福音在保罗的生命中带来了何等巨大的改变。我们也知道，在四百年前，福音在马丁路德的生命中带来了多么美好的作为。我们更知道，福音在宗教改革以前与之后，都在千千万万人的生命中带来了极其令人震惊的、美好的变化。是的，主耶稣基督没有不曾为他的福音与应许显出充足的见证与证据。在那些接受福音之人的生命中，显出了神的大能、公义、圣洁、恩典、与慈爱。关于福音的真实性，作为基督徒，我们更有双份的见证。我们在基督教信仰的历史中，看见神的作为、圣灵的作为，从两千年前的那个五旬节，直到今日的此时此刻。我们在千千万万基督徒的生命中，看到真实而美好的见证。我们更在自己的生命与信仰经历里，感受到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与真实大能。我们相信，一个真实信靠基督福音之人的生命状态，与一个不认识基督、不信靠基督之人的生命状态，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但是，我们并不否认，在这个世界上，有着很多“杰出”的、“文明”的、并

不信靠上帝的人。在人类的历史上，我们或许也能够找到一些个例：他们的道德情操看起来很高尚，有很多智慧，尽管他们并没有什么宗教信仰。我们对此的回答是，这些人往往是处于信仰的间接影响之下。而且这些“高尚”的例子是很稀少的，并不具有一般的代表性。更重要的是，一个人的生命如果是单单靠着自己的力量，而不是倚靠于上帝的恩典，那么他们无论看似好，其实都是在罪性的笼罩中，在谎言、自义与本质上的自傲中。从终极的、长远的意义而言，当一个人忘记或忽视了那宇宙的真正中心的时候，他就会最终以自己为宇宙的中心，以自己的心灵为世界的中心。日久见人心。与这样的人在一起，会是一种痛苦的经历，因为他的心里所真正关注的，是他自己的地位如何，是他自己的待遇与价值如何。

我们可以比较不同的人生，比如，德国的GOETHE先生与日内瓦的FRANCIS先生。两者都是很有能力、文化、智慧的人。但前者是一位世俗主义者，而后者则是一位笃信基督教信仰的敬虔基督徒。GOETHE先生虽然很有智慧、著作颇丰，但却是一个自我中心、傲慢自高、清高自赏的人。然而FRANCIS先生却谦卑温和、待人温柔、满有牺牲精神。让我们思想一下，世俗主义理念系统，以及基督教信仰系统，究竟哪一个思想体系能够培育出更加美好丰富的生命果实。正是那来自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的爱、以及复活的大能，那来自于耶稣基督的恩典与救赎，才使每一个基督徒能够有谦卑、敬虔、热忱的生命，更有属天的平安与美好的盼望。

基督福音的影响，不是仅仅体现在那些著名的、或是社会地位显耀之人的

身上，而是遍及基督教信仰所及的每一个角落。福音给人带来一种崭新的道德规范。教会成为一个恩典与慈善的源头，把祝福与帮助带给社会中那些贫穷、困窘、需要医治的人们，使他们得到新生命、满有能力。基督教信仰给这个世界带来一种从前人们所未曾见过的品格特征，一种人们未曾想过会有的高尚与美好。如果我们压制、摒弃或忘记了基督教信仰，那么，我们的社会还会剩下什么呢？我们还会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呢？只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学习到关于人性的深刻知识，学习到热爱、温柔和忍耐，学习到那满有荣耀而谦卑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些品格，都是在人所能具有的性质中最为宝贵的东西。

LECKY先生在著作中写道：“只有基督教信仰的见证，才能够在将近一千八百年的历史风云中，向世界展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理想品格，并能够在无数人的内心中激发起极其热忱的爱神爱人的心。无论在什么时代，无论在哪个国家，无论人本来的秉性如何、所处的境况如何，许许多多的人们都在基督教信仰的影响下，生命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基督教信仰所带给人的，不仅是一种高尚的情操与道德，更激励人以极大的火热之情、谦卑之心把信仰付诸实践，在爱神爱人的事业上做出很多殷勤服事的工作。基督教信仰对人类历史的影响如此之深，以至于我们可以说，耶稣基督在世上的传道时间虽然很短暂，只有三年多的时间，然而，那三年多的时间，却要远远超过世上所有哲学家、思想家、道德家所作的努力工作的总和”。

前文已经讲述了，关于来世生命的信仰，如何影响我们在今世的人生观念

与文化教育。在这一点上，还有一个也同样非常重要的因素。这就是，我们行事的动机。即使世俗主义思想家MILL先生也不得不指出："超自然的信仰，比人文主义至少有一个重要优势，就是，人对死后生命的期盼"。MILL先生还承认："如果说，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超自然信仰的话，那么，也没有什么证据能够对其证伪"。但是，显然，世俗主义的文化教育只能告诉人今世的生活，却不能给人提供在今世生活的长久动机和能力。

在福音里，耶稣基督胜过了死亡，把永远的生命显明给世人。他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也要去"，"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居所"。我们对耶稣基督之应许的盼望，不仅仅是基于我们对来世之生命的期望或是畏惧。基督所告诉我们的教导，不仅仅是在来世所将要得到的祝福。即使基督不是罪人的救主，他的道德教导也是世上所有人里面最高尚尊贵的。即使基督不是众天使天军的王，他的权柄也在所有人文主义之上。耶稣基督的伟大，深深印在世上那些许许多多最尊贵、最真诚、最纯洁的人们心里。人若想要真诚地寻求人类文化教育的最高理想，并用自己的毕生去实现那些理想，那么，就一定会想要更加完全地来了解和寻求耶稣基督。

让我们继续引用世俗主义思想家JOHN MILL先生在其著作中，对耶稣基督不得不进行的称赞。他说："在耶稣基督的生平与教导中，包含着极其深刻、极其不同寻常的洞见。他的理念和教导，是我们人类所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当这样的崇高理念，与耶稣基督这位有史以来最伟大道德改革者、最

伟大殉道者的身份相结合的时候，宗教，就绝不能被简单地轻视为一个坏的思想、坏的选择。相反，宗教信仰正是引导人类进步的重要因素，并是人类道德的最高理想。即使到今天为止，即使对一个不信基督教信仰的人来说，也找不到什么价值观念上的替代系统，能够来代替基督教信仰系统。更没有什么人，能够比像基督那样的生命，对于人类更加有益”。

即使不信基督的人，也请在上述文字这里停顿一下，仔细凝思。我们即使为了自己灵魂的益处，也要在此想一想，若忽视耶稣基督福音的影响，是否真的明智。更进一步，我们应当追问，在那永恒之中，我们是否与他有分。

++

++

++

++

++

++

++

++

++

++

++

++

++

++

++

++

++

+++

天安门事件与六四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D%E5%9B%9B%E4%BA%8B%E4%BB%B6

六四事件

六四事件，又称六四天安门事件，指1989年4月中旬开始的以悼念胡耀邦活动为导火索，由中国大陆高校学生在北京市天安门广场发起，持续近两个月的全境示威运动，也称八九民运。狭义上指六四清场，即1989年6月3日晚间至6月4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和人民警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对示威集会进行的武力清场行动。

六四事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的爆发标志着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等人在中国大陆推动的后期政治体制改革失败，赵紫阳、鲍彤等中共改革派高层事后被撤职，而胡耀邦已在八六学潮中辞去中共总书记一职，于是1980年代所不同程度推动的自由化改革也就此停止，此后官方只批准了很少的游行活动。国际社会对此事件普遍表示了谴责和制裁，也有部分国家（多数位于中东及非洲）表示同情或者支持，而六四事件的后果除了造成政治从此转向收紧，经济影响也直接导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的放缓，直至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才重新提速。不过，邓小平任内推行的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则一直延续下来，期间更完成了3任政权的和平更替，直至习近平2018年修宪后被废除。

====

历史名称

广义上，“六四事件”或“六四天安门事件”是指1989年4月起于北京市发起并波及全国的抗议活动。更准确的称呼应为“八九民运”或“八九学运”等。事件的命名依据，一方面是要和过去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重要活动有一致的命名习惯，包括1919年的五四运动、1976年的四五运动等。有时候会直接简称“六四”，亦有人使用“六四运动”描述整起示威活动。与海外只集中在特写6月3日晚上清场的态度不同，在中国大陆境内使用“六四”这个词提及的范围与考虑的广度较大，指整个广义的“八九民运”。

狭义上，“六四事件”是指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天安门广场、要求抗议群众撤离的日子（尽管军队在6月3日晚上便执行清场任务），即“六四清场”。中国大陆以外的中文地区也将清场事件称作“六四镇压”或“六四屠杀”。

官方称法

自198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用数个名称指称六四事件，并被怀疑疑似借由修改事件称呼的方式，逐渐降低事件对往后社会大众的影响。在事件刚发生之际，中国政府将其命名为“动乱”，后升级为“反革命暴乱”。事件结束后以“六四风波”指称。后来在江泽民主政后期和胡锦涛主政时期，政府将当天的冲突全部改成更为中立的名称，也就是今日持续使用的“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或“1989年政治风波”这类短语。

2019年习近平执政时期又重新将“反革命暴乱”与中立词语并行使用。

西方称法

西方世界在描述该事件的经过时，经常使用“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英语：Tiananmen Square Protests of 1989）或“天安门镇压”（英语：Tiananmen Square Crackdown）。1990年代时西方新闻媒体经常使用“天安门大屠杀”（英语：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这类字词，但在近年的相关报导中则逐渐减少。主要是因为绝大部分暴力冲突并非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上，而是在北京城西的木樨地。不过“天安门广场抗议”或是“天安门事件”等字词，容易让人误以为整个示威活动只发生在北京市，然而当时中国许多城市都有出现相关的抗议活动。

代名词

在中国大陆境内，上述名称皆于搜索引擎或公开论坛上被列为“敏感词”。为了要绕过网络审查，互联网上出现许多形容六四事件的替代称呼，包括有“5月35日”、“VIIV”（“6”和“4”的罗马数字写法）和“8平方”（= 64）等、“农历五月初一”（1989年6月4日为农历己巳年五月初一，这个表述一般情况很难被认为是六四的意思），对于“1989年”，则用“民国78年”、“平成元年”等字眼规避审查。

随着上述字词在中国网站上传播甚广，现在中国境内的多数网站也将这些视为自我审查词汇。在百度中搜索“天安门事件”则直接显示“四五运动”或

者金水桥事件，但如果直接搜索“六四事件”，则会出现如中国网、中新网和中国日报等官媒发布的有关此次事件的资料，在百度贴吧里面搜索“六四事件”“5月35日”“8平方事件”“VIIV事件”都会显示“抱歉，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相关结果不予展现”。

事件背景

改革开放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大会通过恢复了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党政军职务（合称三副一长），邓小平正式复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1978年12月召开后，获得最高权力的邓小平将改革开放列为重要政策，加速国民经济发展。同时邓小平提拔改革派成员担任重要的政府官员，其中中共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在1980年2月被任命为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分割时任党主席华国锋的权力，同年9月赵紫阳则接替华国锋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1981年下台后，胡耀邦接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自此改革派进入中央最高领导层。尽管市场化的经济政策普遍受到人民的欢迎，但对官员腐败和裙带关系的担忧也不断增长。

经济危机

自1950年代以来，中国便长期透过中央制定的计划定价机制，让商品的价格稳定处在较低水平，但也减少了制造者增加产量的诱因。改革开放后，在经济改革初期，中国政府采取部分产品价格固定、部分商品允许价格波动的价格双轨制作法。但因市场上长期产品短缺而物价较高。部分人则可利用权力以低价购入产品，之后再以市场价格贩售，时谓“官倒”。此外，政府的货币供应量增发过多且过快，造成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工厂无法获得利润；但1988年减少货币供应后，又使得许多金融贷款无法正常兑现。1988年，邓小平在北戴河会议上同意以市场经济为基础，让价格体系得以恢复正常。

但价格管制将放松的消息传开后，随即引起民间恐慌，中国各地民众大量提领现金并购买商品囤积。不到两周内，政府便立即撤销价格改革的政策，但价格闯关带来的影响明显延续一段时间，民间社会面临快速通货膨胀的问题。在官方提出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报告中，指出北京市的物价于1987年至1988年期间增长30%，许多工薪阶层因为无法购买大众商品而感到恐慌。在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许多无法获益的国有企业也被迫削减成本，让过去拥有工作保障与社会福利的铁饭碗开始面临生活的压力。

社会问题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出现了官倒、权钱交易、腐败、特权、贫富分化扩大等种种问题。此外，改革开放以后，改革派领导人设想知识分子会在往后发挥主导的功用，领导国家实施更多的经济改革政策。尽管政府陆续设立新的大学，并增加各校的招生名额，但情况并未如计划设想般实际发

生。一方面因国家所指导的教育体制，并未充分和市场需求不断增长的农、轻工、服务业与外国投资等领域结合；另一方面因专精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学生，则必须进入有限的就业市场。新开设的私立企业并不接受国家分配毕业生，然而高收入的工作则由具裙带关系者取得。条件优厚的工作岗位都被取得后，剩下的职位往往是绩效较差的部门，掌握实质权力者则在该领域并无专长。

面对惨淡的就业市场和有限的出国机会，知识分子与学生们认为凭借处理政治问题将能解决以上问题。这让北京市各个大学校园出现了研究政治为主的小规模“民主沙龙”社团，这些组织逐渐激发学生参与政治的兴趣。受到中国的经济社会逐渐朝向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名义上仍保留的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也面临信任危机。对于民营企业的审核制度，则让许多不良的商人能以宽松的法律优势致富，甚至常在过去强调“没有穷人”的社会中炫耀拥有的财富。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引起民众强烈的不满，也普遍对于国家的未来感到幻灭。

派系斗争

保守派的中共元老

当时人们希望中国政府能有其他改变的作为时，结果政府部门迟迟没有进一步的动作。在改革开放的政策制定和实施后，面对伴随而来浮现的种种问题，领导高层之间在处理办法上出现分歧。但尽管中国共产党内部因为

意识形态而浮现派系冲突，双方人马都需要获得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支持，才能实施各项重要决策。

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又被称作“右派”），主张进一步实施政治自由化的方针。借由设立允许多种想法的渠道，让民众能够表达不满、并进一步支持改革。改革派成员还包括：胡启立、万里、彭冲、习仲勋、田纪云、鲍彤、阎明复、李锐，等等。

另一方面，以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陈云、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为首的激进反改革派（又被称作“左派”），则认为改革开放已经施行过多政策。因而认为重新加强控制以确保社会稳定，并与中国共产党书面的社会主义主张一致。保守派成员还包括：王震、李鹏、薄一波、姚依林、邓力群，等等。

政治体制改革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俗称“8.18讲话”），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议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提倡民主集中制，并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全面修宪建议。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八二宪法》，该宪法也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四部宪法，收入了许多宪政主义的内容和条款，为改革开放奠基。

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赵紫阳主持了后期政治体制改革

随着改革开放的加速，中国社会出现了官倒、权钱交易、腐败、特权等种种问题，经济改革亦受到了原有政治体制的阻碍。1986年上半年，邓小平再次提出“政治改革”并启动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和制定，同年9月“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成立，成员包括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

邓小平的政治改革出发点是，在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前提下，实行党政分开、提高行政效率、革除官僚主义弊端、推动经济制度进一步改革等，但不能照抄西方的宪政制度，他强调：“不能放弃专政，不能迁就要求民主化的情绪。...... 要搞一个增强行政效能的体制，机构要精简。......讲民主必须要和法制联系起来讲，把法制搞起来，才能有稳定的社会环境。我们的行政机构应该很有效能。 ”

与此同时，其他人士还公开提出了“多党制”、“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司法独立”等西方宪政主义的架构。虽然这些与邓小平等人的中国共产党官方改革观点可能有所不同，但在当时比较宽松的政治气氛下，并没有受到过多的抑制与打压。

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主持了开幕式，赵紫阳作了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该报告由鲍彤负责起草，提出并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和设想，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概念。该报告的第五部分详细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将邓小平1980年的“8.18讲话”

作为改革的指导性文件，阐述了许多符合宪政主义的内容，其中包括进一步实行党政分开、权力下放、提倡法治和监督、完善选举制度等等。 十三大还首次实行了差额选举，赵紫阳正式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鲍彤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不久后鲍彤又被任命为中央常委政治秘书。

民间新思潮

“中国人民要现代化，首先必须实行民主，把中国的社会制度现代化。民主并不完全像苏联缔造者列宁编造的那样，仅仅是社会发达的结果。它不仅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达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这个发达阶段以及更加发达的阶段中得以存在的条件。”

——魏京生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早在1978年的拨乱反正时期，魏京生等中国知识分子便开始呼吁政治改革，并在北京市西单民主墙张贴不同政见的大字报。此时允许民众宣传政治自由和民主化的短暂时期，又被称作“北京之春”。但尔后魏京生在1979年3月遭到逮捕，西单民主墙也于同年12月时被迫封闭。1983年，中国共产党的保守派人士在发起了“清除精神污染”的左倾运动。

1986年夏天，曾于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天体物理学教授方励之开始在中国各地大学展开个人访谈之旅，主要谈论的内容包括自由、人权、权力分立等内容。随后方励之成为当时社会大受欢迎的人物，他的发言记录也在学生间广为流传。对此邓小平曾警告方励之主张崇拜西方的生活方式、资本

主义和多党制度，将意味着损害中国的传统价值观、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受到方励之的演讲、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新开启以及世界各地爆发的群众运动影响，学生在1986年12月发起抗议活动，反对改革开放的步伐过于缓慢。其中参与示威游行的学生提出许多诉求，这包括有经济自由化、民主、法治等要求。虽然这次抗议最初是在合肥市附近进行，但很快地学生运动便蔓延至北京市等各大城市。对此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阶层感到惊慌，并开始指责抗议学生试图煽动文革式的动乱。

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被中共内部指责对抗议活动的态度过于软弱，以及因为没有适当处理这次事件而引起社会动乱。胡耀邦遭到保守派人士大力谴责后，在1987年1月16日被迫辞去总书记的职务，但保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在胡耀邦辞职后，中国共产党保守派在邓小平的支持下顺势展开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左倾运动，开始针对支持胡耀邦观点、政治自由化和西方风格者进行打压。这项运动也制止了学生运动的发展，并且使得政治环境一度封闭起来，但胡耀邦也因而获得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改革派人士、知识分子以及学生们的欢迎。但该运动此后遭到了代理中共中央总书记、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反对，赵紫阳认为左派利用了反自由化运动来反对和否定改革开放，并以此说服了邓小平，该运动随后于1987年中期逐渐结束。

1989年4月15日，曾经在80年代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因心脏病发作而逝世，随后引起学生强烈回响与悼念，并成为群众聚集的最初动力。大学校园里陆续出现许多歌颂胡耀邦的宣传海报，呼吁政府重新审视胡耀邦的观点。几天过后，大多数海报开始提到更加广泛的

政治问题，包括有新闻自由、民主制度、以及官员贪污问题等。4月15日以后，一些悼念胡耀邦的民众也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自发组织小规模集会。同一天，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也在校园内设立胡耀邦的灵堂，北京当地学生陆陆续续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4月16日，位于西安市和上海市的学生也开始组织类似的小规模学生聚会。

在部分大学生主导下，原本单纯悼念的活动转向要求政府控制通货膨胀、处理失业问题、解决官员贪腐、政府问责、新闻自由、民主政治与结社自由等。4月17日，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为了纪念胡耀邦而制做了大型花圈，在同一天有更多群众集结在天安门广场上。下午5时，500名中国政法大学学生共同抵达靠近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东门，表达哀悼胡耀邦之意。之后来自不同背景的演讲者举办公开演说，内容包括有纪念胡耀邦、讨论社会问题等。由于被视为将阻碍人民大会堂的运作，因此警方很快便介入示威群众的聚会，并试图说服学生离开天安门广场。4月17日晚上，3,000多名北京大学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进行学校学生的游行活动，很快地近千名来自清华大学的大学学生也参加游行。两队学生抵达天安门广场后，很快就与先前聚集在广场上的群众会合。随着活动规模的增长，聚会活动逐渐演变成为示威抗议，学生们开始向政府起草并提出7项要求：

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功过是非、肯定其“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

严惩殴打学生和群众的凶手，要求有关责任者向受害者赔礼道歉。

尽快公布新闻法，保障新闻自由，允许民间办报。

要求国家领导干部向全国人民公开其本人及家属的实际财产收入，严查官

倒，公布详情。

要求国家有关领导人就教育政策的失误对全国人民作出正式检讨并追究责任，要求大幅度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

重新评价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并为在期间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彻底平反。

强烈要求新闻机构给予这次民主爱国运动以公正如实及时的报道。

新华门事件

示威学生曾一度聚集在中南海新华门静坐抗议，但最终遭到驱离

4月18日上午，学生继续留在天安门广场。一些群众聚集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吟唱爱国歌曲，另外学生也在天安门广场上主办演讲活动。与此同时，数千名学生则聚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居住的中南海入口新华门处，要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高层和学生之间展开对话。警方随即限制学生进入中南海内部，学生则决定原地静坐示威以表达不满。当天晚上，新华门前聚集了北大、人大、北师大、政法大学等校二三千名学生，围观群众六七千人。学生"会聚新华门是因为至今政府没有一个人出来表态"。学生多次齐声高呼"李鹏出来！""李鹏出来！"的口号，并六次试图冲开警戒防线而未成功。许多学生认为他们遭到警方虐待，有关警察采取暴力驱离的传闻也迅速蔓延开来。

新华门事件激怒了许多校园里的学生，许多过去没有积极参与政治事务的学生也因为这次事件，而决定加入抗议活动。在这段期间，一群自称“工人代表”的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则到处发布两份具挑战中央领导集团统治的传单。

4月19日，立场靠近改革派的报纸《世界经济导报》决定出版纪念胡耀邦的专题报导。其中一篇由严家其所撰写的文章中，便对北京市学生发起的抗议活动给予正面评价，并且呼吁重新审视1987年要求胡耀邦下台的作为。不过在得知中央政府的立场渐趋保守后，江泽民要求《世界经济导报》删除相关的长篇敏感报导内容，但《世界经济导报》则以空白页刊登的方式抗议文字审查。最后江泽民马上解除总编辑钦本立的职务，其果断的行动赢得党内元老的正面评价。

由于胡耀邦曾经出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职务，中央决定为其举行国葬，仪式最后决定在4月22日举行，北京市人民政府下达命令封闭广场以举办葬礼。约有十万名学生则在前一天晚上无视命令，游行进驻至天安门广场。在4月22日当天，包括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内的中国党政领导高层皆前往人民大会堂内部参加典礼，并由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发表悼念词，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主持仪式。尽管整个国葬过程向学生直接播出，然而由于纪念活动只持续了40分钟便宣告结束，使得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情绪更为高涨。虽然保安人员封锁了人民大会堂的东大门，但仍有数名学生共同突破封锁线。随后有三名学生跪在人民大会堂的阶梯上，表示要提交请愿书，并要求获得国务院总理李鹏的接见。然而没有任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自人民大会堂出现，这使得绝大部分学生感到失望与不满。

4月21日至4月23日期间，学生们开始筹划成立真正的活动组织。在4月23日，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宣告成立，并选举当时就读中国政法大学的周勇军担任主席，而北京大学学生王丹、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吾尔开希也被推举为各自学校的学生代表。随后北高联呼吁北京市的所有大专院校全面并无限期的罢课，以表抗议诉求。然而这样一个独立于管辖范围外的组织成立，挑战了中国共产党对学生的管理地位。另外一方面，位于湘潭市的湘潭大学学生也发起抗议行动，并且获得许多学校教授支持。同时武汉市当地的大学学生也组织起来，共同抗议湖北省人民政府。

然而在4月22日黄昏，长沙市和西安市爆发了严重事故。其中包括在西安市有暴徒纵火毁坏车辆、房子，并且抢劫靠近西华门的商店；而在长沙市也有38家商店遭到暴徒抢劫，最后这两个城市共有超过350人遭到了逮捕。随着国家局势变得更加动荡，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立即与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多次会议。对此赵紫阳强调要求学生停止进一步的抗议活动，而各自回到大学就读；他亦要求动用所有必要措施来解决动乱行为，而不同级别的政府应该与学生进行开放式对话。国务院总理李鹏则要求赵紫阳谴责示威群众，并认为应该要采取更加积极的防治措施，不过赵紫阳最后驳回了李鹏的看法。尽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高层就回应学生运动的方式意见分歧，而与赵紫阳关系密切的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等人也建议赵紫阳继续留在北京市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但赵紫阳仍然依照原计划，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的邀请，于4月23日飞往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四二六社论

赵紫阳前往朝鲜后，便由留在北京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代理领导党政机关。4月24日，李鹏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以及国务委员兼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陈希同会面，希望能了解天安门广场上的情况。对此北京市官员想尽快解决危机，并认定抗议活动是一场阴谋，旨在推翻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以及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主要党政领导人。在总书记赵紫阳缺席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议认为必须立刻向示威群众采取态度坚决的行动。4月25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和国务院总理李鹏前往邓小平的住处会见邓小平，邓小平同意政府采取强硬立场。邓小平还表示应该借由大众媒体适当地发布“警告”，借此抑制示威活动因为不断传播而扩大。

这次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高层首次对抗议活动的正式评估，而重要问题的决定仍然以邓小平的意见为准。李鹏随后依照邓小平的意见下令起草一份公报，并向中国共产党各个机构和高阶官员要求应该设法对付示威群众。4月26日时，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四二六社论），指责“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阴谋推翻中国共产党和现行的政治制度。然而这项声明激怒了学生，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故意要对付抗议活动。最后社论并没有令学生放弃示威活动，反而促成更多学生愿意团结，并共同表态支持学生活动。

在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组织下，有五至十万名来自北京市各大学的学生在4月27日集结游行，经由街道前往天安门广场。学生团体成功通过警方设立的封锁线，并沿途接受以工厂工人团体为首的市民广泛支持。组织活动的学生领袖希望借由这次游行展现其爱国性质，特意淡化反对共产主义

的口号；其中游行学生主要强调“反官僚、反贪腐、反任人唯亲”这一问题，不过学生仍强调会继续“拥护共产党”。这次示威游行迫使中国政府做出让步，同意与学生代表会面。4月29日，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会见由政府批准的学生社团代表。尽管会谈中讨论了包括报刊编辑、新华门事件、民主自由等广泛议题，并获得一些实质成果，然而包括吾尔开希等学生领袖则表态拒绝出席。

五四对话

4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从朝鲜平壤返国并重新掌握党政权力。然而随着外界要求中国政府对学生示威活动的态度更为软化后，内部相关的讨论冲突反而更为加剧。以赵紫阳为首的温和派，主张继续与学生展开对话；以国务院总理李鹏为首的强硬派，则主张应该强硬地反对抗议活动继续进行。在5月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议上，赵紫阳和李鹏再度针对这一议题有所冲突。当中赵紫阳认为先前强硬派的作法已经证明并无实际的效力，因此政府特别允许这次活动才是唯一的选择。

对于李鹏认为国家的稳定发展应该优先于任何事项，赵紫阳则反驳说中国共产党应该表态支持扩大民主和提升透明度的要求。最后在赵紫阳强力推行下，政府决定展开进一步的对话。赵紫阳随后开放新闻媒体积极报导抗议活动的发展，并在5月3日至5月4日期间发表了两次同情示威群众的演讲。赵紫阳发言中提到学生关切政府官员贪腐的问题是正当的，同时认为这次学生运动应该被视为一种爱国表现。在5月4日当天，有十万名学生在北京街头游行以纪念五四运动，同时再度重申先前示威游行所提出的要

求。赵紫阳的发言实际基本上否定了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内容，这让很多大学生都满意政府所做的让步。5月4日结束时，除了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外，所有北京市的大学皆宣布罢课行动结束，随后大部分学生也逐渐失去参与抗议活动的兴趣，新闻自由获得口头保障，多数人主张以对话渐进推动民主。

再度升级事件

学生分歧与绝食

1989年5月10日，浦志强参加北京学运游行，要求“办报自由”和“结社自由”

正当学生自治会所选举出来的正式对话代表团已经准备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展开对话之际，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组织领袖不愿意由正式对话代表团单方面控制整个抗议活动。在面对学生团体内部不和以及参与群众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包括王丹和吾尔开希等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学生领袖要求采取更激进的作法来恢复抗议声势。其中他们认为中国政府所提出的“对话”只不过是一种诱骗学生就范的方式，因此自5月11日开始动员学生准备进行绝食，希望能够改变《四二六社论》的定性。

最后学生决定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高调对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前两天，自5月13日由柴玲宣读《绝食书》展开绝食抗议；其中学生领袖认为欢迎戈尔巴乔夫的仪式必定安排在天安门广场进行，因此借由绝食抗议便能作为筹码来迫使政府满足他们的要求。此外绝

食获得社会大众广泛的同情，进而使得学生运动成为一种道德行为并且受到群众的追捧。而北京的抗议活动促使得其他城市的大学也陆续组织了抗议和罢课行动，同时有很多学生也纷纷前往北京市参加示威游行，其中在5月13日下午便约有30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整体来说于天安门广场上进行的示威活动仍保有秩序，来自北京不同地区的大学学生每天发起游行以表达抗议要求并且表示团结，同时许多学生也会在行进过程中齐唱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运动著名的《国际歌》。在5月中旬，学生发起绝食行动，促使中国各地四百多个城市陆续集结抗议，表态支持。

苏共总书记访华

1989年5月，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历史性访问中国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是1950年代末中苏决裂后第一位正式访问中国的苏联领袖，两国关系恶化前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曾于1959年访问中国，作为国宾出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10周年大会。苏联领袖相隔30年再次访问中国，象征两国关系改善，因此中国领导人非常重视这次国事访问。

5月上旬至5月中旬时有关采访六四事件抗议群众的审查限制获得明显地开放，国家媒体开始播放包括绝食在内关于同情抗议群众的影像。然而由于担心示威活动将会失控，邓小平要求在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期间应该清除广场上的抗议群众。为了达成邓小平的要求，赵紫阳决定仍使用柔性办法并且指示他的下属马上与学生进行谈判。赵紫阳相信此时仍能够成功借由爱国主义吸引学生的关切，并且让学生了解到如果在中苏

首脑会议期间让其他人士知悉内部有动乱迹象的话会使得全国难堪。5月13日上午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召开紧急会议，并且邀请到重要的学生领袖以及包括刘晓波、陈子明以及王军涛等知识分子。阎明复说表示政府已经准备与学生代表展开直接对话，但前提是学生必须先撤离天安门广场以举办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的欢迎仪式，这样也使学生领袖们之间陷入分歧。

5月14日时，以戴晴为首的知识分子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的许可之下直接通过政府审查在《光明日报》提出意见，呼吁学生应该要尽快离开天安门广场，但是许多学生却认为知识分子是为了政府发言而拒绝做出让步。当天晚上，以阎明复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与担任学生代表的沈彤和项小吉展开正式谈判，其中阎明复肯定学生运动的爱国性质并且恳求学生从天安门广场上撤出。虽然阎明复的诚意成功促使得一些学生愿意达成妥协，但是随着不同派系的学生间无法事先进行协调或者提出连贯的要求而使得会议变得越来越混乱，不久学生领袖在得知政府并不愿意承诺公开直播问题的谈判过程后宣告会议无限期中止。之后阎明复直接前往天安门广场尝试劝离学生，甚至表示自己愿意被学生挟持以换取撤离的决定，然而学生之间并没有理会其劝告。而在隔天阎明复还向李鹏询问是否愿意应学生要求正式退回四二六社论的内容、并且将学生运动定调“爱国民主运动”，但这些建议都一一遭到李鹏的驳回。

最后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期间学生仍然决定继续留在天安门广场，也使得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为戈尔巴乔夫访华举行的欢迎仪式上改在机场内进行。这次中苏首脑会晤于中苏交恶30年后进行，除了标志中苏关系恢复正常外，同时也被视为中国领导人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突破。然而相比之

下由于学生仍然坚持在天安门广场上进行运动而为这次会谈带来尴尬，进而促使得许多原本偏向温和派的领导高层也开始转向愿意实施“强硬派”的作法。其中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在人民大会堂内举行两国领导人之间的高峰会时，学生群众则在附近天安门广场上发起示威活动。而在5月16日戈尔巴乔夫与赵紫阳会面后，赵紫阳则在国际新闻媒体前告诉戈尔巴乔夫表示邓小平在中国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对此，邓小平认为赵紫阳的这句话是要将处理学生运动失当的过错归咎于他。这项言论标志着邓小平和赵紫阳两个中国最高层领导人之间决定性的分裂。

局势升级

1989年6月2日的天安门广场

绝食抗议的作法很快便引起中国各地对于学生的支持和同情，并且在5月17日至5月18日期间数百万名居住于北京市的各行各业居民共同发起示威游行；而参与者还包括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警察人员、中国共产党党员或者是低阶的政府官员，同时许多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及政府资助的工会也鼓励其成员公开参与游行活动。此外一些中国民主党派成员学生致信给李鹏以表达意见，而中国红十字会也特别下达通知并且安排大量人员前往天安门广场为绝食群众提供医疗服务。而在戈尔巴乔夫离开中国后，许多外国记者仍决定继续留在中国并且报导于首都北京市进行的抗议活动，这使得学生运动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并且也让一些西方国家政府呼吁中国政府保持克制。

至此原本于四月底声势衰退的抗议行动重新获得声望，5月17日时来自中国

各地的学生陆陆续续涌进首都北京市以参与学生运动；而在中国各地四百多个城市也爆发规模不一的抗议活动，其中包括中共福建省委、中共湖北省委以及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机关甚至都遭到学生示威游行的影响。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高层迟迟没有针对北京发起的示威活动有明确的定位，这使得地方当局不知道如何处理当地的学生运动。而且因为示威活动合并了许多范围广泛且关注点不同的社会议题，这使得中国政府无法清楚分析哪些议题可以谈判，乃至于不清楚示威活动提出了哪些诉求。与此同时由于绝食抗议的行动其本身便具有“牺牲特质”，这使得无论是权威性还是合法性都因此而逐渐丧失的中国政府感到十分棘手。在种种因素所形成庞大的压力情况下，中国政府内部开始讨论将戒严作为一种应对示威活动的可行手段。

5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人民大会堂首次与学生代表会面，并且希望能够安抚受到大众关注的绝食行为。在会谈中学生领袖再次要求中国政府撤销《四二六社论》并且肯定学生运动为“爱国举动”，但对此李鹏则表示政府主要关切的是因为绝食而送往医院诊治的患者。尽管这次讨论仅取得了少数实质成果，但是学生领袖也因此得以在国家电视台重要节目上有了出现的机会。5月19日凌晨，赵紫阳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陪同下前往天安门广场，而听闻消息陪同前往的李鹏则是抵达广场后马上离开。赵紫阳在凌晨4时50分时借由扩音器直接呼吁学生结束绝食，并且告诉学生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那一天。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戒严清场

随着示威活动不断升级并且扩大，最后作为军方最高领导人的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决定采取果断行动。一连串游行后，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及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为首的强硬派决定以武力解决示威，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陈云、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和前国家主席、时任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等多位保守派中共元老亦支持出兵。5月17日，政治局常委在邓小平的住所召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赵紫阳不断让步的处理方针遭到了其他成员的批评，其中李鹏和邓小平宣称赵紫阳于5月4日发表的和解谈话使得学生不再惧怕中国政府。邓小平警告说如果北京市进行中的抗议活动不迅速平息的话，意味着中国将冒着经历另外一次内战或者是文化大革命的风险，而他的意见亦得到其他中国共产党党内元老的支持。邓小平随后表示应该宣布戒严以表达政府无法容忍抗议活动持续进行的立场，同时为了证明戒严有其作用而决定将示威群众描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倡导者的"打手"，并且指称是幕后筹划的人士试图打击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并且进一步实现他们个人的野心。

同日傍晚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在中南海制定有关戒严之计划，期间赵紫阳表示由于无法实施戒严而准备辞去职务，同时他也不确定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投票做出的戒严决定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之后胡启立亦表示他并不愿意实施戒严，但相对的李鹏以及姚依林都表态支持宣布戒严的决定。乔石则提到虽然他反对政府再做出进一步的让步，但是他本人并不认为实施戒严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法。而出席此次会议元老人物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和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则强烈要求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必须遵循邓小平的命令，之后担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秘书长的杨尚昆更动用其权限开始调动军队进入首都北京市。

5月1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与军方领导人以及中国共产党党内元老会面。邓小平亲自主持会议并表示实施戒严是唯一的选择，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宣布他“错误地”选择胡耀邦和赵紫阳担任他的继任者，并且决定从此将赵紫阳隔除在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会议外。邓小平还誓言要强硬处理赵紫阳的支持者，并且对此开始进行宣传工作。5月20日，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实施戒严，并且从5个大军区中动员了至少30个师的兵力，其中在中国人民解放军24个集团军中便至少有14个被要求部署军队。其中多达250,000名士兵最终被送往首都北京市进行部署；其中有一部分军队则借由空运和铁路运输前往各自的目的地，而广州民航当局甚至还事先安排普通机票以准备随时运输部队。当天下午，杨尚昆当面明确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为指挥，全权指挥戒严行动。然而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部队进入城市后随即遭到大量集结的群众拦阻，在受到大量群众包围军车队伍并且阻止其进退的情况下使得部队在郊区无法继续前进。抗议群众也纷纷向士兵发表演讲并且呼吁后者加入他们的行动，同时示威群众还提供士兵食物、饮用水和相关用品。在部队迟迟无法向城市内部推进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于5月24日下令所有军队撤退至各个城市外的基地驻扎。然而尽管示威群众成功逼使军事部队撤离被视为抗议活动“扭转颓势”的表现，但是中国政府仍然不断于中国各地调动部队以准备展开之后的行动。

撤退与留守

与此同时学生运动的内部分裂则更为加剧，5月下旬学生所组织的抗议活动由于没有明确的领导人或一致的活动，情况变得越来越混乱，同时伴随着天安门广场上聚集著大量群众使得示威队伍出现严重的卫生问题。侯德健建议学生领袖进行公开选举以选出学生运动的发言人，但是遭到学生团体

的反对。另外一方面王丹则认为近期中国政府将有可能发起军事行动以镇压示威活动，因此主张让学生先从天安门广场暂时撤回校园并且另外组成相关团体，但这个建议则遭到主张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的强硬派学生反对。随着派系冲突日益增加，各个派系开始争夺位在广场中央的学生广播中心，期望能够借由控制扩音器的方式掌握学生运动的控制权。各个派系也开始派遣一些学生前往火车站迎接来自全国各地声援的学生们，并趁机将他们拉到自己的派系之中以获得支持。学生团体开始指责其他派系的成员别有用心，这包括有勾结政府成员并且试图借由学生运动以获得个人成就。

在5月27日时，香港将近三十万人则参与在跑马地马场举办的《民主歌声献中华》活动，不少香港名人应歌唱邀并且表示对北京学生的支持。隔天，在李柱铭、司徒华和其他组织的领导人领导下，香港150万名群众聚集在于香港岛发起了大规模的抗议游行，而同一天世界各地也发起了全球华人大游行的活动。而在这期间，包括美国日本等政府也针对中国发出旅游警告。之后北京市的报刊上则陆续发表许多呼吁学生离开天安门广场并且结束抗学生运动的文章，其中在6月1日于《北京日报》刊载的《天安门广场啊，我为你哭泣》这篇文章中指称由于示威运动内部混乱和无序而使得作者感到失望；但是这些文章也使得许多不愿意离开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感到愤怒并且开始组织抗议行动，数千名学生便列队自行游行至北京街头以表达不愿意撤离天安门广场。随后刘晓波、周舵与高新三名知识分子以及台湾歌手侯德健宣布发起第二次绝食活动，并且希望能够借此重新提振民主运动。而由于长期占领天安门广场后许多学生都渐渐感到疲累，这使得原先学生内部的温和派与强硬派之冲突也渐渐停息并且开始展开对话。之后刘晓波等人在发表的声明中提到绝食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公开批评政府，同时提醒学生们他们现在的事业是值得奋斗的，并且促进学生能够继续占领

天安门广场以提出继续改革的要求。

6月2日晚间，一辆警方吉普车在行进时不慎撞击4名平民并且造成3人死亡，这件事造成示威群众开始担心军队和警察试图进驻天安门广场。对此学生领袖随即发出紧急命令，要求在主要的十字路口设置路障以防止部队进入城市中心。6月3日上午，学生和居民则发现有身穿便衣的军队试图携带武器进入城市，学生团体随即将其抓住并且把武器交还给北京市警方。学生随后于中南海的门口外进行抗议活动，但是遭到警方发射催泪瓦斯驱赶。另外一批没有携带武器的部队从人民大会堂出现后很快遭到抗议群众包围，并且在混乱中造成数人受伤；之后双方原地坐下并且开始吟唱歌曲，最后部队撤退回到人民大会堂大厅内。3日傍晚，中央电视台的新闻广播称戒严部队将会镇压动乱，并警告市民不要前往天安门广场。

清场令

指挥戒严行动的将领

刘华清

迟浩田

戒严部队总指挥刘华清上将和副指挥迟浩田上将

6月1日，李鹏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关于动乱的实质》报告，指称示威群众为恐怖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还指出抗议学生并不打算撤离天安门广场，同时示威活动也获得广泛支持。随后国安部也提交报告，强调资产阶级与自由主义已渗透到中国各处，西方观念给学生带来负面影响。国安部亦认为美军部队介入学生运动，期望借此推翻中国共产党的统治。这份报

告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成功营造出胁迫感，为之后的军事行动提供理由。同时中央政治局也收到戒严部队指挥部的报告，指出部队已经做好协助稳定首都现状的必要准备。种种因素让大多数中央政治局委员接受了戒严的必要性和合法性的说法，也同意之后借由武力清场以解决政治危机的方案。

6月2日，随着学生的抗议运动有所增加，中共高层以武力解决政治危机的看法更加巩固。同日，中共高层再度召开会议，最终同意实施清场以“能够结束暴乱并且恢复首都秩序”。他们一致认为应尽可能和平地完成天安门广场的清场任务，但如果示威群众不愿配合的话，部队也被授权得以使用武力完成任务。国内报纸当天还报导军队部署于北京市十大重要关键地区。

6月3日下午4时30分，李鹏、乔石和姚依林3名政治局常委会见军方领导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北京市长陈希同和国务院秘书长罗干，最后确定有关戒严实施的具体办法。会议确认将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必须果断采取强硬措施扭转局势。会议决定当日夜采取行动，“由周衣冰同志统一指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力量，迅速开进天安门广场，坚决执行戒严任务”。在清场的当天晚上，中共领导人分别于人民大会堂和中南海监督执行状况。

木樨地冲突

6月3日晚间，国营电视台陆陆续续警告北京市居民留在室内；但受到前两周成功阻挡军队的激励，大批市民仍然走上街头以阻止部队行进。中国人

民解放军部队从北京市各个方位逐步向天安门广场推进，分别由第38集团军、第63集团军和第28集团军负责西面；空降兵第15军、第20集团军、第26集团军和第54集团军负责南面；第39集团军和卫戍第1师负责东面；以及第40集团军和第64集团军负责北面。大约晚上10时，第38集团军在广场西方约10公里的长安街五棵松十字路口，开始向示威群众开枪。群众对于军队下令实弹射击感到惊讶外，转而开始向部队丢掷物品。当天晚上，32岁的航天技术人员宋晓明成为首位经证实的死者。之后军队遭指控使用射入人体会碎裂，进而造成严重创伤的达姆弹。10时30分，由于民众将双节无轨电车推到路上并放火焚烧，行进中的军队被迫暂时停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约5公里的木樨地，试图清除这些临时路障。住在附近公寓的居民亦出面试图拦阻军方车队，但第38集团军再度开火，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根据天安门母亲运动调查后提出的死者报告中，共有36人在木樨地死亡。另外士兵还向木樨地附近的公寓开火，造成在建筑阳台或室内有人因而遭到枪杀，这包括数名在公寓观察事态发展的中国共产党高级党政官员。第38集团军最后以装甲运兵车将电车车厢撞开，并持续与尝试仓促搭建路障或组织人链的示威群众对峙，之后部队行经长安街经过南礼士路、复兴门、西单到天安门期间都有造成伤亡。而负责南面的空降兵第15军伞兵也使用实弹进行射击，并且在珠市口、天桥和前门等地也造成平民伤亡。但是亦有说法认为该类说法均为远距离观察导致的失真，在现场的CBS记者理查德·罗斯也称并未有士兵开枪，而仅仅试图驱散人群，这使得究竟是否发生开枪事故存疑。

有说法称部队使用实弹进行射击并且造成死伤反而激怒北京市的居民，其中一些人开始以棍棒、石块和自制的汽油弹攻击士兵，甚至纵火焚烧军车。中国大陆当局以及其支持者表示军队主要是为了自我防卫而动用武力，并且提出部队的伤亡证明使用武器正当，而在报告中便有士兵在街上

遭到活活烧死或者是被其他人殴打致死的纪录。而根据吴仁华的研究指出在6月3日晚上10时军方开火后群众才开始向部队做出反击。不过在驱离过程中，亦有学生和居民试图保护遭攻击的士兵，而大多数的军事单位则拒绝向平民执行开枪命令。

进驻天安门

群众使用木板车运送伤员

晚上8时30分时，由于军队的直升机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空使得示威学生在各个大学校园呼吁学生加入其行列。晚上10时，示威学生依照预定时间在民主女神的基座附近举办天安门民主大学的成立仪式。但是10时16分时，由政府控制的扩音器警告说部队可以在实施戒严期间采取任何强制执行的措施。晚上10时30分，随着看见军队以实弹射击的目击者陆陆续续从北京市区西侧和南侧进入天安门广场，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示威学生与群众也了解到有关暴力事件的消息。在午夜时分，学生扩音器则宣布一名学生在靠近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西长安街遭到杀害，这使得待在广场上的群众陷入忧郁情绪。学生指挥部副总指挥李录随即要求学生保持团结，并且坚持以非暴力的手段以争取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凌晨0时30分，吾尔开希则指控一名北京师范大学女学生在晚间离开校园后遭到杀害，之后吾尔开希便因为突发昏厥而被救护车带离广场。而在这时候，仍然有70,000人至80,000人继续留在天安门广场上。

大约凌晨12时15分，军方开始发射照明弹以提供夜间照明，并且第一辆63式装甲运兵车自天安门广场西侧出现并且从广场前的道路快速通过，大约

五分钟后出现第二辆装甲车，两者均往东长安街驶去。凌晨12时30分左右则有2辆装甲运兵车抵达天安门广南侧，学生便陆陆续续向军方车辆丢掷水泥块。之后其中一辆装甲运兵车突然发生故障而无法移动，示威群众便用棍棒破坏车辆并且以浇上汽油的棉被放火焚烧。而因为车辆遭到焚烧而紧急逃出的3名军人则被示威群众殴打，但学生则组织警戒线并且护送3人到位于广场东侧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急救站医治。之后在承受极大压力的情况下学生领袖曾经一度放弃非暴力手段并且准备展开报复行动，其中柴玲便曾一度使用扩音器呼吁学生准备对抗“无耻的政府”。但最后她和李录同意继续维持和平手段的做法，并且没收学生所持有的棍棒、石块和玻璃瓶等可能被视为武器的物品。

凌晨约1时30分，第38集团军和空降兵第15军的队伍前沿分别到达天安门广场的南北两侧。他们开始封锁天安门广场四周并且将里面的示威学生和前往支援的居民分隔开离，而在过程中也杀死数名示威群众。同时第27集团军与第65集团军从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出现，而第24集团军也于东侧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始进行部署。在遭到军队包围之后，数千名仍然留在广场上的示威学生与群众则开始往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聚集。凌晨2时后，部队开始尝试对人民英雄纪念碑旁的示威群众施加压力；而学生广播则不断呼吁军队放弃使用武力，并且提到：“我们是和平请愿，是为了祖国的民主自由，为了中华民族的富强，请你们顺从人民的意愿，不要对和平请愿的学生采取武力……”大约凌晨2时30分，几名工人则开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架设其从装甲运兵车上拆解的机枪，并且发誓要向杀害许多示威群众的部队报仇。之后在侯德健劝说下工人们选择放弃武器，而刘晓波则在纪念碑的栏杆公开砸坏另外一枝没有子弹的步枪以重申非暴力运动的立场。

群众撤离

之后曾在木樨地看见军队枪杀民众的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常委邵江呼吁由知识分子带领示威学生与群众撤离广场，并且表示已经有太多人丧生。刘晓波原本表示不愿意撤离广场，但最后仍被说服并且和周舵、高新和侯德健一同与学生领袖商讨撤离问题，不过包括柴玲、李录和封从德等人在听到撤离意见后最初都拒绝撤离。凌晨3时30分，在隶属于中国红十字会的两名医生建议下，侯德健和周舵同意先行尝试与士兵进行谈判。他们随即乘坐救护车抵达天安门广场东北角并且与第38集团军336军团政治委员季新国会面，季新国随即向戒严部队指挥总部转达请求并且获得同意为学生开辟往东南方安全撤离的通路。凌晨4点时天安门广场上的灯光突然熄灭，同时官方的扩音器宣布："现在开始清场，同意同学们撤离广场的呼吁。"不过此时学生们则是一同唱起《国际歌》，并且认为军队准备执行最后一项清场任务。

凌晨4点30分时，天安门广场重新开启照明并发射一连串的红色信号弹。与此同时，部队开始从四面八方逼近纪念碑，随后部队在聚集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示威群众周围10米处重新部署。而侯德健回来后先是尝试说服事先知情的学生领袖接受他与部队的协议，在大约4时32分侯德健透过学生的广播表示他先行和部队达成谈判，然而许多第一次知道这次会谈的学生则气愤地指责他过于胆怯。封从德之后则在广播中解释由于已经没有时间召开紧急会议，而将以口头表决的方式决定示威学生之后的集体行动。但尽管"坚守"的声音比起"撤离"还要来得更加响亮，封从德仍然表示"撤离"意见较为多数而决定带领群众撤离天安门广场。不过大约在4时40分时，穿着迷彩服的士兵冲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并且破坏学生的广播设施；而其他部队则殴打数十名在纪念碑旁的学生，并且扣押或者破坏他们的相机和录音设备。随后士兵开始强制驱散在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的群众，之后也有学生

和教授尝试说服仍然坚持坐在纪念碑底层的学生离开。

大约早晨5时10分学生们开始离开纪念碑，示威群众们手牵着手往广场东南角安排的通道撤离，不过由于当时坐在广场北部的学生颇多，因此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是从广场北侧离去。而这时军方则要求那些拒绝离开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必须加入撤离行列，除了以对空开枪的方式要求剩下的群众撤出广场外，并且还调动59式战车部队封锁前往广场的道路。而据从北侧撤离的学生所说，军队在纪念碑北面架起机枪向学生扫射。在确认所有示威群众都离开广场后，军方派遣军用直升机运送大型塑料袋并且命令士兵开始清理广场。北京医护人员对香港记者说，军队将广场的尸体装进塑料袋，由军用直升机运走。而6月4日早上6时，已经撤离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队伍在沿着西长安街自行车车道上准备走回校园时，西单邮电局方向有3辆从天安门广场出发的坦克发射催泪弹并且冲撞人群，造成11名学生受伤。6月4日上午数千名先前撤离的示威群众、清场行动中伤亡者的父母以及被政府举动激怒的工人尝试从东长安街重新回到天安门广场，但是当人群靠近部队时士兵则随即往群众处开枪射击作为警告。然而由于有数人因而遭到部队枪击，之后暂时撤离该处的不满群众便又会尝试重新前往占领广场空地。之后群众多次尝试进入天安门广场内，但是军队则持续负责管理广场并且持续两周都不向大众开放。

事件后续

后续示威

北京市区自6月4日军队已经控制天安门广场后便逐渐恢复稳定状态，不过在6月5日时西方媒体所拍摄和录制的王维林于长安街阻挡坦克行进的影像

轰动世界各地，照片被视为整个六四事件标志性的照片之一。之后香港和澳门随即发起大规模示威游行以声援北京的示威群众，其中澳门有十多万至二十万人参与游行抗议，占当时澳门人口的一半，该次游行亦是澳门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游行，另外也有一些国家也对于军队清场一事发起抗议活动。曾经加入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的学生返回原本校园以及部队实施清场的消息传开后，中国内地包括成都市、西安市、武汉市、南京市、上海市和广州市等城市都在都爆发大规模的抗议行动并且持续数天。在广州，数万学生曾将主要干道海珠桥占领了四天，整个城市交通陷入瘫痪。到8日，因军队即将进城，人潮只得散去。而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的调查，在6月5日时成都市便至少有300人丧生。其中成都市当地部队使用震撼手榴弹、警棍、刺刀和电击棒攻击平民，而当天晚上警方也刻意要求医院不能接受学生或者是提供救护车服务。而西安市在6月5日到6月6日期间，当地学生也发起大规模游行活动，并且联合参与罢工的工人开始设置路障。不过6月8日时陕西省人民政府便表示城市已经稳定下来，并且提出“先稳住动乱分子，尽量避免发生正面冲突、激化矛盾”的执行方针。

上海则是在6月5日时由学生发起示威游行并且开始摆设路障，工厂工人亦发起大规模的罢工抗议行动。这些举动使得铁路与道路交通陷入瘫痪，同时早上许多大众交通工具也无法正常提供服务，英国广播公司则报导说：“数万名工作人士因而无法正常上下班。”第二天在中共上海市委要求下，上海市人民政府派遣6,500人清除道路上的路障以恢复通行。然而当天晚上8时30分，来自北京的161次列车撞死在光新路道口5名尝试要封锁火车来往的群众，晚上10时时现场便聚集超过30万人并导致造成交通中断，而群众也开始殴打火车司机以及工作人员并且焚毁数辆火车车厢以表达不满。6月7日时，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理工大学等学校学生纷纷强占各自学校的礼堂以及教学大楼，并且将其安排成灵堂以悼念六四事件的伤亡

者。越来越多学生们参与架设路障阻碍交通的行动，但在听闻上海也有可能戒严后便有3,000多人决定暂时离开校园。当天晚上，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市长朱镕基发表电视谈话，并且提到：“作为市长，在此郑重声明，市委、市政府从来没有考虑过要使用军队，从来没有打算实行军管或戒严。我们只追求稳定上海、稳定大局，坚持生产、保障生活。”

6月5日时，武汉当地约有20,000名大学学生决定游行到天安门广场表达不满，另外示威群众也分别封锁武汉长江大桥的交通以及集结在武汉站前的广场。第二天学生继续在街头游行示威并使当地交通被迫中断，同时约有10,000名学生决定直接在铁轨上静坐抗议，这导致来往北京、武汉到广州的铁路路线被迫中断，此外学生还鼓励当地各大大企业的工人发起罢工活动。6月7日凌晨学生们开始以公车和路障阻碍交通，并纷纷于各处架设灵堂来纪念六四事件的伤亡者。然而一小群激进的学生拦下一辆货运列车并且开始在列车上泼洒汽油，不过在准备焚烧时成功被警方阻止。但这使得当地警方与居民关系渐趋紧张，居民开始提领现金并且抢购物资。而6月5日、6月6日到6月7日，南京当地学生发起游行活动并四处发表演讲，此外示威学生亦封锁附近联络交通并尝试联合工人发起罢工。6月7日早上7时左右，包括河海大学在内几间大学400多名学生以4辆公共汽车驾封锁南京长江大桥持续到傍晚，而南京大学为主的在校学生则在中央门各处摆放路障。一直到当天下午4时以后学生与群众才被说服并且撤离，也让交通一度恢复。然而6月8日，包括南京大学与河海大学等校学生重新控制了南京站周遭一公里的交通，同时学生们也陆陆续续于南京长江大桥上静坐表达不满。对于学生激烈的反应，中共江苏省委认为当地局势已渐趋失控，并陆续向学生表示公安部将会严惩行动的策划人。

加强控制

6月9日，在80年代担任最高领导人的邓小平发表公开谈话，并批评示威活动者的目的

军队在6月4日镇压天安门广场的示威群众后，中国政府开始加强控制新闻媒体和公民言论等自由，同时因六四事件惩处国内外媒体工作者。尽管国家媒体在军队实施清场刚发生后大多报导同情学生的内容，但是之后所有负责人遭到撤离职位作为处分，或者接受检讨和人人过关。其中在6月4日至6月5日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新闻联播》上，个别负责报导此次事件因表现悲痛情绪的4名新闻主播分别是杜宪与张宏民、薛飞和李瑞英搭档。但事件之后央视过关学习，杜和薛的态度不改（却被调离处分三年后先后离职），而李张等人检查符合要求，才有了日后的天壤之别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节目副主任、同时也是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吴学谦儿子的吴晓镛和英语播音员陈原能也因为其负责的节目对示威群众表示同情之意，后来吴事后被捕，陈则被禁止出国。而《人民日报》由于发表同情示威群众的报导，包括社长钱李仁与总编辑谭文瑞等编辑都因而撤职。而包括吴学灿等编辑人员则是因为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出版特别相关报导，纷纷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

所有国际新闻媒体在北京市实施军事行动期间被勒令停止广播，同时中共当局早在5月24日就关闭了卫星传播的线路。然而许多广播公司仍然无视这些禁令而尝试借由试电话向外界报告情况，而许多相关的拍摄影片纪录也很快被偷偷地运出中国大陆，这也包括西班牙电视台在6月4日凌晨所拍摄的天安门广场情势独家纪录。而在军事行动期间一些外国记者则遭到中国大陆有关当局的骚扰，其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理查德•罗斯

（Richard Roth）以及搭档摄影师便遭到中国大陆当局拘留，然而在他仍然不断透过移动电话报导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之后几名因为报导中国大陆当局派遣部队清场的外国记者在随后几个礼拜遭到驱逐出境，而其他记者则持续遭到中共当局骚扰或者是被列入黑名单之中。各国驻上海领事馆则被中国大陆当局告知并无法保证记者的人身安全，并开始要求每家新闻媒体必须遵从新颁布的准则内容。

6月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在其他党政高层的陪同下前往中南海怀仁堂接见戒严部队高级干部，而这也是自从学生发起示威活动以来邓小平首次于公开场合出现。邓小平在之后演讲中称呼因为六四事件而丧生的解放军士兵为“烈士”，并且指出示威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推翻共产党以及国家，希望能进一步“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邓小平认为示威者之所以不断强调包括官员贪污等等有关的投诉，便是为了掩盖其底下试图将当前社会主义制度加以取而代之的真正动机。他之后还以此观点表示：“这整个都是仍坚持帝国主义之西方世界的计划，他们企图让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逐一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然后将它们带往另一条充斥着国际资本以及垄断资本主义的道路。”

为了排除同情天安门广场示威群众的中国共产党党内人士，中国共产党领导高层发起了长达一年半的整顿方案以“严格处理内部强烈倾向资产阶级自由化道路的党员”。根据报导有将近40,000名中国大陆官员被调查其在抗议期间的作为，有超过30,000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职位因此被迫调动，甚至估计有超过1,000,000名官员其政治可靠程度遭重新评估。而在这一期间，几名中国大陆外交官则前往国外要求提供政治庇护。而抗议行动造成中国大陆当局决定加强其作用，在六四事件发生后许多在1980年代引入的自由

作法遭到撤销，同时中国共产党回到传统列宁主义的模式并且重新控制新闻出版和大众媒体。不过六四事件使得中国大陆当局了解到无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或者是北京警方都缺乏如橡皮子弹和催泪瓦斯等充足的镇暴设备，因此在这次抗议行动结束后中国大陆各个城市的镇暴警察陆续获得非致命的相关装备。同时六四事件还促使得中国大陆当局决定增加国内安全开支，并且扩大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在镇压城市抗议活动时的权限。

逮捕行动

在军队成功控制天安门广场后，中国大陆当局开始针对参与示威抗议的群众展开大规模逮捕行动，并且也撤除相关工作或者支持抗议群众的政府官员的职务。根据北京市委办公厅所编出版的《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提到，北京市在“六四”后共抓捕了1,103名涉及“暴乱”的疑犯。有市民因为仅仅在街上拿走士兵遗下的军用包就被控以抢劫罪名，判处七年、十年的监禁。许多参与六四事件的人士之后陆续流亡海外，包括柴玲、吾尔开希等学生领袖便透过香港组织的黄雀行动，逃往美国、英国、法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之后则被中国大陆当局长期禁止返回中国大陆境内。不过陈子明和王军涛则是在1989年年底准备流亡时遭到逮捕，中国大陆当局指控他们为整起抗议活动的“幕后黑手”并且于1990年判处13年有期徒刑。

中国大陆有关当局陆续逮捕或者拘留了共计数万名来自中国大陆各地的群众，而根据对话基金会援引各省级人民政府的资料指出在1989年春天时有1,602名与抗议活动有关的人士被判处有期徒刑。许多人被安排至监狱监禁

或者是送往劳改营，并且被禁止与他们的家人会面。而相关单位除了时常对这些涉嫌参与示威活动的群众以酷刑施压外，还将这些持有不同意见者与杀人犯或者强奸犯安排在同一个牢房内；同时由于许多人遭到逮捕使得牢房空间不足，甚至没有足够的空间让每个人都可以入睡。上海监狱和劳改队开展“平息反革命暴乱”为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播放《飘扬，共和国的旗帜》等录像。截至2012年5月为止，仍然至少有2名参与抗议活动人士仍然关押在北京市，另外还有5人则下落不明。另外曾经担任赵紫阳助手的鲍彤则被指控泄露国家机密和反革命宣传，并于1992年7月被判有期徒刑7年。

王丹和赵长青则是少数几位被列为通缉犯并遭到逮捕的学生领袖，被列为学生领袖通缉名单之首的王丹先是被判处4年的有期徒刑，在1998年以保外就医的理由，离开监狱并获准移民前往美国居住；他在哈佛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后，主要从事学术的工作。赵常青因为被视为在抗议活动中影响力较小的公众人物，在为期6个月的监禁后获得释放，但之后由于继续要求中共展开政治改革而再度遭关押。吾尔开希在事件后逃往台湾，并长期在台湾中央广播电台从事政治评论员的工作；之后他曾三度表态愿意自首，并希望返回中国大陆探视亲人，不过最后都被遣返回台湾。李录则在华尔街成为投资银行家，并且成立了一家公司。柴玲先是流亡法国，之后再转到美国寻求政治庇护；后来她于美国高科技公司工作，并成立了关注中国大陆女性权益和计划生育问题的非营利组织女童之声（All Girls Allowed）。

2008年11月3日至11月21日期间，禁止酷刑委员会举办第四十一届会议，并根据《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第19条审议会员国提交的报告。当中禁止酷刑委员会对于中国大陆当局处理六四事件的方式感到担忧，认为尽管许多

家属提出“在1989年6月4日于北京镇压行动中遭杀害、逮捕或失踪”的申诉，但中国大陆当局却迟迟没有展开调查。同时禁止酷刑委员会也提到中国大陆当局并未告诉家属相关人士的下落，而对过度动用武力的负责人也无任何行政或者刑事处分。不过在2009年12月，中国大陆当局回应禁止酷刑委员会建议时表示已经就“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完全结案，并强调当时采取及时且果断的手段是必要和正确的。同时中国大陆当局认为将六四事件形容成“民主运动”已经扭曲了事件想要推翻共产党专政的本质，并且认为这些意见与禁止酷刑委员会的职责并不符合。

死伤人数

由于中国官方拒绝提供更多事件资料，导致数据模糊且出现多种版本，单是死亡人数的估计便从百余人至上万人都有。1989年6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官员召开新闻发表会，发言人袁木表示“初步统计”包括部队士兵、大学学生、非法分子和误杀群众在内，有近300人死亡。袁木还提到有5,000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士官和士兵受伤，而包括违法暴徒和围观群众在内、有2,000名平民受伤。根据北京市警方的调查，在北京市遭到杀害的平民“包括大学教授、技术人员、政府官员、工厂工人、小型私营企业拥有人、退休工人、高中学生和小学学生等，其中最年轻的仅有9岁”。而自中国政府于6月6日召开新闻发表会后，六四事件的实际死亡人数和天安门广场伤亡问题便不断出现争论，有“死者都在天安门广场外”的说法。原因在于中国政府展开军事镇压后，便不断控制任何资讯的发布；之后则严格禁止在中国境内研究相关主题，使得今日对于实际死亡和受伤人数仍然不清楚。各方来源提供的伤亡估计亦有很大的出入，声称人数从数人丧生至数千人丧生的说法都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89年第11

号）所提供资料，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队、武警及警察有数十人被害，6000多人负伤；非军人有3000多人受伤，200余人死亡，包括36名大学生、医护人员、群众。海外报道的死亡人数一般显著多于大陆报道。2014年美国白宫解密文件显示约有10454人死亡、40000人受伤（白宫的报告引述自戒严部队的消息人士提供的中南海内部文件）。2017年底，英国国家档案馆解密的文件显示，有中国国务院的成员（名字在档案中被涂黑）称1989年天安门事件至少造成10000名平民死亡。

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则表示美国国务院外交官看见军队向未持有武器的群众开火，走访北京附近医院后认为至少有数百人遭到枪杀，而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员工也曾前往现场搜集部队杀害民众的证据。子女因为这次事件丧生的丁子霖、张先玲等人则共同成立天安门母亲运动后，在中国政府阻止下持续尝试调查死者家属，并记录死者相关资讯；天安门母亲运动确认的死者清单从1999年提出的155人、2005年提出的187人、2010年提出的195人，在2011年8月共有202人获得确认。在天安门母亲运动所搜集的死者资料中，除了因事件而直接丧生的民众外，还包括4名自杀人士、以及6月4日后因抗议活动而遭杀害者。

另一方面，根据吴仁华对于戒严执法行动的相关研究，只有15名军事人员经确认是因为遭到杀害而丧生。在已经确认死亡原因的15名军事人员中，有6名士兵是因为搭乘的卡车翻覆，车体随后燃烧而丧生；一名隶属第39集团军宣传单位的摄影师因为没有穿着制服，在拍照过程中遭到枪杀；以及在同年7月4日，一名第24集团军排长因为心脏麻痹逝世。剩下7名军事人员的死亡原因，吴仁华认为应该是排除天安门广场上的示威群众时，在任务过程中阵亡。

此外，中国各地仍有示威者伤亡，由于当地记者较少，伤亡程度难以估计。而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的调查，在6月5日时成都市便至少有300人丧生，其中成都市当地部队使用震撼手榴弹、警棍、刺刀和电击棒攻击平民，而当天晚上警方也刻意要求医院不能接受学生或者是提供救护车服务，间接导致死者增加。位于成都的天府广场因此也被称为成都“天安门”。

各方反应

官方定调

“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而现在来，对我们比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们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们经历的风波多，懂得事情的利害关系，他们是支持对暴乱采取坚决行动的。虽然有一些同志一时还不理解，但最终是会理解的，会支持中央这个决定的。

……事情一爆发出来，就很明确。他们的根本口号主要是两个，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人民要求反腐败，我们当然接受。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提出的所谓反腐败的口号，我们也要当好话来接受。当然，这个口号仅仅是他们的一个陪衬，而其核心是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

度。……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错了没有？没有错。没有改革开放，怎么会有今天？

……以后我们怎么办？我说，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要认真总结经验，对的要继续坚持，失误的要纠正，不足的要加点劲。总之，要总结现在，看到未来。”

——邓小平1989年6月9日《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

中国共产党对六四事件的官方立场认为为了控制“政治风波”、因此使用武力是必要的，而这也确保了经济成功发展所必须拥有的稳定社会；包括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江泽民和胡锦涛等中国领导人在被外国记者问到这类问题时，都会不断重申中国共产党的官方立场。时任国务委员兼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陈希同做了《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

同时，中国政府也不断控制有关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抗议活动的大众印象，当有提及到这次抗议活动的印刷媒体必须与中国政府对于六四事件的说法保持一致。另外中国政府还准备了一份白皮书以说明政府对于抗议活动的观点，之后中国政府内部匿名人士将这些档案运出海外并且在2001年时由公共议题出版《天安门文件》。六四事件30周年前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参加香格里拉对话时表示“六四事件是一场风波和动乱，中

央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和平息了这场动乱，是正确决定，正因此才能保持国内稳定。中国在之后三十年间，在共产党领导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对于六四事件许多当时的政府官员也存在有各自不同的见解，其中当时担任国务委员兼北京市长并且宣读戒严令的陈希同在2012年逝世前便多次对于流血事件感到遗憾，而当时担任赵紫阳政治秘书的鲍彤则多次呼吁中国政府应该平反示威活动。而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杨尚昆则在1998年逝世前向军医蒋彦永表示六四事件是中国共产党犯下最严重的错误，并且认为将来有一天该事件将会获得纠正。

中国大陆媒体

1989年6月4日晚，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新闻联播》时，两位主持人均着黑衣，左、右主持人分别为杜宪和张宏民

事件发生后，包括《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媒体借用国际新闻讽喻国内时事。6月3日，《人民日报》以粗黑字体刊出题为“汉城学生绝食示威抗议当局杀害学生”的文章。同版，有文章报道波兰消息，以“波领导人指出选举是和解的伟大尝试”为肩题；主题用黑宋大字，“警告任何人都不要玩火”。对中东局势的报道则是：“以军再次入侵黎南部，用飞机坦克对付平民”。在“社会”版，则有“四川一服刑罪犯竟当上人大代表”一文。6月5日晚，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不仅以醒目文字报道波兰领导人“警告任何人都不要玩火”，还用字幕打出“以总理承认武力平息不了巴勒斯坦起义”。

尽管中宣部已要求媒体“噤声”，甚至威胁“谁报道谁负责”，《人民日报》仍然在头版用花边框刊出《北京这一夜》一文，首先披露了戒严部队进城的消息。后来《北京这一夜》必须删节，但由于版面已经固定，原本预留一千余字的空白中仅余不下两百字，使得《北京这一夜》的花框内留下不少空白，后来被指“开天窗”。北京国际广播电台的英语广播员在4日凌晨的广播中称，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悲剧”（the most tragic event）。中央电视台的两位主持人在主持6月4日晚《新闻联播》时双眼浮肿，语速缓慢，身着黑色衣服。

事后，学运期间主张新闻改革、同情学生的胡启立、阎明复等中共领导被撤职。人民日报社总社长李仁和、总编辑谭文瑞也被撤职。私自在6月4日刊发《人民日报》号外的编辑吴学灿更被判四年徒刑。北京国际广播电台的负责人吴晓镛被调离，其父亦受牵连，整个英语部的工作人员都作了检讨。报导此次事件表现悲痛情绪的四名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分别是杜宪、张宏民、薛飞和李瑞英。事件之后央视内部组织“过关学习”，李瑞英、张宏民符合留任要求，而杜和薛则被调离新闻联播播音岗位。后薛飞1991年从中央电视台辞职，翌年杜宪也从央视离职。

各国、各地区反应

事件发生后，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做法评价不一。国际社会大多数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武力驱离示威群众，许多西方国家亦一度实施经济制裁，并至今实行武器禁运。对于中国政府通过武力镇压处理抗议活动的

方式引起来自西欧、东欧、北美洲、澳大利亚和一些西亚与拉丁美洲国家的批评，其中西方国家政府和新闻媒体更是对此严厉谴责。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亚洲国家则在抗议期间持续保持沉默，其中印度政府一方面下令国家电视台减少相关报导以免损害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但是另一方面也对于因为中国军队清场而死亡的民众表达同情之意。而多数对该事件作出反应的非洲国家则认为该事件属于中国内政，并且对该事件表示同情。根据日本外务省在2020年12月23日公开的1989年前后外交文件，日本政府在6月4日当天决定对中国和睦，并反对西方对中国制裁。而包括朝鲜、巴基斯坦、古巴、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和一些中东及非洲国家则表态支持中国政府的作法，并且谴责相关的抗议活动进行。许多海外的中国留学生为了表示支持天安门广场上的示威活动，于欧洲、美洲、中东和亚洲等地的城市发起示威活动，并且开始在互联网上架构提供新闻服务的《华夏文摘》和创建非政府组织中国民主后援国际；而在中国军队以武力驱散天安门广场上的示威群众后，这些海外华人则组织如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和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等团体，并且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拥有一定的政治影响。

然而对于许多西方国家来说，中国政府对于天安门广场上的抗议活动的处理方式破坏了自身的国际声誉。许多西方国家新闻媒体从原本计划采访5月举行的中苏首脑会议而转向报导有关早期戒严行动的情况，示威群众抓住这个机会并且开始为国际电视台的观众制作标志和旗帜，而这也使得西方社会对于中国学生的抗议活动多表示同情。而在中国政府对于如何处理媒体报导示威活动而犹豫不决时，也意味着为中国和海外记者报导抗议活动时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抗议活动的影像纪录在事件之后20年仍然强烈影响西方对于中国的看法和相关政策。其中阻挡坦克行进的王维林图像变成该事件重要的标志，被称为“坦克人”，且长期在西方社会成为公民

反抗专制政权的象征。《时代》杂志更是以“无名的反抗者”将其列入20世纪100位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另外一方面，对于当时仍然是英国殖民地的香港来说，六四事件的发生使得社会大众恐惧在1997年主权移交后，中国是否会违背一国两制的承诺。对此香港总督彭定康试图针对立法局展开政治改革，但这让香港政府和中国政府间发生摩擦。而对于许多香港民众来说，天安门广场上的抗议遭到镇压成为了一个转捩点，许多民众因此对中国政府失去了信任；再加上当时香港市民普遍对香港主权移交后的地位感到不确定，使得1997年前出现了大规模的移民潮，许多人前往加拿大或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生活。英国政府为了阻止人才随着移民潮而外流，同意让香港政府施行居英权计划，授予部分香港民众正式的英国公民身份。而自1990年后，香港每年都有数万名民众参与由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主办的大型“维园六四烛光晚会”活动。香港在1997年主权转移给中国后，相关的纪念活动仍在持续进行。

六四事件过后，澳门在中国政府秋后算账下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中，两个高调争取平反“六四”的组织被暴力袭击，当中“东大学生关注北京学运小组”在负责人聂国瑞（后来曾任香港亚洲电视驻澳门记者）遭人以玻璃瓶袭击头部后宣布解散，而民联会的成员则因职业威胁、家庭压力、经济封锁和暴力袭击而四散，当时任职中国银行经理的吴国昌受压辞职，在青洲小学任教的区锦新也被解雇，后来更被人用木棍扑头，民联会除了区锦新和吴国昌以外的成员大多离去。后来二人先后从政，透过直接选举进入立法会，直到现在两人仍然坚持举办六四悼念集会。在1990年代针对民主派的打压行动中，有部分坚持平反“六四”和抗议警方滥权的人被清算，由于澳

门当时亲共势力已控制澳门社会，故可轻易而举地打压反对者，被打压人士的处境有突然失业、做生意的突然被断供货、铺位被收回、银行户口被冻结，同时面对着暴力威胁，有被暴力袭击的人报警后于事无补，也没有记者愿意报道。他们部分人最后妻离子散甚至露宿街头。

国际制裁

六四事件后，包括台风战斗机等欧洲制军事装备受到武器禁令的限制，皆无法出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的形象在六四事件发生后，从原先展开现代化改革的反苏盟友，转变成为镇压示威群众的类斯大林威权主义国家。之后反对中美间自由贸易的蓝队阵营也多次提及六四事件，并且以此认为中国对于维护世界和平和美国自身利益都将构成威胁。军队以武力实施清场的消息也对中国经济产生显著的影响，包括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部分外国政府都要求暂停给中国提供贷款；而除了许多外国直接投资的承诺遭到取消外，中国的旅游观光业收入也从原先的22亿美元减少至18亿美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务院总理李鹏在1992年1月31日访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时，就此表示对华经济制裁和武器禁运政策严重妨碍国家主权。

同时欧盟与美国都决定针对中国实施武器禁运政策，并且持续到今日。作为因应，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国防支出从原先1986年的8.6%提升至1990年的15.5%，这扭转了过去十年以来国防经费开支不断减少的情况。中国长期呼吁欧洲联盟和美国解除禁令，并获得一定数量的欧洲联盟成员国支持。2004年时，法国总统杰克·希哈克便提议欧洲联盟解除禁令，同时获得德

国总理格哈特·施罗德的支持。而自2004年以来，中国则开始形容武器禁令“已经过时”，进而损害中国与欧洲联盟间的关系。但中国在2005年3月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后，使得中国大陆和台湾间陷入紧张局势，数个欧盟理事会成员退回原先有关解除武器禁令的支持。

之后施罗德的继任者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公开反对解除禁令，而美国国会议员还建议如果欧洲联盟解除禁令的话应该对欧洲联盟实施军事技术的转让限制。2005年7月，担任欧洲联盟轮值主席国的英国政府也反对解除禁运，在多次批评中国人权纪录的若泽·曼努埃尔·巴罗佐当选成为欧盟委员会主席之后也使得解除欧盟武器禁运更加困难。另外一方面，欧洲议会则长期反对解除针对中国的武器禁运限制，虽然每次提案反对理由多是注明没有必要解除禁令。在欧洲议会多次反对解除任何有关中国武器禁运的提案下，这使得中国只能够向其他国家寻求军事装备的供应。尽管过去中国与苏联一度处于紧张关系，但是中国仍然长期从东方集团国家购买武器装备并且实际成为其主要武器来源。其他曾愿意供应武器装备给中国的国家还包括以色列和南非，但是在美国的压力下也渐渐停止这类合作关系。

事件影响

改革停滞

六四事件后，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和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获得提拔而进入中央领导高层，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六四事件的发生直接导致了改革开放尤其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停滞，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被免去所有职务，包括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在内，许

多同情抗议活动的中共官员也被降级或免职，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被提拔为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第三代领导核心。许多参与八九民运的人士则流亡海外，并被政府禁止返回中国大陆。这次风波后，中共党内强硬派抬头，改革开放政策停滞，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才重新恢复；原先在1980年代逐渐开放的人权、民主政策等政治改革也暂止进行。

1989年10月31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根据该法，原则上举行集会、游行、示威，必须依照该法规定向主管机关提出申请并获得许可。

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领导高层撤除了反对实施戒严的赵紫阳其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职位，而同样反对戒严并且在决定是否戒严时投下弃权票的胡启立也遭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撤职。不过相对于赵紫阳随后遭到软禁并且持续到2005年逝世为止，胡启立仍然保留党籍，并且在“改变他的意见”后重新被任命为机械电子工业部副部长。而同样具有改革思想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在提前从海外返回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后，中国政府便以健康理由将其拘留并且实施软禁。同样在“改变自身想法”后万里从软禁中获释，之后万里继续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职务，直至1993年任期届满后退休。

而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书记江泽民之后取代赵紫阳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其中江泽民在上海市处理具有改革派倾向刊物和积极响应四二六社论的作法使得他赢得中国共产党党内保守势力的支持。这次抗议活动也让原本依照1982年宪法与往常惯例采取的权力分立有所修正，过

去为了防止毛泽东的个人统治以及相关的过激行为，中国共产党决定废除毛泽东终身担任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职务。同时重新设立自1975年被废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职务，并将其列为没有实权的虚位元首职务，同时实际上真正拥有政治权力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总理以及中央军委主席则由不同人担任。然而在六四事件期间，担任国家主席的中共元老杨尚昆同时兼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秘书长掌握军权，并且公然与另一位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赵紫阳决裂，并且转向主张使用军事武力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和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一派，这使得官方政策变得不一致和不连贯并且明显阻碍行使权力。为了对外交流的身份需要，自1993年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兼任国家主席的职务。

邓小平离开领导层后，随着"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实行，陈云、杨尚昆、薄一波、习仲勋等中共元老亦逐渐淡出政坛。之后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等人组成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式接班。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称"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对政治风波采取了果断措施"，进行了大规模逮捕示威民众和支持者，并镇压其他地区进行的抗议活动；同时严格控制国内新闻媒体对事件之报导，并禁止外国记者将相关照片和采访影像发送至国外。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在后邓小平时代一直延续下来，直至2018年修宪后才被废除。

九二南巡

此时受到示威抗议的影响使得中国政府在改革政策制定上采取保守态度，并且认为示威抗议的原因便是由于改革速度过快的结果。而主持改革开放政策的邓小平在示威活动爆发后其影响力则显著降低，这迫使他必须与坚

持社会主义的强硬派做出妥协。但之后同样支持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赵紫阳被迫远离政治核心，同时在保守阵营的压力下邓小平也与国家政策决定开始疏远。在以江泽民为首的领导集体确立后，邓小平便在稍后以江泽民为“合格的党总书记”为由让其接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自己则退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高层。然而，一方面，政府改革开放脚步过慢引起地方领导人的强烈批评；另一方面，1990年代苏联解体使得邓小平影响力在保守派势力中逐渐恢复。

1992年，邓小平在中国南方的深圳、珠海、广州、上海等地巡视并讲话，重申与改革开放相关的邓小平理论。其中，邓小平批评在示威抗议结束后掌权的社会主义强硬派，并且称赞创业精神和其他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最初该意见遭到中国共产党相关媒体的忽视，但是最后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则发布正式命令确立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开放作法。邓小平的九二南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因六四事件而放缓甚至停滞的中国大陆改革开放自此重新提速。

审查制度

中国共产党严格限制有关六四事件的讨论，并且已经采取措施阻止或者审查相关资讯信息。其中教科书几乎没有任何相关的讯息；即使有所提及，相关内容也多是以中国共产党官方观点编写而成。在抗议活动结束后，政府官员查禁许多有争议的电影和书籍并且关闭多家报刊出版社。在往后1年内，中国国内近12%的报纸、13%的社会科学期刊以及150部电影遭到取缔，还有将近8%的出版公司也被迫关闭歇业，此外政府还宣布他们已经查获

3,200万本违规的书籍刊物和240万片违禁的影像记录。之后有关六四事件的新闻媒体内容和互联网资源都因为实施审查制度而遭到限制或者是封锁，而其中受到金盾工程的影响使得包含六四事件等互联网内容在中国境内遭到封锁而无法浏览。

其中在中国大陆有许多文学作品因为与六四事件相关而遭到禁止出版，例如收集许多六四事件期间抗议诗集的《六四诗集》便遭到禁止，而在2006年时小说《紫禁城》也因为其相关内容而遭到查禁。此外有关采访赵紫阳或者是其秘书鲍彤的书籍也遭到禁止，其中包括由杨继绳于秘密采访赵紫阳并且整理其他否决中国政府决定之资料所撰写而成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以及受到政府压力而无法出版的宗凤鸣著作《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等书。比较特别的是在2009年5月时，赵紫阳秘密录下的录音纪录成功偷运至海外，并且另外编写出版了《改革历程》一书；而在2010年时，另一本依据李鹏在六四事件期间的日记整理后也以《李鹏六四日记》为名出版。

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搜寻“六四”或者是“天安门”等相关词语，则只会提供经过审查后的结果，甚至在有的时候则会短暂切断与服务器的连接。其中有一部分是借由关键字审查来将网站的特定页面加以封锁，但是对于像海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运动等网站则会直接遭到中国政府完全禁止进入。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审查制度却往往并不一致，包括YouTube、维基百科和Flickr等许多网站长期以来便多次遭到封锁然后又获得解禁；此外审查制度对于中文网站来说也比外语网站还要来得严格许多。在2006年1月时，Google同意在其中国大陆页面审查有关六四事件和其他中国政府认为“敏感”之内容，不过2010年1月时宣布撤除相关的审查合作。

而后来的不少教科书，谈及六四事件时大多以“清场”而非“镇压”来形容事件，并以“平息事件”来结尾。而于香港，当地的教育局公布的课程修订大纲中没有提到“六四事件”，而被问及时表示因为“未有纳入的事件因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并不重要”。

在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2021年2月第1版）中出现了标题为《经受政治风波的考验和治理整顿的完成》的关于六四事件的官方记载。书中将六四事件称为“1989年政治风波”，并记录了关于胡耀邦逝世、四二六社论在内的事件内容。在本节的后几节中，也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对此的反思与相关措施，内容涉及贪污问题的解决，经济政策的调整。

政治冷漠

到了今日，由于许多潜在因素使得很多中国公民都不愿意谈论抗议活动的进行。较为年长的知识分子则不再渴望政治变革并且转而专注在经济改革方面。而许多中国青年一般都不知道有关抗议活动的经过、王维林等著名象征乃至于6月4日当天的事件等。但尽管如此每年6月4日当天中国政府也不允许有关于六四事件的活动存在，例如在六四事件二十周年的2009年6月4日当天中国共产党相关机关便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加强警备，其中除了穿着制服的公安机关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成员外还有数百名便衣工作人员出现在广场上。之后新闻媒体工作人员被拒绝进入广场内，那些试图在广场上拍摄或者采访持不同政见者的记者则遭到短暂拘留。而在六四事件二

十五周年前夕，包括高瑜、浦志强、徐友渔、郝建、刘荻、胡石根等人则因为参与相关纪念活动而遭到逮捕。另外每年六四事件周年纪念期间，中国政府亦会关闭全球社群网络服务的网站链接并且加强对于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监视。

但在这般情况下包括丁子霖的天安门母亲运动等人士或者组织仍然会继续报导有关六四事件的经过，而多年来一些中国民众也呼吁中国政府重新评估抗议活动并且补偿遇难者家属。特别是天安门母亲运动便要求赔偿、平反受害者并且归还在中国与海外所筹到的募款金额。而曾经参与军事镇压的前军人张世军更是向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发表了公开信，期望政府能够就六四事件重新评估其历史价值，但随后他便在自己的家中遭到逮捕。不过虽然中国政府从未正式承认在六四事件期间有从事不法行为，但在2006年4月时则在政府首次公开的情况下接受六四事件相关受害人家属的申诉，并且以“困难补助”的名义向在四川死亡周国聪的母亲唐德英赔偿将近70,000元人民币，其中周国聪在1989年6月6日时遭到警方拘押在成都市并且在2天后逝世。这一举动获得中国许多活动家的欢迎，但是一些人则将这案例视为为了维护社会稳定的举动，并不认为是预告中国共产党官方立场将有所变化的行动。

直到八九民运三十周年，即2019年时，六四事件的话题在中国仍然是敏感话题。法国广播电台报道认为，一批香港记者在事件三十周年之际，以摄制纪录位片、撰写文章和口述当年事件的所见所闻的方法，以传承历史真相；另一方面，法广认为一些亲建制派传媒由过往不主动提及事件以达到让人遗忘的目的，转为以讽刺、批评及错误论述等方法营造“六四事件可以争拗”的现象。中共中央机关报在运动中期称其为“动乱”，后谴责为“反革

命暴乱”，至今六四事件在中国大陆仍为敏感话题被严格限制讨论或悼念。尽管事件本身对共产党的影响力不断减弱，在中国大陆以外地区仍有许多人主张“转型正义”。

观点变化

在此事件结束后多年特别是进入2000年后，由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带来民众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并使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及军事强国。国家实力的提升，使得对中国大陆民众因经济差距倒向“西方怀抱”的担忧被消解，中国政府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得以稳固。根据2010年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认为，中国政府的受信任度和合法性仍然很高，其从2007年的83%增加到2010年的87%。研究还发现，有87%的中国人满意他们的政府，74%的中国人认为他们的政府正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另外，诸多国家（包括苏东剧变中涉及的国家和利比亚、2014年后的乌克兰等）发生西方国家支持的“颜色革命”并造成政权更迭后，长期处于经济低迷甚至陷入政局动荡，使得出于中国时局动荡、国家分裂这一假设的担忧日益增加。

在此背景下，中国社会对六四事件中政府措施持否定态度的舆论观点逐渐减少以至于消失。到2010年代，支持政府的立场更不断升温。政府暴力镇压、结束运动的方式获得认可，对六四事件本身的负面评价则同时增加，如将其称之为“胡闹”。而在这部分对事件本身表示否定立场的人群中，甚至有当年事件中的民主派人士。而中国大陆的部分公众人物（如互联网中的网络红人马云）还开始在言论中引用六四清场这一事件，其立场则直接体现出对政府的支持。六四清场中，政府使用坦克清场的方式更是被大量中国大陆民众认为是暴力镇压最为有效的手段。例如，2019年6月香港反送

中运动爆发，中国大陆舆论与香港严重对立。而在中国大陆民众呼吁中央政府直接以武力镇压结束的呼声中，即有人提议使用六四清场方式，出动坦克驱离，直接结束运动。

文化作品

在学生示威活动遭到镇压后，于1989年6月4日当天正在罗马举办演唱会的英国摇滚乐团治疗乐队，在最后安可曲中将“信仰”（Faith）一词改为“今日于中国死去的每个人”（everyone that died today in China）。比利・乔在其1989年9月发布的单曲专辑《火不是我们放的》中，则以“中国戒严着”（China's under martial law）一词来将六四事件作为倒数第二个引用的历史事件。而前卫摇滚乐团海狮合唱团则在创作的歌曲《日落城之王》中使用天安门广场来作为印象图片，同时歌曲内也出现“六四的傀儡皇帝”（a puppet king on the Fourth of June）等歌词。同年11月时琼・拜亚在她的专辑《Speaking of Dreams》中亦以歌曲《中国》（China）来纪念六四事件，之后她亦说到专辑是为了“坚持非暴力手段而付出巨大代价、已经永远改变中国面貌”的天安门广场上之学生。R.E.M.则是在1991年推出了《闪亮快乐的人》，在专辑歌曲上讽刺性的安排有关中国政府对于六四事件的宣传内容翻译。1992年时，罗杰・沃特斯也推出了专辑《欢愉致死》，其中在歌曲《看电视》（Watching TV）中对于西方世界就六四事件的反应进行沉思。到了2013年，AKB48推出了专辑《Team A 6th Stage“目击者”》，其中在歌曲《目击者》中就有疑似影射六四事件的相关内容，也因此导致在2014年SNH48引进同名专辑时该歌被删除。

1989年，汤姆・布洛考在自己主持的黄金时段上将天安门广场的示威活动与柏林墙倒塌同样列为当年度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权事件之一。2009年6月3

日，英国广播公司则播出纪录片《重返天安门》（Kate Adie Returns to Tiananmen Square），由记者凯特•阿迪再度前往中国并且回忆在1989年所目睹的事件发生经过。另外由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在2009年制作的电视剧《天与地》，其编审周旭明表示剧本在创作时受到六四事件的启发，而这部电视剧后来则在2011年时遭到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下令禁止播出。而在1992年时，由李国豪主演的电影《龙霸天下》则于电影中出现六四事件的部分场景，在电影中李国豪扮演一个在六四事件期间死亡的美国政府雇员其儿子。《辛普森一家》"Goo Goo Gai Pan"一集中，当辛普森一家穿过天安门广场时，广场上的一块石碑上写着"1989年，天安门广场，这里什么也没有发生"。《南方公园》"电影预告片"一集中，片中角色称1993年在天安门广场上有很多人死亡，事实上是指1989年的六四清场。

2006年时由中国导演娄烨执导拍摄的《颐和园》同样也提及六四事件，并且有数个影像便是在实际的北京街道上拍摄。然而该片在中国大陆被以电影尚未经过审核而禁止公开上映，但也有一部分原因被认为是因为电影内容涉及到六四事件。2014年时，在由马丁•史柯西斯监制、刘伟强执导的黑帮电影《青龙复仇》中，也有情节描述黑帮成员们一同观看和讨论六四事件的新闻。另外在艺术作品部分，中国艺术家岳敏君以六四事件为灵感而创作的油画作品《处决》在2007年时成为拍卖价格最为昂贵的中国当代艺术作品。而同样是中国艺术家的王兴伟则将原本受伤学生躺在单车上抬离现场的新闻照片，以企鹅图像加以取代并且重新绘制出油画作品《新北京》。中国独立音乐人李志创作歌曲《广场》，但该歌曲被各大平台封禁。2019年4月，德国徕卡相机公司上线了一支名为"徕卡-狩猎（Leica-The Hunt）"的系列广告片，因片中涉及中国的部分提及六四事件，此片被中国封杀。

2020年10月15日，阿根廷艺术家 Francisco Nicosia 发行的专辑 《Fang Yin》中的单曲《1983, spatial report》直接使用了6月4日至6月5日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新闻联播》（从“北京的态势急转直下”起）作为背景音乐。

在2020年11月13日发售的游戏《使命召唤：黑色行动冷战》的前导预告中出现了一秒有关该事件的画面，因而该预告片在中国被下架。而后发布了经过修剪编辑的预告片（仅删减了画面，没有删减音频）。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1989_Tiananmen_Square_protests

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

1989年在中国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抗议活动，被称为六四事件或天安门大屠杀。手持突击步枪的部队，伴随着坦克，向示威者和那些试图阻止军队进入天安门广场的人开火。抗议活动于 4 月 15 日开始，并于 6 月 4 日由于政府派人民解放军占领北京市中心部分地区后被强行镇压。死亡人数估计从几百到几千或上万不等，还有数千人或上万人受伤。北京抗议活动引起的全民运动有时被称为“ 89 民主运动”或天安门事件。

1989 年 4 月，在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变革的背景下，支持改革的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引发了抗议活动，反映了人民和政治精英对国家未来的焦虑。1980年代的改革导致了新生的市场经济，一部分人受益，另一部分人则受到严重不利，一党制的合法性也面临挑战。当时普遍的不满包括通货膨胀、腐败、毕业生对新经济的准备有限，和限制政治参与。尽管他们高度混乱且目标各不相同，但学生们呼吁加强问责制、宪法正当程序、民主、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在抗议活动的高峰期，大约有一百万人聚集在广场上。

随着抗议活动的发展，当局以和解和强硬两种策略作出回应，暴露出党内领导层内部的深刻分歧。到了 5 月，由学生领导的绝食在全国范围内激发了对示威者的支持，抗议活动蔓延到了大约 400 个城市。中共最高领导，国务院总理李鹏和党内元老李先念和王震呼吁果断行动、对抗议者进行暴力镇压，并最终成功地赢得了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和主席杨尚昆的支持立场。5月20日，国务院宣布戒严。他们动员了多达 300,000 名士兵前往北京。6 月 4 日凌晨，部队在北京的主要干道上推进到北京中部，在此过程中，示威者和旁观者均遇害。军事行动由杨尚昆主席同父异母的弟弟杨白冰将军统率指挥。

国际社会、人权组织和政治分析人士谴责中国政府的大屠杀。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武器禁运。中国政府广泛逮捕抗议者及其支持者，镇压中国各地的其他抗议活动，驱逐外国记者，严格控制国内媒体对事件的报道，加强警察和国内安全力量，降职或清洗那些被视为同情抗议活动的官员。更广泛地说，镇压结束了1986 年开始的政治改革，并停止了 1980 年代的自由化政策，这些政策在邓小平1992 年南巡后才部分恢复。这被视为一个分水岭事件；对抗议的反应为中国的政治表达设置了限制，这些限制一直持续到今天。记住抗议活动与质疑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广泛相关，并且仍然是中国最敏感和最广泛审查的话题之一。

====

自 1989 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为这一事件使用了许多名称，并逐渐使用更加中性的术语。随着事态的发展，它被贴上"反革命暴动"的标签，后来改为简单的"暴动"，接着是"政治风暴"。最后，领导层选择了更为中性的词"1989 年春夏之间的政治动荡"，并沿用至今。

在英语中，经常使用"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天安门广场抗议"和"天安门广场镇压"等术语来描述这一系列事件。然而，北京的大部分暴力事件实际上并不是发生在天安门，而是在广场外沿长安街只有几公里长的一段，尤其是木樨地附近。这个词还给人一种误导性的印象，即示威只发生在北京，

而实际上，他们在中国的许多城市都发生过。

背景

拨乱反正与经济改革

文化大革命截至毛泽东于1976年去世和逮捕四人帮。这场由毛泽东领导的运动对该国最初多元化的经济和社会结构造成了严重破坏。随着经济生产放缓或停顿，该国陷入贫困。政治意识形态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以及共产党本身的内部运作中至关重要。

1977年9月，邓小平提出“拨乱反正”与纠正文革的错误。1978年12月第11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以后，邓小平成为中国的事实上的领导者。他发起了全面改革中国经济的计划。几年之内，该国对意识形态纯洁性的关注被对实现物质繁荣的一致努力所取代。

为了引导他的改革议程，邓将他的盟友提拔到政府和党的最高职位。1980年9月，赵紫阳任国务院总理，1982年胡耀邦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改革开放的挑战

邓小平的改革旨在降低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并逐步允许农业和工业领域的私人生产。到 1981 年，大约 73% 的农村农场已经去集体化，80% 的国有企业被允许保留其利润。几年之内，产量增加，贫困大幅减少。

虽然改革普遍受到公众的欢迎，但对改革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担忧与日俱增，包括党内精英官僚的腐败和裙带关系。自 1950 年代以来，国家规定的定价制度长期以来一直将价格保持在较低水平。最初的改革创建了一个两级系统，其中一些价格是固定的，而另一些则允许波动。在长期短缺的市场中，价格波动使有强大关系的人能够以低价购买商品并以市场价格出售。负责经济管理的党内官僚有很大的动机进行这种套利。公众对腐败的不满达到了高潮；许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开始相信只有民主改革和法治才能治愈这个国家的病痛。

继 1988 年北戴河夏令营会议之后，邓小平领导的党同意向市场化定价体制过渡。价格管制放松的消息在中国各地引发了提现、购买和囤积的浪潮。政府在不到两周的时间里惊慌失措地取消了价格改革，但在更长的时间内产生了明显的影响。通货膨胀率飙升：官方指数报告称，1987 年至 1988 年间，北京的消费价格指数上涨了 30%，导致工薪阶层恐慌，担心他们再也买不起大宗商品。而且，在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无利可图的国有企业被迫削减成本。这威胁到很大一部分依赖“铁饭碗”的人口：即就业保障、医疗保健和补贴住房等社会福利。

社会剥夺权利和合法性危机

1978 年，改革派领导人设想知识分子将在指导国家改革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但这并没有按计划发生。尽管开设了新大学并增加了入学人数，国家指导的教育系统并没有产生足够的毕业生来满足农业、轻工业、服务业和外国投资领域日益增长的需求。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专业的学生的就业市场尤其有限。此外，私营企业不再需要接受国家分配给他们的学生；许多高薪工作都是基于裙带关系和偏袒而提供的。获得国家分配的良好职位意味着必须讨好效率极低的官僚机构；这些官僚机构将权力授予在其管辖领域内缺乏专业知识的官员。

知识分子和学生对政治问题产生了更大的兴趣。“民主沙龙”、“草地沙龙”等小型学习团体开始出现在北京大学校园。这些组织激励学生参与政治讨论。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名义上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逐步采用资本主义做法的过程中面临着合法性危机。私营企业催生了利用宽松监管环境的投机者，他们经常在不那么富裕的人面前炫耀自己的财富。民众对财富分配不公的不满正在酝酿之中。贪婪，而不是技能，似乎是成功的最关键因素。公众普遍对国家的未来感到幻灭。人们想要改变，但定义“正确道路”的权力仍然完全掌握在未经选举的政府手中。

全面而广泛的改革在市场化步伐和随之而来的意识形态控制方面产生了政治分歧，在中央领导层内部打开了深深的鸿沟。改革派（以胡耀邦为首的“右派”）赞成政治自由化和多元化思想作为表达民众不满的渠道，并要求进一步改革。保守派（以陈云为首的“左派”）表示，改革走得太远，主张

恢复更大的国家控制，以确保社会稳定并更好地与党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保持一致。双方执行重要决策都需要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支持。

1986年学生示威

1986年年中，天体物理学教授方励之从普林斯顿大学归来，开始了中国大学的个人之旅，谈论自由、人权和三权分立。方是精英知识分子中广泛暗流的一部分，他们认为中国的贫困和不发达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是中国专制政治制度和僵化指令经济的直接结果。随着方的录音讲话在全国广为流传，政治改革是解决中国持续存在的问题的唯一方法的观点在学生中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作为回应，邓小平警告说，方在破坏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统价值观和党的领导地位的同时，盲目崇拜西方生活方式、资本主义和多党制。

1986 年 12 月，在方以及其他世界范围内的“人民力量”运动的鼓舞下，学生示威者举行了抗议改革步伐缓慢的活动。这些问题范围广泛，包括对经济自由化、民主和法治的要求。虽然抗议活动最初是在中国科技大学所在地合肥，但很快蔓延到上海、北京和其他主要城市。这让中央领导感到震惊，他们指责学生煽动文化大革命式的动乱。

总书记胡耀邦被指责为展示“软”的态度，处理不当的抗议，从而破坏社会的稳定。1987 年 1 月 16 日，他遭到保守派的彻底谴责，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党开始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针对胡、政治自由化和西方

思想。这场运动阻止了学生抗议并限制了政治活动，但胡在知识分子、学生和共产党进步人士中仍然很受欢迎。

政治改革

邓小平是中国最高领导人。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上发表题为《论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的讲话，在中国启动政治改革。他呼吁对中国宪法进行系统修改，批判官僚主义、集权和家长制，同时提出中国领导职位的任期限制，提倡“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 ” 1982年12月，中国第四部现行宪法，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

1986年上半年，由于原有的政治体制阻碍了进一步的经济改革，腐败和经济不平等的趋势日益加剧，邓小平多次呼吁恢复政治改革。1986年9月成立了研究政治改革可行性的五人委员会；成员包括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邓小平的意图是提高行政效率，进一步明确党和政府的职责，消除官僚主义。邓虽然讲法治和民主，但划定了一党制内的改革为界限，反对实行西方式宪政。

1987年10月，在中共十三大上，赵紫阳作了鲍彤起草的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报告。他的讲话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赵紫阳指出，在中国，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并以1980年邓小平的讲话为指导，详细阐述了政治改革的具体步骤，包括推进法治和分权、分权、完善

选举制度等。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赵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1989年抗议活动的开始

胡耀邦之死

学生领袖

名称	籍贯和隶属关系
柴玲	山东；北京师范大学
乌尔开西	新疆；北京师范大学
王丹	北京；北京大学
封从德	四川；北京大学
沉彤	北京；北京大学
王有才	浙江；北京大学
李录	河北；南京大学
周永军	中国政法大学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突然死于心脏发作；学生们反应强烈，他们大多认

为他的死亡与他被迫无奈辞职的政治困境有关。胡的死为学生大量聚集提供了最初的动力。在大学校园里，出现了许多颂扬胡的海报，呼吁尊重胡的遗产。几天之内，大多数海报都涉及更广泛的政治问题，例如腐败、民主和新闻自由。4月15日，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自发的小型集会开始了。同一天，许多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加入了集会。4月16日，西安和上海也举行了有组织的小型学生聚会。4月17日，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为纪念胡耀邦献了一个大花圈。它的花圈仪式是在 4 月 17 日举行的，聚集的人群比预期的要多。下午5时，500名学生抵达人民大会堂东门，在天安门广场附近，悼念胡。聚会上有来自不同背景的演讲者，他们发表了纪念胡的公开演讲并讨论了社会问题。然而，他们很快就被政府认为妨碍了大会堂的运作，因此警方试图说服学生们散开。

从4月17日晚开始，3000名北京大学生从校园向天安门广场游行，很快，清华大学的近千名学生也加入了。抵达后，他们很快就与已经聚集在广场上的人联手。随着规模的扩大，聚会逐渐演变成抗议活动，学生们开始为政府起草一份请求和建议（七项要求）清单：

肯定胡耀邦关于民主自由的观点是正确的。

承认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是错误的。

公布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收入情况。

允许私营报纸并停止新闻审查。

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的工资。

结束对北京示威活动的限制。

在官方媒体上提供对学生的客观报道。

4月18日上午，学生们留在广场。一些人聚集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唱着爱国歌曲，听着学生组织者的即兴演讲。其他人聚集在大会堂外。与此同时，数千名学生聚集在党的领导所在地——中南海的入口——新华门，要求与政府进行对话。在警察阻止学生进入大院后，他们进行了静坐。

4月20日，大部分学生被劝离新华门。为了驱散剩下的大约 200 名学生，警方使用警棍；据报发生了轻微的冲突。许多学生感到受到了警察的虐待，有关警察暴行的谣言迅速传播开来。这一事件激怒了校园里的学生，那些政治上不活跃的学生决定加入抗议活动。此外，一群自称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的工人发出了两份挑战中央领导层的传单。

胡的国葬于4月22日举行。4月21日晚，约有10万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游行，无视北京市当局关于因葬礼而关闭广场的命令。葬礼在人民大会堂内举行，领导出席，向学生们现场直播。赵紫阳总书记致悼词。葬礼似乎很匆忙，只持续了 40 分钟，广场上情绪高涨。

保安封锁了人民大会堂东入口，但有几名学生向前推进。一些人被允许越过警察线。这些学生（三人）跪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递交请愿书，并要求见总理李鹏。站在他们旁边的第四个学生（乌尔开希）做了一个简短的、情绪化的演讲，恳求李鹏出来和他们说话。仍然在广场但在警戒线外的更

多学生有时情绪激动，高喊要求，呼口号，并冲向警察。吾尔开希安抚众人，等待总理出现。然而，大会堂并没有出现任何领导，让学生们失望和愤怒；一些人呼吁进行罢课抵制。

4 月 21 日，学生们开始组织起来。4月23日，在来自21所大学的约40名学生参加的会议上，北京学生自治联合会成立。随后呼吁在所有北京的各大学进行全面的罢课抵制。这种在党的管辖范围之外运作的独立组织引起了领导层的警觉。

4月22日黄昏时分，长沙、西安发生严重骚乱。在西安，暴徒纵火烧毁汽车和房屋，并在该市西华门附近的商店中发生抢劫。在长沙，有38家商店被抢劫者洗劫一空。这两个城市有超过350人被捕。在武汉，大学生组织了反对省政府的抗议活动。随着全国局势变得更加动荡，赵紫阳多次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赵强调三点：劝阻学生不要再抗议并要求他们返回课堂，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打击骚乱，并与各级政府学生开展对话形式。李鹏总理呼吁赵谴责抗议者、并认识到需要采取更严重的行动。赵驳回了李的意见。尽管呼吁他留在北京，赵还是于4 月 23 日启程前往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转折点：4 月 26 日社论

赵离开北京前往朝鲜后，李鹏在北京负责行政当局运作。4月24日，李鹏会见了北京市委书记和市长，了解情况。北京市政府官员希望迅速解决危机，并将抗议活动定为推翻中国政治制度和包括邓小平在内的重要党领导

人的阴谋。在赵缺席的情况下，政治局常委会同意对抗议者采取坚决行动。4月25日上午，国家主席杨尚昆，国务院总理李鹏在邓的住所会见了邓小平。邓支持强硬立场，并表示必须通过大众媒体传播适当的警告，以遏制进一步的示威活动。会议确立了对抗议活动的首次正式评估，并强调了邓在重要问题上的"最终决定权"。李鹏随后下令将邓小平的意见起草成公报，并发给所有共产党高级官员，以动员党的机器对付抗议者。

4月26日，党的官方报纸《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题为《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头版社论。社论中的语言有效地将学生运动标记为反党、反政府的叛乱。这篇社论使用了 1976 年天安门事件期间使用的类似言论，唤起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回忆。这篇文章激怒了学生，他们将其解释为对抗议活动及其原因的直接定罪。社论适得其反：它没有使学生屈服，而是激怒了学生，让他们直接反对政府。社论的两极分化性质使其成为其余抗议活动的主要症结所在。

4月27日示威

4 月 27 日，来自北京各大学的约 50,000-100,000 名学生穿过首都街头游行到天安门广场，突破了警察设置的防线，沿途得到了广泛的公众支持，尤其是工厂工人。渴望展现运动爱国本质的学生领袖也淡化了反共的口号，选择呈现"反腐败"和"反任人唯亲"但"亲党"的信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真正呼吁推翻共产党的学生派系因 4 月 26 日的社论而受到关注。

游行的惊人成功迫使政府做出让步并与学生代表会面。4月29日，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袁牧会见了政府批准的学生会指定代表。会谈虽然讨论了社论、新华门事件、新闻自由等广泛问题，但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乌尔开希等独立学生领袖拒绝出席。

当赵紫阳于 4 月 30 日从平壤返回并重掌权威时，政府的语气变得越来越和解。在赵看来，强硬路线行不通，让步是唯一的选择。赵要求允许新闻界积极报道运动，并于5月3日至4日发表了两次同情演讲。赵在讲话中说，学生对腐败的担忧是合理的，学生运动是爱国的。这些演讲基本上否定了 4 月 26 日社论提出的信息。5月4日，约10万名学生在北京街头游行纪念五四运动以及重申早前游行的一再要求。许多学生对政府的让步感到满意。5月4日，除北大和北师大外，北京所有高校宣布结束罢课抵制。随后，大多数学生开始对运动失去兴趣。

抗议活动升级

准备对话

早在 4 月中旬，政府就如何应对这场运动产生了分歧。赵紫阳从朝鲜归来后，进步派与保守派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支持继续对话和对学生采取温和态度的人支持赵紫阳，而反对运动的强硬保守派则支持李鹏总理。赵和李在 5 月 1 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发生了冲突。李坚持认为稳定的需要高于一切，而赵说党应该支持增加民主和透明度。赵推动进一步对话。

为准备对话，学生联合会选举了正式代表团的代表。然而，由于学联领导人不愿让代表团单方面控制运动，因此出现了一些摩擦。运动因转向更深思熟虑的方法而放缓，因内部不和而破裂，并因整个学生团体的参与度下降而日益淡化。在此背景下，包括王丹、吾尔开希在内的一批有魅力的领袖，渴望重振雄风。他们也不相信政府提出的对话提议，认为它们只是为了打发时间和安抚学生的伎俩。为了摆脱其他主要学生领袖现在采用的温和渐进的方法，这些少数人开始呼吁回归更具对抗性的策略。他们制定了一项动员学生进行绝食的计划，该计划将于 5 月 13 日开始。早期动员其他人加入他们的尝试只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直到柴玲在绝食计划开始的前一天晚上进行了情感诉求。

绝食开始

5 月 13 日，也就是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高调进行国事访问的两天前，学生们开始绝食。得知戈尔巴乔夫的欢迎仪式定于广场举行，学生领袖想利用绝食来迫使政府满足他们的要求。此外，绝食赢得了广大民众的广泛同情，为学生运动赢得了它所寻求的道德制高点。到5月13日下午，约有30万人聚集在广场。

受北京事件的启发，其他城市的大学开始抗议和罢课，许多学生前往北京参加示威活动。总体而言，天安门广场示威秩序井然，每天都有来自北京地区各高校的学生游行，表示支持罢课和抗议者的要求。学生们在去广场的路上和在广场上时唱了《国际歌》，这是世界共产主义国歌。

由于害怕运动失控，邓小平下令为戈尔巴乔夫的国事访问清理广场。为执行邓的要求，赵指示下属立即与学生协调谈判。赵相信他可以呼吁学生以爱国主义为重。学生们明白，中苏首脑会议期间出现的内部动乱迹象会让国家难堪，而不仅仅是政府难堪。5月13日上午，中共统战部负责人阎明复召开紧急会议，召集了刘晓波、陈子铭、王军涛等知名的知识分子领袖。阎说，政府准备立即与学生代表进行对话。无论学生是否退出，天安门欢迎戈尔巴乔夫的仪式都将取消——这实际上消除了学生们认为自己拥有的议价能力。这一消息使学生领导层陷入混乱。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访问

从 5 月上旬到中旬，新闻限制显著放松。官方媒体开始播放同情抗议者和抗议运动的镜头，包括绝食抗议者。5月14日，以戴晴为首的知识分子得到胡启立的许可，可以绕过政府审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全国知识分子的进步观点。知识分子随后发出紧急呼吁，要求学生离开广场，试图缓和冲突。然而，许多学生认为知识分子是在为政府说话，拒绝行动。当晚，阎为首的政府代表与沈彤、向小吉为首的学生代表正式谈判。阎肯定了学生运动的爱国性质，并恳请学生退出广场。虽然阎对妥协的明显诚意让一些学生感到满意，但由于相互竞争的学生派系向领导层传达了不协调和不连贯的要求，会议变得越来越混乱。在学生领袖得知该活动没有按照政府最初的承诺在全国播出后不久，会议就破裂了。阎随后亲自到广场上号召学生，甚至自告奋勇将自己扣为人质。第二天，阎还把学生的请求交给了李鹏，要求李考虑正式撤回 4 月 26 日的社论，并将运动重新命名为“爱国民主运动”；李拒绝了。

戈尔巴乔夫访问期间，学生们留在广场；他的欢迎仪式在机场举行。中苏首脑会晤是近30年来首次举行，标志着中苏关系正常化，被视为对中国领导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突破。然而，它的顺利进行却因学生运动而出轨。这给全球舞台上的领导层造成了严重的尴尬（“丢脸”），并促使政府中的许多温和派走上更加强硬的道路。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的会晤是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当时广场上一片骚动和抗议。5 月 16 日戈尔巴乔夫会见赵时，赵告诉他、以及国际媒体，邓小平仍然是中国的“最高权威”。邓觉得这话是赵企图将运动处理不当的责任推给自己。赵对这一指控的辩护是，私下告知世界领导人邓是真正的权力中心是标准操作程序；1989 年 2 月，李鹏对美国总统乔治・H・W・布什发表了几乎相同的私下声明。然而，该声明标志着该国两位最高领导人之间的决定性分裂。

聚集动力

绝食激起了对学生的支持，并在全国引起了同情。5 月 17 日至 18 日，约有 100 万北京各界人士团结一致，其中包括解放军人员、警察和下级官员。许多基层党和青年团组织，以及政府主办的工会，都鼓励他们的成员参加示威。此外，中国的一些“民主党派”也致函李鹏支持学生。中国红十字会专门下发通知，派遣许多人到广场上为绝食者提供医疗服务。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离开后，许多外国记者留在中国首都报道抗议活动，使国际关注这场运动。西方政府敦促北京保持克制。

这场运动在 4 月底逐渐减弱，现在又恢复了势头。到 5 月 17 日，随着

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涌入首都加入运动，中国约 400 个城市发生了各种规模的抗议活动。学生们在福建、湖北和新疆的省委总部示威。北京领导层没有明确表达的官方立场，地方当局不知道如何回应。由于示威活动现在包括广泛的社会团体，每个团体都有自己的不满，因此越来越不清楚政府应该与谁谈判以及要求是什么。政府在如何应对这场运动上仍存在分歧，随着绝食者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并获得广泛同情，政府的权威和合法性逐渐受到侵蚀。这些综合情况给当局施加了采取行动的巨大压力，因此讨论了戒严令作为适当的回应。

形势似乎难以处理，采取果断行动的重担落在了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身上。5 月 17 日，在邓小平官邸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事情达到了顶点。会上，赵紫阳要求撤回4月26日社论的让步策略遭到了彻底的批评。李鹏、姚依林和邓坚称，赵于5月4日向亚洲开发银行发表和解讲话，暴露了最高领导层内部的分歧，给学生们鼓了勇气。邓小平警告说，"在局势不失控的情况下，现在没有退路"，因此"决定宣布戒严并派遣军队进京"，以示政府的不容忍立场。为了说明戒严的必要性，示威者被描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倡导者所利用的工具，以及希望进一步实现个人野心的党内分子的工具。在赵紫阳的余生中，赵一直坚称，六四事件的最终决定权在邓小平手中：——出席会议的五名政治局常委委员中，赵和胡启立反对戒严，李鹏和姚依林坚决支持，乔石保持谨慎中立，不置可否。邓任命后三人执行决定。

5月17日晚，政治局在中南海召开会议，敲定戒严计划。会上，赵宣布准备"请假"，理由是他无法让自己参与实施戒严。出席会议的长老薄一波和杨尚昆敦促政治局常委会听从邓的命令。赵不认为最终的政治局常委会投票对戒严具有法律约束力；杨尚昆以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动员军队进

京。

5月18日，李鹏首次会见学生，试图安抚民众对绝食的担忧。在会谈中，学生领袖再次要求政府撤销 4 月 26 日的社论，并确认学生运动是“爱国的”。李鹏说，政府最关心的是将绝食者送往医院。讨论是对抗性的，几乎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但在国家电视台上获得了学生领袖的突出播放时间。此时，那些呼吁推翻党和李鹏、邓小平的人在北京和其他城市都变得突出。口号针对的是邓小平，例如称他为“垂帘听政”。

时任中共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陪同赵紫阳在广场会见学生；温在党的自由派政治清洗中幸存下来，后来于2003年至2013年担任总理。

5月19日凌晨，赵紫阳以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前往天安门广场。陪同他的是温家宝。李鹏也去了广场，没多久就离开了。凌晨4 点50分，赵以扩音器向一群学生发表讲话，敦促他们停止绝食。他告诉学生们，他们还年轻，并敦促他们保持健康，不要在不关心自己未来的情况下牺牲自己。赵老师的感人演讲得到了部分学生的喝彩。这将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了。不管你们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我这次来不是请你们原谅的。我想说的是，现在同学们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绝食已经到了第七天，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绝食时间长了，对身体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这是有生命危险的。现在最重要的是，希望尽快结束这次绝食。我知道，你们绝食是希望党和政府对你们所

提出的问题给以最满意的答复。我觉得，我们的对话渠道是畅通的，有些问题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解决。比如你们提到的性质、责任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终究可以得到解决，终究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你们也应该知道，情况是很复杂的，需要有一个过程。你们不能在绝食已进入第七天的情况下，还坚持一定要得到满意答复才停止绝食。但是那个时候就晚了！

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国家和你们的父母培养你们上大学不容易呀！现在十几、二十几岁，就这样把生命牺牲掉哇，同学们能不能稍微理智地想一想。现在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你们都知道，党和国家非常着急，整个社会都忧心如焚。另外，北京是首都，各方面情况一天天严重，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同学们都是好意，为了我们国家好，但是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失去控制，会造成各方面的严重影响。

总之，我就是这么一个心意。你们停止绝食，中国政府不会就这样子把对话的门关起来，绝不会！你们说体制有问题，我们可以继续讨论。慢是慢了一些，但一些问题的认识正在逐步接近。我今天主要是看望一下同学们，同时说一说我们的心情，希望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这个问题。这件事情在不理智的情况下，是很难想清楚的。大家都这么一股劲，年轻人么，我们都是从年轻人过来的，我们也游过行，卧过轨，我也知道当时那种情况，没有想后果怎么样。但是事后一想啊，你们要冷静想一想今后的事。有很多事情总是可以解决的。希望你们早些结束绝食，谢谢同学们。”

——赵紫阳在天安门广场，1989 年 5 月 19 日

5 月 19 日，政治局常委们会见了军方领导人和党内长老。邓主持会议并表示，戒严是唯一的选择。会上，邓小平宣布选择胡耀邦和赵紫阳接班人是"错误的"，并决定解除赵的总书记职务。邓还发誓要坚决对付赵的支持者并开始宣传工作。

对抗议者的监视

学生领袖受到当局的严密监视；交通摄像头被用来对广场进行监视；附近的餐馆以及学生聚集的任何地方都被窃听。这种监视导致对抗议参与者的识别、捕获和惩罚。大屠杀发生后，政府对工作单位、机构和学校进行了彻底的审查，以确定参与抗议的人。

北京以外

上海的大学生也走上街头纪念胡耀邦逝世，抗议政府的某些政策。在许多情况下，这些都得到了大学自己的党组织的支持。

4月19日，与改革派关系密切的杂志《世界经济导报》的编辑决定为胡出版纪念版。里面是严家其的一篇文章，对北京的学生抗议活动给予了好评，并呼吁重新评估胡1987年的所受到的清洗行动。江泽民察觉到北京的保守政治趋势，要求对该文章进行审查，许多报纸被印成空白页。江随后停职了该报主编，他的果断行动赢得了保守党长老的信任，他们称赞江的忠

诚。

香港，5月27日，超过30万人聚集在跑马地马场的聚会被称为中国的民主演唱会（中国：民主歌声献中华）。多位香港名人演唱歌曲，表达对北京学生的支持。翌日，由李柱铭、司徒华等组织领袖带领的150万人游行，游行穿过港岛。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华人居住的地方，人们聚集起来抗议。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内的许多政府都发布了前往中国旅行的旅行警告。

军事行动

戒严

党政领导

名称　1989年职位

邓小平　　　中央军委主席；

事实上的 最高领袖

陈云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席

赵紫阳　　　中共中央总书记 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

李鹏　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

乔石　中共中央纪委书记

中共政法委书记

胡启立　　　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姚依林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副总理

杨尚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

李先念　　　全国政协主席

万里　人大常务委员会主席

王震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江泽民　　　中共上海市委书记

中国政府于 5 月 20 日宣布戒严，并动员了来自全国七个军区中的五个军区的至少 30 个师。解放军24个军团中至少有14个军团出兵。多达250,000 名士兵最终被派往首都，其中一些是乘飞机抵达，另一些是通过铁路抵达。广州民航当局暂停民航旅行，为运送军队做准备。

军队进入首都、在郊区被成群结队的抗议者封锁。数以万计的示威者包围了军车，阻止他们前进或后退。抗议者对士兵进行训诫，并呼吁他们加入他们的事业；他们还为士兵提供食物、水和住所。当局见无路可进，于5月24日下令军队撤退。随后，所有政府军撤回城外基地。虽然军队的撤退最初被视为有利于抗议者的"扭转局势"，但实际上，全国各地正在动员进行最后的攻击。

与此同时，学生运动内部的分歧加剧。到 5 月下旬，学生们变得越来越混乱，没有明确的领导或统一的行动方针。此外，天安门广场人满为患，面临严重的卫生问题。侯德建建议公开选举学生领袖为运动代言，但遭到反对。与此同时，王丹缓和了他的立场，感觉到即将发生的军事行动及其后果。他主张暂时撤出天安门广场重新集结校园，但遭到想要守住广场的强硬学生派系的反对。不断增加的内部摩擦导致在一系列“迷你政变”中争夺对广场中间扬声器的控制权：谁控制了扬声器，谁就是运动的“负责人”。一些学生会在火车站等候迎接来自该国其他地区的学生的到来，以争取派系支持。学生团体开始互相指责别有用心，例如勾结政府并试图从运动中获得个人名声。甚至有学生企图将柴玲、冯从德等人从他们的领导职位上赶下台，柴玲称之为“有组织有预谋的行为”。

6 月 1-3 日

6月1日，李鹏发表了题为《论动乱的真面目》的报告，传遍了每一位政治局委员。该报告旨在通过将抗议者称为恐怖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来说服政治局清理天安门广场的必要性和合法性。报道称，动乱持续加剧，学生们没有离开的打算，他们正在获得民众的支持。国家安全部向党的领导层提交了一份报告，为戒严提供了进一步的理由。报告强调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渗透的危险进入中国以及西方，尤其是美国对学生的负面影响。国安部表示相信美国军队已经干预学生运动，希望推翻共产党。该报告在党内营造了一种紧迫感，并为采取军事行动提供了正当理由。连同武力清除广场的计划，政治局收到来自军队总部的消息，称军队已准备好帮助稳定首都，并且他们了解戒严令克服动荡的必要性和合法性。

6月2日，随着抗议者的行动越来越多，中国共产党认为是时候采取行动了。随着报纸发表文章呼吁学生离开天安门广场并结束运动，抗议活动开始了。广场上的许多学生不愿离开，对文章感到愤怒。作为对文章的回应，成千上万的学生在北京的街道上排成一排，抗议离开广场。

三位知识分子——刘晓波等人——和台湾歌手侯德健宣布第二次绝食以恢复运动。在占领广场数周后，学生们感到疲倦，温和派和强硬派学生团体之间出现了内部裂痕。绝食者在宣言演说中公开批评政府镇压运动，提醒学生他们的事业值得为之奋斗，并推动他们继续占领广场。

6月2日，邓小平和几位党内长老会见了赵紫阳、胡启立下台后留下的三名政治局常委委员李鹏、乔石、姚依林。委员会成员同意清理广场，以便"停止骚乱，恢复首都的秩序"。他们还同意需要尽可能和平地清理广场；但如果抗议者不合作，部队将被授权使用武力完成工作。那天，国营报纸报道说，军队已部署在该市的十个关键地区。27日，第65军和第24军被秘密转移到人民大会堂西侧和公安部广场东部。

6 月 2 日晚，有报道称一辆军用挖沟机碾过 4 名平民，造成 3 人死亡，引发了人们对军队和警察试图进入天安门广场的担忧。学生领袖发布紧急命令，在主要十字路口设置路障，以防止军队进入市中心。

6 月 3 日上午，学生和居民发现身穿便衣的军队试图将武器偷运到该市。学生们将武器缴获并交给了北京警方。学生在中南海领导大院新华门外抗

议，警方发射催泪瓦斯。军队从人民大会堂出来，很快就遇到了大批手无寸铁的抗议者。几名抗议者在人民大会堂外冲突时试图打伤士兵，迫使士兵暂时撤退。

6月3日下午4时30分，政治局常委三名成员分别会见了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国务委员等领导人，并敲定了戒严令：

平息反革命暴乱的行动于晚上9 点开始。

军队应 在6月4日凌晨1点前聚集在广场上，广场必须在 早上6点前清场。

不能容忍任何延误。

任何人不得阻碍戒严部队的前进。部队可以采取自卫行动，并可以使用任何手段清除障碍。

官方媒体将向公民广播警告。

该命令没有明确包含枪杀指令，但“使用任何手段”的许可被一些单位理解为使用致命武力的授权。当晚，政府领导从人民大会堂和中南海监视了行动。

6 月 3-4 日

6月3日晚，国营电视台警告居民待在室内；但是像两周前那样，成群结队的人走上街头，阻止即将到来的军队。解放军部队从四面八方向北京推进

——西边的第38、63 和 28 集团军；第15空降军，第20，第26和第54集团军从南部推进；东边的第39集团军和第1装甲师；以及来自北方的第 40和 64 集团军。

长安街

与 1976 年没有军队参与的天安门事件不同，1989 年的士兵配备了56 式突击步枪，这是AKS-47的变体，并向平民发射实弹。

晚上 10 点左右，第 38 集团军开始向空中开火，他们沿着西长安街向东向市中心前进。他们最初打算鸣枪警告并驱散聚集的大量人群。这次尝试失败了。最早的伤亡发生在五棵松西部，32岁的航天技术员宋晓明是当晚第一个确认死亡的人。几分钟后，当车队在三环路以东遭遇大规模封锁时，他们直接向抗议者开火，使用自动步枪射击。人群对军队使用实弹感到震惊，并以辱骂和投掷物作为反应。部队使用了国际法禁止的爆炸子弹。

大约晚上 10 点30分，军队的前进在广场以西约 5 公里处的木樨地短暂停止，铰接式无轨电车被放置在一座桥上并着火。来自附近公寓楼的人群试图包围军事车队并阻止其前进。第38军再次开火，伤亡惨重。根据天安门母亲的遇难者列表，木樨地有36人死亡，其中包括一位正在治疗伤员的医生。随着战斗继续向东，射击变得不分青红皂白，“随机的、散乱的模式”杀死了抗议者和无关的旁观者。一些人在俯瞰林荫大道的党高级官员的公

寓中丧生。士兵们开枪扫射公寓楼，一些人在里面或阳台上被枪杀。第 38 集团军也使用装甲运兵车(APC) 冲过公共汽车。他们继续击退示威者，示威者仓促架起路障并试图形成人链。随着军队的推进，长安街沿线发生了大量平民人数伤亡。迄今为止，数量最多的是从木樨地到西单的两英里路段，“65辆解放军卡车和47辆装甲运兵车……被完全摧毁，其他485辆军车受损”。

在南方，第十五空降军也使用了实弹，在虎坊桥、珠市口、天桥和前门都有平民死亡。

抗议者攻击解放军士兵

与较为温和的学生领袖不同，柴玲似乎愿意让学生运动以暴力对抗告终。柴在五月下旬的一次采访中表示，只有当运动以流血结束时，中国大多数人才会意识到学生运动的重要性并团结起来。然而，她觉得她无法说服她的同学们。她还指出，对于暴力镇压的期望是她从李录那里听到的，而不是她自己的想法。

随着杀戮的开始，它激怒了城市居民，其中一些人用棍棒、石块和燃烧瓶袭击士兵，纵火焚烧军车并殴打车内士兵。在北京西部的一条大街上，反政府抗议者焚烧了一支由 100 多辆卡车和装甲车组成的军用车队。中国政府及其支持者试图争辩说，军队采取自卫行动，并利用军队伤亡来为使用武力辩护；但据吴仁华说，军队在6月3日晚上10点开火后发生了对军队的

致命袭击，抗议者造成的军队死亡人数相对较少——在7到10人之间。相比之下，至少有成百上千或上万的平民死亡。

清除广场

晚上8 点30分，军用直升机出现在广场上空，学生们呼吁校园增援。晚上10 点，天安门民主大学的开学典礼在民主女神基地如期举行。晚上10 点16分，政府控制的扩音器警告军队可能会采取"任何措施"来执行戒严。到10:30 下午，城西和城南发生流血事件的消息开始蔓延到广场。午夜时分，学生扩音器传出在军事博物馆附近的西长安街有一名学生遇害的消息，广场上弥漫着一股阴沉的气氛。学生会副指挥李录敦促学生团结起来，通过非暴力手段保卫广场。午夜12 时30分，乌尔开希得知昨晚早些时候和他一起离开校园的北京师范大学一名女学生刚刚被杀后昏倒了。吾尔开希被救护车带走。到那时，广场上还有七万至八万人。

午夜12 点15分左右，一道耀斑照亮了天空，第一辆装甲运兵车从西面出现在广场上。12 点30分，又有两辆装甲运兵车从南方抵达。学生们向车辆扔了大块混凝土。一辆装甲车 停了下来，可能是金属杆卡在了它的轮子上，示威者用浸过汽油的毯子盖住它，然后放火烧了它。酷热迫使三名士兵离开，他们被示威者蜂拥包围。据报道，装甲运兵车冲过帐篷，人群中的许多人想殴打士兵。学生们组成了保护警戒线，护送这三个军人前往广场东侧历史博物馆旁的医疗站。

学生领导层面临着放弃非暴力和报复杀戮的压力。一时间，柴玲拿起扩音器，号召同学们准备“自卫”，对抗“无耻政府”。然而，她和李录最终还是同意了和平手段，并没收了学生们的棍棒、石头和玻璃瓶。

凌晨1 点30分左右，第15空降军、第38军的先头部队分别抵达广场的北端和南端。他们开始封锁广场，阻止学生和居民的增援，杀死更多试图进入广场的示威者。与此同时，第27军和第65军的士兵从人民大会堂向西涌出，第24军的士兵从东面的历史博物馆后面出现。剩下的数千名学生，完全被包围在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区域。凌晨2 点，部队朝纪念碑学生的头顶开枪。学生们向部队播报：“为祖国的民主与自由，为中华民族的强盛与繁荣，请大家安宁，听从人民的意志，不要对和平示威的学生使用武力。 ”

凌晨2 点30分左右，纪念碑附近的几名工人带着从部队缴获的机枪出现，并发誓要报仇。在侯德健的劝说下，他们放弃了武器。工人们还交出了一把没有弹药的突击步枪，刘晓波把它砸在了纪念碑的大理石栏杆上。目睹木樨地杀戮的学生邵江恳求年长的知识分子撤退，说失去了太多的生命。起初，刘晓波并不情愿，但最终还是和其他人以及侯德健一起，向学生领袖提出撤退。柴玲、李录、封从德最初拒绝了退出的想法。3:30 上午，在红十字营两名医生的建议下，侯德健等同意尝试与士兵谈判。他们乘坐救护车来到广场东北角，与第38军第336团政委交谈，后者将请求转达给指挥部，指挥部同意让学生朝东南方向安全通行。政委告诉侯，“如果你能说服学生离开广场，那将是一个巨大的功劳。”

凌晨4 点，广场上的灯突然熄了，政府的扩音器宣布：“广场清场开始，我们同意学生们的清场要求。” 学生们唱着《国际歌》，准备作最后一搏。侯返回并通知学生领袖他与军队的协议。凌晨4 点30分，灯光重新亮起，部队开始从四面八方向纪念碑前进。凌晨4 点32分左右，侯德建拿起学生的扩音器，讲述了他与军方的会面。很多第一次听说会谈的学生都愤怒地指责他懦弱。

士兵们停在距离学生大约十米的地方——第一排士兵摆出俯卧的姿势，架起机关枪。在他们身后，第二排士兵们蹲着，手持突击步枪对准学生。其中混杂着带棍棒的防暴警察。再靠后是坦克和装甲运兵车。封从德拿起扩音器，对学生们解释说没时间开会了。他提议用喊声来投票、决定集体行动。尽管投票结果尚无定论，封说学生们喊“撤退”的声音占了上风。几分钟后，大约凌晨 4 点35分，一队身着迷彩制服的士兵冲进纪念碑区域，向学生们的扬声器射击。其他部队在纪念碑前殴打和踢打数十名学生，抢夺并砸碎了他们的相机和录音设备。一个拿着扩音器的警官喊道：“你们最好离开，否则这不会有好下场。”

一些学生和教授说服仍然坐在纪念碑下层的其他人起身离开，而士兵则用棍棒和枪托殴打他们，并用刺刀刺他们。目击者听到枪声。大约 早上5点10分，学生们开始离开纪念碑。他们拉手向东南行进，尽管有些人向北出发。拒绝离开的人被士兵殴打，并被命令加入离开的队伍。将学生从广场上赶走后，士兵们被命令交出他们的弹药，之后他们被允许从 早上7点到早上9点进行短暂的休息。然后士兵们被命令清除广场上学生占领留下的所有碎片。残骸要么堆放在广场上焚烧，要么装在大塑料袋中，然后由军用直升机空运走。清理结束后，驻扎在人民大会堂的部队在接下来的九天里

一直被限制在里面。在此期间，士兵们只能睡在地板上，每天吃三人共享的一包方便面。军官们显然没有遭受这样差的待遇，他们还可以定期用餐。

6 月4日早上6点刚过，一队撤离广场的学生沿着长安街的自行车道向西走回校园时，三辆坦克从广场追赶，发射催泪瓦斯。一辆坦克冲过人群，碾死 11 名学生，碾伤数十人。

当天上午晚些时候，数千名平民试图从东长安街的东北方向重新进入广场，但被步兵队伍挡住了。人群中的许多人是广场上示威者的父母。当人群接近部队时，一名军官发出警告，部队开火。在北京饭店的记者面前，人群匆匆撤回大街。数十名平民在逃跑时被击中背部。之后，人群再次涌向部队，后者再次开火。众人随后惊慌逃窜。一辆到达的救护车也遭受了枪击。人群又尝试了几次，但无法进入广场，广场对公众关闭了两周。

6 月 5 日和坦克人

6 月 5 日，镇压抗议活动在中国以外通过视频片段和照片被世界看见。世界各国的人们在电视机中看到，一个孤独的人站在一列坦克部队前，经长安街离开天安门广场。“坦克人”成为20世纪最具标志性的照片之一。当坦克驾驶员试图绕过他时，“坦克人”堵住了坦克的路径。他继续在坦克前挑衅地站了一会儿，然后爬上坦克的炮塔和里面的士兵说话。回到坦克前的位置后，男人被一群人拉到一边。

尽管示威后“坦克人”的下落不明，但中国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在 1990 年表示，他不认为该人被杀。他后来被评为20 世纪最具影响力的100 人之一【本书作者注，正是在这样的电视画面的巨大影响下，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以后不久，东欧各国社会主义政权在声势浩大的抗议游行群众面前崩溃，苏联不久解体】。

在木樨地长安大道上，停泊的 37 辆装甲运兵车车队被困在各种烧毁的公共汽车和军车中，被迫弃车。除了在北京偶尔发生士兵向平民开火的事件外，西方新闻媒体还报道了解放军各单位之间的冲突。下午晚些时候，26 辆坦克、3辆装甲运兵车和支援步兵在建国门和复兴门立交桥向东占据防御阵地。炮弹响彻整夜，第二天早上，来自该市东部的一个报告说，发现了一辆损坏的装甲车，它是被一枚穿甲弹击中而损坏的。首都持续的动荡扰乱了日常生活。6 月 5 日，《人民日报》在北京没有任何版本，尽管保证已印刷。许多商店、办公室和工厂无法营业，因为工人留在家中，公共交通服务仅限于地铁和郊区巴士路线。

总的来说，政府在广场被军事占领后的一周内重新获得了控制权。随后进行了政治清洗，其中负责组织抗议活动、或宽恕抗议活动的官员被免职，抗议活动领导人被监禁。

北京以外的抗议活动

6 月 4 日北京恢复秩序后，在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之外，中国其他约 80 个城市继续发生各种规模的抗议活动。在香港，人们再次穿上黑色衣服，声援北京的示威者。其他国家也有抗议活动，许多人也采取了佩戴黑色臂章的方式。

在上海，学生们于 6 月 5 日上街游行，并在主要干道上设置路障。铁路交通受阻。其他公共交通工具被暂停，人们无法上班。工厂工人进行了总罢工并走上街头。6月6日，市政府试图解除铁路封锁，但遭到群众的强烈抵制。数人被火车碾压身亡。6月7日，上海主要大学的学生冲进校园内的各种设施，为北京的死者竖立纪念棺材。在没有致命武力的情况下，局势逐渐得到控制。市政府因避免了重大动乱而得到了北京市最高领导层的认可。

在西安、武汉、南京和成都等内陆城市，6月4日之后，许多学生继续抗议，经常设置路障。在西安，学生阻止工人进厂。在武汉，学生封锁了长江铁路大桥，另外4000人聚集在火车站。大约一千名学生上演了铁路“静坐”。京广线、武大线轨道交通中断。学生们还呼吁大型国有企业的员工罢工。在武汉，局势非常紧张，据报道，居民开始挤兑银行并采取恐慌性抢购。

类似的场景在南京上演。6月7日，数百名学生在南京长江大桥和中阳门铁路大桥进行封锁。当天晚些时候，他们被说服撤离，但没有发生任何事故，尽管他们第二天返回主要火车站和桥梁。

成都的气氛更加地凝重。6月4日上午，警方在天府广场强行驱散学生示威。由此产生的暴力事件导致 8 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最残忍的袭击发生在 6 月 5 日和 6 日。目击者估计，在一群人闯入锦江宾馆后，有 30 到 100 具尸体被扔到一辆卡车上。据国际特赦组织称，6 月 5日，成都至少有 300 人丧生。成都军队使用震荡手榴弹、警棍、刀具和电击武器镇压平民。医院被命令不接受学生，第二天晚上，救护车服务被警察拦下。

政府声明

在 6 月 6 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务院发言人袁牧宣布，根据“初步统计”，“近 300 人死亡 [...] 包括士兵”，包括23 名学生，“坏分子应得的；这是因为他们的罪行；以及被误杀的人。” 他说，伤员包括“5,000 名[警察]官员和[士兵]”和“2,000 多名平民，包括少数无法无天的恶棍和不了解情况的围观群众”。军方发言人表示，天安门广场没有人死亡，广场上也没有人被坦克碾过。

6月9日，抗议活动开始以来首次公开露面的邓小平发表讲话，赞扬“烈士”（牺牲的解放军战士）。邓小平指出，学生运动的目标是推翻党和国家。“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完全依赖西方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邓对抗议者说。邓辩称，抗议者抱怨腐败是为了掩盖他们的真实动机，取代社会主义制度。他说，“整个西方帝国主义世界都打算让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然后将它们置于国际资本的垄断之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死亡人数

自事件发生以来，广场本身的死亡人数和流血事件的程度一直存在争议。事件发生后，中共立即积极压制对伤亡数字的讨论；对于死亡人数的估计，严重依赖目击者证词、医院记录和受害者亲属的组织努力。因此，各种伤亡估计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初步估计从官方数字几百到几千或上万不等。

官方数字

事件发生后不久，中共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约为300人。 在6月6日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袁牧表示，政府“初步统计”显示，约有300名平民和士兵死亡，其中包括23名学生来自北京的大学，还有一些他形容为“痞子”的人。袁还说，约有5,000名士兵和警察受伤，还有2,000名平民。6月19日，北京市委书记向中央政治局通报说，政府确认的死亡人数为241人，其中平民218人（包含学生36人）、解放军士兵10人、武警13人，伤员7000人。陈希同市长6月30日表示，受伤人数在6000人左右。

其他估计

6 月 4 日上午，报告了许多死亡人数的估计值，包括来自中共内部单位的消息。北京大学在校园内散发的传单显示，死亡人数在两到三千之间。中

国红十字会给了2600人死亡的估计数字，但后来否认。瑞士大使估计有2,700人。《纽约时报》的尼古拉斯·D·克里斯托夫(Nicholas D. Kristof) 在 6 月 21 日写道，“大约有 12 名士兵和警察以及 400 至 800 名平民被杀，这似乎是合理的估计。”美国大使詹姆斯·利莱说，根据对北京周边医院的走访，至少有数百人死亡。同一天提交的解密的国家安全局电报估计，截至 6 月 4 日上午，有 180-500 人死亡。北京医院在事件发生后不久编制的记录中，记录了至少 478 人死亡和 920 人受伤。国际特赦组织估计死亡人数在数百到近 1,000 人之间，而一些西方外交官则将死亡人数估计为 300 到 1,000。

在一份广为报道的 2017 年天安门事件后发送的解密电报中，英国大使艾伦·唐纳德爵士最初声称，根据中国国务院一位“好朋友”的信息，至少有10,000 名平民死亡；在澳大利亚总理鲍勃·霍克(Bob Hawke)的演讲中重复了这一说法；但该估计数字远高于提供的其他来源。此文件信息解密后，前学生抗议领袖封从德指出，唐纳德爵士后来将他的估计修改为2,700-3,400人死亡，这个数字更接近其他估计。

辨认死者

“天安门母亲”，一个受害者的维权组织，由丁子霖和张先玲共同创立；其子女在镇压中被中共杀死；到2011年8月，该组织已经确定202名受害者。面对中共的干预，该组织煞费苦心寻找遇难者家属，搜集遇难者信息。他们的人数从 1999 年的 155 人增加到 2011 年的 202 人。名单中有四人在 6 月 4 日或之后因参与示威活动而自杀。

前抗议者吴仁华创立中国民主联盟；这是一个鼓动中国民主改革的海外团体；吴仁华说他只能够识别并确认15名军事人员死亡。吴断言，如果将与示威者无关的事件造成的死亡人数从统计中剔除，则可能只有七名军人死亡可以算作因暴徒"在行动中丧生"。

天安门广场本身的死亡事件

中国共产党官员长期以来一直声称，6 月 4 日凌晨，在广场南部最后一批学生撤走期间，广场本身没有人死亡。起初，外媒对广场"屠杀"的报道盛行，但随后记者承认，大部分死亡事件发生在北京西部的广场外。那天晚上在广场周围的几个人，包括华盛顿邮报前北京分社社长杰·马修斯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理查德·罗斯报道说，虽然他们听到了零星的枪声，但他们找不到足够的证据表明广场本身发生了大屠杀。

台湾出生的侯德建在广场上声援学生，并声称他没有看到广场上发生任何屠杀。前中国持不同政见者李小平引述他的话说："有人说广场上有200人死亡，也有人说多达2000人死亡。也有坦克碾过试图离开的学生的故事。我不得不说我没有看到任何东西。我在广场上一直待到早上 6:30。"

同样，2011 年，来自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三份秘密电报声称天安门广场本身没有发生流血事件。一名站在广场内红十字站旁边的智利外交官告诉他的美国同行，他没有观察到任何大规模向广场内的人群开火的情况，尽管

可以听到零星的枪声。他说，进入广场的大部分部队都只配备了防暴装备。天安门母亲的记录表明，在军队推入广场的当晚，有三名学生在广场上丧生。

出席抗议活动的中国学者吴仁华写道，政府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是一种逃避责任和展示其仁慈的烟雾弹。吴说，枪击事件发生在广场内部还是外部无关紧要，因为它仍然是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的、应受谴责的屠杀：

“真的，无论是在广场内、还是广场外，全副武装的大军屠杀那些和平的普通人，这其实本质上都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根本不值得进行这种讨论。”

直接后果

逮捕、惩罚和疏散

1989 年 6 月 13 日，北京市公安局下令逮捕 21 名被他们认定为抗议领袖的学生。这 21 名受通缉的学生领袖是北京学生自治联合会的成员，该联合会在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几十年过去了，这份头号通缉名单从未被中国政府收回。

21名学生在被捕或逃跑后，每个人都面临着不同的经历。21人中只有7人能够逃脱。在军情六处和中央情报局等西方情报机构组织的黄雀行动下，柴玲、吾尔开希等一些学生领袖经由香港得以逃往美国、英国、法国和其他

西方国家。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这次黄雀行动涉及40多人，起源于1989年5月成立的“支持中国民主运动联盟”。北京抗议运动被镇压后，该组织初步拟定了40名异议人士名单。他们认为可以形成“中国流亡民主运动”的核心。

其余的学生领袖被逮捕和监禁。那些逃跑的人，无论是在 1989 年还是之后，直到今天都很难重新进入中国。中国政府更愿意让持不同政见者流亡海外。那些企图重新进入的人，例如吾尔开希，被简单地遣返但没有被逮捕。

1989年底，陈子明和王军涛因参与抗议被捕。中国当局声称他们是这场运动背后的“黑手”。陈和王都否认了对他们的指控。他们于1990年受审，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其他人，如张志清，基本上已经消失了。在他于 1991 年 1 月首次被捕并随后获释后，关于他的处境和现在居住的地方一无所知。张志清的角色和被列入21号通缉犯的原因一般不得而知；名单上的很多人都是这样，比如王超华。

据对话基金会援引省政府的说法，1989 年初有 1,602 人因与抗议活动相关的活动而被监禁。截至 2012 年 5 月，至少有两人被关押在北京，另外五人下落不明。2014年6月，据报道，苗德顺（音译）被认为是最后一名因参与抗议而被监禁的囚犯；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是在十年前。据报道，所有人都患有精神疾病。

领导层变动

党的领导层将赵紫阳开除出政治局常委。另一位反对戒严但弃权投票的政治局常委成员胡启立也被免职。但他得以保住党籍，“改变意见”后，调任电子部副部长。另一位具有改革精神的中国领导人万里，在短暂的出国旅行归来后，在北京首都机场下飞机后立即被软禁。当局宣布对他的拘留是出于健康原因。当万里终于“改变意见”后被软禁释放时，他就像乔石，被调到一个不同的职位，职位相同，但主要是礼仪性的角色。数名中国驻外大使申请政治庇护。

1989年，上海的党委书记江泽民在没有使用暴力的情况下平息了学生抗议活动，接替赵紫阳出任党总书记。

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升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在上海采取的果断行动，包括处理《世界经济导报》在内，以及他阻止了该市发生的致命暴力事件，赢得了北京党内长老的支持。那年晚些时候，在新的领导班子就位、并认识到自己地位被削弱后，邓小平本人也退出了党的领导，——至少是正式的——辞去他最后一个中央军委主席的领导职务。直到 1992 年，他一直保持低调。根据加拿大解密的外交电报，瑞士大使自信地告诉加拿大外交官，在屠杀发生后的几个月里，“政治局常委的每一位成员都与他接触过，要求转移非常大的金额财产到瑞士银行账户。”

赵紫阳的助手鲍彤是被正式指控犯有与 1989 年示威活动有关的罪行的最

高级别官员。1992年以“泄露国家机密、宣传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为将天安门示威者的同情者从党的基层中清除，党的领导层启动了为期一年半的整风计划，以“严惩党内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严重的人”。据报道，有 400 万人因其在抗议活动中的作用而受到调查。部署了 30,000 多名共产党官员，以评估超过 100 万政府官员的“政治可靠性”。当局在全国逮捕了数万甚至数十万人。有些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走在街上时被抓获；其他人在夜间被捕。许多人被判入狱或被送往劳改营。他们经常被拒绝与家人见面，而且经常被关在拥挤的牢房里，以至于不是每个人都有睡觉的空间。持不同政见者与凶手和强奸犯共用牢房，酷刑并不少见。

媒体报道

官方叙述

中国共产党在 6 月 4 日“事件”中构建的官方叙述指出，必须使用武力来控制“政治动荡”，这也确保了经济成功发展所必需的稳定社会。中国领导人——包括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胡锦涛——在被问及相关问题时，不断重申中国共产党的官方说法。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还不断控制公众对 1989 年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的叙述。在提及抗议活动时，平面媒体必须与中国政府对“6 月 4 日事件”的描述一致。此外，中国政府准备了一份白皮书来解释政府对抗议活动的看法。后来，中国政府内部的匿名人士将这些文件运往海外，并于 2001 年

发表了《天安门文件》。在 6 月 4 日事件发生 30 周年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魏凤和在“香格里拉对话”时说：“6月4日事件是一场骚乱和动乱。中央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平息骚乱，平息动乱。正是因为这个决定，国内的稳定才得以建立。过去30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媒体

6 月 4 日的镇压标志着中国相对新闻自由时期的结束，国内外媒体工作者在镇压后面临更严格的限制和惩罚。国家媒体立即对学生表示同情。结果，负责人后来都被撤职了。6 月 4 日在中央电视台每日新闻联播节目中报道了这一事件的两名新闻主播薛飞和杜贤被解雇，因为他们公开表达了对抗议者的同情。原外长吴学谦之子吴小勇被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项目部免职，因为他对抗议者的同情。人民日报的编辑和其他工作人员，包括主任和总编辑，也因报纸上同情抗议者的报道而被解雇。几位编辑被捕。

外媒

随着戒严令的实施，中国政府切断了 CNN 和 CBS 等西方广播公司的卫星传输。广播公司试图通过电话报道来违抗这些命令。尽管 6 月 4 日晚上能够录制视频的唯一网络是西班牙的Televisión Española（TVE），但视频片段被偷运出该国。在军事行动期间，一些外国记者遭到当局的骚扰。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理查德罗斯和他的摄影师在通过移动电话从广场提交报告时被拘留。

几名报道镇压行动的外国记者在接下来的几周内被驱逐，而其他人则被当局骚扰或被列入黑名单，无法重新进入该国。在上海，外国领事馆被告知，不遵守新颁布的报道指南的记者的安全无法得到保证。

国际反应

中国政府的反应受到广泛谴责，尤其是西方政府和媒体。批评来自西欧和东欧、北美、澳大利亚以及一些西亚和拉丁美洲国家。许多亚洲国家在整个抗议期间保持沉默。印度政府对大屠杀作出回应，命令国家电视台只提供绝对最低限度的事件报道，以免危及与中国关系的解冻，并同情中国政府。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等国支持中国政府并谴责抗议活动。华侨学生在欧洲、美洲、中东和亚洲的多个城市进行了示威游行。

长期影响

政治

对抗议活动的镇压加强了党在国内事务中的作用。其后果是，1980 年代引

入的许多自由被取消，因为该党回到了传统的列宁主义模式，并重新建立了对新闻、出版和大众媒体的牢固控制。

到1993年，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国家主席合并为一人，此后一直沿用至今。

1989年，中国军队和北京警方都没有足够的防暴装备，比如橡皮子弹和催泪瓦斯。在天安门广场抗议之后，中国城市的防暴警察配备了非致命性的防暴装备。抗议活动导致内部安全支出增加，并扩大了人民武装警察在镇压城市抗议活动中的作用。

几年过去了，特别是邓小平“1992年南巡”之后，限制才放宽。私人经营的印刷媒体随后再次蓬勃发展。民营报纸从 1980 年代的 250 家增加到 2003 年的 7,000 多家。省营的卫星电视台遍及全国，挑战国营央视的市场份额。领导层也不再将共产主义作为一个包罗万象的信仰体系。国家批准的宗教组织成员显着增加，毛时代被压制的传统信仰重新出现。这种国家认可的多元化也为未经认可的灵性和崇拜形式的成长创造了环境。为了减少对有争议的国家控制方法的需要，新教徒、佛教徒和道教徒经常被国家用作“批准的”教派，以“打击法轮功”等邪教，使教派相互对抗。

随着该党脱离其所建立的正统共产主义，其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培养民族主义作为替代意识形态上。这一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将党的合法性与中国的“民族自豪感”联系起来，使国内舆论重新支持它。这可能在 1999

年 5 月最为突出，当时美国轰炸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本书作者注，当时，美国正在针对南斯拉夫独裁者的非人道屠杀政权进行军事打击；贝尔格莱德的几乎所有外国使团都已经撤离；然而，中国大使馆仍然驻守在那里，并对于南斯拉夫独裁政权给予口头和精神支持；据未经公开和证实的信息，中国大使馆内有在美军军事行动期间的被击落的飞行器或军事探测设施】。爆炸事件见证了民族主义情绪的流露，并增加了对作为中国国家利益首要倡导者的党的支持。

经济

在天安门广场抗议之后，许多商业分析师下调了他们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展望。对抗议的暴力镇压是导致中国延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因素之一，直到十二年后的 2001 年才完成。此外，对中国的援助从 1988 年的 34 亿美元减少到 1990 年的 7 亿美元。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外国政府暂停了对中国的贷款；中国信用等级被下调；旅游收入从22亿美元减少到18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承诺被取消。然而，政府国防开支从 1986 年的 8.6% 上升到 1990 年的 15.5%，扭转了之前 10 年的下降趋势。

在抗议之后，政府再次寻求对经济进行集中控制，尽管这些控制变化是短暂的。察觉到保守政策再次在党内站稳脚跟，已卸任所有官职的邓小平于 1992 年发起"南巡"，走访中国南方最繁荣地区的各个城市，同时倡导进一步的经济改革。作为对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部分回应，到 1990 年代中期，中国再次以比 1980 年代改革初期所见更大的规模来推行市场自由化经济政策。尽管党内政治自由主义者被清除，但许多经济自由主义者仍然存

在。回顾1989年事件造成的经济冲击，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只是微不足道的暂时性影响。事实上，由于许多以前受害的团体现在将政治自由化视为失败的原因，他们将更多的精力花在了经济活动上。经济将迅速恢复到1990 年代的势头。

香港

在香港，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导致人们担心中国会在 1997 年即将从英国移交香港之后违背其“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承诺。作为回应，港督彭定康试图扩大香港立法会的权力；这导致与北京的摩擦。对于许多香港人来说，天安门事件是他们对北京政府失去信任的转折点。这一事件，加上主权移交后香港地位的普遍不确定性，导致香港人在 1997 年之前大量外流到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

自1989年以来的几十年中，每年有成千上万的香港人出席大型烛光守夜活动，直到2020年为止。

在香港，1989 年的天安门事件已经永久地铭刻在公众的意识中；香港或许比中国大陆以外的任何地方都更加记忆深刻。这些事件继续强烈影响人们对中国及其政府的看法、对民主的态度以及香港人应在多大程度上认定自己为“中国人”。6 月 4 日的事件被视为中国威权主义品牌的代表，香港的民主政客经常援引这些事件，尤其是在涉及香港民主改革和香港与北京的关系时。

中国的国际形象

中国政府镇压抗议活动遭到广泛谴责。紧接着，中国似乎变成了一个被遗弃的国家，在国际上越来越孤立。对于在 198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争取国际投资的领导层来说，这是一次重大挫折，因为该国正从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走出来。然而，邓小平和核心领导层发誓要在 1989 年后继续实行经济自由化政策。从那时起，至少在表面的装扮上，中国将在国内和国际上努力重塑其国家形象，从专制政权转变为良性全球经济和军事伙伴。

在 1990 年代，中国试图展示其参与国际经济和国防机构的意愿，以确保对持续经济改革的投资。中国政府于 1992 年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93 年签署了《化学武器公约》，1996 年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中国在 1986 年仅是 30 个国际组织的成员，但到 1997 年，其所属成员身份已经超过 50 个国际组织。中国还寻求多元化其对外伙伴关系，与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并欢迎台湾企业代替西方投资。中国加快了与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并于 1992 年与印度尼西亚、以色列、韩国和其他国家建立了关系。 虽然中国在整个 1980 年代是国际援助的净接受国，但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军事作用使之改变而成为援助的净提供者。

此外，政府通过强调其技术工人、相对较低的工资、成熟的基础设施和庞大的消费群，成功地将中国提升为有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在中国增加的外国投资使许多世界领导人相信，通过建设性地让中国参与全球市场，更

大规模的政治改革将不可避免地随之而来。与此同时，该国所带来的商业利益的爆发性增长使得跨国公司对政治和人权视而不见，转而为关注商业利益开辟了道路。从那以后，以前对中国持批评态度的西方领导人有时会在双边会议上对天安门的遗留问题仅仅在口头上说；但讨论的实质是围绕商业和贸易利益展开的。

欧盟和美国的武器禁运

由于对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的暴力镇压，欧盟和美国对中国的军备销售禁令今天仍然存在。中国多年来一直呼吁取消禁令，并得到了欧盟成员国不同程度的支持。自 2004 年以来，中国将这一禁令描述为“过时”并损害中欧关系。2004 年初，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在欧盟内部发起了一场解除禁令的运动，希拉克的努力得到了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的支持。然而，2005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分裂国家法》的通过，大陆与台湾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破坏了解除禁令的企图；一些欧盟理事会成员撤回了对取消禁令的支持。此外，施罗德的继任者安格拉·默克尔反对取消禁令。如果欧盟解除禁令，美国国会议员还提议限制向欧盟转让军事技术。英国在 2005 年 7 月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时也反对解除禁运。

此外，欧洲议会一贯反对取消对华军售禁令。尽管其意见不是解除禁令所必需的，但许多人认为它更好地反映了欧洲人民的意愿，因为它是唯一的直接选举产生的欧洲机构。武器禁运限制了中国寻求军事硬件的选择。中国不得不到前苏联集团那里寻求军事技术；在此以前，由于中苏分裂，它与前苏联集团关系紧张。其他愿意向中国提供军事技术的供应商此前包括

以色列和南非，但美国的压力限制了这种合作。

当代问题

中国的审查

中国共产党继续禁止讨论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采取措施屏蔽或审查相关信息，企图压制公众对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的记忆。教科书几乎没有关于抗议活动的信息。抗议活动结束后，官员们禁止了有争议的电影和书籍，并关闭了许多报纸。一年之内，12%的报纸、8%的出版公司、13%的社会科学期刊和150多部电影被禁或关停。政府还宣布查获了 3200 万册违禁书籍和 240 万盒录像带和录音带。对有关该主题的媒体和互联网资源的访问受到审查人员的限制或阻止。被禁文学和电影包括《颐和园》，《紫禁城》，《六四诗集》，《关键时刻：李鹏日记》以及赵紫阳或他的助手鲍彤的任何著作，包括赵的回忆录。但是，仍然可以找到这些出版物的违禁品和互联网副本。

提及抗议活动的印刷媒体必须与政府对事件的报道一致。国内外记者被拘留、骚扰或威胁，他们的中国同事和他们采访的任何中国公民也一样。因此，由于潜在的负面影响，中国公民通常不愿谈论抗议活动。许多1980年以后出生的年轻人对事件不熟悉，因此对政治漠不关心。中国青年往往不知道1989年抗议事件，以及“坦克人”王维林，或“六四屠杀”本身的日期与意义。一些年长的知识分子不再渴望实施政治变革。相反，他们专注于经

济问题。一些政治犯因为害怕将他们置于危险之中，拒绝与他们的孩子谈论他们参与抗议活动的情况。

尽管有关这些事件的公开讨论已成为社会禁忌，尽管当局频繁干预和骚扰，但有关这些事件的私下讨论仍在继续发生。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在 1990 年代留在中国，尽管他可以前往海外得到政治庇护；他仍然在中国发表关于天安门事件的言论；他面临着不断的监视。“天安门母亲”组织，对抗议活动的人道主义方面尤其直言不讳。当局动员安全部队，包括人民武装警察，每年 6 月 4 日，竭力防止公众举行纪念活动，——特别是在 2009 年抗议 20 周年和 2014 年抗议 25 周年等重大事件的周年纪念日。在 2019 年抗议活动 30 周年之际，中国著名艺术家艾未未写道“专制和极权政权害怕事实，因为他们将权力建立在不公正的基础上”，他还写道，记忆很重要：“没有它，就没有诸如文明社会或国家之类的东西”，因为“我们的过去就是我们所拥有的。”

在大屠杀周年纪念日，记者经常被拒绝进入广场。此外，众所周知，当局在每年中的这个时候严密监视外国记者并加强了对著名人权活动家的监管。在中国境内对“6 月 4 日天安门广场”进行的互联网搜索，只能得到经过审查的结果，或导致服务器连接暂时中断。带有特定关键字的特定网页会被审查，而其他网站，例如支持海外华人民主运动的网站，则被严格封锁。对海外中文网站的封锁比对海外外文网站的封锁严格得多。在大屠杀周年纪念日之前的几周内，社交媒体审查更加严格；即使是对抗议活动的间接提及和看似无关的术语，通常也会受到非常积极的封锁和审查。2006 年 1 月，谷歌同意审查其中国大陆网站，以删除有关当局认为敏感的天安门事件和其他主题的信息。谷歌于 2010 年 1 月取消了与审查的合作。

呼吁政府重新评估

该党对这一事件的官方立场是，必须使用武力来控制“政治动乱”并确保经济繁荣所需的稳定。中国领导人，包括前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和胡锦涛，在接受外国媒体提问时重申了这一观点。

多年来，一些中国公民呼吁重新评估抗议活动，并要求政府向受害者家属提供赔偿。特别是“天安门母亲”的团体，要求赔偿、为受害者平反，以及接受国内外捐赠的权利。参与军事镇压的退伍军人张世军（音译）发表了一封致胡锦涛主席的公开信，试图让政府重新评估其对抗议活动的立场。他随后被捕并被带离家中。

尽管中国政府在事件发生时从未正式承认相关指控，但2006年4月，向一位受害者母亲支付了款项，这是政府为天安门事件受害者家属提供救济的第一起公开案件。这受到了多位中国活动人士的欢迎。不过，也有人认为这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措施，并不认为预示着党的官方立场会发生变化。

中国领导人表示遗憾

1998年去世前，杨尚昆告诉军医蒋彦永，6月4日是中共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杨自己无法纠正该错误，但认为最终肯定会被纠正。赵紫阳一

直被软禁，直到2005年去世。赵的助手鲍彤一再呼吁政府撤销对示威活动的判决。北京市长陈希同帮助执行了戒严令，后来因政治丑闻蒙羞，在他去世前一年的2012年，为无辜平民的死亡表示遗憾。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据报道，在他于 2013 年离开政坛之前，曾在党的会议上建议改变政府对天安门事件的立场，但遭到同事的拒绝。

联合国报告

在 2008 年 11 月 3 日至 21 日的第 41 届会议上，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对"1989 年 6 月 4 日北京镇压期间或之后被杀、被捕或失踪"的人的报告缺乏调查表示关注。它表示，尽管亲属多次提出要求，但中国政府也未能将这些人的命运告知亲属。同时，对过度使用武力负责的人没有"面临任何制裁、行政或刑事处罚"。委员会建议中国政府采取所有这些措施，并"酌情道歉和赔偿，并起诉那些被认定应当为过度使用武力、酷刑和其他虐待行为负责的人"。

2009年12月，中国政府回应委员会的建议，称政府已结案"1989年春夏政局动荡"。它还表示，"过去20年的实践表明，中国政府当时采取的及时果断的措施是必要和正确的"。它声称将"事件称为'民主运动' "的标签是"对事件性质的歪曲"。据中国政府称，这种意见"不符合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的职责"。

1980年代的美国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istory_of_the_United_States_(1980%E2%80%931991)

美国历史（1980-1991）

美国从1980年到1991年的历史包括吉米卡特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罗纳德里根政府的八年、乔治HW布什总统任期的前三年，直至苏联解体。受到伊朗人质危机、失控的通货膨胀和国内反对声的困扰，卡特在 1980 年的总统选举中输给了共和党候选人里根。

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里根在 1981 年和 1982 年经济衰退后推出了旨在刺激美国经济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包括导致1980 年代石油过剩的石油放松

管制政策。他在四次首脑会议上会见了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最终签署了《中导条约》。这些行动加速了冷战的结束；冷战最终于 1989-1991 年结束，东欧和苏联以及众多第三世界的共产主义政权崩溃就是典型代表。美国在1981 年至 1983 年经济陷入衰退，但此后复苏并迅速增长。

====

1970 年代广泛讨论的人口现象是“阳光带”的兴起，该地区包括西南、东南部，尤其是佛罗里达和加利福尼亚（1964 年超过纽约成为全美人口最多的州）。到1980年，阳光带的人口已超过东北和中西部的工业区——锈带；工业区逐渐失去工业，人口几乎没有增长。阳光带的兴起是始于 1950 年代美国社会变革的高潮，廉价航空旅行、汽车、州际公路系统和空调的出现都刺激了向南和向西的大规模迁移。年轻的工作年龄的美国人和富裕的退休人员都涌向阳光带。

阳光带的兴起已经改变了国家的政治气候，加强了保守主义。这个不断增长的地区的繁荣心态与铁锈地带的担忧形成鲜明对比，铁锈地带主要是那些无法或不愿意搬到其他地方的人，尤其是少数群体和老年人。与广阔的南部和西部各州相比，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仍然更致力于社会项目，对受监管的增长更感兴趣。这些地区的选举趋势反映了这种分歧——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越来越多地投票支持民主党联邦、州和地方选举的候选人，而南部和西部现在是共和党的坚实基础。

随着制造业逐渐离开其在东北和中西部的传统中心，东北和中西部地区的失业和贫困加剧。以纽约市市长约翰·林赛(John Lindsay)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回应是在税基缩小的时候大幅增加福利服务和教育，以及公共就业和公共工资。1975 年，纽约市勉强避免了破产；它是由于使用州和联邦资金以及州对其预算的严格控制而获救的。

与此同时，居住在郊区、农村地区和阳光地带的保守派反对他们所认为的自由社会计划的失败以及它们的巨额开支。这是 1980 年总统竞选和1994 年中期选举的有力主题，当时共和党在民主党控制了 40 年后重新夺取了众议院。

1960 年代的自由派领袖是伟大社会和民权运动时代的特征，1970 年代全国各地都让位于保守的城市政治家，例如纽约市市长埃德科赫，一位保守的民主党人。

里根革命

拒绝美苏缓和

1970 年代对美国的自信心造成了破坏性的打击。在越战和水门事件中打碎了对于总统制度的公共信任。国际上的挫折，包括1975 年南越的垮台、

1979年的伊朗人质危机、苏联对阿富汗的干预、国际恐怖主义的增长以及军备竞赛的加速，引发了对该国控制国际事务能力的担忧。能源危机、高失业率、非常高的通货膨胀和不断上升的利率使经济规划变得困难，并引发了对美国繁荣未来的根本问题。

美国“萎靡不振”这个词在卡特 1979 年的“信任危机”演讲之后流行起来，在 1970 年代末和 1980 年代初并非没有根据，因为这个国家似乎正在失去自信。

在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的统治下，苏联经济落后了——例如，它在计算机方面落后了几十年——然而它由于利润丰厚的石油出口而得以维持。与此同时，随着共产主义者在第三世界取得进展，美国与苏联的缓和也随之瓦解。最具戏剧性的是1975年北越入侵并征服南越时在越南取得的胜利；美国军队只是为了营救那些美国的支持者而介入。近百万难民从南越逃离；大多数幸存下来的人来到美国 。在莫斯科或北京的支持下，其他共产主义运动正在非洲、东南亚和拉丁美洲迅速蔓延。苏联似乎致力于勃列日涅夫主义，1970 年代派遣军队入侵阿富汗、打击阿富汗政权；此举遭到西方和穆斯林国家的严厉谴责。

对于美国衰落的国际和国内政局的反应，是在美国有一批学者，记者，政客和政策制定者的崛起；他们许多人被标记为“新保守派”或“新保守主义者”；因为他们中许多人认为美国民主党在1970 年代背叛了美国利益（尤其是在 1972 年乔治·麦戈文被提名之后），并将美国国家地缘政治立场的减弱归咎于民主党自由派。许多人聚集在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身

边，但他们后来与罗纳德·里根和共和党人结盟，后者承诺要对抗亲苏共产主义的扩张。反对共产主义的民主党人，也反对"伟大社会的福利计划"。但他们的主要目标是遏制共产主义和与苏联缓和的旧政策。他们想要的是逼退、并和平结束共产主义威胁，而不是漫无目的的谈判、外交和军备控制。

以诺曼·波德霍雷茨为首的新保守派抨击冷战时期的外交正统观念为"绥靖"，暗指内维尔·张伯伦1938年在慕尼黑与纳粹的谈判。 他们称共产主义为"邪恶"；他们抨击与苏联缓和关系；反对给予苏联最惠国贸易地位；支持美国单方面干预第三世界，以此作为提高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的手段。在里根选举之前，新保守派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他们试图阻止在美国国内因越战而导致的反战情情绪。

在 1970 年代，政治学家、后来担任罗纳德·里根 (Ronald Reagan) 领导下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越来越多地批评民主党。柯克帕特里克 (Kirkpatrick) 从自由民主党学者转变为新保守主义思想的皈依者。她认识到，那些能够拥抱民主、并且是美国盟友（这并非是巧合）的专制独裁者，与共产主义极权独裁者是截然不同的；后者不屈不挠，无法改变。

1980 年代初的政局非常严峻。受到 1930 年代以来最糟糕的经济、汽车和钢铁行业的严重困境、持续的伊朗人质危机以及美国似乎无法应对全球日益增长的苏联冒险主义的影响，因此，——当美国业余奥林匹克冰上曲棍球队击败了他们的苏联职业运动员对手的时候，——这给美国公众带来了

一点点好消息；这场赛事看似是一个神迹。

罗纳德·里根 (Ronald Reagan) 和 1980 年的选举

保守派情绪正在增长，部分原因是对性革命的过度和自由主义政策（如扶贫战争）未能兑现承诺的厌恶。总统吉米·卡特在1980年争取连任的美国民主党党内初选过程中，在麻萨诸塞州（肯尼迪参议员的家乡），卡特轻松地击败了自由主义派明星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

在1980 年经济滞胀的背景下，加利福尼亚州前州长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在大多数州的共和党初选过程中赢得共和党提名；他向选民指出，美国在国外对抗苏联时的弱点。在未能与福特达成前所未有的协议后，里根选择了他的主要党内竞争对手乔治·H·W·布什作为自己的竞选搭档、副总统候选人。在竞选期间，里根依靠珍妮·柯克帕特里克 (Jeane Kirkpatrick) 作为他的外交政策顾问来确定卡特在外交政策上的弱点。

里根承诺重建越战后实力和士气急剧下降的美军，恢复美国在国际战线上的实力和威望。他还承诺结束倾向于高福利、高税收政策的“大政府”经济路线，并通过使用供给链经济学来恢复经济体系的健康。

供给链经济学家反对“大社会”经济路线建立的福利国家。他们断言，美国

经济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度征税的结果，这将资金“挤出”了私人投资者，从而抑制了经济增长。他们认为，解决方案是全面减税，特别是在高收入阶层，以鼓励私人投资。它们还旨在减少政府在福利和社会服务方面的支出，这些政府支出面向 1960 年代的社会较贫困阶层。

公众，尤其是阳光带地区的中产阶级，同意里根的提议，并在 1980 年投票支持他。批评者指责里根对穷人的困境漠不关心；但1970 年代的经济困境超出了任何总统的控制或逆转的能力。

1980 年的总统选举是美国政治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它标志着郊区和阳光带的新选举权，宗教信仰权利首次成为主要因素。此外，它是一个分水岭，开启了对政府扶贫计划和大社会特有的平权行动的承诺。它还表明了对鹰派外交政策的承诺。

伊利诺伊州众议员约翰•B•安德森（John B. Anderson）是一位温和的共和党人，在第三方候选人中表现不佳。这场运动的主要问题是经济滞胀、对国家安全的威胁的忧虑、伊朗人质危机以及似乎表明美国伟大时代已经结束的普遍不适。卡特似乎无法控制通货膨胀，他在德黑兰营救人质的努力失败了。卡特放弃了他的缓和导向的顾问，并迅速向右移动以对抗苏联，但里根说这太少了，太晚了。

里根在最终选举团中以 489 票获得压倒性胜利，卡特以 49 票获得大幅失败。共和党人击败了 12 名民主党参议员，25 年来首次重新获得对参议院

的控制权。里根在选举中获得 43,904,153 票（占总票数的 50.7%），卡特获得 35,483,883 票（41.0%）。约翰安德森赢得了 5,720,060 (6.6%) 票。

里根政府

历史学家大卫·亨利发现，到 2010 年，学者们已经达成共识，即里根复兴了保守主义，并通过展示促进意识形态的"务实保守主义"使国家转向右翼，在分裂的政治制度所施加的限制范围内。此外，亨利说，学者们都基本同意他重振了对总统职位的信心和美国的自信，并为结束冷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里根担任总统的方式与他的前任有些不同。他将大量的工作委托给下属，让他们处理政府的大部分日常事务。作为一名高管，里根制定了广泛的主题，并与选民建立了牢固的个人联系。他使用了非常强大的助手，特别是参谋长詹姆斯·贝克（福特的竞选经理），迈克尔·迪弗担任副参谋长，埃德温·米斯担任白宫法律顾问，以及预算局的大卫斯托克曼和他自己的竞选经理、中央情报局的比尔·凯西。

1981 年 3 月 30 日，里根在华盛顿被一名心烦意乱的非政治人士枪击。他随后完全康复。

里根在 1981 年任命了第一位女性最高法院女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 Sandra Day O'Connor)；这震惊了全国。他于 1986年将保守派领袖威廉·伦奎斯特提拔为首席大法官，保守派安东宁·斯卡利亚接替伦奎斯特。他在 1987 年的第四次任命被证明是有争议的，因为最初的选择不得不退出（他在大学吸食大麻），而参议院拒绝了罗伯特博克。里根最终提名的安东尼·肯尼迪得到了参议院认可。

里根经济学和 1981 年联邦预算

罗纳德·里根 (Ronald Reagan) 承诺经济复苏将惠及所有社会人口。他提议通过减税和缩小联邦计划的规模和范围来实现这一目标。批评他的计划的人指责减税会减少收入，导致巨额联邦赤字，进而导致利率上升，扼杀任何经济利益。里根和他的支持者借鉴供给链经济学的理论，声称减税将通过经济增长增加收入，使联邦政府自 1969 年以来首次实现预算平衡。

然而，里根 1981 年的经济立法混合了多种竞争方案，以满足他所有的保守派选民（货币主义者、冷战者、中产阶级摇摆不定的选民和富人）。里根政府对货币供应的严格控制安抚了货币主义者。冷战者，尤其是像柯克帕特里克这样的新保守主义者，赢得了国防预算的大幅增加；富有的纳税人在个人税（边际税率最终将从 70% 降至 50%）和公司税两方面都获得了为期三年的全面减税；中产阶级看到他们的养老金和福利不会成为政府所削减的目标。但是，政府很难解释里根的全面减税和巨额国防开支计划如何不会增加赤字。

预算主管大卫斯托克曼把里根的经济计划在政府规定的四十天期限内递交国会。斯托克曼毫不怀疑需要削减开支，并全面削减开支（国防开支除外）约 400 亿美元；当收支无法平衡时，他求助于“神奇的星号”——这意味着“未来的储蓄待确定”。他后来会说，该计划匆忙完成，没有得到足够的考虑。因失去社会服务而受到威胁的选区的呼吁无效；预算削减相对轻松地通过了国会。

1982年的经济衰退

到 1982 年初，随着 1979 年开始的经济衰退的持续，里根的经济计划陷入困境。从短期来看，里根经济学的影响是预算赤字飙升。政府借款以及货币供应收紧导致利率高企（短暂徘徊在 20% 左右）和严重衰退；1982 年失业率高达 10%。“锈带”的一些地区（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随着钢厂和其他行业的关闭，陷入了实际上的萧条状态。中西部和其他地方的许多家庭农场被高利率毁掉，卖给了大型农业综合企业。

里根允许美联储大幅减少货币供应量以治愈通货膨胀，但这导致经济衰退暂时加深。在 1982 年经济衰退最严重的几个月里，他的支持率直线下降。民主党横扫中期选举，弥补了他们在上一个选举周期中的损失。当时，批评者经常指责里根与实际脱节。

失业率在 1982 年末达到 11% 的峰值，此后开始复苏。从 1982-83 年最糟糕时期复苏的一个因素是，由于1980 年代中期生产水平的提高，石油价

格急剧下跌，从而结束了燃料价格的通胀压力。欧佩克卡特尔的实际崩溃使政府能够改变其紧缩的货币政策，这让保守的货币主义经济学家感到震惊，他们开始敦促降低利率和扩大货币供应，实际上不再担忧通货膨胀（这现在似乎得到控制），而是担心失业问题和投资下降。

到 1983 年年中，失业率从 1982 年的 11% 下降到 8.2%。GDP增长率为 3.3%，为 1970 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水平。通货膨胀率低于 5%。当经济复苏时，罗纳德·里根宣布这是美国的早晨。新房开工热潮，汽车行业恢复活力，消费支出再创新高。然而，在里根政府的经济繁荣时期，蓝领工人大多被抛在后面，曾经为非技术工人提供高工资的旧工厂工作已不复存在。

里根在1984 年的总统选举中以 50 个州中的 49 个州的压倒性优势击败了民主党候选人沃尔特·蒙代尔。

不断上升的赤字

在 1983 年开始的经济复苏之后，里根经济学的中期财政影响是预算赤字飙升，因为减税和国防开支增加导致支出持续超过收入。军事预算增加，而税收虽然比 1970 年代末和 1980 年代初停滞不前有所增加，但未能弥补不断上升的支出。

1981 年的减税政策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政策，短期内也侵蚀了联邦政府的收入基础。军费开支的大幅增加（五年内约 1.6 万亿美元）远远超过了社会开支的削减，尽管这种削减开支的目的是针对社会中一些最贫困阶层的。即便如此，到 1985 年底，国内项目的资金已被削减到超过国会所能容忍的程度。

在此背景下，赤字从 1980 年的 600 亿美元上升到 1986 年的峰值 2200 亿美元（远远超过 GDP 的 5%）。在此期间，国家债务增加了一倍多，从 7490 亿美元增至 1.746 万亿美元。

由于美国的储蓄率非常低（大约是日本的三分之一），赤字主要靠从国外借款来弥补，几年内美国就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这不仅损害了美国的地位，也是战后依赖美国资本输出的国际金融体系的深刻转变。此外，1980 年代的媒体和娱乐业美化了股票市场和金融部门（例如 1987 年的电影华尔街），导致许多年轻人从事经纪人、投资者或银行家的职业而不是制造业；任何失去的工业基地不太可能很快会恢复。

赤字使利率保持在高位（尽管由于政府紧缩的货币政策得到喘息而低于政府早些时候的 20% 峰值水平），并有可能将利率推到更高。因此，政府被迫借入大量资金来支付账单，从而推高了借贷价格。尽管供应方承诺由于企业减税而增加投资，但在高利率的背景下，增长和投资目前受到影响。1987 年 10 月，突然发生了令人震惊的股市崩盘，但美联储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做出回应，避免了可能再次发生的大萧条。

也许更令人担忧的是，里根时代的赤字使美元被高估。由于对美元的需求如此之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借款），美元兑其他主要货币取得了惊人的强势。随着美元价值飙升，美国的出口变得越来越没有竞争力，日本成为最大的受益者。美元的高价值使外国人难以购买美国商品，并鼓励美国人购买进口商品，从而使工业出口部门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由于工会的过度需求和落后的技术使他们无法与日本进口产品竞争，钢铁和其他重工业下降。美国的消费电子行业（在 1970 年代开始衰退）是外国商业倾销和其他日本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最大受害者之一。与日本电子产品相比，美国消费电子产品质量差，技术创新相对缺乏，部分原因是冷战导致美国大部分科学和工程努力进入国防领域，而不是消费领域。到本世纪末，它几乎不复存在。好的一面是，新兴的计算机行业在 1980 年代蓬勃发展。

美国贸易逆差日益不利；贸易逆差从 200 亿美元增加到超过 1000 亿美元。因此，美国的汽车和钢铁等工业，在国外和国内市场也面临着新的竞争。在里根政府对日本制造商实施自愿进口限制（允许他们每年在美国销售最多 130 万辆汽车）、并对所有进口卡车征收 25% 的关税（对乘用车征收较轻的3%关税）后，汽车行业获得了喘息空间。日本人的回应是在美国开设组装厂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做可以说他们在为美国人提供工作。1985 年，汽车销售再次蓬勃发展后，VIR（自愿进口限制政策） 被废除，但直到今天，关税仍然有效。随着 CAFE 法规的出台，小型汽车在 1980 年代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就像电子产品一样，在美国市场上，日本产品的质量和技术复杂度都最高。

巨大的赤字在很大程度上是林登约翰逊对“枪炮和黄油”（越南战争和“伟大

社会福利计划”）的承诺以及战后重建后、来自其他七国集团国家日益激烈的竞争所造成的，但正是里根政府选择让赤字发展。

里根要求国会给予他一项明确的否决权，允许他通过削减那些他认为是浪费的开支项目来降低政府赤字，但他没有得到国会授权。他还呼吁进行平衡预算修正案，该修正案将要求联邦政府支出不超过其收入，但从未实现。

里根与世界

随着里根承诺恢复国家军事实力，1980 年代的军费开支大幅增加，五年内达到约 1.6 万亿美元。随着超级大国关系恶化到上一代肯尼迪政府以来从未见过的水平，新的军备竞赛将会开展起来。

人们普遍认为里根的外交政策比他的国内政策更成功、更深思熟虑。他赞成对冷战采取强硬态度，尤其是在超级大国竞争的第三世界舞台上。然而，在越南惨败之后，美国人越来越怀疑承担大规模部队承诺的经济和财务成本。政府试图通过支持经过专门训练的反叛乱或“低强度冲突”的相对廉价的战略来克服这一点，而不是像韩国和越南这样的大规模战役，后者在金钱和人命方面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阿拉伯-以色列冲突是军事行动的另一个动力。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以摧毁巴

勒斯坦解放组织（PLO）。但在 1982 年萨布拉和夏蒂拉大屠杀引发了以色列的政治危机和国际尴尬之后，美军进入贝鲁特以鼓励以色列撤军。此前，政府支持以色列在1982年中期入侵黎巴嫩，一方面是为了维持对以色列的支持，另一方面是为了平息以色列的亲苏敌人叙利亚在黎巴嫩的影响。然而，美国的干预在多方的黎巴嫩内战中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1983 年 10 月 23 日，海军陆战队军营爆炸造成 241 名美军丧生。此后不久，美国撤回了剩余的 1,600 名士兵。

在针对格林纳达的紧急愤怒行动中，美国第一次入侵并成功推翻了共产主义政权。

10 月 19 日，格林纳达这个小岛国经历了伯纳德·科德 (Bernard Coard) 的政变，这位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寻求加强该国与古巴、苏联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现有联系。格林纳达首相被杀，叛乱分子接到命令立即开枪。岛上有 1000 多名美国人，其中大部分是医学生及其家人，政府无法保证他们的安全。“东加勒比国家组织”、邻国的区域安全协会，由多米尼加总理欧亨尼娅查尔斯牵头，正式呼吁美国提供保护。在 10 月 25 日发起的一场短期战役中，主要是与武装的古巴建筑工人作战，美国军队入侵并取得了控制权，格林纳达恢复了民主。

里根在发现利比亚与导致两名美国士兵死亡的柏林爆炸案有关后，对利比亚发动了空袭。

里根政府还从 1980 年开始向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受到严重军事叛乱影响的政府提供资金和武器，并在较小程度上向危地马拉提供资金和武器；危地马拉在 1982-83 年间由右翼军事独裁者埃弗拉因里奥斯蒙特将军统治。

里根政府扭转前总统吉米·卡特的针对阿根廷军政府侵犯人权的官方谴责立场，并允许其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作。

中美洲是政府的主要关注点，尤其是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桑地诺革命推翻了以前由美国支持的索摩萨家族统治政权。这两个国家历来由跨国公司和富有的地主寡头治理，而其大部分人口仍处于贫困之中；结果，以马克思主义为主的革命领袖赢得了两国农民越来越多的支持。

1982 年，中央情报局在阿根廷国家情报机构的协助下，在尼加拉瓜组织并资助了右翼准军事组织，即 Contras。追踪该计划的秘密资金导致了伊朗门事件的曝光。

1985 年，里根政府被国会授权在伊朗出售武器，但未能成功解救在黎巴嫩的美国人质；里根后来承认不知道下属正在非法将其中的收益转移给 Contras；海军陆战队 中校 奥利弗·诺斯、国家安全顾问约翰·波因德克斯特的助手，为此事承担了大部分责任。由于丑闻，里根的支持率在 1986 年一落千丈，许多美国人开始严重质疑他的判断能力。虽然总统在他最后两年的声望有所提高，但他再也不会像 1985 年那样获得支持了。可以预见的是，民主党在 1986 年的中期选举中重新控制了国会。与此同时，奥

利弗·诺斯（Oliver North）在 1987 年在国会作证期间获得了短暂的名人地位。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里根政府也试图推翻古巴和苏联支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独裁统治。里根政府为那里的反叛组织提供秘密的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

在阿富汗，里根大力加强对当地反对苏联代理政府的圣战者战士的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为他们提供毒刺防空导弹。美国的盟友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也向叛军提供了大量援助。由于苏联军队陷入游击战，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减少并最终终止了他的国家对阿富汗的承诺。

里根还表示反对越南在柬埔寨设立的共产主义政权以及后来的洪森政权，后者在越南入侵该国后推翻了种族灭绝的红色高棉政权。政府批准向当地叛乱分子提供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里根政府还支持联合国继续承认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里根还继续支持专制的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他是一位狂热的反共主义者。在 1984 年的总统辩论中，他解释了他的政府对马科斯的支持，他说：“我知道从目前的民主权利的角度来看，菲律宾有些事情对我们来说并不好，但什么是替代方案？这是一场大型的共产主义运动”—— 指的是当时在菲律宾活动的共产党游击队。美国在菲律宾也有重要的战略军事利益，因为知道马科斯政府不会篡改在菲律宾维持美国海军基地的协议。马科斯后来于 1986 年被科拉松·阿基诺领导的大部分和平的人民力量运动赶下台。

里根对曾经是自由主义者宠儿的联合国持严厉批评态度。他批评了他认为的联合国腐败、低效率和反美主义。1985-1987年，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其文化使命失败，并开始刻意扣留联合国会费。美国决策者认为这种策略是在联合国维护影响力的有效工具。当联合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改过自新时，美国回来并支付了会费。

冷战的最后阶段

里根政府对苏联采取强硬立场。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初期，总统将敌对的超级大国称为"邪恶帝国"。虽然是吉米卡特在苏联干预阿富汗后正式结束了缓和政策，但 1980 年代初期的东西方紧张局势达到了自古巴导弹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里根推出的战略防御计划（SDI）恶化了美苏关系。 SDI 在当时被普遍称为"星球大战"计划，是一项耗资数十亿美元的导弹防御系统研究项目，该系统可以击落来袭的苏联导弹。

虽然苏联在 1981 年里根上台之前在国际舞台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例如1976 年统一其社会主义盟友越南，以及东南亚、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一系列社会主义革命，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联系；——但是，这些只是掩盖了它的弱点。苏联经济遭受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并在 1970 年代开始陷入停滞。1980 年，当卡特还是总统时，克里姆林宫散发的文件表达了一种悲观的观点，即莫斯科最终无法赢得与美国的技术或意识形态之战。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上台后，东西方紧张局势迅速缓和。在 1982 年以来连续三位年长的苏联领导人去世后，苏联政治局于 1985 年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标志着新一代领导人的崛起。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相对年轻的改革型技术官僚迅速巩固了权力，为政治和经济自由化提供了新动力，并推动了与西方建立更友好的关系和贸易。

戈尔巴乔夫着眼于改革，努力促进消费品的生产；然而，一方面是由于冷战军备竞赛的双重负担，另一方面是由于国际社会主义盟友需要苏联提供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所以，苏联不可能同时满足这些经济战略发展目的。

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苏联决策者越来越接受里根政府的警告，即美国将使军备竞赛成为苏联的巨大负担。苏联人已经在国防上投入了大量资金，而开发针对 SDI 的制衡系统，则远远超出了他们的经济能力。因此，苏联采取的决策是，对美国让步、和经济重组。在苏联国内，这最终使戈尔巴乔夫无法重新确立中央控制权。此后，里根政府的鹰派人士认为，美国国防开支增加所带来的压力是苏联改革的额外动力。

在冷战期间，世界分裂成西方国家集团（以“北约”为核心）和东方国家集团（以“华约”为核心）的两个对立的集团。然而，从 1980 年代后期开始，东欧华沙条约的政权开始接连迅速瓦解。1989年，“柏林墙倒塌”被视为东欧共产主义政府垮台的象征。随着1987年中程核力量的签署，以及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古巴从安哥拉撤军，美苏关系在这十年后半期有了很大

改善。

这些事态发展，削弱了美国向智利和韩国等专制政府提供支持的理由；这些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与华沙条约国家在同一时期经历了民主化进程。

乔治 HW 布什政府

里根的副总统乔治·H·W·布什轻松赢得了 1988 年的共和党提名，并在 1988 年的选举中以压倒性优势击败了民主党候选人、马萨诸塞州州长迈克尔·杜卡基斯。杜卡基斯在竞选中犯了许多错误，其中最著名的是杜卡基斯驾驶M1 艾布拉姆斯坦克的竞选广告。

外交

与里根不同，布什淡化政治志向，强调谨慎的管理。他的主要外交政策顾问是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和劳伦斯·伊格伯格，以及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布什进入白宫成为总统之前，曾经在外交事务方面取得了长期而成功的成就，包括在联合国担任驻华大使、中央情报局局长以及作为副总统对 65 个国家进行正式访问。

布什总统任期内发生的重大地缘政治事件包括：

1989年6月中国武力镇压天安门广场抗议运动；这在美国和世界各地受到广泛谴责。

1989年12月美国入侵巴拿马推翻独裁者。

与苏联签署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核裁军条约。

1991年海湾战争中，美国击败了入侵科威特的伊拉克。

在冷战中战胜苏联共产主义。

1989 年的民主革命和共产主义的崩溃，尤其是在东欧

1990 年德国统一，民主的西德吸收了前共产主义的东德。

苏联在1991年解体；苏联被一个相对而言对西方友好的俄罗斯等14个国家所取代。

在上述事件中，除了中国的1989年六四屠杀之外，所有的事件都强烈地支持美国。

布什在入侵巴拿马时，以及START条约方面，采取了主动立场。除此以外，在上述所有事件中，布什都主要是一个被动的观察者，试图不干涉或幸灾乐祸。

考虑到有利的结果，除了布什不愿谴责天安门广场镇压外，学者们普遍对布什的外交政策给予高度评价。（布什认为与中国的长期良好关系太重要了，不能危及）。在获得民意支持方面，布什从来没有试图为自己的外交政策动员多少民意支持，在国内事务中，他的支持率一直在下滑。

冷战后

布什主张出现“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更不受恐怖威胁，在追求正义方面更强大，在寻求和平方面更安全。世界各国，东西方国家的时代才能繁荣昌盛，和睦相处。”

波罗的海国家的民族主义鼓动首先是发生在立陶宛，然后是其他两个国家，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它们宣布脱离苏联而独立。1991 年 12 月 26 日，苏联正式解散，分为十五个组成部分。

冷战结束，南斯拉夫和索马里等国政府垮台留下的权力真空，揭示或重启被数十年专制统治所掩盖的其他仇恨。尽管美国公众，甚至政府内部都不愿意卷入与美国几乎没有直接利益相关的局部冲突，但这些危机成为西方联盟重建时所需要针对的基础，而此时共产主义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为此，比尔·克林顿总统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宣布："今天，随着旧秩序的过去，新世界更加自由但更加不稳定。共产主义的崩溃引发了旧的敌意和新的危险。显然，美国必须继续领导我们做了很多努力所创造的世界秩序。"

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寻求重振冷战体制结构，尤其是北约，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多边机构，通过这些机构推动全球经济改革。北约最初计划扩展到匈牙利、波兰和捷克共和国，此后进一步向东移动。此外，美国的政策特别强调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体现在 1994 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

美国经常对据称资助恐怖主义、参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或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采取经济制裁措施。有时对这些举措达成共识，例如美国和欧洲在1989 年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遭到暴力镇压后对中国实施武器禁运，以及联合国安理会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对伊拉克实施制裁。然而，对其他单边制裁（例如对伊朗和古巴实施的制裁）的支持有限，导致国会采取措施惩罚违反美国本国法律条款的外国公司。

一位有影响力的当代美国政策评论家马克斯·布特认为，美国在冷战后的雄心勃勃的目标是这样设计的：

“在经历过暴政的土地上灌输民主，希望这样做可以阻止恐怖主义、军事侵略和武器扩散……这是一项雄心勃勃的事业，其中最成功的例子是二战后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在这些情况下，美国陆军帮助将军国主义专政转变为自由民主的支柱——这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发展之一。”

经济学

最初，布什继承了 1982 年最后几个月开始的强劲反弹的经济。然而，美联储继续实施限制性货币政策，限制了 1980 年代后期的经济增长。当 1990 年石油价格冲击在 1990 年中期袭来时，消费者支出收缩，经济进入衰退。与1980 年代初期的衰退不同，1990 年开始的衰退相对温和。一些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和东北部，而南部大部分地区受影响较小。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imeline_of_United_States_history_(1970%E2%80%931989)

美国历史时间轴（1970-1989）

水门事件使尼克松成为美国第一位在任期辞职的总统。

理查德·尼克松总统

1970 年 –庆祝第一个地球日。

1970 年 –肯特州立大学和杰克逊州立大学在学生抗议活动期间发生枪击事件，并变得越来越暴力。

1970 年——由电台名人 Casey Kasem主持的美国 40 强节目成为第一个成功的全国联合广播节目，每周倒计时。

1970 年 –公共广播系统(PBS) 开始运营，接替国家教育电视台(NET)。

1970 年 – 歌手兼作曲家、吉他手、音乐家，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在 27 岁时死于吸毒过量。

1970 年 – 歌手贾尼斯·乔普林(Janis Joplin)因吸毒过量去世，年仅 27 岁。

1970 年 –环境保护局成立。

1970 年 –职业安全与健康法案(OSHA) 签署成为法律。

1971 年 – 歌手吉姆·莫里森(Jim Morrison)因吸毒过量去世，年仅 27 岁。

1971 年 –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结束了美国金本位货币政策，即尼克松冲击

1971年-电台和电视烟草广告禁令

1971 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情景喜剧《全家福》在 CBS 首播。

1971 年——第26 条修正案获得批准，允许 18 岁的人投票。

1971 年 – 在纽约时报公司诉美国政府案中，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五角大楼文件可以发表，拒绝政府禁令作为违宪的事先限制。

1972年-总统尼克松 访问中国，开启了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正式关系正常化的重要一步。

1972 年 -与苏联签署了反弹道导弹条约。

1972 年——第一位非裔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球员杰基·罗宾逊去世。

1972 年 –水门事件丑闻：五名男子因在华盛顿特区水门事件办公大楼内盗窃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而被捕

1972 – 尼克松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连任。

1972 年——阿波罗 17 号飞向月球，并成为飞往那里的最后一次载人任务（截至 2021 年 5 月）。

1973 年——尼克松总统和阿格纽副总统开始第二个任期。

1973年-前总统林登·约翰逊逝世。

1973 年 - 林登约翰逊总统的国葬

1973 年 – Roe 诉 Wade 最高法院的裁决推翻了反对堕胎的州法律。

1973 年——《巴黎和平协定》结束了美国对于越南战争的直接参与。

1973 年 –参议院水门事件听证会开始，弗雷德·汤普森发现存在尼克松的秘密录音带。

1973 – Skylab作为美国的第一个空间站发射升空。

1973 年 -作为腐败案件辩诉交易的一部分，副总统Spiro T. Agnew耻辱地辞职。根据宪法第25修正案，尼克松任命来自密歇根州的国会议员、福特为副总统。

1973 年 – 水门事件丑闻：尼克松总统解雇了两名司法部长，他们任命的代理检察长接替人解雇了水门事件特别检察官，以处置秘密磁带。

1973-1974——美国受到阿拉伯石油禁运的影响；由于汽油和取暖油供应短缺，汽油价格飞涨。作为回应，夏令时从 1 月份开始（比平时提前了近四个月），并且全国限速降至 55 英里/小时。

1974 年 - 1974 年爆发美国历史上第二大系列龙卷风（148 次），袭击了美国 13 个州和加拿大的一个省；315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

1974年-亚特兰大勇士队的汉克阿伦打破了棒球职业生涯的纪录。

1974 年——水门事件丑闻：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投票弹劾总统

1974 年 - Lynyrd Skynyrd发行了电影《Sweet Home Alabama》。

杰拉尔德·R·福特总统

1974 年——尼克松总统辞职，成为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辞职下台的美国总统。福特副总统成为第 38 任总统。纽约的纳尔逊·A·洛克菲勒(Nelson A. Rockefeller)成为第二个根据宪法第 25 条修正案被任命为副总统的人。

1974 年 – 水门事件丑闻：福特赦免尼克松在任总统期间对美国犯下的任何罪行，认为这符合“国家的最佳利益”。

1974 年 –取消了在美国境内持有私人黄金的限制。

1975 年——福特总统签署赫尔辛基协议。

1975年——电影《大白鲨》上映。这是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电影生涯的里程碑。

1975 年——跨阿拉斯加管道系统的建设开始。

1975 年——越南战争结束。

1975 –西贡陷落

1975 年——比尔盖茨创立微软，最终将主导家用电脑操作系统市场。

1975 年——阿波罗-联盟号测试项目开始，美国阿波罗号宇宙飞船和苏联联盟号宇宙飞船在轨道上对接，标志着两国航天器之间的首次此类连接。

1975 年 – 福特总统在 17 天的时间里躲过了两次暗杀。

1975 年 - 电视连续剧《命运之轮》和《周六夜现场》在NBC首播。

1975 年 –索尼的Betamax成为第一个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家庭视频录制设备。

1976 年——1976 年的版权法对美国版权法进行了彻底的修改。

1976 年——史蒂夫·乔布斯、史蒂夫·沃兹尼亚克和罗纳德·韦恩创立了苹果公司。

1976 年——美国人庆祝美国建国二百周年。

1976 – 吉米卡特当选美国总统。

吉米卡特总统

1977 – 卡特宣誓就任第 39 任总统，蒙代尔担任副总统

1977 年 – 第一台家用个人电脑Commodore PET 开始零售。

1977 年 - 电视迷你剧《Roots》在 ABC 播出，获得了观众的好评和记录。

1977 年——科幻太空电影《星球大战》在影院上映。

1977 年 - 1977 年纽约市停电持续 25 小时，导致抢劫和其他混乱。

1977 年——摇滚之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在格雷斯兰(Graceland) 的家中去世，享年 42 岁。75,000 名歌迷在孟菲斯的街道上排队参加他的葬礼

1977 年 – Atari 2600成为第一个成功的家庭视频游戏系统，普及了基于微处理器的硬件和包含游戏代码的卡带的使用

1978 –大众汽车成为第二家在美国开设工厂的非美国汽车制造商（仅次于劳斯莱斯），开始生产Rabbit。

1978 –戴维营协议开始，梅纳赫姆·贝京总理（以色列）和安瓦尔·萨达特总统（埃及）在马里兰州戴维营开始和平谈判进程。

1978 年——《汉弗莱霍金斯充分就业法案》签署成为法律，调整了政府的经济目标，以包括充分就业、生产增长、价格稳定以及贸易和预算平衡。

1978 年 – 参议院于 1999 年 12 月 31 日投票决定将巴拿马运河移交给

巴拿马人控制。

1978 年——11月 27日，市政主管哈维·米尔克(Harvey Milk)和市长乔治·莫斯康(George Moscone)在旧金山被丹·怀特 (Dan White) 暗杀。

1979 年——三哩岛核事故发生，这是美国历史上灾难性最严重的核电站事故。

1979 年——伊朗人质危机爆发。在此之后，第二次能源危机发生了，石油价格上涨了两倍，并使美国汽油价格首次超过每加仑 1 美元。

1979 年——美国航空公司 191 号航班从奥黑尔国际机场起飞后坠毁，机上 271 人全部遇难，地面上有两人死亡，这是迄今为止美国本土最致命的航空事故。

1979 年 — 面临破产，克莱斯勒应首席执行官李·艾柯卡(Lee Iacocca)的请求获得政府贷款担保，以帮助重振公司。

1979 年——Sugarhill Gang 发行了Rapper's Delight，被广泛认为是第一首主要的嘻哈歌曲。嘻哈音乐运动发生在 1970 年代早期，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

1980年代

1980 年——美国抵制莫斯科夏季奥运会，以抗议 1979 年苏联入侵阿富汗；还宣布在欧盟委员会的支持下对苏联实施粮食禁运。

1980 年——《难民法》签署成为法律，改革美国移民法，并出于人道主义原因系统地接纳难民

1980 年 – 5 月 18 日在华盛顿州发生的圣海伦火山喷发造成 57 人死亡。

1980 – 里根当选总统

1980 年——12月 8 日，前披头士乐队约翰·列侬在纽约市被一名枪手谋杀。

罗纳德·W·里根总统

1981年——罗纳德·里根就任第40任总统（1981年1月20日——1989年1月20日）；乔治布什成为副总统。同一天，伊朗释放人质，标志着伊朗人质危机的结束。

1981 年——小约翰·欣克利 (John Hinckley Jr.)企图暗杀罗纳德·里根 (Ronald Reagan) 。

1981-1982年美国是全球经济衰退的一部分，全国失业率高达9%，部分地区失业率更高，通货膨胀率高达13.5%。1980 年代初期美国经历了经济衰退

1981 年 –肯普-罗斯减税法案

1981 – MTV签约，成为第一个专门播放音乐视频的 24 小时有线网络。

1981年-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一个酒店的人行道坍塌，导致114人死亡和200人受伤，这是9/11之前美国发生的最致命的结构性坍塌。

1981 年——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发射升空，标志着美国自 1975 年以来首次重返太空。

1981 年 – Sandra Day O’Connor成为美国最高法院的第一位女性。

1981 - 8 月，里根总统解雇了 11,345 名罢工的空中交通管制员。

1981-1982 — 6 岁的Adam Walsh被杀（1981 年），以及来自爱荷华州得梅因的 12 岁送报员Johnny Gosch的失踪（1982 年），提高了人们对失踪儿童案件的认识。

1983 年 - 241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黎巴嫩被自杀式炸弹炸死。

1983 年——美国入侵格林纳达。

1983 年——歌手凯伦卡彭特死于神经性厌食症的并发症，提高了人们对饮食失调的认识。

1983 年 –克莱斯勒向公众推出了其小型货车——道奇大篷车和普利茅斯航海者（作为 1984 款车型）。

1983 年 - 里根政府创建了绰号为星球大战的战略防御计划，以阻止核导弹袭击。

1984年-大多数东方集团国家（苏联以及东欧共产主义国家）抵制在洛杉矶的夏季奥运会。

1984 – 里根当选连任。

1984 年 – 随着快克（一种可吸的可卡因）首次引入洛杉矶地区，毒品问题愈演愈烈。

1984 年 – 通过《60 分钟》和《20/20》等节目的高调媒体报道，提高了关于恋童癖者以及对儿童性虐待的认识。

1985 年——里根总统和布什副总统开始他们的第二个任期。

1985 年——伯恩哈德·戈茨(Bernhard Goetz) 在射杀四名声称意图抢劫他的年轻人后，被控定罪。

1985 年 -职业摔跤比赛进入主流媒体，成为文化偶像。

1985 年 - 世界对第三世界国家饥荒的认识引发了《我们是世界》和《Live Aid》公益歌曲和流行音乐演唱会的受关注度。此外，随着演员洛克哈德森的去世，人们对艾滋病（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的认识也提高了。

1985 年——乡村音乐歌手威利·纳尔逊和约翰·梅伦坎普组织了第一场“农场援助”音乐会，为面临金融危机的家庭农民筹集资金。

1985 年 –福特汽车 Taurus和Mercury Sable（作为 1986 年型号）以及任天堂娱乐系统向公众发布。

1985 年 –格拉姆拉德曼霍林斯平衡预算法案

1986 年 –伊朗门事件

1986 年——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升空 73 秒后爆炸，机上七人全部遇难（包括学校教师克里斯塔·麦考利夫），并使美国的太空计划搁浅了 2.5 年。

1986 年——里根总统签署了《枪支所有者保护法》。

1986 年 – 1986 年税收改革法案

1986 年——马绍尔群岛从美国独立。

1986 年 – Fox Broadcasting Company 成立，成为自DuMont以来第一个提供夜间节目的“第四大网络新闻电视” 。

1987 年 – 各种丑闻涉及流行的电视布道家，包括Jim Bakker、Oral Roberts和Jimmy Swaggart。

1987 年——在访问德国柏林期间，里根总统向苏联总书记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挑战“推倒这堵墙！”（指柏林墙）。

1987 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黑色星期一单日下跌 22.6% 。

1987 年 11 月 22 日 - 一名戴着Max Headroom面具的身份不明的男子突然出现在芝加哥的WGN-TV和WTTW电视台上。这是迄今为止最臭名昭著的电视广播中断。截至 2019 年，这个谜团仍未解开，然而，Reddit上的许多人声称他们是这起犯罪的幕后黑手。

1987 年——里根总统和苏联总理戈尔巴乔夫在华盛顿特区签署了《中程核力量条约》。

1988 年 – 在肯塔基州卡罗尔顿附近，一名醉酒司机的汽车撞上教堂巴士，造成 27 人死亡；社会对于酒后驾驶危险的意识得到提高。

1988 年——严重的干旱和大规模的热浪席卷了中西部和落基山各州。危机随着1988 年黄石公园火灾达到了顶峰。

1988 年 -在挑战者号航天飞机之后，发现号第一次飞行发射。

1988 – 布什当选总统

1988 年——《中程核力量条约》生效。

乔治·HW·布什总统

1989 年——布什宣誓就任第 41 任总统，奎尔就任副总统。

1989 年 -时代公司和华纳通信公司宣布合并计划，组建时代华纳公司。

1989 -埃克森公司瓦尔迪兹油轮在阿拉斯加的威廉王子湾发生石油泄漏；1080万加仑的石油泄漏到原始的野生动物栖息地。

1989 年 –一位痴迷的粉丝谋杀了女演员丽贝卡•谢弗(Rebecca Schaeffer)，这提高了人们对跟踪犯罪的认识。

1989 年 –飓风"雨果"袭击加勒比海和美国东南海岸，造成 70 亿美元的损失。

1989 年 – 1989 年 Loma Prieta 地震在大旧金山湾区造成 63 人死亡。地震发生在1989 年世界棒球系列赛第 3 场比赛中，ABC在电视广播中现场直播。

1989 年——布什总统宣布发动"毒品战争"。

1989 年 - 动画电视情景喜剧《辛普森一家》在福克斯电视台首播。

1989 年——布什总统和苏联总理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表明两国之间的冷战可能即将结束。德国柏林墙的倒塌在世界其他地方具有巨大象征和号召意义。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eagan_Era

里根时代

历史学家和政治观察家强调，在里根时代，由里根总统所领导的国内和外交政策，产生了持久的影响。里根时代的定义普遍包括1980年代，而更广泛的定义也可能包括1970年代后期、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甚至2020年代。在2008 年出版的《里根时代：一段历史，1974-2008年》一书中，历史学家和记者肖恩・威伦茨认为，里根主宰了这段美国历史，就像富兰克林・D・罗斯福及其新政遗产主宰了它之后的四十年一样。

里根时代所包括的范畴，超越了里根本人的思想和个性；他通常被描述为基础广泛的保守运动的领导者，其思想主导了税收、福利、国防、联邦司法和冷战等领域的国家政策制定。里根时代的其他主要保守派人物和组织包括杰瑞・福尔韦尔、菲利斯・施拉夫利、纽特・金里奇和传统基金会。在里根总统任期内成立的伦奎斯特法院作出了几项保守的决定。里根时代更广泛的定义也包含了，——杰拉尔德福特、吉米・卡特、乔治・HW・布什、比尔・克林顿、乔治・W・布什、巴拉克・奥巴马、唐纳德・特朗普和乔・拜登的总统任期。

自由派普遍哀叹于里根时代；而保守派则普遍赞扬它并呼吁它在 21 世纪延续。自由主义者也受到显着影响，导致了第三条道路。

里根政府上任后，实施了以供给链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经济政策。1981 年《经济复苏税法》减少了税收，同时政府还削减了国内开支并增加了军费开支。在乔治·HW·布什和克林顿政府期间，不断增加的赤字推动了增税的通过，但随着2001 年经济增长和税收减免和解法案的通过，税收再次被削减。在克林顿担任总统期间，共和党赢得了个人责任和工作机会法案的通过，该法案对那些接受联邦援助的人施加了一些新的限制。

在 2008 年为民主党提名竞选时，巴拉克奥巴马解释了里根如何改变国家的轨迹：

“我认为罗纳德·里根以理查德·尼克松和比尔·克林顿都没有的方式改变了美国的发展轨迹。他让我们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因为这个国家已经做好了准备。我认为他们觉得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的所有过度行为和政府已经太大，但政府在其运作方式方面没有太多责任感。我认为。。。他只是挖掘了人们已经感受到的东西，那就是我们想要清晰，我们想要乐观，我们想要恢复那种一直缺失的活力和创业精神。”

====

时期

大多数历史学家把“里根时代”看作是从1980年的里根当选总统开始；并且把里根时代的起源看作是1970年代。例如，卡尔曼（2010）探讨了 1970 年代的多重危机，这些危机侵蚀了人们对自由主义解决方案的信心：——宗教权利的兴起和对同性恋权利运动的反对、女权主义、平等权利修正案、基层对联邦法官下令乘坐公交车的方式的反对，在越南的失败，与苏维埃政权缓和关系的挑战、进口汽车和纺织品的挑战，担心去工业化的铁锈地带的倒塌，物价飞涨，滞胀、能源危机，以及伊朗人质危机期间国家遭受的屈辱，以及国家怀疑其辉煌岁月是否已经过去时的不安感。卡尔曼逐步展示了一个又一个政治选择崩溃的过程，从而奠定了里根时代的到来的背景。

“里根时代”一词通常仅指里根总统任期内的美国，但它也具有包含其他时期的扩展含义。在老布什总统任期（1989- 1993年），在克林顿总统任期（1993- 2001年），和乔治•W•布什总统任期（2001- 2009年）往往被视为里根时代的延伸。威伦茨还认为包括福特总统任期（1974-1977）和卡特总统任期（1977-1981）。

里根时代的终点往往被视为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在2008年的当选。2010 年和2014 年的中期选举似乎使人们对里根时代的真正结束产生了怀疑，因为保守派共和党人赢得了众议院和后来的参议院的两项重大胜利。然而，奥巴马政府推行的全面政策与里根时代的社会政策形成了明显的决裂，因为美国人越来越支持同性婚姻和大麻合法化等社会问题。在2016年大选中获胜的唐纳德•特朗普的崛起，是否意味着里根时代的延续，还是代表了美国政治的范式转变，引发了争论。政治学家Stephen Skowronek认为，特朗普的选举表明里根时代仍在继续。Skowronek 将奥巴马与伍德罗•威尔逊

和理查德·尼克松等前总统进行了比较，他们在他们自己的政党在联邦层面上普遍占少数的时候执政。朱莉娅阿扎里认为，特朗普的当选表示，在政治的新循环中开始了新的周期。

====

崛起

威伦茨将里根时代的开始追溯到水门事件丑闻，该丑闻结束了理查德尼克松的总统任期，并为新的共和党领导人创造了机会。随着水门事件丑闻、约翰·肯尼迪被暗杀、越南战争和恶劣的经济状况，在 1970 年代中期，公众对政治领导人普遍疏远。人口从城市到郊区的大规模流动导致了新的选民群体的产生，他们对新政经济政策和政治机器的依恋程度较低。里根和其他保守派成功地提出了保守思想，作为对自由主义新政（以高税收和高福利政策为主要特征）失望的公众的替代方案。里根的魅力和演讲技巧帮助他将保守主义塑造为对国家的乐观、前瞻性愿景。里根曾经在1976年共和党总统初选中挑战尼克松的继任者、现任总统杰拉尔德福特。福特在 1976 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击败里根，赢得总统候选人提名，但在大选中输给了民主党候选人吉米卡特。

卡特在担任总统期间，疏远了许多在 1976 年投票给他的人，包括他自己党内的许多人。在1980 年的民主党初选中，卡特击败了来自左翼参议员泰德肯尼迪的强烈挑战，后者曾在建立国家医疗保险制度问题上与卡特发生

冲突。卡特和民主党作为一个整体，也疏远了其他选民，而保守运动则集结了选民力量。持续不景气的经济引发了人们对税收的不满，选民对那些主张“小政府”政策哲学的人越来越接受。平权行动计划也引起了强烈反对，因为一些白人声称这些计划构成了反向歧视。卡特总统在 1976 年赢得了多数福音派新教选民的支持，但日益政治化的基督教右翼开始强烈反对卡特的总统职位。这些宗教选民中的许多人受到了诸如道德多数派的杰瑞·福尔韦尔(Jerry Falwell)和反对批准平等权利修正案的菲利斯·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等领导人的公开竞选活动的影响。另一个重要的保守组织，传统基金会，作为一个重要的保守派智囊团出现，制定和倡导保守派政策。

在保守派运动中许多人的支持下，里根在1980 年的共和党初选中击败了当权派最喜欢的乔治·H·W·布什、温和的国会议员约翰·B·安德森和其他人。为确保政党团结，里根在1980 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任命布什为他的竞选伙伴，尽管布什将里根的供给链经济学描述为“巫师经济学”。

在与卡特总统进行的大选竞争过程中，里根动员了他的选民基础，宣扬他的经济保守立场，而卡特竞选阵营则试图将里根描绘成一个危险的极端分子。国内经济状况改善帮助卡特在 10 月的民意调查中超过了里根，但里根在 10 月 28 日的辩论中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选举日，里根在普选中以微弱优势赢得多数票，但在选举人票中以较大优势赢得了44 个州。在同时举行的国会选举中，共和党人赢得了众议院的多个席位，并自 1950 年代以来首次控制了参议院。

里根总统任期

上任后，里根认为美国面临着可怕的危机，解决这场危机的最佳方式是通过保守的改革。他的主要政策优先事项是增加军事开支、减税、减少非军事联邦开支和限制联邦法规。里根认为，减少政府的作用将导致经济增长加快，进而导致收入增加，有助于偿还国债。里根政府与国会议员杰克坎普合作，推出了一项重大的减税法案，该法案赢得了足够多的共和党人和保守派民主党人的支持，以通过国会两院。1981年8月，里根签署了1981年经济复苏税法，它颁布了三年内 27% 的全面联邦所得税削减，以及一项减少联邦支出的单独法案，特别是在反贫困计划中。

里根任期初期的经济衰退，加上减税和军费开支的增加，导致赤字不断增加。民主党在1982 年的中期选举中赢得了众议院的几个席位。里根的支持率下降到35%，许多民主党人认为他们的政党可以在1984年的总统大选中击败里根，并推翻里根政府的一些政策。1983 年开始的强劲经济复苏提高了里根的支持率，政府认为减税是扭转经济的主要因素。在1984年的总统选举中，里根在没有面临严峻挑战的情况下赢得了他所在政党的再次提名，而前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则赢得了民主党的提名。在选举日，里根赢得了 59% 的选票，并一举拿下 49 个州，引发了美国政治永久性共和党化的猜测。

尽管连任，里根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在制定保守政策方面面临着更大的困难。他的国内议程受到不断增长的赤字和伊朗门事件的影响。然而，当里根和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于 1987 年达成中程核力量条约

时，政府确实赢得了重大的外交政策成功。里根还任命了许多保守派法官，包括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和威廉·伦奎斯特。最高法院将在随后的几年中做出一些保守的决定。布什副总统在1988 年的共和党初选中击败了参议员鲍勃·多尔和电视布道家帕特·罗伯逊。在里根人气的帮助下，布什在1988 年的总统选举中击败了民主党候选人迈克尔·杜卡基斯。

里根的继任者

老布什的总统任期主要集中在外交事务上，随着东方集团（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崩溃，他面临着一系列重大的外交政策问题。布什的许多高级外交政策任命，包括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都是受亨利·基辛格影响的现实主义者。在柏林墙倒塌和其他与苏联结盟的国家经历动荡的同时，布什与戈尔巴乔夫建立了友好关系，这在苏联同意德国统一方面发挥了作用。

布什于 1989 年成功入侵巴拿马，并在 1991 年的海湾战争中领导了一个反对伊拉克的多国联盟。美国在海湾战争中迅速获胜后，布什的支持率飙升。然而，布什政府在国内政策上取得的成功较少，赤字仍然是一个主要问题。尽管布什曾在 1988 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承诺不会增税，但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格拉姆-拉德曼-霍林斯平衡预算法案的影响，该法案是 1985 年的一项法律，据称要求到 1993 年实现平衡预算。在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影响下，布什同意签署1990 年综合预算和解法案，其中包含增加税收和削减开支的组合。尽管布什在 1980 年代向右转，但从未完全接受布什的保守派共和党人对这笔交易感到愤怒。

除了政府面临的挑战之外，美国于 1990 年进入衰退，全国失业率上升至 7.8%。即使苏联在 1991 年 12 月垮台，也没有给布什带来多大的帮助，因为许多保守派将美国长期竞争对手的垮台归功于里根的政策。布什在 1992 年共和党总统初选中击败右翼评论员和前里根官员帕特・布坎南 (Pat Buchanan)的挑战后，赢得了该党的再次提名。在大选中，布什面对民主党州长比尔克林顿的挑战，以及，独立候选人罗斯佩罗・佩罗发起的一场民粹主义运动，后者重点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布什未能平衡预算。克林顿是中间派民主领导委员会(DLC)的创始成员，专注于糟糕的经济状况。在三方竞选中，克林顿赢得了多数选举人票并获得了43%的普选票，而布什获得了37.4%的普选票，佩罗获得了18.9%。

克林顿的胜利使他成为自吉米卡特 1981 年卸任以来的第一位民主党总统。尽管克林顿赢得了早期的立法胜利，例如通过了1993 年的《家庭和医疗休假法案》和 1993 年的《综合预算和解法案》，但他的政府却因一系列丑闻和医疗改革提案的失败而受到损害。在1994年的中期选举中，共和党控制了国会参众两院。作为回应，克林顿聘请了政治顾问迪克莫里斯，他提倡在共和党和民主党国会议员之间进行三角化战略。在涉及两次政府停摆的重大预算僵局中，克林顿赢得了国会对他自己的预算提案的批准，从而避免了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和其他国会共和党人所寻求的大幅削减医疗保险和其他计划。1996年，克林顿签署了《个人责任和工作机会法案》，这是一项共和党人起草的法案，该法案对接受联邦援助的人施加了一些新的限制。克林顿在 1992 年竞选期间曾呼吁改革福利制度，希望增加诸如对受助人的工作要求之类的变化。

在1996年的总统大选中，克林顿在普选和选举人票上都以大比分击败共和党候选人鲍勃·多尔。由于共和党人保持对国会的控制，他无法推进他的大部分国内议程。克林顿第二任期期间经济增长尤为强劲，2000 年失业率下降至 4%。1998 年，政府经历了自 1960 年代以来的首次预算盈余。克林顿第二个任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针对克林顿的弹劾程序，这源于他与白宫实习生莫妮卡莱温斯基的婚外情。尽管众议院投票弹劾克林顿，但他被参议院判为无罪，因为所有参议院民主党人和几位参议院共和党人都对这两项弹劾指控投票判其无罪。由于经济强劲，克林顿的副总统阿尔戈尔，大多数华盛顿专家都将戈尔视为2000年总统大选的早期宠儿。然而，在一场以有争议的最高法院裁决告终的极其势均力敌的选举中，前总统布什的儿子、德克萨斯州州长乔治·W·布什击败了戈尔。

布什政府包括前任共和党政府的许多杰出人物，包括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迪克切尼和科林鲍威尔。上任后，布什签署了一项重大减税措施，即《2001 年经济增长与减税和解法案》。9·11事件后，布什政府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反恐战争，针对全球性冲突，基地组织和其他团体。2003年，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废黜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尽管伊拉克战争越来越不受欢迎，布什还是在2004 年的总统选举中击败了民主党人约翰克里。在布什连任两年后，杰克·艾布拉莫夫丑闻、政府对卡特里娜飓风的处理、布什改革社会保障的失败以及伊拉克战争的持续不受欢迎都削弱了布什的公众地位。在布什的声望下降和马克福利丑闻的帮助下，民主党在2006 年的选举中赢得了对国会的控制权。2008 年，房价暴跌导致重大金融危机，标志着一场被称为“大衰退”的长期经济衰退的开始。在金融危机期间举行的2008 年总统大选中，民主党人巴拉克奥巴马击败了共和党人约翰麦凯恩。奥巴马在 2012 年击败共和党候选人米特罗姆尼并赢得连任。在2016 年的总统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尽管失去了普选票，

但还是击败了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在2020 年总统选举中，COVID-19大流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击败特朗普。

====

流行文化

汤姆克兰西写了三部照亮里根时代的畅销小说：《猎杀红色十月》（1984年）、《红色风暴崛起》（1986 年）和《克里姆林宫红衣主教》（1988年），反映了里根时代的冷战价值观。一个邪恶帝国的苏联以及美国价值观和技术的优越性，都是克兰西的惊悚片和里根的豪言壮语的主题。政策精英利用这些小说（以及其中一部电影的拍摄）向美国公众宣传他们的国家安全理念。肯德里克·拉马尔 (Kendrick Lamar)在他的 2011 年专辑Section.80 中有一首名为“Ronald Reagan Era”的歌曲。

里根在漫画书《黑暗骑士归来》（1986 年）和《传奇》（1986-87年）中作为一个角色出现。

====

国际

许多学者采取国际视野，将里根时代与英国的撒切尔时代联系起来。正如一位学者所解释的那样：

“在西欧和北美的许多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以 1973-74 年石油价格急剧上涨开始的衰退标志着以增长为基础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拼凑而成的划时代转变......紧随其后的凯恩斯主义的出现不仅仅意味着已经被用来为广泛的经济政策辩护的经济学说的过时。它代表了对社会愿景——凯恩斯福利国家——的重大退步，该愿景推动了国家战略通过社会政策协调利益，在政治上调节市场经济，从而减少阶级和各种社会冲突。”

====

史学

历史学家道格·罗西诺 (Doug Rossinow) 在 2007 年报道说，“在撰写本文时，在学术历史学家中，里根修正主义者——他们认为 1980 年代是一个喜忧参半的时代，在某些演绎中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种观点占据了这个领域”。其他学者同意里根时代的重要性。